



至简中国史

大数据讲述
中国大历史
弘亿◎著

中华文明何以历劫不死，数千年生生不息？

复盘国运 重建史观 | 忘却历史的民族，没有未来

一部脉络清晰、饱含洞见的中国通史
一部流畅、简约，独一无二的国史入门书

史88索或

“一个不懂自己出生前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

△ 一国之国民，应对本国历史抱持温情与敬意 △

朱季海（章太炎关门弟子）门生倾力之作

深度破解国人读史痛点 再兴大众读史热潮 | 一本书读懂中国历史

至简中国史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至简中国史：大数据讲述中国大历史 / 弘亿著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093-7743-7

I . ①至… II . ①弘… III . ①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 ①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7284 号

策划编辑 / 责任编辑：杨 智 (yangzhibnulan@126.com)

封面设计：汪要军

至简中国史：大数据讲述中国大历史

ZHIJIAN ZHONGGUOSHI DASHUJU JIANGSHU ZHONGGUO DALISHI

著者 / 弘亿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版次 /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张 / 18.75 字数 / 326 千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7-5093-7743-7

定价：39.90 元

值班电话：010-66026508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传真：010-66031119

网址：<http://www.zgfzs.com>

编辑部电话：010-66038703

市场营销部电话：010-66033393

邮购部电话：010-660332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编务印务管理部联系调换。电话：010-66032926)

当我们脚踩着历史长河里的石头（序）

这是一本中国历史入门读物，旨在用生动、流畅的语言和一个新的框架结构，引导国民快速读懂中国历史，并讲述华夏——中华民族这一族群（Ethnic groups）整体命运兴衰的历程。

历史是生存竞争的记录。在物种竞争的洪流中，人类通过上百万年的努力，从食物链的中低端攀爬到最顶端；在人类社会内部，生存竞争促使族群分化、淘汰。人类历史上的几万个民族、数千个文明，大部分已经被生存竞争的巨浪淘尽。至今犹存的十万人口以上的民族，全世界只有 300 多个，而其中具有文明原创力的，又是寥寥少数。数千个小型文明体，或者消灭，或者融入更大、更复杂的文明体之中。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特殊的一个。

正如失忆的人要靠信息重建记忆系统一样，经历过“时代脑震荡”之后的中国也要靠历史信息重建价值系统。斗胆预测，几十年内，中国社会必将兴起一股重新思考国史的热潮，果能如此，本书愿意作“为王前驱”式的探索。

解决国民读史的痛点

本书并非定位于一本学术著作，而是专门为普通读者准备的。

如果把中国社会平均计算成一个人，目前其年龄约 40 岁，学历只是初中已经毕业、高一还没读完，观念和学识都在快速变化成长（相比之下，德国、美国平均年龄约 38 岁，受教育年限约 14 年，即大专毕业）。显然，这跟 200 年前甚至 100 年前的中国人平均值已经大不一样。那时候的“平均中国人”只有 30 岁出头，但近乎于文盲，知识、观念均来自传统惯性和上界之灌输。

200 年前的国人，只有少数科举精英能够读正史，大众其实是靠《三国演义》甚至说书唱戏之类来了解历史、形成历史观（合久必分、阴谋权术等）的，今天，显然不能再这样了。不靠《三国演义》，靠什么呢？本书想要作一个适合“平均

中国人”读史的新探索。

这里首先要解决两个痛点。

一是要逾越学术障碍。不管是古代的《三国志》(陈寿)、《靖康稗史笺证》(确庵),还是现代的《殷墟卜辞综述》(陈梦家)、《国史大纲》(钱穆),抑或是海外的《中国:传统与变迁》(费正清)、《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马士),如要把这一类纯学术或半学术著作强加给普通读者,恐怕都不太合适——好像庄子笔下那只海鸥,飘飘然落在国都郊外,齐王向它献上酒肉之宴,却并不符合它的口味。

二是要回答时代关切的问题。时代在快速变化,而史书大都“瞠乎其后”,望尘莫及。社会大转型必经的历程,是普遍知识和价值观的震荡重组,好比全社会每个大脑都在重装系统,这一进程急湍奔涌、波澜壮阔,于无声处听惊雷。对于时代的重大关切,一部好的史书应该作出必要解答。一部好的史书是望远镜,而不是浮云遮望眼。一部好的史书,要辨析历史源流、提供战略视野和历史观,而不是堕落为《甄嬛传》一类宫斗剧。所以,每个时代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历史书。

在以上两个方面,本书都愿意作出探索。

孔夫子也有不足

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在引入西学体系之后突飞猛进,学术成果丰硕,历史作品气象万千。本书从中汲取了智慧和养分,当然,也修正了其中的不足。

就中国通史类读物来说,普通读者常接触到的大概有如下几类:

一是民国年间的学术或半学术作品,那是历史研究的革新时代,各类史学著作灿若云霞、蔚为大观。二是几十年来最主流的“教科书派”,它们曾经山河一片红、稳居核心位置。代表性的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白寿彝《中国通史》。三是《史记》《资治通鉴》等古典作品。

民国年间的历史学界,“史料派”是第一大流派,此派重视考证,反对任何“经学式”发挥,在学术界地位近乎垄断(如钱穆就因此长期不能入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傅斯年有一句名言:史学就是史科学。这种取向,是那时绝大部分史书的底色。因此,民国学术作品对解释历史演进原理大都缺乏兴致。

但对大部分普通读者来说,了解历史的意义在于提炼历史经验,建构认知地图,这是中国传统上最为珍视的智慧形式。知识不等于认知,史料积累不等于历史智慧。历史史料本是碎片化信息,只是“小数据”(局部记录)而不是“大数据”(全面记录)。通过“小数据”来理解历史是远远不够的,何况还有许多“大数据”

淹没在黑暗中。我们既要见树木，还要见森林。可惜，这不是民国年间史学界诸公之所急。

教科书派填补历史空白，蓬勃崛起，史料派在青年中丧失市场份额，犹如齐、鲁之雅乐，不敌郑、卫之新声。教科书派断言解释历史，在历史哲学的巅峰位置引爆思想、在青年群体头脑中重装系统。这是一场宏大的社会政治运动在史学领域的反映。晚清以来风靡半个世纪、具有世界观和思想武器作用的今文经学与之相比，不啻为小巫见大巫。

沧海桑田，变了时代，换了人间。互联网以光速疾驰，教科书望尘莫及。有些历史解释正被反思，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五阶段论”，本是由斯大林同志定型，经郭沫若提倡而变为官方思想的，可这一发明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的真实进程。解释现代社会的出现、生长及其运行规律，教科书派哑然失语，遑论洞见未来。该派一边文笔枯槁丑陋，一边又总是板着脸作权威状，互联网新新人类弃若敝屣，岂非必然？

近些年一度兴起“国学热”，古典作品再度升温，反映出当今社会在重新寻找精神之锚。不过，阅读古典史书，特别需要分辨其中的精华与糟粕。比如说，儒生写史，为了达到其主观说教的目的，往往不惜歪曲事实。以孔子为例，当时鲁国国君先后有四个被臣下弑杀（隐公、闵公、公子般、公子恶），有一个被放逐（昭公），又鲁桓公因窥破齐襄公与妹妹文姜乱伦私通，被齐国暗中辱杀，这些重大事件，孔子作《春秋》均曲笔掩盖。孔子之徒，甚至还公然声称鲁国国君不曾相弑（《礼记·明堂位》文）。至于孟子，他所主张的历史，不少是假的，他所反对的历史，却往往是真的^a。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为塑造“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对陶潜、刘备一类“正面人物”的缺点选择性忽视、过滤掉负面新闻而只作正面报道。

另外，官修史书政治挂帅，史官貌似独立的背后，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到清朝时代，又经历了一次异族政权的系统性阉割。这就是汤因比所谓“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

综合前人，本书追求两个目标：

一、按照最新的学术研究和考古发现，综合之前的历史著作，力求学术准确、叙述得宜。一位法国政治家曾讽刺俄国说：在俄国，历史是沙皇的财产（指其随

^a 蒙文通《古史甄微》辨析《孟子》书中的十四件古事，结论为“孟子所称述者若可疑，而孟子所斥责者翻若可信”。

意摆布捏造)，笔者自信可免于此讥。本书引入了科技考古学、分子人类学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比以往的史书更加接近实真相，这也是前辈学者所未能见的。

二、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探究历史演化背后的原理，找到在历史风暴源头扇动翅膀的那只蝴蝶。

寻找历史的蝴蝶

历史进程如一个巨大混沌，在混沌中辨析源流，可以发现若干规律和因果。

古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之说，把“四维”归结为国家兴亡的最主要因素，这当然不对。真正决定一国历史兴衰的，是两个根本因素：制度和民族基因禀赋。民族基因禀赋代表潜力，而制度决定潜力发挥的程度。国家发展水平为两者之积。民族基因禀赋五光十色，制度系统千差万别，两者的组合让人类世界产生分化。

由于相关学科（如制度经济学）出现较晚，前人对制度的理解并不深刻。对中国历史的考察虽已十分细密，但在一些学者们的认知图景中，制度却在暗处。这就像庄子笔下的猫头鹰的视力，有时明察秋毫，有时却瞠目不见丘山。因此，在笔者看来，历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分期，往往选择的是次要的技术性指标。本书力图对中国历史演化重新梳理，以制度变迁为维度，划分成鸿蒙时代、封建时代、帝国时代、大国问路四个阶段，是为新的框架。

民族基因禀赋通过血统遗传，大致可视为常量。制度则可以视为变量，通过与常量的函数作用，决定着历史兴衰。

当然，历史兴衰非常复杂，驱动因素除上面两个之外，还有很多（相对次要的），历史轨迹是他们的合力作用。如，尚武精神的兴衰就在中国历史上起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大体来说，自上古至西汉是尚武精神的时代，西汉中期尤其是东汉以后，尚武精神就逐渐消失了。尚武精神短暂复兴时，国家变强大（如唐朝、明朝初年），但一旦静止下来，尚武精神渐失，国运便长期低迷。

尚武精神属于文化意识形态范畴，论述文化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兴衰的作用，最著名的著作可能就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了。中国传统上对文化精神领域极其重视。孔子及其后学主张“有教无类”，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究其根源，不过是将文化意识形态提高到“普世”的高度，盖过了种族差异等其他要素，这就像葡萄牙人把天主教作为唯一的认同，不管日耳曼人还是印第安人，只要信仰天主教，就是一家人。

其实，文化意识形态在历史中的作用相对次要。就如同地球公转主要是因为

太阳引力，其他星球的引力相对次要，最大作用只是将地球运动轨道从正圆变成椭圆。文化意识形态就是“其他星球”中的一个。

文化意识形态跟制度一样，对一个民族来说，既可以原创、继承，也可以后天选择。文化选择有时主动，有时被动。人类历史上，被动选择居多。例如，目前人类当中的大部分人所说的语言，其实是举刀屠杀他们祖先的征服者所说的语言。当然也有主动选择文化的，回鹘人原信仰佛教，伊斯兰教崛起东向扩张后，改宗伊斯兰教。鲜卑人原信仰萨满（shaman）教，魏孝文帝时自愿全盘汉化。

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选择发生过多，文化变迁的潮流也一直绵绵不绝。第一次大规模“西学东渐”是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佛教输入；第二次大规模“西学东渐”出现于鸦片战争之后，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主张全盘西化、顾颉刚主张否定中国古史、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代表了这一波思潮的极端状态。

文化可原创，可选择。制度有内生，有移植。考察历史，其成败半由人力半由天，所谓“人力”，即是靠民族天赋基因来发挥作用的部分。

中国再认识：共看明月应垂泪

人类生存要依靠一些神秘的认同。“史”在中国有特殊性，一直以来，它都是构成华夏精神世界的关键载体。

数百年来，自私自利的市侩和乡愿意识统辖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心理，但在这满盈的市侩气氛中，真正中国的“士”，何尝一天放弃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一代代为中国奋斗过的人仆倒了，新生者继续前行，中华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在血火之中如此坚韧，深刻的历史意识功不可没。

但历史意识已不再强健。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有两种方法可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对中国来说，文化精神枯萎并非全不可能。

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任务是古典文明的转换性创造。其中，核心价值系统要在历史中寻找坐标。祭祀、战争、天地、神明、宗族、故乡，这些都是古人重要的人生价值之锚，其中包含着生存的基因和密码。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中国历史如同一轮明月，需要人们泪眼之后的再认识。

人类所有文明体都得面对现代化大转型的考验，这一历程充满风险，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成功者走向繁荣，失败者遭受奴役。在中国历史大转型的洪流之

中，当我们脚踩着激流中的石头，已经可以隐约眺望到彼岸。但是到达彼岸不会那么顺利，激流之中暗礁四伏。历史为我们塑造了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很难飞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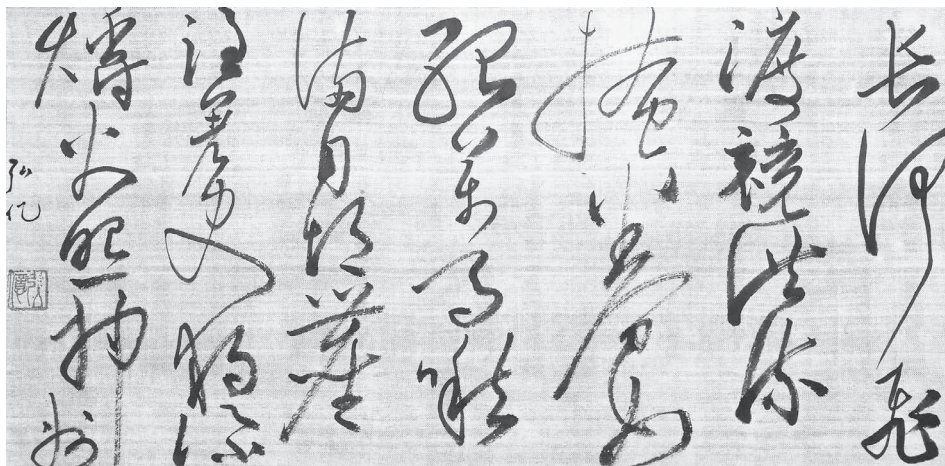
鹤巢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洞察数千年历史浩浩荡荡，个人力量永远不能穷极。

前辈史家早有感触。张荫麟说：“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顾颉刚说：“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连陈寅恪、章太炎、梁启超等史学泰斗，都曾想著述中国通史而不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以区区之小才著史论史（尽管本书算不上通史而只是一本读史的小册子），真好比以斗量海、以管窥天，丑态百出、贻笑大方自不能免。然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师朱季海先生（1916—2011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关门弟子）也曾寄予我厚望和期许，效此蚍蜉之力，以涓滴奉献长河、以一粟奉献沧海，也属义不容辞。

王船山诗云：“六经责我开生面。”所谓“责”我，是一种时代的压力。一本通俗读物本来不必承载过于沉重的意义，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使得承担时代的负荷成为必然。故赋诗一首，是为序：

长河飞渡竞洪流，掩卷如听万马啾。满目胡尘谁著史，独添燭火照神州。

弘亿 2016.8



作者手书自作诗

内容精要 / 001

第一卷 鸿蒙时代

第一章 重建中的中国上古史：中华文明起源 / 002

第二章 神话、历史与民族精神 / 006

神话：民族心灵最深处 / 006

强盛文明的言说 / 006

发现华夏族的性格——中日神话对比 / 009

第三章 三皇五帝时代：传说与历史之间 / 011

远古生活：自由平等 / 011

五帝时代：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 012

华夏族的起源·帝尧时代的景象·禅让的真相

第二卷 封建时代

第四章 夏、商、周三代综述 / 022

夏：天下盟主 / 022

商灭夏：东风压倒西风 / 024

商朝：女人爱化妆，作战用大象 / 025

周灭商：农民打倒商人 / 027

西周：宁静而肃穆的社会生活 / 030

封建国家的成熟：夏商周不是奴隶社会 / 031

001

目
录

生存竞争与融和同化：华夏族的形成 / 033
华夏文明：唯一不曾断绝的古老文明 / 035

第五章 王纲解纽 春秋争霸 / 037

春秋初年：历史大转型的预备期 / 037
东周的内忧外患 / 038
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郑庄公 / 039
齐国崛起，桓公始霸 / 040
春秋时期的“国际公约” / 042
宋襄公是个真贵族 / 044
晋楚争霸，问鼎中原 / 045
两次弭兵会盟：弱小宋国促成“国际”和平 / 050
吴越代兴：春秋争霸的尾声 / 052

第六章 战国：历史大转型 / 054

战国关键词：残酷的总体战 / 055
国家裂变：晋、齐的蜕变与割据称雄的加剧 / 056
改革与变法：战略竞争的时代主旋律 / 057
历史的特例：合纵连横后强秦一统天下 / 060
华夏的本来面目：士的精神 / 064

第七章 百家争鸣：中华文明灿烂原乡 / 067

孔子的身世与儒家学派的形成 / 067
墨子：不尚空谈的伟大行动家 / 070
道家：奠定中国人的世界观 / 071
法家有三派：治国有利弊 / 073
邹衍、杨朱、陈仲、许行 / 075
神秘的人物：鬼谷子其人与纵横家 / 077

第三卷 帝国时代

第八章 秦：法治昙花一现 / 080

秦人前传：源于山东、称霸西戎 / 080

风云际会：公孙鞅入秦 / 082

帝道、王道、霸道，秦孝公选择“霸道” / 083

商鞅的法治思想 / 084

商鞅变法：改变中国历史的推手 / 086

秦国崛起：制度的力量 / 089

一统天下，终结五百年混战：“皇帝”的诞生 / 090

帝国的建设：统一文字与交通 / 093

秦国的国防：北击匈奴、南征南越，建成万里长城 / 095

大秦帝国政治：“利维坦”猛如虎 / 095

强秦为什么灭亡 / 097

楚王之约：楚汉争霸的伏笔 / 100

第九章 汉代：奠定中国人的性格 / 101

汉代的伟大及其流弊：帝国定型与尚武精神的丧失 / 101

前传：楚汉争霸的经过 / 103

史上第一个庶民王朝 / 106

汉初的经济繁荣 / 106

汉武帝亲政：派李广、霍去病大破匈奴 / 107

开疆拓土，设立十三州 / 111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为帝国政权所用 / 114

王莽改制：一场儒家原教旨主义大败局 / 116

东汉：以小市民的心态立国 / 120

暂时强盛，持久暗弱：东汉给后面四百年投下的阴影 / 122

繁荣一时的科技：科学为什么长不大 / 124

东汉影响了欧洲历史 / 126

第十章 魏晋南北朝：华夏第一次生存危机 / 128

五胡乱华前夜：华夏族的腐化 / 129

五胡乱华之初的社会形势 / 131

亡国丑态与衣冠南渡 / 134

相继举兵争权：北方的混战 / 136

灭亡与同化：诸胡的结局 / 138

第十一章 隋唐：帝国的正午 / 141

杨坚代周灭陈：其兴也勃焉 / 142

隋朝国祚短促：其亡也忽焉 / 144

隋唐轶事：李氏家族的非同寻常及李唐血统之谜 / 145

贞观政治：重振士的精神 / 147

玄奘的高僧之路：“留学”19年，推进佛教繁荣 / 148

唐初的拓边：丝绸之路扫清障碍，白江口击退倭国 / 149

历史华章：开元盛世 / 151

怛罗斯之战：影响深远的一次碰撞 / 153

江河日下：动乱前夜的帝国 / 155

安史之乱与体制问题：渔阳鼙鼓动地来 / 156

西风残照与晚唐衰象 / 157

纷乱的五代十国：静海军独立，传国玉玺失踪 / 159

第十二章 宋代：一个文弱的时代 / 161

分裂与胡尘——北宋立国的时代背景 / 161

权术迷雾：宋初三大疑案 / 163

1. 黄袍加身，陈桥兵变

2. 太祖之死，烛影斧声

3. 继位之忧，金匱之盟

大宋朝的弱势国防 / 165

王安石变法：大宋自救能否成功 / 168

屈辱溃败：靖康之变与建炎南渡 / 171

做武将难：宋代武人的命运 / 174

崖山兵败，南宋灭亡 / 177

第十三章 元世界帝国简史 / 180

蒙古前传：困境崛起，铁血统一 / 180

长生天之鞭：20万人征服欧亚大陆 / 183

蛮族入侵：蒙古征宋战争 / 185

压迫统治：四等人制度与“达鲁花赤” / 191

政治紊乱：四十年间九皇帝 / 192

日薄西山：元朝苟延残喘之路 / 193

元末大起义与元朝灭亡 / 195

尾声：蒙古人北逃后的命运 / 196

第十四章 明朝：西方向上，东方向下 / 198

明朝开篇：恢复中华 / 198

朱元璋的个性和明初政治 / 199

明朝失败的帝王教育 / 201

宣扬国威与万国来朝 / 204

郑和下西洋为何难以为继 / 207

明朝危局：土木堡之变 / 209

张居正改革 / 211

东西方历史分野：法律与制度的作用 / 214

晚明的内忧外患：帝国破产 / 216

第十五章 第三次生存危机：清建政始末 / 219

争夺大明遗产 / 219

大清的征服和统治 / 220

版图扩张：领土和民族的整合 / 224

隔绝与落伍：世界潮流中的大清国 / 225

马戛尔尼访华：近代史的开端 / 228

欧洲大炮改变中国：进入世界局势 / 230

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为何都不能救中国 / 234

第十六章 晚清：走向近代 / 237

“列强”各不相同的对华心理 / 237

决定国运的甲午海战 / 239

甲午战败后的救国之路：改良与革命赛跑 / 241

辛亥革命与南方独立 / 243

帝国的终结：大清朝的最后一天 / 245

第四卷 大国问路

第十七章 民国：寻找制度的苦难历程 / 248

大转型：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 / 248

民国建立：风雨飘摇中袁世凯掌权 / 250

效仿欧洲：移植代议制 / 251

移植代议制失败与袁氏复辟 / 252

代议制再次失败与南北分裂 / 254

否定代议制思潮与新思想的诞生 / 257

南方革命政府初步统一中国 / 258

民国建设的黄金十年 / 260

重建代议制及其失败 / 261

从华夏族到中华民族 / 262

第十八章 日本侵华：第四次生存危机 / 263

日本侵略扩张的千年大梦 / 263

战略大棋局 / 265

战争进程：日军大举进犯，中国苦战周旋 / 266

日本终被拖垮 / 269

结局：日本投降与中国重建 / 270

第十九章 世界体系变迁与中国国运 / 272

西方的崛起 / 272

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 / 276

文明集团竞争：华夏中国涅槃重生 / 277

第二十章 复卦：历史大转型进行时 / 279

致谢名单 / 283

鸣谢 / 284

内容精要

上古时期部分

- 人类历史上有数万个民族，生存至今且人口数量超过 10 万的，仅有 300 多个，华夏——中华民族是其中之一。
- 生存竞争是历史演进的终极驱动力。
- 上古时期，战争是生活常态，也是民族和国家形成的催化剂。
- 五帝代代相传至尧舜禹的先古圣王系统，是战国、秦汉时期历史学者的编辑成果，历史的真实进程并非如此。
- 华夏族的特质是什么？分析上古神话、考古资料及历史进程可见，其关键特质是文明原创力。
- 华夏是生存竞争的强者：自中原起源，以武装殖民取代原有土著（不是互相融合）逐渐扩展，最后覆盖东亚大陆，成为最庞大的群体。
- 尧舜禹禅让的传说不是历史史实，却包含着上古时代的情怀和原始民主的基因。

封建时代部分

- 夏、商、周是三个不同部族集团领导权相更替的过程。
- 西周亡于犬戎，类似晋亡于五胡、北宋亡于女真，只是上古史在地理上东西展开，故西周王室向东退却，而不是像后者那样退往江南。
- 春秋霸权体系是一种华夏内部的“国际”秩序，对内提供秩序与和平，对外团结华夏对抗入侵，与战国争霸根本性质不同。
- 战国时期，仁爱和顺服不能带来和平，而武力和实力却经常能。

- 战国时期的列国总体战，掌握了制度力量的邦国最终胜出。

帝国时代部分

- 强秦一统天下，封建社会丰富的组织形态被消灭净尽，政府强、社会弱的格局由此形成，为后世中国的衰弱埋下了伏笔。
- 西汉草根建国，古典贵族集团及其文明生态同步断绝，是为中国历史退化之始。
- 董仲舒对古典儒家学说进行了“转基因”式改造，汉武帝与之联手，形成后世两千多年“文化路径依赖”的起点。
- 汉室只是利用儒家，自身并不相信。
- 自汉至清，历史循环重复。兴衰周期率：如果把国家机构体系比作一台机器，其有效期约 100 年，之后开始腐蚀、朽坏、报废，两个阶段相加一般不超过 200 年。
- 组成“兴衰周期率”的关键部分，还有“马尔萨斯定律”。人口增长幅度则常超过土地承载能力，过剩人口无法生存。消灭过剩人口的方式，往往是残酷的（改朝换代）战争，战后，人口与土地重新平衡。
- 粗略估算，从秦朝末年到清朝，因改朝换代的战乱所消灭的人口，有数亿人之多。
- 国运兴衰与尚武精神密切相关，故东汉是华夏强弱分水岭。
- 王莽大败局，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总后果。
- 淝水之战是华夏文明生存的关键点。
- 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程度，从现代分子人类学成果来看，似乎并不高，传统史书的记载以点代面，很不准确。
- 杨坚建立隋朝，标志着华夏正统的恢复。
- 隋唐盛世，是华夏古来立国精神恢复的自然结果。
- 唐朝时期的怛罗斯之战，是华夏世界跟伊斯兰世界首次碰撞，开启西域此后千年历史演化之机。
- 制度对国运兴衰有长期影响力，良好的制度是一切生产力发挥作用的前提。宋朝亡于制度。
- 国之两维：制度和民族基因禀赋。明朝三百年的苦难与辉煌，最能体现这个国之两维的巨大作用。

- 文化有“路径依赖”，宋代理学先生决定明朝命运。
- 资本主义是一种体系，法治和制度是生长出这个体系的土壤，明朝晚期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根本不可能成长为资本主义社会。
- 儒家用心良苦，想用道德驯服权力，但从未成功。权力源于暴力，道德说教注定苍白，权力不会因此被关进笼子里。
- 儒家学说对上不足以驯服权力，对下却足以驯服人民。

近现代部分

- 国际运动体系决定近代中国国运。
- 清朝士大夫集团中，世界观率先转变者，成为时代领袖，例如奕訢、林则徐；世界观保守不变者，成为时代殉葬品，例如刚毅、徐桐。
- 林则徐、曾国藩二人，在“小我”层面圣贤，在“大我”层面误国。
- 民国历史是一个寻找制度的历史。
- “五四”时期出尽风头的文人，多为大言不惭的肤浅之士。究其学说本源，不过是“基马尔主义”的中国翻版。
- 华夏自上古至秦汉两千多年，处于上升周期；自秦汉至晚清两千多年，处于平台整理——下降周期；自晚清开始，重新步入上升周期。
- 中国处于历史大转型进程中，我们尚未到达彼岸。



作者注意从书斋之外汲取知识，图为与俄罗斯国务委员、车臣共和国总理科什曼交流中俄的历史和发展趋势



作者曾师从于国学大师朱季海，图为与朱季海先生在一起



作者推重制度经济学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姆森的学说，在书中也引入了若干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第一卷 鸿蒙时代

人类告别猿猴进化成人，已有数百万年之久，而有文字记录者不过几千年。

人类在上百万年的时间里，从食物链的中低端攀爬到了食物链的顶端，这段历史因没有文字记录，故称之为史前文明史；文字出现以后的历史，称之为人类文明史。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加速度的过程。西方学者按照人类所使用的工具不同，将人类早期的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其中，石器时代长达百万年以上，占据了人类现有历史中的绝大部分，其中，最后的那点尾巴被称为“新石器时代”，因为所造的石头工具比以前更加精致了。新石器时代距今大约只有1万年左右。

本书不打算深入描述过于久远的历史，只从中华文明的萌芽期写起，也就是俗称的“中国5000年历史”，大致从黄帝时期开始，时间上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个初始阶段，是一个混沌初开、文明曙光乍现的时代，故名曰“鸿蒙时代”。

第一章 重建中的中国上古史：中华文明起源

002

至简中国史

中华文明到底是怎么起源的？

几千年以来，人们依据历史书的记载和儒家典籍的描述，天然地认为“三皇五帝”是我们的祖先，由黄帝代代传到尧舜禹，继而是夏商周。这段叙事世系完备、记载有序，人们对此并没有反思和怀疑过。

但这个观点在 100 年以前被打破了。

当时，质疑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兴起，反映在史学领域，便是顾颉刚、胡适、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疑古派）”的出现。他们用西方整理古代资料的办法，重新梳理了古文献和史书，认为中国的古史传说是靠不住的。顾颉刚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而这个论断，否定了整个“三皇五帝”时代，也否定了古史记载的那个黄金时代。胡适声称“东周以上无信史”。顾颉刚甚至通过“考证”，推断出大禹是一条虫子，而不是一个人。传统古史系统于是崩溃，大一统观念也失去依托。

“此前，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重视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史学学术背景下，‘三皇五帝’都是想当然的事，文明起源不是问题。然而新文化运动的‘古史辨派’，却动摇了这个基本信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说。^a

我们到底从哪里来？中华民族会不会像世上万千民族中的大多数，难以找到自己的起源？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黄洋说：“历史，是人类的集体记忆。失落了源头，人类就陷入失忆。我们历来自称炎黄子孙，可如果炎黄是否存在也还没有搞清楚，难道不尴尬吗？”所以，能否通过扎实的科学的研究，在准确事实的基础上重建上古史的体系，成为百年来史学界的一大重要课题。

^a 《三联生活周刊》报道。

1925年，著名学者王国维提出，考察古史要有文献学和考古学二重证据法。要将地下的考古发现补正文献史料，即以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相互印证，以此辨析历史真伪。比如，如果上古史书记载了某件事，而出土文物恰好也印证了这件事，那这部分记载一定是可信的。

于是，在重建上古史与回答文明起源的问题上，考古学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一线希望。由此，中国学术界才开始主动接纳这门源于西方的学问。以考古来印证古史传说，进而重建可信的古史，是近一个世纪之前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的基本心态。

1926年，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考古学家李济来到山西临汾，考察晋南地区，并对西华阴村进行了发掘。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独立主持的第一项田野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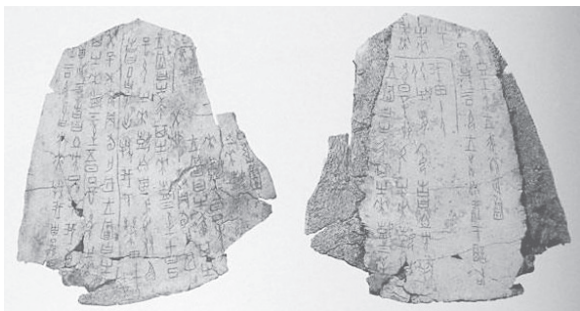
此后，中国大地上开始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到了21世纪，考古研究更加波澜壮阔，例如科技部2002年立项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除了传统的历史、考古等学科外，还集合了环境史学、物理、化学、地理、计算机、动植物、医学、人类遗传学等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门类。

100年来，随着考古学不断取得重大突破，越来越多的古史记载获得了印证。

中国夏商帝王世系，自“古史辨派”质疑以来，只被看作传说，不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顾颉刚主张要把这段历史当故事看）。然而20世纪上半叶以来，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和识别，史记中商代帝王的世系很多都在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证。王国维考证发现，《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帝喾确有其人^a，《史记》记载的商朝世系也是可信的。这样，被古史辨派一度推翻的夏商世系传说，自此重新获得了可信的证据。

1928年，商朝首都遗址“殷墟”在河南安阳被发掘出来。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殷墟的发掘，确证了中国商王朝的存在，重新构建了中国古代早期历史的框架，再次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等传统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确为信史。

1959年，历史学家徐旭生根据上古史籍记载的指引，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葱葱麦



殷墟甲骨文

^a 王国维：《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

田覆盖的地下，发掘出一片城市遗址，此遗址距今 3700 年左右，考古学家研究认定此时期是夏朝晚期、商朝初年。

至此，“双重证据法”所证明的历史，已经被推前到夏商之际。但关于夏禹前的历史，还只是传说，尚未被考古证实。海外学者对这段历史多持怀疑态度。

情况终于有了转机。2002 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距县城约 15 里地的一块麦田里，发掘出一片规模巨大的上古都城，都城在鼎盛时期面积达 4000 多亩地（280 万平方米），跟今天的清华大学校园差不多大。这一发现，将历史进一步推前到了尧舜时代，即夏朝建立之前的时期。

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王族墓地、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作为都城的基本要素，它全部具备。这项考古发现，使考古学所证明的中华文明起点由二里头遗址所标明的距今 3700 年左右的夏商时期推前 500 年，到距今 4200 年左右。而根据古书的年代记录，那正是尧舜时期^a。

遗址中的古观象台，据碳十四方法测定，大约在公元前 2100 年左右使用。这个观象台表明，4000 多年前人们已经通过设计大型的建筑，来测定节气。此地还出土了两个精美的彩绘龙纹陶盘，直径近半米，内饰盘龙，龙口衔松枝，说明华夏族的龙图腾已经出现。又出土一只陶土扁壶，上面写有几个暗红色古文字，比商代的甲骨文早至少七八百年。这都表明，当时的文明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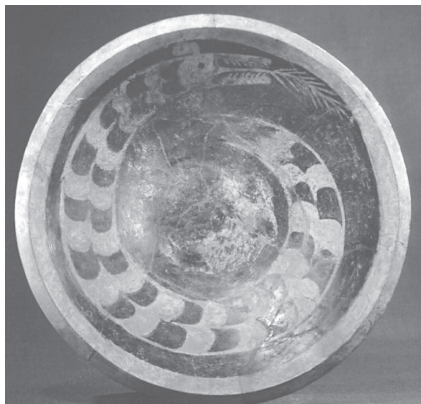
2011 年，考古人员在陕西神木发现了石峁古城遗址。石峁古城的规模，远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浙江，300 多万平方米）、陶寺遗址（山西，270 万平方米）等已知城址，是目前已发现的我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相当于 6 个故宫。石峁古城和周围的卫星城主人是谁，目前尚不确定，有不少学者推断，它很可能是轩辕黄帝领地。其他小型一些的考古发现，更是不胜枚举。

李济先生说：“殷墟发掘的经验启示于我们的就是：中国古史的构成，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账。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资料，一步一步地分析它们构成的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较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写。”

与此同时，蒙文通、徐旭生、傅斯年等众多学者也在文献学方法的基础上，

^a 陶寺遗址时间上与尧舜时期一致，但是不是尧舜二帝本人所居住的都城，因没有直接证据，学界对此持谨慎态度，尚未作完全确定的结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何努在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说：“就目前情况来看，只能说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目前相关科研正在推进中，未来或许会有确定结论。

重新梳理上古历史，试图从理论上还原出上古中国的脉络。“三大集团说”“夷夏东西说”等鸿蒙时代社会状况的新描述，逐渐产生。蒙文通和徐旭生各自独立得出了远古时期中国大地上存在三大部族集团的结论，可谓不谋而合。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龙纹陶盘

尽管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还远未完成，但经过大量的考古实证加古史重新梳理，一个上古时的中国，轮廓已经逐渐清晰。有了大量学术研究的支撑，即便跟几十年前相比，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也已经大大进步。其实，顾颉刚在考证大禹是一条虫时所用的方法颇多附会，后有好事者沿着顾颉刚的逻辑去考证，考证出“顾颉刚”竟然是一只鸟^a。

中国上古历史，百年来经历了相信古典——打碎古典——重建新古典之路。这恰似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轨迹，也是中国人百年来思想历程的缩影。国人曾对古人深信不疑，又曾以“五四”“文革”的铁锤将其彻底打碎。而今天，在我们对西方文明激烈拥抱之后，蓦然回首，却发现那些满载着方块字的残简与黄卷，重又在灯火阑珊处放出光芒。时代浩浩向前，我们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上，清晰地看到这一“正一反一合”的百年路径。

对于鸿蒙时代的描述，本书将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相互参照来展开。以前的历史书中，这两者大都是割裂的，本书尝试将两者交织进行。

在这部分“双重证据式”的历史开始之前，先来讲一讲神话传说的时代。

^a 顾颉刚本人后来放弃了大禹是条虫这一观点。

第二章 神话、历史与民族精神

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的历史靠口口相传，谓之传说，比传说更古老的传说，则成为遥远的神话。神话传说时代和三皇五帝时代，共同组成了我国上古历史的鸿蒙时期。神话是一个民族童年的梦境，我们探索神话，一则是为了考据其中的史实因素，二则是追寻沉淀进民族文化基因，至今还在我们的血管里奔腾的民族精神。

神话：民族心灵最深处

一个成年人，无法记得自己的婴儿时期。与之类似，华夏族幼年时期，由于极为久远，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渺远难辨。所幸，还有代代流传下来的神话，可以让我们一窥华夏族幼年时期的心灵状态。

神话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生命史前状态的追忆，是对自己文明出发点的想象，它包含了这个民族对生命创造与文明创造的最原初理解。因而神话是民族精神最集中、最本色的反映，可谓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缩影，存在于民族心灵最深处。

弗洛伊德的学生、德国心理学家、《周易》的推崇者荣格曾说，一个民族，如果“失掉了神话，不论在哪里，即使在文明社会中，也总是一场道德灾难”^a。

强盛文明的言说

翻开中国上古神话，一派强盛的生命力澎湃而来，如大海潮音，如狮子吼。中国神话的核心在于创造文明。

在古希腊神话当中人类文明所有的一切，比如火、文字、医药、车船等等，

^a 荣格：《集体无意识和原型》。

都是来自于神。而在中国神话中，这些都是由人类英雄所创造。这些英雄死后，中国人以感恩的心态，崇敬、祭祀他们，尊他们为神。这就是中国人的神——他们是创造文明的英雄。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数千个以上的民族，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具有创造文明的能力，华夏族恰是其中之一。华夏族的文明原创力，生生不息，绵延至后世。考察历史史实可知：创造力与学习力兼有，是华夏族的特点之一（相比之下，日本民族学习能力和在他人基础上做优化的能力很强，但原创力却几近为零）。

传说中，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创造房屋，神农氏发明医药，后稷氏创造农耕，黄帝发明衣裳、弓箭、指南车，鲧发明了筑城术，黄帝的妻子嫫祖发明了养蚕织帛，仓颉创造出文字，蚩尤发明兵器，伯益发明凿井，奚仲发明车辆，共鼓、货狄发明舟船，夷发明了战鼓，伶伦发明了音乐，隶首发明了算数……

其中最典型是伏羲画八卦、神农尝百草的故事。

伏羲的故事，是说燧人氏教会人类用火熟食以后，人民不再茹毛饮血，伏羲氏教民“结绳为网以渔”，进入渔猎时代。但是人们仍不懂得风雨雷电的气候变幻，不知道如何应对各种凶险灾难。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思考冥冥之中的哲理。而后，黄河中跃出龙马，背负“河图”，洛水中游出神龟，背负“洛书”。伏羲根据河图洛书的启示，领悟到宇宙乃由阴阳两种根本性力量组成，根据阴阳的不同组合，画出八卦，来象征、指示、预测宇宙间各种现象。实际上，八卦可以理解为上古时期的生存预警符号系统，人们根据八卦的指示，躲避灾祸、延续生存。

神农尝百草的故事，是说神农氏为了医治人间疾病，尝试各种植物，逐渐总结出中药。而神农氏最后也因为误食毒草而死。神农尝百草，很可能是对真实历史的一种临摹，这反映出中医的起源。

上古神话显示，中国人对死亡并没有颓废、恐惧心理。盘古开天辟地，使命完成之后，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他死之后，身体复归于大自然，化成世间万物：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



伏羲交尾图

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道路，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

中国上古神话充满了人类征服自然、生命意志战胜诸神的理想。

大禹治水，讲述的是劳动征服自然的故事。这一传说在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传说中极为特殊。洪水神话是关于宇宙毁灭和人类再生的神话，反映了远古某个时期人类在遭到毁灭性洪水劫难之后，遗民再生，人类终得重新繁衍。很多民族的神话传说当中都有洪水。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多是人类躲避洪水，被洪水吞噬消灭；以色列犹太民族所传下的《圣经》中也记载有上帝发下洪水灭绝人类，只有诺亚造出方舟才拯救了世界各种生物。中国的洪水神话传说最特殊，最后是以人之力制服了洪水。

大禹治水的传说，经过学者们的考证，已经可以确认为信史。夏朝或夏朝以前，中原大地上曾有多次洪水泛滥。甲骨文当中的“昔”字，会意结构，意为洪水之日。

再如后羿射日的故事。当时，天有十个太阳，酷烈炎热，民不聊生，地上猛兽虫蛇残害人类。后羿挽弓射落9个太阳，只留下1个，又斩杀巨蛇、鸢鸟“大风”、喷水吐火而声如婴儿的怪兽“九婴”之类，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古代神话描述过祖先们的整体生存危机，而结局是最终渡过了生存危机。

火神祝融氏与水神共工氏开战，共工氏战败，怒撞不周山天柱。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人类即将在崩塌的天地间灭亡。在存亡的紧急关头，女娲炼成了流质五色石，补全了天地。从此，天地之间生成了灿烂霞光。女娲又以巨石顶天立地，顶平了天地四柱，吸干了洪水，擒杀了黑龙，人类又重新开始了生命的历程。

中国古代神话，展现出祖先永不屈服的强力意志。

例如精卫填海的故事。炎帝的女儿，到东海游览不幸溺死海中。但她死后，精神化做一只鸟，名叫精卫。精卫鸟每天衔着“西山之木石”，填向大海。

这一悲壮精神，已成华夏族灵魂的深层次元素。如明朝末年，顾炎武赋诗道：“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顾炎武生活在被异族征服的亡国之痛中，乃以精卫精神自励。

夸父追日的故事，说的是天下大旱，夸父族首领为了缓解旱情，想要把太阳摘下，于是开始逐日、和太阳赛跑，在口渴喝干了黄河、渭水之后，在奔于大泽路途口渴死，手杖化作桃林，身躯化作夸父山。

中国神话中的神祇，往往是真善美的化身。盘古、神农、大禹、夸父等人，都是牺牲奉献型的英雄，为了公众利益，奉献出自己，而实现人神之际的生命升

华。这些神话大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被整理成文字，其中固然包含了“后人”的加工，但其内容则流传自远古。从历史角度来说，神话毕竟是神话，当然不能全信，但是应当意识到，它也包含着很多史实的因素。例如神农尝百草的故事，被现代基因学研究神奇地“证实”了。

2011年6月21日的《新民晚报》报道，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李辉博士研究发

现，对现代中国人群的基因调查显示，中国人对“苦味”最敏感，这种“苦味基因”可以辨识食物是否有毒。

李辉的研究指出，一个名为“TAS2R16”的苦味基因表达于人体舌头细胞内，这个基因在所有味觉基因中对毒性的识别力最强，而中国人群的“TAS2R16”基因显现出超强的能力，使中国人普遍具有非常敏感的苦味感觉，能够通过味觉判断食物是否含有毒性。研究发现，中国人“苦味”基因突变的自然选择出现在5000至6000年前，与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大致处于同一时代，因此可以证实，所谓的“神农尝百草”确有真实的历史环境（并非指神农氏个人，而很可能是当时整个部族开始大量尝试野生植物）。李辉的这一研究成果已发表于著名学术杂志《人类生物学》上。

中国人“苦味”基因的优势，使古代中国人的食物种类远超过欧洲，中国人口数量也超过欧洲，这也许是中国创造出灿烂文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1982年，考古学家尹达先生为《史前研究》杂志创刊写了一篇文章，文章题为“衷心的愿望”，这也是他最后的学术论文。他认为，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古代的神话和传说，有真正的史实因素，切不可一概抹杀。

发现华夏族的性格——中日神话对比

民族精神有两个核心特质：一是恒定性，二是独特性。恒定性指的是历久不变之处，独特性是区别于其他民族之处。因此，独特性往往需要通过对比来发现和辨认，既辨认出对方，也辨认出自己。



《山海经》书影

日本可以作为一个参照。

日本神话有浓厚的罪恶感因素，与之相应，日本的神多与疑心、复仇、惩戒、罪恶感有关。日本创世神话，是说兄妹二人（大神）结为夫妻，生下了数十个后代（诸神）。但火神出生时，因炙热烧死了母亲，父亲乃用“十拳剑”将其杀死，其尸体化作日本的山川地貌。其中，儿子烧死母亲一节就有浓厚的罪恶感色彩，充满了邪恶、不祥和报复的意味。

日本神灵速须佐之男命是一个充满猜疑和仇恨的神。他向大乞津比卖神乞求食物，对方从嘴巴、肛门和鼻孔中取出各种美味，做成食品送给了他。他却认为对方有意给自己脏东西吃，而把对方杀死，其疑心之重可见一斑。此外，他还大闹高天原（天宫），毁坏田埂、填平沟渠，在大常殿上拉屎，毁坏织女的机房，把天斑马剥了皮扔进机房里，天衣织女受到惊吓，梭子触击阴部，竟然死去。

创世兄妹夫妻二人最后也反目成仇。丈夫在地狱中看见妻子浑身是蛆虫，惊吓逃跑，妻子觉得受辱，派黄泉军追杀。

中国神话中对主角的描述，多是赞扬、肯定其劳动、牺牲、奉献和宏伟的理想，而日本神话中的神灵，有强烈的欲望，为实现欲望，不惜用战争手段。

如天照大神得知人世间还有一片沃土，世俗世界还有其他的神灵在统治时，她认为这无疑是对她神圣的一种亵渎。于是下令，平定“苇原中国”（即日本国土）。而八束水臣津野命神看见出云国国土狭小贫瘠，便用绳索将北门佐歧之国、北门良波乃国等拴住拉了过来，与出云国连在一起，以便壮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的神话，表现出中国人要制服暂时还无法制服的自然力量的愿望和决心。日本则没有此类看不见结局的神话，他们要求迅速见效。

中国的国土空间极为广阔，因此创造出许多巨人的神话。而日本空间相对比较狭小，神话往往奇丽细腻。

与中国的文明原创力不同，从历史上看，日本人在细分领域内可以精益求精、不断优化，但在基础性、方向性、宏观性领域，日本历史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原创力。这种从民族基因最深处流淌出来的特点，即便在今天，我们仍然能够观察、感受到。例如在经济领域，虽然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国，但却缺乏重大创新，因此每当重大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革命兴起，它总是落在一波。在本书写作时，在最前沿的移动互联网领域，日本已经落后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了。

第三章 三皇五帝时代：传说与历史之间

中国有准确、连续的历史记录，是自公元前 841 年（在西周时期）起，因为直到这时才有较确切的纪年。此前的历史，并非书面成文史，而是由后世历史学家依据考古、历法、传说和古籍资料综合考证、推求而成。

三皇五帝的事迹，散见于中国的诸多古籍。这是介于传说和历史之间的时代，古籍中的相关记录有较高的可信度，但不应该被视为严格的历史史实的描述。正如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的油画，远看是一片清新宁静的池塘，上面开满了睡莲，近看则只能看到一块块油画颜料。时隔久远，描述三皇五帝的时代，我们只能以“印象派”的方式，而不能以“写实派”的方式。

五帝时代为国家诞生之初，之后夏商周相连缀，步步登高形成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阶段——封建社会，从东周晚期开始，社会进入急剧的大转型期，历经 300 年大激荡，中国历史由封建时代转型到帝国时代。帝国时代从秦汉帝国的确立起，一直到 1911 年清王朝的解体为止，中间治乱循环。帝国时代结束之后，中国又开始了第二次历史大转型，这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大转型，至今尚未结束。

远古生活：自由平等

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大致对应古书里面所描述的三皇时期（准确年代不可考），那是一个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时代。

三皇，通常是指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古书上有多种说法，该种较为公认）。现代学界通常认为，所谓三皇，不是指三个人，而是指用火、渔猎、农耕三个时代。从人类发展来看，用火、渔猎、农业革命，都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正是靠这些阶梯，人类才不断拉开了跟动物的距离，攀升到了食物链的最顶端。

火的使用改变了早期人类的饮食方式，使人类的营养吸收能力与动物相比大幅跃升，可谓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梯。因此，火在各个民族之中都被赋予了崇高的

意义。古希腊神话中，火是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下来送给人类的。而在中国，口口相传的是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

伏羲氏应当是一个善于占卜并以渔猎著称的氏族。《易·系辞》下篇讲述了他创造八卦符号、发明渔网的事迹，说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时代，人们已经开始刀耕火种式的原始农业。农业是远古人类发展到现代人类的一个关键因素，自从农业技术出现，全世界人类的生活方式都逐渐改变了。

石器时代生产力极为低下，人们茹毛饮血，生活质量不比野兽好多少。从今天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等馆藏的出土器物来看，当时的人们往往临河聚村落而居，使用原始、粗糙的石器、陶器。

生活虽苦，石器时代人们的心态，却很可能是悦活而乐观的。新石器时期的许多陶器上，所画的都是鹿、鱼、蛙、蝴蝶等动物，或者舞蹈等场景，反映出当时人们精神世界的纯净、恬美，并不像后世饕餮纹等艺术风格那样肃穆、沉重。

这种乐观心态背后，是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氛围。对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这时期大部分的墓葬都很简单。到后期才出现了地位分化。如，属于仰韶文化（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陕西华阴横阵遗址墓葬，每一墓坑的死者都属于一个家族，随葬的瓶、钵、罐等十分平均，看不出贫富贵贱的差别。

而墓葬也能反映出当时社会上受到尊重的人物，如部落首领、巫师、英雄。属于仰韶文化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墓地，距今约6500年，发现有罕见的用蚌壳摆成的龙、虎图形以及星象图，其中间是一个壮年男子骨架，他很可能是备受崇敬的领袖或者战斗英雄。

五帝时代：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华夏族的起源

“五帝时代”是中华文明史的开端。

上古时部落散居各地，各有各的领袖和神灵。殷商以前，是神权盛行的时代，部族领袖的尊号是“帝”，即上帝、天神之意。周朝之后，人民对神的观念逐渐变化，统治者才“贬帝号，号为王”，秦王嬴政一统天下之后，发明了“皇帝”一词，最高统治者的尊号才又从“王”变成“皇帝”。

“五帝”一词，到了战国时代才出现，此前的文献中有很多“古帝”，并非“五”个。因此，五帝是哪五帝，版本也很多（通常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本书使用“五帝时代”一词，不过是因其约定俗成较为方便而已。

西汉时的《大戴礼记》《史记》等书对五帝的家族关系言之甚详，但不可全信。

五帝时代的中国大地上，有若干部族繁衍生息、交往、争战。按渊源关系和地理分布，大致可以梳理为中原的河洛集团、东部沿海的海岱集团、南方的江汉集团三大族系的对立^a。三大集团经历了一千多年后，最终融合统一为华夏族。

以前流传的以《史记》为代表的先古圣王系统，是从三个集团里面采集杂糅综合而成，其实历史进程本非如此。

河洛集团有两大分支，一为炎帝系列，一为黄帝系列。一般认为黄帝所生活的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

炎帝、黄帝同出于“少典”部落。那时，氏族名称跟人名往往混同。古书上说“少典生炎帝、黄帝”，指的是炎帝和黄帝都出自于少典部落，并非少典本人是他们的父亲。很多人据此误认为黄帝和炎帝是兄弟二人，乃是望文生义的错误。

黄帝起源于姬水河畔，故姓姬，炎帝起源于姜水河畔，故姓姜。姬水何在，无法考证。姜水，大致可以确定在现在渭河的上游一带，靠近宝鸡、岐山（考古人员曾在这一带挖出许多彩陶）。综合各种史料推断，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概位于今陕西省北部。近年来，考古界发现石峁古城遗址，学界猜测这可能是黄帝的都城。

战国时期的古书，往往把炎帝跟神农混淆成一个人。其实他们在时代上差别巨大。

炎黄部落发源于陕西，后逐渐向东迁移、扩展，建立了若干以姓氏命名的小国。

海岱集团的主要氏族



《三皇五帝和北斗星君图》（汉代）

^a 此为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发现并命名，历史学家徐旭生也有基本相同的论述，而名之为华夏族、东夷族和苗蛮族三大集团，下文按照徐旭生的研究展开论述，而名字上采用蒙文通的命名。

有太皞、少皞（又作太昊、少昊，其实就是大皞、小皞）、蚩尤。综合多种古书的记录考定，少昊的活动范围大概在今山东省曲阜一带。

海岱集团声名最显赫的人物是蚩尤。前人往往误以为蚩尤属于苗蛮集团（江汉集团），徐旭生经过详细地考证，确证蚩尤属于东夷集团（海岱集团）。蚩尤在世时便名震四方，他作战兵败身死之后，对方还靠他的名字“以威天下”。蚩尤虽败，但作为尚武之魂，盛名流传千年。秦朝时祭祀东方八神，他作为战神赫然在列。汉高祖刘邦起兵时，黄帝和蚩尤被同时祭祀。到了后世，史官把一种彗星称为“蚩尤之旗”，认为是预兆战争的天象，“见（蚩尤之旗）则王者征伐四方”。^a

综合梳理古书记载可以确认，蚩尤的坟墓和纪念祠就在今山东省阳谷寿张镇境内。据当地网友描述，此墓尚在，不过没有像样的保护，现在是一片荒土堆而已，令人叹息（蚩尤战死，身首异处，身体及衣冠冢在今山东省巨野县。）

江汉集团的代表人物是被后代视为火神的祝融。这一集团的中心在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北邻地处中原的河洛集团。伏羲、女娲原是他们的神祇。

司马迁所著《史记》以五帝本纪为中国历史的开端，这是有高见卓识的，因为五帝时代正是中国大地上的古人类迈入文明门槛的时期。

《史记》第一篇记载的是黄帝，核心内容是三场大战。其实从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开始，中原大地上一直有激烈、频繁战争。炎帝与黄帝之战、黄帝与蚩尤之战，不过是其中比较重大的一些。战争要求有高度的理性作为指导，方才能赢得生存的机会。这种鸿蒙时期的频繁战争所形成的冷静、理性、谋在长远的文化心理，很可能是中华文明思维方式和智慧形式的深层次根源。

先是炎帝系与黄帝系在阪泉之野发生大战，这是一次河洛集团的内战，黄帝获胜。

以黄帝为首的河洛集团与海岱集团又发生战争（此前蚩尤曾把炎帝打败），这一场战争非常惨烈。《史记》里说黄帝发明指南车，在战场上辨别方向。此后中原河洛集团与东方海岱集团开始融合。黄帝遂成为天下之盟主。

《史记》中对黄帝的描述：他是虞、夏、商、周各代帝王的血缘始祖，是统一国家的开创者，得天下后他四方巡行及于疆土四至，他与其妃子又是许多文化与文明事物的创始者。如此透过黄帝，司马迁表露了他心目中的华夏意象：一个血缘、政治、疆域与文化的综合体^b。

a 《汉书·天文志》。

b 王明珂：《华夏边缘》。

今天，陕西省黄陵县建有黄帝陵，庙亭上书“人文初祖”四个字，即表示黄帝为“文明初祖”之意。

一般认为，汉字在黄帝时期就开始形成了。战国时期的许多学派都认为，文字是黄帝时期的仓颉所创造的。近几十年考古发掘出土了很多公元前三四千年的陶器（时间上大致为黄帝时代），上面刻画有很像蚊子的各种符号，很多学者认为这可能就是原始文字。

炎黄之前氏族的范围可能还很小。经过自身繁衍、扩展，及后来与东方海岱集团大战的融合，氏族变成巨大的部族和部族联盟，覆盖的地域范围已经非常广阔，从中原大地直到东海之滨。

此后，中原河洛集团又与南方江汉集团发生冲突，战争发生在后期舜、禹的时代。

这三大集团逐渐融合，但差别长久存在。如到了夏初，东方海岱集团的首领羿和伯益，还跟大禹的儿子启发生军事冲突。而江汉集团的血脉，很多为后世的楚国所继承。几大集团最终融合为统一的华夏族，已是一两千年之后的周朝了。

当时中国并非统一，而是各地部族林立，此起彼伏。某一部族特别强盛，其领袖便名垂后世，否则姓名不传。五帝之间，相隔多久，我们并不知道。但尧舜禹之间是相接、连续的，他们距黄帝活动的时期，约有 1000 年。

黄帝子孙世系难以准确得知。《史记》对黄帝的后代子孙，都以详细的世系来描述。司马迁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当然不会凭空杜撰，但司马迁距离黄帝的时代也有约 3000 年之久，所记录的历史，难免有许多错漏之处，因此对黄帝子孙的世系，本书存而不论，只对比较能够确信的部分，作简略描述。

在黄帝族所繁衍的众多子族中，颛顼（音“专须”）与帝喾（音“酷”）是时代较早的最著名的两支。

颛顼和帝喾的时代曾经对社会上的一些制度进行改革。

帝颛顼是一个宗教色彩极浓的人物，是宗教领袖兼部落盟主。他被称为北方



陕西黄帝陵

之帝，也就是北方的神。关于他的传说很有趣，说他生的三个儿子死后都变成了鬼：一个住在江上，变为老虎；一个住在若水，变成鬼；一个住在人家的宫室角落，专门吓唬小孩。这些传说，我们自然只需要当故事去看。

帝颛顼主要的事迹是实行宗教改革，其中有“绝地天通”，也就是禁止各地大大小小的巫师跟天神擅自交流，以号称传播天神的旨意，而由包括自己在内的少数几个人来进行，这样便大致统一了人们的思想认识，防止人心混乱。

关于帝喾的史料很少。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可见他也是一位兼司神职的部落联盟首领。帝喾继续了颛顼的作为，将祭祀与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结合起来。

当时族群之间经常爆发战争，颛顼和帝喾曾经与共工族有过激烈的斗争。《淮南子·天文训》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淮南子·原道训》说：“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这场斗争延续了很久，直到舜和禹的时期才告结束。

此后则是尧、舜、禹的时代。

帝尧时代的景象

根据儒家典籍的描述，帝尧时代是一个四夷宾服、天下承平、文明发达的黄金时代。难怪很多人想穿越回去体验一下。如果穿越回去，当会有何种见闻？

很可能，举目四望，但见大泽郁郁葱葱，一群群大象悠然前行，风吹入阔叶的森林，飘飘摇摇一派亚热带景象。原来那时气候温暖湿润，大象、犀牛等热带动物常见于中原大地（今天河南省简称为“豫”，字义是一人手牵大象），人们不必遭受寒冻之苦。不幸的是气候暖和，则有毒蛇出没。所以人们见面不是问吃了吗？而是问：无它？即，你没遇见蛇吧？^a——古人太讨厌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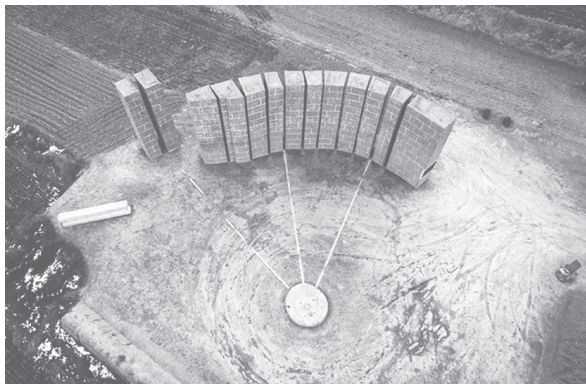
据气象学家竺可桢研究，从仰韶文化时期（约在公元前 5000 年至前 3000 年）开始的温暖气候，一直持续到夏、商两代，到周武王年间才告结束，转入寒冷时期。从此，大象等热带动物才从中原逐渐消失了^b。

如何判断季节、划分时令？冬至日和夏至日分别在哪一天？4000 年前的古人让我们这些学过现代气象学的人佩服。

a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b 在《吕氏春秋·古乐》《孟子·滕文公下》中都有周武王灭纣时“驱虎、豹、犀、象而远之”的记载，这反映了周武王伐纣时是犀牛、野象成群退出黄河流域的关键时期。而《竹书纪年》则有周孝王时长江、汉水结冰的记载。

山西陶寺考古遗址中，发现了一处气势宏伟的古观象台。考古研究显示，当时人们通过观象台巨型土柱的狭缝观测日出，来判断时令。研究显示^a，当时人们能准确判断冬至日、夏至日，以及春分、秋分，以用于观象授时——碳十四方法测定，这个观象台的使用时间，在公元前 2100 年左右。



陶寺遗址观象台复原

这与史书记载相契合：《尚书·尧典》记载，尧命令大臣观象授时：“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授时”，即测定标准时间，并告知社会公众。

在帝尧时代，舞蹈很流行，主要是为了健身和进行军事训练，与舞蹈相配合，音乐也很讲究。古书《世本·作篇》记载，尧帝的大臣夔创造音乐，巫咸发明鼓，无句制作磬。有趣的是，在陶寺遗址中恰巧出土了这几种乐器。

大墓中的特磬长达 81 至 90 厘米，这是以往难以想象的，足以证明“无句作磬”有根据。陶寺遗址大墓中还有成对的鼉（音“驼”）鼓。鼉，就是鳄鱼。鼓腔里遗留着鳄鱼骨板，由此可知鼓面是用鳄鱼皮所制，据说鼓声如同鳄鱼鸣叫。汉代司马相如曾作《上林赋》，其中说道“建翠华之旗，树灵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将鼉鼓与陶唐氏（即帝尧，因封于陶、唐二地而得名）相联系，并且把舞蹈作为当时的主要特色，足以证明“巫咸作鼓”有根据。

陶寺考古还显示，那个时代农业和艺术都已经很发达。

正因为取得了如此高的成就，帝尧被公认为那个时代伟大的领袖。《史记》赞美他说：“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尽管如此，帝尧为人民服务的心情没有变，他知道权力来源于人民，成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公众利益。

史书记载，尧设置谏言之鼓，让天下百姓尽其言；立诽谤之木（等于现在的海报墙，是华表的雏形），让天下百姓在谤木上发帖子，批评他的过错。

^a 《陶寺观象台遗址的天文功能与年代》，载于《中国科学》杂志。

禅让的真相

帝尧之后，舜成为天下领袖。《史记》中说，他选贤任能，举用“八恺”“八元”等治理民事，放逐“四凶”，任命禹治水。在其治理下，政教大行，八方宾服，四海咸颂舜功，因而《史记·五帝本纪》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舜之时，暴发绵延多年的巨大洪灾，禹带领诸部族协同奋斗，终于将洪水制服，也在此过程中奠定了领袖地位。

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大致是说，尧经过考察，发现舜很贤能，于是出让帝位，舜工作到年老，循例让位给禹。禅让的传说核心内容是权力是如何转让的，不过事实并不清晰。后世学者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肯定，一派否定。

以儒家为代表的学派，极力肯定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并奉之为政治的楷模。在孟子看来，尧舜禹每个人，都是高尚、神圣的“有德者”，尧舜禹时代是人类升平揖让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影响深远。直到明清朝代，皇帝的老师还教育皇帝以尧、舜、禹为榜样。连青年毛泽东都相信《史记》的记载。《史记》里说，舜在干部考察过程中，能够在大山里“烈风暴雨不迷”，具有某种神性，毛泽东颇受感染，也曾在暴雨中赤条条地钻到湖南的深山里，看能不能不迷路。

但其他学派对这段历史的记述，口气却完全相反，他们称：帝位是以暴力竞争夺来的，根本不是温良恭俭让的禅让。从《竹书纪年》“舜囚尧”的斗争记录到《韩非子》的雄辩推理，都使得禅让传说有点站不住脚。

那么，到底哪派说得对？

其实两派的说法都不太准确。儒家学派对其过度美化，而法家等学派则是根据战国时期的权力斗争倒推历史，有点过度丑化。上古社会一定有浓厚的原始民主遗风，只是具体到舜和禹的禅让，则未必还是那么单纯、那么温良恭俭让了。

实际上，即便是孟子本人，也无法把这个故事说圆。孟子的学生万章问孟子说，为什么禹把天下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而不像尧和舜一样，把天下传位给贤者呢？孟子回答不出，只好说这是天意，“天予贤，则予贤，天不予，则不予”（民国年间，历史学家蒙文通通过详细考订古史资料，有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发现：孟子所主张的历史，通常都靠不住，孟子所批判的历史，却往往是真实的）。

儒家学说看上去确实有点迂腐，但不能因此轻率否定他们的价值。

儒家学派的理想非常伟大，这种崇高的理想，是中华文明能够自强不息的精神原动力之一。尧舜禹禅让的传说正是儒家理想的政治运行方式的核心，有点像阿基米德的那个支点，或者大江大河的本源。由此出发，才有一系列修身养性、

人伦秩序的理论。

儒家理想的政治运行方式是什么？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天下为公。即，理想的政权是公有的，而不是一家一姓所私有。这不完全是幻想，包含着对上古时期社群美好生活的追忆。历代儒家学者，顽固坚持这个理念，不愿向现实政治低头。

现实政治是什么？

人类的古史已经载明，政权的终极来源是武力（暴力），掌握终极暴力的人拥有政权，然后就随心所欲，甚至无恶不作。儒家学者也认识到，自从禹将帝位传给儿子后，古代社会由大同时代进入小康时代，社会生态越来越坏了。

儒家关于禅让的理想流传不衰，到汉朝称制之后，还不断有儒生建议汉王朝让贤，王莽顺应民心称帝（不是篡权）成为这一学说的现实成果。王莽大败局才让这个学说破产。从此之后，儒家很迷茫，也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根基了。这个过程就好像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最终惨败。为什么会惨败？因为他的解决方案不是立足于现实，而是寄希望于让所有人相信一个半虚构的理论。

孟子构建出升平揖让的禅让模范典型，用心良苦。他一贯用心良苦，想用道德来驯服赤裸裸的权力，然而从来不起作用。在暴力一权力面前，道德说教是苍白的，它无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孟子喜欢谈心性之学，符合宋朝人的口味，于是在宋朝之后被抬得很高，荀子则被赶出了孔庙。由此，中国人对政权的认识，离真相越来越远了。

当然，我们不能对古人要求太高。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人类这一巨大成就的实现仅有几百年时间。权力制约毕竟是历史博弈演化出来的，而不是思想家预先设计好的。美国的联邦党人指出只有权力能够限制权力，不过才只有两三百年的时间，我们哪能对孟老夫子要求过高呢？



伏、尧、大禹、商汤

附：国家是社会发育的蝶变

人的身体由各个器官构成，器官之间相互协调，使生命得以运转。同样，社会也由许多器官构成，它们相互协调，使社会得以运转，其中核心器官之一便是国家机构（国家机器），简称国家。人从一颗受精卵长大，各器官逐渐发育，次序有先后。国家亦然，在人类百万年的历史中，国家直到几千年前才发育出来。

并不是所有的人类群体都能发育出国家机构，国家是因生存竞争的需要而出现的。在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中，原住民一直处在原始状态，没有产生出国家机构。

国家的功能是提供公共治理服务，这是国家的本源意义，即“大道之行，天下（国家）为公”。不过国家机构是由人组成、由人操作运转的，而人有私欲，所以国家机构的功能经常发生扭曲。

历史上，国家机构是演化的产物，不是人类头脑的设计作品。在炎帝和黄帝的时代，随着生存竞争导致的部落规模的不断扩大，需要有专门的人和机构对部落进行公共管理，这就是国家的雏形。国家是生存竞争的产物。

国家一旦发育出来，就会像一切生命体一样，为适应生存环境而进行不断的进化。就中国历史而言，到了夏商时期，国家形态已经进化为部落封建制，到西周时期发育为成熟的宗法封建制，到商鞅变法以后则进一步进化为帝国制度，这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一个由蛹化蝶的过程。

帝国制度在近代以来被形容为“封建落后”，饱受批评。其实这个制度体系是演化和生存竞争的产物，它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巨大的功能，例如消除内部战争，它是大帝国的农业生产方式所能支撑的最高形态的国家状态，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延续有着重要的作用。当然，它与现代化难以兼容，现代化要求有更高层面的制度支撑，这也就是近200年来中国人努力追求的目标。

社会不能突变，它只能从传统中生长出来。目前处于大转型时期的中国，国家形态中仍然有大量的旧制度残留。

就像随着医学的发展出现了人造的试管婴儿一样，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对国家形态的设计和调控能力也在增强，美国就是一个“试管国家”，它是一个事先设计的作品。设想某一天，我们能够在实验室中设计国家模式A、国家模式B、国家模式C，然后将其孵化成形，那就是更高形态的蝶变了。



第二卷
封建时代

第四章 夏、商、周三代综述

鸿蒙时代浩荡东流去，我国古代社会遂在距今 4000 年左右时，踏入了文明的门槛，夏、商、周封建制国家的建立和成熟，是文明社会治理形态的具体体现。夏、商、周三代的社会形态，现在惯常被称作“奴隶社会”。其实依科学的表述，此时乃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在这个浩浩阴阳移的古典时代，华夏的文明创造犹如星火燎原。在国家组织形式方面，从初级的氏族封建制国家，逐步发展到了严密、成熟的封建国家。

夏：天下盟主

20 世纪早期，考古学界还没有发现夏朝的遗迹，所以夏朝是否存在，质疑之声颇多，最近几十年发掘出的王城岗遗址、二里头遗址、东下冯遗址等古迹，有学者认为是夏朝晚期，有的认为是商朝早期，莫衷一是。综合各种素材，笔者相信夏朝一定是真实存在的。^a

史书记载，大约在帝颛顼以后的时期，夏部族兴起了。古代文献常把禹的世系追溯到颛顼，如《史记·夏本纪》和《大戴礼记·帝系》就曾说禹为颛顼的孙子（也有文献说禹为颛顼的五世孙。不管如何，说夏族是颛顼部落的一个支裔，应当问题不大）。

跟后世的中国历史主要体现为南北对立不同，上古时期主要是东西对立和对

^a 此处略举一些证据：首先，是史书和书面文字，尤其是《山海经》的记载；此外，殷墟甲骨文提到了杞侯，说明杞国是存在的，而杞国是夏之后裔；2002 年购买回国的遂公盃（西周中期）里有“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的字样——说明西周人认可禹的存在；语言学上来说，学者郑张尚芳《夏语探索》证明夏语的存在；另外，古书中记载大禹时期出现过“五星汇聚”和日食等天文现象，天文学家所推测出的这些天象发生的年代，正在古史记录的大禹执政时间范围，等等。

流^a。夏、商、周、秦是西风与东风的来回切换。夏部族自西方（相对中原而言）起源，商部族自东方海滨起源，而周部族又从西方起源，且自认为是夏的传人，最终灭周的秦人，又是从东方起源（在今山东省境内），且秦人主要继承的是殷商文明。

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认为，夏、商、周三代在文化上是一系相承的。

大禹治水，其身劳苦，其功赫赫，他正是夏朝的奠基者。从禹的儿子启开始，夏朝正式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b考定夏代自公元前 2071 年始，至夏商分界年公元前 1600 年止，符合《竹书纪年》所说夏朝“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

所谓“无王”，指夏朝初期太康失国以后的一段时间。这时期东方海岱集团的领袖后羿、寒浞先后占据统治地位，直到太康弟仲康的孙子少康时，夏王才恢复统治——黄帝时期三大集团的竞争，至此犹存。

夏王出自姒姓。夏朝虽然建立，但周围小国林立。他们之间有朝聘会贺的来往，却没有后世那样严格的臣属关系。夏的地位有点像春秋时期的盟主。夏朝时方国部落众多，见于《史记·夏本纪》的就有杞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冥氏等。《吕氏春秋·用民》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这时“国”的规模，或许略似于今天的一县一乡。

夏桀亡国的主因在于失去了诸多方国部落的支持，进而内外交困，最终被商部族所灭。

夏朝对后世影响很大。商朝的统治者每以夏亡为前车之鉴，而周朝统治者则以夏为自己的正宗，故周人屡称自己为“有夏”。周人以夏自称表明姬周族与夏族关系密切，甚至可能原为夏族分支。《尚书·召诰》载周公之语谓“我不可不监于有夏”，认为夏朝“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强调周朝统治者必须吸取夏朝覆灭的教训，才能够长治久安。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的许多制度、礼仪、文化等对于后世都有深远影响。孔子对于夏礼很感兴趣，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以懂夏礼为荣。相传夏的开国君主夏后启曾经“舞九韶”，对于“韶”之乐舞，孔子十分沉醉，以至于在齐国听后，“三月不知肉味”。

a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

b 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史学界有很大争议，海内外学者对其多有批判，本书引用是为取其便利，不代表全盘认可其观点。

夏朝历法称为“夏令”或“夏时”，为人们历来所沿用（孔子就主张“行夏之时”）。相传造车、酒等技术都是夏朝时发明的，并且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东下冯遗址考古等显示，夏朝时正从石器时代进入铜器时代。许多劳动工具仍由石制，但青铜器也多见。人们的居所，有的是半穴居的房子，有的是白石灰抹墙的平房，有的是窑洞。人们平时劳动狩猎，闲时演奏音乐，并且佩戴首饰、注重仪表。

商灭夏：东风压倒西风

继夏而起的商朝由子姓的商族所建立。商的祖先名为“契”，与舜禹大约同时代，故商也是一个相当古老的部落。

据王国维考证，商人乃是帝喾的后裔，可见夏、商都是华夏族的不同分支。

商起源于东方、北方，或在幽燕之地。相传契的母亲简狄吞玄鸟卵有孕而生子，此子名契，即商的始祖——《诗经·玄鸟》的描述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人早期活动在黄河下游北方之沃野，时常迁徙，到成汤时期则活动在今冀南、豫北一带。约公元前17世纪，成汤在众多方国部落的支持下灭夏朝而建商朝。

后羿灭夏和少康中兴可以看作是第一次夷夏（东夷与华夏）之争，而成汤灭夏，可以认为是第二次夷夏之争。

按《史记》所记，商朝共传17世，31王。商朝的覆灭在公元前11世纪（《竹书纪年》称商朝“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与商朝的实际情况当相距不远）。

商朝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从成汤灭夏到盘庚迁殷以前为第一阶段，称为早商时期；盘庚迁殷之后至商朝灭亡为第二阶段，称为晚商时期。早商时期殷都



商代早期宫殿遗址

屡迁，商朝都邑先后有亳、囂、相、庇、奄等。盘庚继位以后把都邑从奄迁徙至殷。这以后，商的都邑还可能有过小范围内的移动，也可能出现过两都并存的局面，但大体说来，基本上还是以殷为都邑的。《史记正义·殷本纪》概括《竹书纪年》的说法，认为“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其说大致可信。

商王继位不仅有“父死子继”的情况，而且也有不少是“兄终弟及”，即由王的弟弟继位。“兄终弟及”制度在其他朝代较为罕见，其原因可能与加强以商朝为核心的方国部落联盟的需要有关。

商朝时期王权得到加强。最高君主的名称在夏代多称为“后”，到了商朝则称为“王”。相传成汤灭夏时就因自己勇武而号称“武王”，《诗经·长发》记述后世苗裔对他的歌颂，道是：“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灭夏之时，成汤立于大旗之下，庄严地举起大钺，气势威严犹如烈火，其谁敢阻挡！

盘庚迁殷之后的晚商时期，王权进一步加强。后期的几位商王名号在干支字之前往往冠以美称，如康丁、武乙、文丁等，表示商王已经拥有了更加特殊尊贵的地位。商朝最后两位王竟将上帝的“帝”字用于王的名号，称为帝乙、帝辛（即纣王），直接反映了君权神授的观念。

商朝：女人爱化妆，作战用大象

20世纪初，因盗掘甲骨，地处河南的殷商后期首都遗址“殷墟”被意外发现。1928年，此地正式开始考古发掘，从此给中国古史研究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殷墟出土遗物，除了大批的铜器、陶器、骨器、石器外，还有无数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至少有十万片以上）。这些甲骨主要是占卜所用，那卜辞相当于一批特殊的历史档案。这些珍贵的甲骨卜辞与史书记载相互印证，商朝的万千气象便在历史学家的案头复活了。

商文明裔裔皇皇，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阶段。

商朝城墙很厚，阴历阳历并用，甲骨文六书（六种造字方法）俱备，青铜器工艺繁复，货币来自海滨甚至遥远的东南亚。商人已经精确掌握了合金的比例及其冶炼技术，那繁复精美的殷商青铜器，初成时金光灿烂，所用的是铜锡合金。

甲骨文包含单字约5000个，可识的约一半。这些文字虽然形体上与今字大异，但已识的字都可依照一定规则译成今字。其意义及用法与今字基本完全一致，清晰地显示出中国文化的一系继承。而正如一本书不会包括所有的字一样，甲骨文



精良的商代青铜工艺

并不能包含当时所有的字数，故当时使用的字数，一定是多于 5000 个的。

商人驯化的动物除牛（旱牛和水牛）、马、犬外，还有象，商人还曾利用大象作战。从雕刻品和其他遗物可以看出，商人是席地而坐的，当时一部分人的服装是交领、右衽、短衣、短裙、束带、鞋翘尖；当时女人爱化妆——脸上涂朱；头饰极复杂，左右两鬓或额间的头巾上缀骊绿松石砌成的圆形物；发

上戴雕纹嵌绿松石的象牙梳；头饰比头还高。

商人的交通用具，有牛、马、牛马或象驾的车。除普通的车外，又有兵车，其形式大略是舆作半圆形，由后升降，一辕驾四马，两服两骖，与后来周朝的兵车无多差异；这是从殷墟发现的铜质车饰推知的。据卜辞的记载，商人出征有时远行至三四十日。

商人真的是“商人”，他们擅长做生意，用牛车拉着各种货物，从事贩运贸易。“商人”含义是生意人，起源于此。

商人的商业已发展到使用货币的阶段。货币主要是咸水贝所制成，偶有小块的玉器。从殷墟的遗物可以推知，殷都一带商业十分繁荣：铜器、玉器、绿松石饰品的原料，以及用量甚大的龟甲、咸水贝，都是极远处所产，翻山过海贩运而来（其中，玉的出现表明张骞通西域之前，西方跟华夏就有零星往来）。近期的考古表明，龟甲和贝壳有一部分甚至来自东南亚，足见当时商业活动范围之大。

对神权的高度重视，在古代社会中商朝当属第一，即所谓“商人尚鬼”。在商人看来，神鬼的世界是和有形的世界同样地存在，而且这两个世界可以互动。殷墟甲骨的卜辞表明，商朝统治者几乎每日必卜、每事必卜，军国大事经常靠神意决策。神鬼世界的主要成分是他们祖先。王室对祖先的祭祀，极其盛大。用牲的数目有多至一次五十羊、三百牛，或四百牛的。

商王武丁及其稍后的时期，人殉、人祭达到鼎盛，大量的人牲被杀掉祭祀神灵，显示了神权的特殊尊贵。

商人普遍地聚族而居，而且每族自成为一社会的单位。每族有一名号，即所谓“氏”。姓和氏的分别，商朝当时已有。姓是旧有的族号，氏是比较后起的族号。因为族人的繁衍，一族可以分成许多族，而散居异地。同源异流的众族保留其旧

有共同的族号，谓之姓；同时各有其特殊的族号，谓之氏。姓字甲骨文及周金文皆作生，不从女。以生为姓，含义是追溯人生的来源。

古人名与姓氏不并举，因为在比较原始的社会里，互相接触的人，以同姓氏为常，自没必要把姓氏冠其名前，此种习惯直至春秋时代犹然。以姓氏冠名乃是有五方杂处的大都市以后的事。

周灭商：农民打倒商人

和子姓的商族一样，姬姓的周族也很古老。周的始祖名为“弃”，是舜禹时代的人，曾被舜任命为管农业的“后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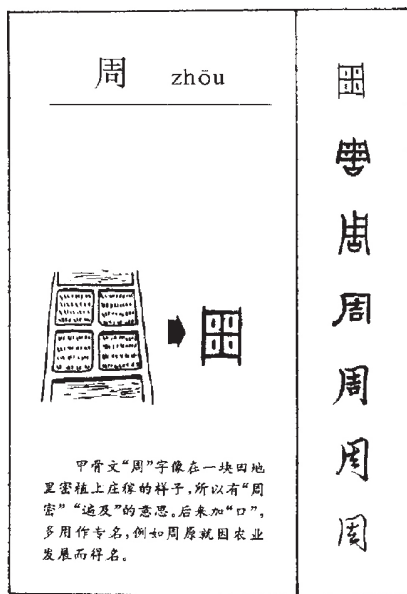
周人的祖源神话与商人的“天命玄鸟”不同。周的始祖母名为姜嫄，她践踩了“帝”（天神）的脚印，心动有孕而生后稷。这个有浓厚神话色彩的传说里的“帝”，据说就是帝喾，可见周族的起源与黄帝族的高辛氏颇有渊源。

后稷所以名“弃”，是因为他曾经三次被抛弃：先被抛弃在隘巷中，路过的牛羊都绕行而不践踩；又被抛于树林，却被伐木人抱回；第三次被抛弃在寒冰上，却有一群大鸟张开翅膀来覆盖他、温暖他。

《诗经·生民》所记载的这种弃子仪式，很可能与原始时代某种宗教礼仪有关。弃在经过严峻考验后，被认为是神异式的人物，长大后便在氏族中广有威望，最终成了一个农业专家。周人跟擅长做生意的商人不同，主要心思在于农耕——甲骨文的“周”字，是一块田地的模样。

此后，在部族首领公刘时期，周族居于戎狄之间，后全族在公刘率领下迁徙至豳（音“彬”，今陕西省彬县）。公刘以后九传至公亶父，周族又从豳迁徙到岐山下的周原。《诗经》留下了大量诗歌，描述当时的社会气象、歌颂周人先祖和领袖，如《生民》《公刘》《绵》《皇矣》《文王》《破斧》等篇章。

这以后周族才迅速发展，特别是在周文王的时期曾经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兴盛局面，众多方国部落群起拥护，从



周字的演变

而奠定了武王伐纣灭商的基础。

周文王是周部族发展史上的关键领袖。文王姓姬，名昌，为季历之子，继位时已届中年，据孔子描述，文王“黜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一副奔波劳累的老农民形象。从《孟子·公孙丑》“文王以百里”的说法看，他继位时，周的范围还小，也就是方圆百里的数量级。文王举措得宜，使周的势力有了更大的发展，其政略首要是注重农业生产，增强经济实力^a。

周文王之子为周武王姬发。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率军灭商朝，成为周朝的开国之君。这次波澜壮阔的王朝更替，被历史详细记录了下来。

商朝的末代皇帝名纣，正式场合称为“帝辛”，是帝乙之子。纣王本来天赋神勇、孔武非凡，《史记·殷本纪》说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但他骄傲刚愎，生活奢侈糜烂，在邯郸以南、朝歌（今河南省淇县）以北的广大区域里大造豪华宫殿。纣王还十分暴虐，设置了炮烙之刑。他主政时政治黑暗，比干、箕子、商容等贤臣遭诛杀和废逐，商朝的大师、少师、内史等要员，持祭器、乐器、图法等国之重宝奔投于周。正是纣在位期间，周族迅速崛起。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周乃图谋灭商建政。

按照《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姬发曾经率兵东进至盟津（今河南省孟津县东），诸侯不期而会者多至800支。武王审时度势，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命令退兵。直到纣王杀比干、囚箕子，陷于彻底孤立，武王才断定天时已到。

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中期，武王在姜子牙协助下伐纣。姜子牙被称为“师尚父”，又称吕尚、姜牙、太公望等，是姜姓的吕国首领而入于周者，因善于统兵打仗，故被称为“师”，是协助武王灭商的主要武将。成功之后，姜子牙受封建立齐国，建都于营丘，即今山东省昌乐县内。

武王十一年元月，周师东向出发，主力军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人，此外还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方国和部族的盟军。

二月间，周军从孟津渡黄河而北上，经过怀（今河南省沁阳）、共头（今河南省辉县境）等地，直扑朝歌（今河南省淇县）。该月甲子日早晨，两军在朝歌郊外的牧野遭遇。两军决战之前，武王发表誓师演讲，痛斥纣的罪恶，勉励大军要如猛虎猎豹、奋勇前进。

商朝方面虽然人数众多，“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诗经·大

^a 《诗经·天作》篇云“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尚书·无逸》篇云“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明》)，但战心已然涣散，部分军士阵前倒戈。在激烈的战斗后，商朝方面军溃败，纣王逃奔鹿台，抓住最后的机会穿上缀满宝玉的华丽衣裳，自焚而死。

武王以黄钺斩纣头，悬于大白之旗示众。

青铜器“利簋”铭文说“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可见牧野之战只用一天时间即告胜利。但战事还有可能出现不测风云，所以武王当晚高度警惕，一夜未眠。

次日，武王在商王宫殿里举行大典，由尹逸宣读祝文，武王再拜稽首，表示“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逸周书·克殷》），即宣告革命成功，遵循天意接手政权。

武王灭商以后，立纣王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命令释放被囚禁的箕子和百姓，表彰殷贤人商容和被纣杀死的诤臣比干，将商朝囤积在鹿台和巨桥的粮食财物散发给民众，还命人运走九鼎、宝玉等宝器，以象征主宰天下的权力的递嬗，并派军队平定商王畿及其附近地区的戏方、靡、陈、卫、磨、宣方、蜀、厉等方国部落，作为灭商战争的余绪。据《利簋》铭文记载，武王在殷都停留了7天，于甲子日之后的辛未日到达今河南省郑州市一带的东师。此后，武王西行至伊洛地区，考察地理形势。四月间，武王率军凯旋，返归首都镐京。

纣死后，其子武庚受封于周，替周人管理这一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周初三监叛乱被平定之后，周以微子代武庚。尽管“殷祀”即殷商遗留的生活方式和治理体系还保存了很长时间，但作为一个朝代而言，纣王之死则是商朝寿终正寝的标志。

汤武革命，并不赶尽杀绝，而是“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公羊传》）。如周灭殷之后，封夏代之后为杞国，封殷代之后为宋国。这样，既承认新政权有其独立的合法性，又不否认旧政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种“兴灭国、继绝世”的伦理在全球历史上是很独特的。

商朝虽亡，却有两个遗民值得一提，那便是伯夷和叔齐。

伯夷和叔齐是商朝时孤竹国君的两个公子，因感觉商纣王腐败黑暗，不愿与之合作，但也不赞同周朝的暴力革命。二人曾向周武王扣马劝谏，但武王不采纳。武王灭商后，伯夷和叔齐有感于国家灭亡之痛，誓死不食周粟，在首阳山采薇而食。靠野菜当然很难维生，但他们舍生取义，最后求仁得仁，饿死在首阳山。商朝虽然灭亡，伯夷和叔齐的铮铮风骨，却一直被人们推崇、传颂。

汉代，司马迁著《史记》，将二人合传《伯夷列传》放在所有列传之首。记载流传至海外，日本、越南士人也大为感动，引以为模范。日本江户时代，德川

光国读《史记》，为伯夷的气节所折服。明朝末年，德川家建堂，将伯夷、叔齐的木雕像安置在堂内，并据孔子评论伯夷、叔齐所说的“求仁得仁”而将其命名为“得仁堂”。此堂至今犹在，位于东京小石川后乐园内，近邻明末遗民朱舜水先生亲手设计的“圆月桥”。

从周武王开始，西周王朝共历 12 世，13 王，此外，在武王之后，武王的弟弟周公（名旦）曾经摄政称王一个时期，在武王的儿子成王长大之后，便将王位主动奉还；在厉王末年有长达 14 年的“共和”时期。西周一直受到西方蛮族“犬戎”的强大军事压力，战争中军队覆没，导致内政危机，并最终在公元前 771 年灭亡。西周前后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最后的君王是传说中“烽火戏诸侯”^a的周幽王。

周幽王晚年政局大乱后，平王被拥戴继位，以后便是东周时代。

西周：宁静而肃穆的社会生活

西周时的社会生活，宁静而肃穆。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除了祭祀祖先和战争之外，人们的生活正如春去秋来般安静悠长。只有一年中春天的社祭赛会，是举国狂欢的日子。

国家有城市、有野外，城市内称为“国”，城市外称为“野”。城市主要是安全防卫的需要，不像后世那样是因经济和贸易而产生。春、夏、秋三个季节，庶民们在郊外劳作、住宿，冬天回到城市里的家中，军训、行礼、过年。

西周传下来的一首民歌《诗经·七月》，详细描写了豳（今陕西省彬县）地农民的生活：正月里修理农器，二月里开始耕种，妻子到田里送饭，督耕的农官“田峻”也笑嘻嘻地来了。女儿携着竹筐，采了陌上桑叶来养蚕。八月准备收获，女儿缫丝、染色，预备为公子织衣裳。十月里蟋蟀的清鸣在床底响起，人们收获稻谷、酿制美酒，以备明春给贵人上寿。严冬将至，用心修葺寒舍：点火熏走老鼠，墙缝抹上泥，以备凄厉的寒风。秋收之后，便到贵人家里做工——白天采茅，夜晚绞绳。是月烹宰羔羊，准备年终聚饮，齐到贵人堂上献酒，欢呼万寿无疆。十一月出猎，寻觅狐狸，为贵人做皮袍。十二月农夫们会同受军事训练。是月向贵人献

a “烽火戏诸侯”虽然是《史记》所载，但不是历史事实，一则西周很可能尚未发明烽火，二则诸侯距离镐京极远（郑国最近，300 多里，齐国等国千余里），行军需要数月时间，以烽火召来博妃子一笑实不可能。

上养肥的猪，又把冰凿下、藏好，以备贵人来年夏天之用。

《七月》这首上古歌曲，在画面般优美的词句背后，也反映了严酷的统治关系：贵族们的生活自然、高雅、舒适，可是辛苦了一年的农民们，在寒冬来临的时候却还在发愁没有棉衣可怎么过冬呢（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封建国家的成熟：夏商周不是奴隶社会

近几十年以来，历史教科书一直将夏商周三代定义为“奴隶社会”。其实这个说法在民国年间刚刚被提出的时候，并没有在史学界引发反响，因为这个框架脱离了中国历史史实，本来并不值一驳。新中国成立之后，主张奴隶社会的定性逐渐成为主流话语。

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学者重新研究这一课题，以“反证”的方式反对存在奴隶社会这一说法，逐渐形成一个目前学术界较为公认的“无奴学派”^a，代表性学者有黄现璠、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他们指出“中原王朝不存在一个以奴隶制剥削形式为主体的奴隶制阶段”。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晁福林认为夏商为氏族封建制社会，西周和春秋为宗法封建制社会。本书认同这些见解。

海外史学界对奴隶社会话题，一直没有多大争议，普遍认为不存在奴隶社会。例如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撰文指出，商周时期，奴隶在全国人口当中的总比例微不足道，而且并不从事生产劳动，商朝时期的“众”和周朝时期的“庶人”，都是普通平民，他们是人口的绝大多数^b。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唐德刚也曾说：“我国古代中有奴隶（slaves），而无奴隶制（slavery），笔者在不同的拙著内曾力证之，国际汉学界亦有公论。”又说，通过研究印第安人的历史，“循之北美各部落之社会发展史，则一览可知……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之所谓‘封建’（feudalism）者，实自‘部落生活’（tribal life）直接演变而来，与‘奴隶制’（slavery）无延续关系也”^c。

所谓“无奴”，并非指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奴隶，而是指奴隶制生产方式不构成主流。当时中国社会的主体是“庶民”，其中以农民为主，其余当有少数商人和工人。庶人和奴隶的重要差别在于前者可以私蓄财物，可以自由迁徙。上文《诗

a 陈吉生：《试论中国历史学的无奴学派》，载《世界历史论坛》2010年6月。

b 何炳棣：《商周奴隶社会说纠谬：兼论“亚细亚生产方式”说》。

c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经·七月》的记载，便是当时农民生活的描述。

中国历史中，关于奴隶的情况现在所知不多。如在奴隶和其他人中的比例如何？天子、诸侯或大夫所直接役属的奴隶有多少？都不得而知。我们只能从文献片段中，窥见一些记录。当时周王和列国君主赏赐奴隶的数目就曾经被记录下来，最高的纪录是晋景公（公元前 599 至前 581 年）以“狄臣”（狄人被俘虏为奴隶）一千家赏给他的一个新立战功的大夫荀林父。

这些奴隶的主要来源是异族的俘虏。奴隶可以抵押买卖，例如西周铜器铭刻中有“赎兹五夫用百孚”的语句。在周代盛行的殉葬制度底下，奴隶也是必然的牺牲品。平常以百计的殉葬者当中，有多少是奴隶，不可考。

“封建”（feudal）是一个被滥用的词汇。五四时期，陈独秀忽略中日、中欧历史差异，引入西欧及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反封建”命题，形成“封建 = 前近代 = 落后”的范式。“封建”有了过多的内涵，而且基本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其实严格地说，封建社会的要素如下：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于上级称臣，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者兼地主；在这社会里，凡统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是统治者，同时各级统治者属下的一切农民非农奴即佃客，他们不能私有或转卖所耕的土地。因此，周代的社会无疑是封建社会。

王畿之地，也就是周天子直接控制和管理的地盘，在周人的估计中，是大约一千里见方。王畿之外，周室先后至少封立了 130 个以上（确数不可考）的诸侯国，诸侯与王室的关系模式主要在按期纳贡朝觐，出兵助王征伐，以及协助救济灾患等方面，诸侯国的内政几乎完全自主。这跟欧洲的封建时代非常相似。

周朝的诸侯国大部分是分封给宗亲亲戚或功臣而成的，还有其他一些情况：如宋国是商朝后裔受封而成，另有商代原有的诸侯国或独立国，归附于周朝的，例如陈、杞等。

周公摄政后，发动东征，通过这一武装殖民，周人影响力扩大数倍而到达海滨。周公东征，经过历时三年的长期战斗，彻底摧毁殷商的残余势力。殷商的三百六十夫被击溃后，有的被分散赏赐给诸侯（如鲁国的“殷民六族”、卫国的“殷民七族”），有的被消灭，有的远远逃亡，北去东北以至朝鲜半岛，南到大江以南。

周朝在政治上注重的是“分”，而不是“合”。分封制是这样，宗法制也是如此。拿宗法制度来说，它强调了从强宗大族里繁衍出数量众多的支系小宗，这些支系小宗再繁衍出下一个层次的支系小宗，从而形成连锁式的分裂增长。就周朝

独具特色的井田制度来说，其基本特点依然是“分”，即分出公田和私田。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虽然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但实际上却是和分封制度相适应的、多层次的贵族土地所有制。

在宗法观念下，周人又提出了“礼”。周公治理天下的关键就是制礼。作为礼仪制度、伦理观念的礼，其起源很早，然而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提出来，并把它作为社会文化生活的准则，则在周朝。与宗法制度、礼等相关联，周人又提出了“孝”“德”等观念，并使其在周代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周公旦

生存竞争与融和同化：华夏族的形成

跟后世的中国历史主要体现为南北对立不同，上古时期主要是东西对立和对流。夏、商、周三朝的递嬗，代表三个部族的流动和发展。大体上，夏人自西向东，商人自东向西，周人又自西向东，他们先后相交错、相融和、相同化，同时各把势力所及地方的土著同化，在一千多年中，融和、同化成一大民族，他们对于异族，自觉为一整体，自称为“诸夏”，有时也被称并自称为“华”“诸华”或者“华夏”，今天“中华”的“华”字意思即起源于此。

包括夏、商、周三族在内的华夏各分支，尽管来源与祖先传说不尽相同，但到西周时已有了共同的族称（华、夏、中国），共同的地域观念（“禹绩”，即大禹开拓的地方——夏区），共同的祖先观念（黄帝为共同始祖）。通过辛苦而辉煌的文明创造，通过与其他众多族群的生存竞争，通过漫长的千年时间，至此，华夏族正式形成了。

以字义训，华即花、即万花繁盛，为生殖，为繁荣，为华美；夏为盛大（《尚书正义》云：“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

相比之下，“戎”“狄”“蛮”“夷”只是生活状态的客观描述，没有主观赞美的含义（当时是中性词，到了战国、秦汉以后，因有华夏作对比，才越来越含有贬义）。戎字指的是一个人拿着一件武器（戈），狄字描述的可能是游牧生活，与

狗和篝火为伴。蛮字原型是一个两边盘着发辮的小姑娘蹲坐之形，夷字是一个人身上背有一张弓。这都是华夏之外族群的生活状态。

“诸华”和“诸夏”在中原附近的封国又合称为中国，以与夷狄相对称。

“中国”的称谓，最早见于周初武王、成王时，不仅见于《尚书》，又有出土周朝青铜器“何尊”铭文的实证。

国宝“何尊”于1963年出土于宝鸡，上面122字的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洛邑王城的重要历史事件。铭文上有“宅兹中国”一语，宅，是定居之意。“宅兹中国”——我们栖居于中国，读到此语，至今仍能感觉到跨越时空的暖意。

至于其他星罗棋布于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而与诸夏错居的许多游牧或非游牧的民族，与华夏进行着长期的生存竞争，武力战争是当时生存竞争的主要方式。他们之中大部分最终被华夏族所征服、同化。

周朝以前，中国的主要地盘是在山东、河南、山西，而旁及河北、陕西的一部分。中国国土的蔓延扩张，全来自于对外的武力。西周时有周公东征、穆王南征等，春秋战国阶段各边陲诸侯国不断与戎狄作战，扩张文化和土地，秦统一天下后，秦始皇派大军北击匈奴、南征南粤，击溃了当时已知的所有抵抗力量，奠定了中国国土中部和东南部的基本框架，100多年之后，汉武帝北征匈奴、西征西域、南征西南夷，版图进一步扩大，已经和今天的国土面积比较近似。

早在殷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以内和以外散布着许多文化远较商人落后的游牧民族，不时寇略商朝或其诸侯的领域。商朝后期的最大外敌是西北的鬼方（其根据地大概在山西北部及陕西的北部和西部）。历史上记载商王武丁曾对他用兵至三年之久。此外卜辞所记商人的外敌还有许多，但其中除羌人外，在后来的历史记载中都再没有出现。

商朝战争的规模有大有小。根据甲骨文卜辞的记录。用兵规模有时为四五千人，有的战争俘虏十五六人，但有一次记录杀敌2656人，算是规模较大的了。

商末、周初的鬼方后来被周人称为玁狁（音“险允”），继称犬戎，此族在周初屡次出没于丰镐以西和以北。成王时曾伐鬼方，俘人至一万三千余，战争之激烈可想。参加此役的孟国（近岐山）曾铸鼎刻铭以记其事，至今尚存。穆王时又大败此族，俘其五王，迁其若干部落于汾、洮一带。至厉王末年，玁狁乘周室内乱，又复猖獗；以后四十余年不时入侵西陲，甚至深入王畿，逼近镐京，终为宣王所攘逐。

在中原大军的持续打击下，鬼方最终发生分化，一部分北上草原，成为丁零人（音“颠连”），一部分成了春秋时代的北狄人。

进入东周后，从公元前 662 至前 595 年间，为诸夏祸最烈的外族，正是“狄”人，与犬戎同源于鬼方而异派。春秋期间齐受狄入侵七次，卫六次，晋五次，鲁二次；邢、宋、温、郑、周各一次。卫受摧残最甚，被逼两次迁都（卫原都朝歌，在河南省淇县东北；一迁楚邱，在河南省滑县东，再迁帝丘，在河南濮阳），其国境大半沦陷，赖齐桓公之救始免于亡国。邢亦被迫迁都（邢本都河北邢台，迁山东东昌），亦赖齐桓公之救始免于亡国。成周为狄攻陷，周天子（襄王）奔逃到郑，赖晋文公之救始得复国。狄患后来终于被晋国彻底荡平。

这是一场残酷而漫长的生存竞争。北方游牧民族并未完全绝迹，以后还不断在中国历史记载中出现，甚至几度将华夏族推到灭亡边缘。

到了后世，在华夏族与匈奴、鲜卑族等的争霸中，丁零人始终充当千年跑龙套的角色，时断时续地出现在历史记载里，连名字也变化不定，有高车、铁勒、敕勒、丁零等。在南北朝时期，部落散乱的高车遭遇到新崛起的小部族突厥突然袭击，高车败溃，部众约 20 万人全部投降了人数远少于自己的突厥，成为突厥崛起的资本，突厥人后壮大为北方霸主。至今突厥人后裔遍布中亚，被总称为“突厥语族”，“土耳其”（Turkey）即突厥音译。

北方游牧民族众多，名称、源流都很杂乱，但其生存方式和文明（野蛮）程度基本近似。在欧洲文明崛起之前，华夏族主要的防御对象便是北方游牧民族。

生存竞争必须有尚武精神作为文化层面的支撑。汉代之前，华夏族的尚武精神一直烈烈如火，对待北方游牧民族也总是占据优势。汉代尤其是东汉之后，华夏族的尚武精神逐渐枯萎凋零，华夏群体转为柔弱。此后的历史中，华夏族相对北方游牧民族，就大多居于相对弱势地位。

华夏文明：唯一不曾断绝的古老文明

从世界范围看，在公元前 21 世纪到公元前 11 世纪，即我国的夏朝和商朝时期，堪称文明古国、可以与夏、商媲美的极少，仅有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古希腊文明确实很早，也十分辉煌。但当今学者普遍认为，这种文明是巴比伦文明和埃及文明二者在地中海上的遇合，尽管后来有所创造但不是原创，故不能算四大文明之一）。在这个时期以后，我国的周朝把夏、商的文明继续推向兴盛，传统文化不仅得以延续，而且有更高水平的发展，可是与夏、商同时期的其他文明古国却全部陷于衰落和灭亡。

我国的夏、商时代正值埃及的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新王国结束后，埃及就

陷入分裂局面，利比亚人占据其北方地区，努比亚人则攻入其南方，埃及文明由是衰竭。此后，埃及又被并入波斯帝国的版图。随着国家的覆灭，古埃及的文字也逐渐被人们遗忘，终成一种死文字。今天，埃及土地上活动的基本不是法老的后裔，而是欧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后代。



失传的古埃及文字

作为两河流域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古巴比伦王国的建立与我国商朝开国的时间约略相当，但它延续仅 200 多年即告终结，于公元前 1959 年被小亚细亚东部的赫梯人灭掉。此后，巴比伦文化难以再现辉煌，作为古巴比伦文明象征的刻有汉谟拉比王法典的玄武岩石柱也被入侵的埃及人作为战利品带回埃及古都苏撒，直到 20 世纪初才被发现。在今天的伊拉克，巴比伦文明的遗迹早已荡然无存。

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文明被称为哈拉巴文化，其兴盛的时期和我国夏朝约略相当，可是在公元前 18 世纪左右却被入侵的雅利安人毁灭。此后哈拉巴文化即湮没在历史中，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才通过考古发掘而为世人所知。

就古代文明发展水平来看，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辉煌，然而在连续发展方面我国的古代文明却独占鳌头。夏商西周的文明不仅达到了很高水平，足以媲美其他文明古国，而且源远流长、浩浩乎如江河奔流万里。即便到了现代社会，也能迅速吸纳现代元素并进行文明的自我升级（相比之下，基督教文明区、穆斯林文明区与现代化有着极多的矛盾和冲突。尽管现代科学和现代体系首先出现在基督教文明区，这是另一问题）。古老的华夏文明，他那内在强盛的生命力，真足以横绝一世矣！

第五章 王纲解纽 春秋争霸

在莽莽苍苍的关中平原上，矗立着西周的都城镐京，那里位于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镐京四周都是黄土累积的平原。西北方向就是游牧民族“犬戎”之所在，他们对镐京几乎形成了半包围之势。

周王室与犬戎长期对峙，但军事上居于劣势。“宗周六师”等部队渐次被犬戎消灭，周王室军队覆没、财政虚耗，权威下降，在诸侯心目中的地位由此严重动摇。周幽王时，国内发生争夺王位之战，犬戎与其中一股势力勾结，乘虚而入，残破镐京，大肆抢掠洗劫而去。西周灭亡。

周幽王被杀，部分诸侯拥戴太子称王，即周平王^a。平王虽立，但被犬戎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与东面的各诸侯商量后，他放弃了镐京，并于公元前 770 年迁都到洛邑（今河南省洛阳西），史称“平王东迁”，即东周时期的开始。

周王室迁都是当时的政治巨变。平王有弑父嫌疑，得国不正、难以获得各派势力的拥护，另外周室实力已经十分虚弱，天下共主之威信开始褪色。政治秩序从最核心的部分开始瓦解，逐渐礼崩乐坏，演化出春秋时代的国际体系。

春秋初年：历史大转型的预备期

自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221 年，共 550 年，是为东周时期，又称春秋战国时期。“春秋”取名于鲁国史书《春秋》，“战国”则取名于西汉时编定的《战国策》。历史之河本是连续不断的，如此划分，如同对河流进行测量标注，目的是便于认识和理解。春秋战国两个时代迥然有别。春秋是古典贵族政治的高峰，连战争也充满了礼仪；战国则一个残酷竞争的总体战时代，伴随着数百万人的残

^a 周幽王、周平王时代政局混乱，相关历史记录也不准确。《史记》、《竹书纪年》和《清华简》对此记录互不一致，或谓同时出现过二王并立的局面，还有一段王位空白期。

酷死亡，我国的社会结构由封建社会转型为帝国社会。

战争是历史进程的催化剂。春秋战国不到 600 年，发生了 660 多次战争。春秋时期的战争使 130 多个国家变成不到 10 个。政治秩序重组是这个大转型时代突出的现象。司马迁在《史记》中感慨“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弑君事件如此多发，政治混乱的程度可见一斑（实际上春秋时期的弑君数量不止 36 个，笔者粗略统计，超过 40 个）。

自公元前 770 年平王东迁，至齐桓公称霸的 90 年间，是为春秋初年，社会政治进入了列强争霸的准备期。

东周的内忧外患

平王东迁的时代，华夏内外交侵，面临着严峻的危机。

内政方面，传统秩序开始瓦解。

东迁之后的周王室犹如落坡的凤凰。关中故地大片丧失，为犬戎所占。王室直接拥有的“王畿”面积大大缩水，它以洛邑为中心，方圆不过 600 余里。辖区缩小必然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加之许多诸侯已不再纳贡，王室财政极感困难。

公元前 720 年，周平王死，因为随葬品不足，新继位的周桓王竟然只得派人去向鲁国乞求，史称“求赙”。西周以来“天子不私求财”的传统从此被打破。

以前天子巡狩的盛业也停废了。西周时天子每隔几年则要到各地巡视，祭祀名山大川，考察诸侯政绩，称为“巡狩”。郑国原有参与周天子祭泰山的义务，故在泰山脚下有一块田，田亩收入专用于祭祀，称“祊田”。鲁国在许国（今河南许昌）也有一块田，是赐给周公在王室做官的采地，称为“许田”。天子无力巡狩，郑的“祊田”无用，便与鲁国的“许田”交换。这次换田标志着天子巡狩礼的崩溃。

王室衰弱之后，过去诸侯必须朝会天子的礼仪也已名存实亡。相反，天子却要向诸侯进行聘问。周桓王在位 20 多年，曾五聘于鲁国。过去诸侯死了，继位者必须先赴王都朝见天子，请求赐爵，称为“受命”。东迁后诸侯治丧完毕新君即位就不再朝见天子，改由天子派人去向诸侯送册命，称为“锡（赐）命”。

对外方面，华夏面临着狄、犬戎等蛮族强大的生存竞争压力。

春秋时的地理形势，并不是华夏族居住在中原，蛮夷居住在周边，而是华夷狄混杂居住。春秋时华、夷杂处情形，粗略而言，徐州有淮夷，青州有莱夷，雍州（今陕西）有犬戎、义渠，豫州（今河南）有陆浑之戎，冀州（今河北）有鲜

虞、赤狄、白狄、山戎，荆扬有蛮。

狄人是鬼方的一支，与犬戎同源，他们以今山西、陕西两省为根据地，势力到达河北、河南和山东。春秋开始之前九年（晋曲沃庄伯二年），狄人伐晋，直打到晋国首都郊外。犬戎不但攻破西周王城，还屡屡蹂躏中原。曾经侵犯郑国，被击退，又曾经侵犯齐国，也被郑国的救兵击退。

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郑庄公

春秋初年，诸夏比较活跃的国家是郑国、齐国、鲁国、宋国、卫国。后来的秦、晋、楚外围三大强国，这时都还比较弱小。其中，第一强国是郑国。

郑国商业经济发达，军力强劲。商业经济为什么发达？原来有特殊的制度环境。郑国国府与商人立有盟誓（契约）：商人不背叛国君，国君保护其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后来“崤之战”前，秦军企图偷袭郑国，郑国就多亏了大商人弦高临机应对，才幸免于难。只可惜这种法权保护是浅层次、不彻底的，当时的经济形态也过于初级。现代经济学已经证明了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源，郑国的这一盟誓，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但它像一点未能燎原的星星之火，最终淹没在历史中。

郑国的著名领袖是郑庄公。郑庄公，姓姬，名寤生，据说他出生的时候脚先出来，所以取名“寤生”。庄公在权力斗争中胜出，登上权力宝座后，采取整顿武备的现实主义政治策略。他对周王室就像美国对联合国——尊敬地利用。郑庄公表面恭敬，暗中奉行马基雅维利主义，他不但冒用周王室的名义伐宋，甚至还派兵抢收周地的粮食。

封国成了恶邻，周王室岂能不窝火？双方兵戎相见。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率领王师、多国联军与郑军交战，战场位于今河南省长葛市之北，这就是史上有名的“繻葛之战”。

此战中，郑庄公摆开“鱼丽”阵，此阵战车前冲，步卒后随，有点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坦克率领步兵部队。郑军先攻击最弱的陈国军队，使蔡国和卫国军队畏惧而仓皇退出战场，然后集中兵力从两边合击周军，周师大



春秋时期的战车

败。周桓王被郑将一箭射中肩膀，忍痛勉强指挥军队逃出重围。王师败退，周天子更加威风扫地。从此，周天子逐渐成为大国争霸所利用的工具。

争霸，就是强国以武力去争夺成为诸侯盟主的霸权。春秋各国在争霸角逐中曾出现过所谓的“春秋五霸”，一般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a

春秋与战国时的争霸，性质不同。战国时代的争霸是一种纯粹争夺权力的行为，而春秋霸权的历史作用在于保障华夏的生存：抵抗蛮族世界。华夏霸权体系是在周王室衰落、失去统帅作用之后，华夏团结自保的方式；在华夏内部，则是改善政治秩序，维系国际和平和各国内政稳定。两者的总称，便是“尊王攘夷”。

戎狄在当时是一股残暴而强大的力量，如果没有诸夏大团结，则狄患后果不堪设想。经过春秋至战国时期，华夏族各国协同作战或独自作战，于是这些外族或者被同化、或者被消灭，最终中国大地上形成一个统一的文明体。

就诸夏内部而言，霸权体系是一种政治稳定器。参加联盟诸国，在内可保持政治稳定，乱臣贼子有所顾忌，不敢轻行篡弑；在外可保各国力量平衡，相互间不得轻启战争，有事付之仲裁，以确保和平。

齐国崛起，桓公始霸

西周封国有上百个，经相互兼并，至春秋时，势力较强的国家约有 14 个，它们是：郑、卫、秦、晋、虢、楚、燕、齐、鲁、宋、陈、蔡、吴、越。

郑庄公死后，国内发生继承人之争，进而引发多国混战，宋国纠集的联军攻入郑国国都，焚毁城门。郑国于是中衰，历史的主角转向齐国。

齐国位于今山东境内，地处海滨。周朝建立之初，姜尚因功受封于此，他本是一个杰出的军事领袖，故齐国向来比较强盛。12 代之后，君位传至齐僖公。

公元前 706 年，也就是周王室与郑国交战的一年后，郑太子忽带兵助齐抵御北戎有功，齐僖公要把女儿文姜嫁给他，他却说“齐大非吾偶”，谢绝了。原来，文姜和她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即后来的齐襄公，有乱伦关系。

文姜后来嫁给鲁桓公。有一次鲁桓公跟她回娘家，居然看破并且说破了襄公与她之间的隐情。襄公恼羞成怒，便命人刺杀了桓公。鲁人敢怒不敢言，只能要求处死凶手以遮丑。

a 也有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实际都不太准确，如果把在国际会议中被公认为盟主作为称霸的标准，那么这两种说法都有添加和遗漏，“五霸”只是个泛指。

齐鲁两国，国力原来大致相当，鲁桓公事件，反映出齐国开始逐渐强势。此事发生后四年（公元前690年）齐襄公灭纪（在今山东省寿光县南，为周初所封与齐同姓国），这是齐国兼并小国之始。襄公后来被公子无知所弑，无知僭位后，又被弑，齐国大乱。

襄公有二弟：长的名纠，由管仲和召忽辅佐；次的名小白，由鲍叔牙辅佐。襄公即位时，鲍叔牙看他经常胡来，知道国内迟早要乱，便领着小白投奔莒国。乱起，管仲也领着公子纠逃往姥姥家——鲁国。公孙无知发动叛乱，杀死了齐襄公，但不久无知也被人所杀。之后便是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对齐国君位的争夺。

齐的巨室国、高二氏暗中差人去迎接小白，而鲁君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要扶立他。鲁君同时命管仲带兵截住莒、齐间的道路。管仲所部遭遇小白一行，管仲立即开弓射箭，眼见小白应弦倒下。

公子纠的队伍到达齐境，齐国却已经有了新君，竟然就是小白！

原来管仲正巧射中他的带钩，他灵机一动，仆倒装死，安然归国、捷足先登。

小白就是齐桓公，他胜利后，立即强迫鲁国杀死公子纠。召忽以身殉主，管仲却依然活着。鲍叔与管仲本是挚友，素知管仲有经天纬地之才，此时向齐桓公力荐——《史记》上说两人年轻时一起做生意，管仲总是占便宜，不可信。桓公心胸宽广、重视贤才，遂把国政付托给管仲，并尊称他为“仲父”。此后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全来自管仲的大手笔。

自西周分封以来，邻居鲁国的国力长期不弱于甚至超过齐国，齐国争霸初期并不顺利。公元前684年，齐军在伐鲁的长勺之战中，被鲁庄公用曹刿“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策略击溃。公元前681年，齐约8个诸侯国会盟于北杏（今山东省东阿县北），意欲成为盟主。结果很没面子，8国中鲁、卫、曹、郑拒不出席，在到会的宋、陈、蔡、邾中，宋国君又中途退席。北杏会盟失败。但管仲在齐国创造出一套兵民合一的体制，齐国渐强。管仲是个经济奇才，他竟然提倡消费拉动经济，又操纵国际贸易中的供求关系，并注重货币发行量对物价的影响。

齐国称霸的主要潜在对手是鲁、宋两国，两国宾服，则大局可定。很快，齐便借口鲁不出席会盟，再度伐鲁，并迫使鲁与齐结盟。公元前680年，齐又以宋“背北杏之会”为由，联合陈、曹伐宋，并请周王室派军相助，桓公以天子之命伐宋，宋被迫求和。

公元前679年，齐、鲁、宋、卫、陈、郑在卫国的鄆（今山东省鄆城北）会盟，齐桓公主盟为诸侯长，这是他称霸的开始，史称“齐始霸也”。

齐桓公遵循华夏文明集团的内部礼仪，以“尊王攘夷”为目标，不灭他国、

不占其地，对其他诸侯国回赠有时超过其贡纳，对小国反倒更有利。在他之后，霸主对仆从国的搜刮剥削极为苛重，晋楚两国因此打开了富强的方便之门。所以孔子评论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

当时郑国已经衰落，唯有齐桓公有能力率华夏族统一作战，阻止狄势不侵入黄河南岸。管仲告诫桓公：“戎狄豺狼，不可厌（满足）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这是当时一个最重要的观念。

公元前664年，北戎侵燕，齐桓公率军北伐，保卫燕国。前662年，狄人攻邢（今河北省邢台），桓公派兵救邢，并将邢人迁居夷仪（今山东省聊城）。前660年，狄人犯卫，桓公救卫，归拢卫国残余人民，总共5000多人，把他们安置在楚丘（今河南省滑县）。史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齐桓公赢威信日隆。

春秋时期的“国际公约”

正当齐桓公称霸中原之际，南方楚国迅速壮大，开始北上中原争霸，不仅兼并了许多小国，而且连年对郑用兵。为了阻挡楚国北上锋芒，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鲁、宋、郑、陈、卫、许、曹等国联军侵蔡伐楚，直抵楚边境陲地（今河南省郾城南），派遣使者责问楚王。楚成王竟不敢应战，只得求和，两方订立“召陵之盟”，盟约的内容不可考，核心应是楚承认了齐的中原霸主地位。

又过了5年，齐在葵丘（今河南省兰考县东）召集鲁、宋、卫、郑、许、曹等国会盟，在这个“国际会议”上商订了有关各国共同遵守的条约。在这次盛会上，周襄公还派特使送来祭肉，正式确立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

所签署的条约叫做《葵丘之盟》。列强歃血为盟，宣布一致遵守所签盟约。盟约由齐国主导，以“周天子”之名公布，就好像美国通过联合国输出自己的国际体系。条约的核心内容是：

毋雍泉，毋訖余，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春秋谷梁传》之僖公九年）

意即：不要截断河流建水库，不要在荒年囤积居奇操纵粮食价格，选择继承人时不要废长立幼，不要把小妾扶正，不要让女人参与政治。不要把小妾扶正也要写进公约，不免令人好奇，但其重大意义不亚于现在的《核不扩散条约》。

由于往古部落之间通婚的老传统，我国封建时代王族婚姻都是有国际背景

的，例如“秦晋之好”。秦晋都是超级强国，他两家的外甥已经做了“树子”（太子），如果换掉而代之以妾之子，岂不要引起国际纠纷？为了国际和平，则树子不可易。以妾为妻、使妇人与国事亦然。

在公元前7世纪的黄河、淮河和长江流域，小国甚多，一河流经数国。如果上游国家筑坝蓄水，下游国家就要受旱灾，所以不能“雍泉”（截流）。饥荒缺粮时期，各国尤不许囤积居奇，即所谓“毋訖余”。所以上面这些都是维持“国际和平”的关键点。

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有极高的成就。兴邦丧邦，常常是外交的力量。

《晏子春秋》里就有一段齐国宰相晏子使楚，因为是个小矮子，楚国人想羞辱他，反而被晏大使所辱的小故事：

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宾者更导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使子为使。”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间，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谓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矣。”

楚国人又讽刺晏子说，听说你们的国君齐庄公被权臣杀死，你号称忠诚，为什么不跟着殉难？晏子回答说，国君为国家社稷而死，臣下应该跟着殉难。国君因自己的错误而死，我又不是他的宠臣奴仆，为什么要跟着殉死？楚人语塞。

原来，此处所说的齐庄公被杀，乃是一件轰动国际的八卦大案。齐国权臣崔杼（崔武子）的妻子是个大美女，齐庄公跟她私通，经常借机溜到崔杼家的后院。崔杼忍无可忍，布置家丁，当场捉奸。齐庄公狼狈不堪，想谈判，被拒绝；又提出到宗庙里自杀，被拒绝，最后竟趁乱逃窜，翻墙时被射中大腿，坠墙摔死。当时朝中大臣都怕得罪崔杼，畏首畏尾，独有晏子前去伏尸大哭一场。但晏子也认为齐庄公混蛋，所以哭完就走，走个程序而已。

可是事情还没完。在这特殊时刻，涌现出几位伟大的太史。《左传》记载，崔杼弑君后，太史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怒而杀之。太史的弟弟太史仲继续这么写，又被杀。另一个弟弟太史叔跟上，又



婴像

被杀。老四太史季仍不屈服，崔杼威胁说，你还是写庄公暴病而死比较好，否则……太史季当场顶了回去：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你的事我即使不写也天下皆知，也掩盖不了你的罪责，反而成为千古笑柄！崔杼彻底气沮。

事情仍然没完。三兄弟被杀后，另有齐国史官“南史氏”听说了，慨然持简而来，打算冒着生命危险记录这一史实。到了之后，听说太史季已压倒崔杼，才掉头回去了。

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史官。我们今天看到的一行行残编断简，虽然早已被历史的风尘腐蚀，但每一个字里行间都闪耀着他们伟大的良知。

清末发现了甲骨文，所刻商朝帝王名字竟跟汉朝《史记》的记载完全吻合，形成文物与史书的双重印证。这可隔了 1000 多年啊！这就是我国伟大的史官。我们现在能看到汉以前的史书，那是史官们以命、以血换来的。

晏子是距齐桓公 100 多年后的人物，跟孔子同时而略早，当时齐国国力早已衰弱，出使楚国十分不易，而晏子最终不辱使命。当然，外交绝不只是逞口舌之快，而是能够通过外交政策和国际协作，避免战争、带来和平、巩固权力和优势地位，因此外交战略直接决定国家兴亡。

遗憾的是，春秋时期的“国际体系”运行经验，并没有总结成理论、方法和学科，无法传之于后世。到秦汉之后，万国臣服，外交的经验和学问不再有用，春秋战国时期灿烂的外交学逐渐被废弃了。

葵丘之盟后十年间，管仲和桓公先后去世。

管仲赫赫功业，极受后世尊崇。他死了百余年后，孔子还赞叹，幸亏管仲领导诸夏对抗夷狄，要不然“吾其被发左衽（做戎狄）矣”！到了战国时代，许多政治理论和富国强兵的策略，都挂在管仲名下，成为《管子》一书的主干。

齐桓公一死，国内又发生激烈的君位争夺，诸子相互攻杀，宫中大乱。齐桓公已死 60 多天竟无人料理，尸体上钻出尸虫。等公子无诡最终立为国君之后，才敛尸出殡。齐国由此一落千丈，要到一两百年之后，它才能恢复强国地位。

宋襄公是个真贵族

桓公死后，五公子争位，齐国和诸夏同时陷入体系动荡。

此时，宋襄公出面救场。宋襄公首先会合各路诸侯，带兵入齐，给它立君定乱，获得成功。接着，他拘执了滕君、威服了曹国，然后要求楚成王分给他领导

诸侯霸权。

楚成王口头答应了。宋襄公便通知召开国际会议。结果就在会议现场，楚王伏兵突起，襄公从坛上的盟主变成阶下囚。幸而他的囚车进入宋国境内时，宋国有备，楚王暂且释放了他。

自从齐桓公死后，郑国就倒向楚国，郑君并且亲朝于楚。宋襄公此后又要伐郑。他的大军和楚的救兵在泓水上相遇。楚人渡水未毕，大司马劝宋襄公趁机进攻，他说不行。一会儿，楚人登陆完毕，却还没整队，大司马又劝他进击，还是不行。等到楚军列阵完毕，他的贵族风度才容许他下进攻令。结果，宋军大败；他也受伤致死。死前他解释说，君子临阵，不在伤上加伤，不捉头发斑白的老者；古人用兵，不靠险阻。寡人虽是亡国之余，怎能向未成列的敌人鸣鼓进攻呢？

宋襄公在泓之战强调古典战争礼仪，结果军破身伤，“国人怨之”。对宋襄公这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泽东语），《左传》批评他不懂战争，不过《春秋公羊传》却表示很赞，说他“临大事不忘大礼”，甚至把他跟周文王相提并论，“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其实两书评价的差异，反映出两种时代观念的不同。宋国保留古代礼制较多，江淮流域也是古代发展缓慢的地区。这一带的徐偃王也以仁义著称，说明古代尊重道德规则的战争公法在该地区尚有保留。

宋襄公有点像项羽，宁可死亡，也不放弃贵族的高风。后人评说宋襄公，总觉得他迂腐不可救药，但其实，他代表了一种可贵的古典精神，“襄”是个美谥，反映了同时代贵族们对他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

宋本是一个中等国家，又不忍践踏底线，争霸以失败告终。不过宋国文化传统悠久（殷商遗民），地理位置重要，在春秋时代始终很活跃，进入战国后也还有其地位。

小国存亡本受国际体系运动所决定，国际体系的存在可以保障弱国的生存——有研究表明，1946年以来，联合国会员国没有一个因遭受外敌入侵而亡国的，尽管局部战争时有发生。齐桓公死后十年间，国际体系出现权力真空，国家间兼并不断发生：卫灭邢；邾灭须句；秦灭芮、梁；楚灭夔。

齐国单一霸权之后，经过宋国过渡，出现了晋楚两极的“国际体系”，就如同英国单一霸权体系演变为美苏争霸体系。

晋楚争霸，问鼎中原

晋楚两大国是真正的大鳄——在春秋将近三百年的时期内，楚国灭了五十余

国，晋国灭了二十余国。

大江南岸的楚国，在中原各国的眼中，神秘而强劲。它是一个狠角色，从公然自称“王”就可见一斑。周朝时周天子才称“王”，各诸侯国的国君，按照爵位等级不同来称呼，例如“齐桓公”“魏文侯”“郑伯”之类^a。楚国国君，却也胆敢称王，因为它跟中原诸国若即若离，甚至公然自称“我蛮夷也”，敢于另立中央。据说武汉至今有“不服周”的口头语。

中原看楚国，有点像英国人看美国或澳大利亚，既感到另类又有些认同。楚国自认蛮夷，但华夏色彩很重，跟周王室往来频繁，接受周王室册封——只是级别很低。楚庄王虽然自己称王，但《左传》等正史只称他为“楚子”。类似的，吴王阖闾也自称王，孔子修《春秋》，也只称他为“吴子”（这种笔墨技巧，就是后世儒生们所赞叹的“微言大义”）。

楚人的起源很难精确考证。甲骨文中有“楚”字，即楚人在殷商时期已经存在。他们有可能原来居住在中原的山东、河南一带，属于东方族群，而被周人强制迁徙到南方去的。

西周初年楚国正式立国臣服于周之时，其地域仅仅有国都丹阳（具体位置众说纷纭）周围的弹丸之地，直到春秋初年，楚国仍是方圆百里的小国。西周初年，诸侯会盟时楚君还没有资格列席，只能去做看守灯火之类的杂务。

然而，楚国历代国君励精图治，国势勃兴。周昭王曾三次伐楚（公元前 985、公元前 982、公元前 977 年），后两次都遭受惨败，最后一次甚至昭王本人也“南巡不返”，实际上中了楚人的埋伏，淹死在汉水之中。这事要比繻葛之战中郑国大夫射中周桓王肩膀的那一箭早了整整 270 年。

再说春秋第一强国——晋国。

晋始封时都于唐（今山西省太原北），在汾水的上游；其后过了约三个半世纪，已迁都绛（今山西省翼城县），在汾水的下游。

开晋国风气的人物是曲沃武公，他本是分封在曲沃地方的侧室和分支，竟然起兵剪灭宗主和正室（晋），建立起僭主政权，成了晋武公。曲沃篡晋斗争过程十分残酷，由此形成了晋国严酷的现实主义政治传统，开后来战国时代的风气。

晋武公之子是晋献公，即位于齐桓公十年（公元前 676 年），死于桓公三十五年。他 26 年的统治令晋国国力大振。他重新修筑了绛都的城墙，又扩充

a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关于西周时爵位，因各种记载不同，一向存在着争论。其实许多记载都是出于后人的想象，所谓‘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级并非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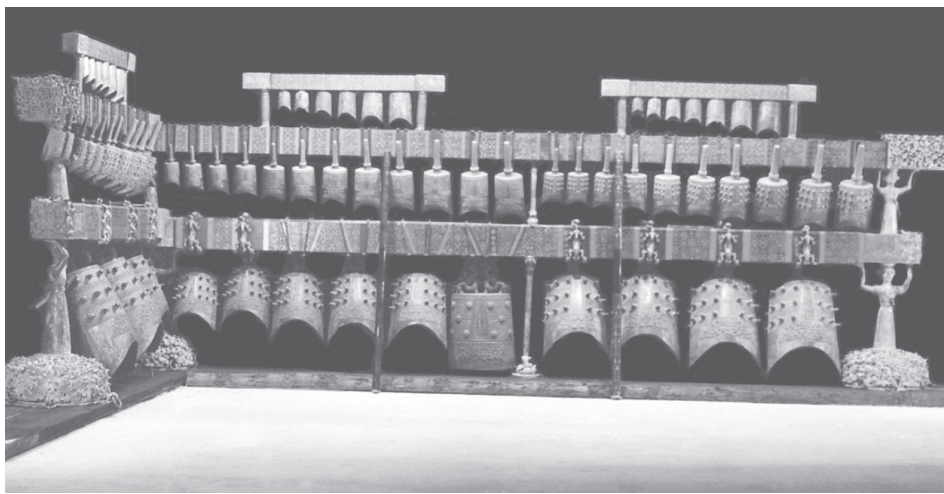
原来的一军为二军。他灭霍、灭耿、灭魏、灭虞、灭虢，使晋国的领土不但包括了整个汾水流域，并且扩展到黄河以南。献公整军经武，兼弱攻昧，已积贮了向外争霸的潜能。可惜他晚年沉迷女色，又废嫡立庶，酿成身后一场大乱，继他的儿孙又都是庸才。晋国的霸业还要留待他和狄女所生的公子重耳，就是那在外漂流十九年，周历八国，备尝艰难险阻，到六十多岁才得位的晋文公。

公子重耳因国内政乱而带领一千人马出逃，流亡过程曲折艰难，也有很多典故轶事流传下来。

曾有故事叙说寒食节的起源：介子推跟随晋文公流亡列国，曾在绝境中割大腿肉供文公充饥。文公复国后，子推不求利禄，与母归隐绵山。文公坚请不出，于是焚山以求之，子推坚决不出山，竟和他的母亲一起抱树而死。文公无比哀痛，葬其尸于绵山，修祠立庙，并下令于子推焚死之日禁火寒食，以寄哀思，后相沿成俗，是为寒食节的来历。

寒食节本在清明节前一两天，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地区把寒食节与清明节等同了起来，在同一天过。寒食初为节时，禁烟火，只吃冷食，在后世的发展中逐渐增加了祭扫、踏青、秋千、蹴鞠（踢足球）、牵勾（拔河）、斗鸡等淳美而有趣的风俗。

由介子推而成寒食节的故事，笔者后来专门翻阅史书加以查验。发现其实此事当时不见于官方史书记载。几百年之后，汉代学者刘向的书中有此描述（《左传》等书中有介子推的名字，但没说他被焚于绵山的事，只说他“隐而死”）。也就是说，因介子推之死而有寒食节的故事，未必是信史（其中割肉一节尤其不可



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

能)——但这个悲剧故事悲壮的精神和高蹈的气节,实在太动人了。

晋文公即位时,宋襄公已经去世两年。宋、郑、鲁、卫、曹、许等若干小国,都和楚国关系暧昧。当初文公流落经过宋国时,仁厚的襄公曾送过他二十乘马。文公即位后,对宋国存有好感。宋人又眼见他即位后大有作为,觉得他可以倚靠,便背楚从晋。楚率陈、蔡、郑、许的兵来伐,宋人向晋求救。文公召集一班患难相从的老臣开会,决议晋国旧有的二军更扩充为三军,练兵选将,预备“报施救患,取威定霸”。

公元前632年,即齐桓公死后11年,楚、陈、蔡的联军与晋、宋、齐、秦的联军决战于卫国的城濮。

晋文公与楚国早有过交道。当年还是公子重耳的晋文公,流亡时曾经经过楚国,楚成王以礼相待。有一次楚王设宴招待,席中问道,将来你若能返回晋国,怎么报答我?重耳说,楚国富饶广阔,您什么也不缺,报答真不容易,我只好勉强承诺:如果你我两国不幸交战,我退避三舍。如果仍然不获谅解,我才好举兵相陪。当时楚国大臣子玉也在座,事后提议杀重耳。楚成王觉得重耳必成大器,不从。

一舍是三十里,三舍就是九十里。这次战争时,晋文公兑现了承诺,令大军后退九十里,到城濮方才停驻。这一承诺的兑现,被庄严地写入史册,“退避三舍”也成为汉语中常用的成语。

四月初一,楚方联军进至城濮,初二,双方大军对阵。一场大战之后,楚军溃败,楚军统帅子玉及时收住兵力,方免于全军覆没,于是向后败退。楚军退至连谷(河南省西华境)时,子玉为兵败负责,自杀。

城濮之战是继齐、楚召陵之盟和宋、楚泓之战以后,晋国与楚国之间的一场大战,在春秋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扼制了楚国的北进势头,稳定了中原形势,成就了晋国的中原霸主地位和晋文公的威名。

晋国、楚国八十多年时断时续的争斗,由此开始。

晋、楚两国,当时



晋文公复国图(局部)

都有雄强的领袖。

楚国的楚成王一生颇有成就，不过后来太子商臣发动夺权政变，成王在临死前要求吃熊掌（以拖延时间），不被允许，遂被弑杀。楚成王的孙子楚庄王名气更大，很多成语故事就是因他产生的，如“一鸣惊人”“问鼎中原”等。楚庄王继位以后，沉迷酒色不理朝政，但实际上是在暗中观察、积蓄力量。后来有大臣以寓言的方式跟他对话，说楚国的郊外有一只大鸟，三年不飞、三年不鸣，为什么？楚庄王回答说：“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于是以雷厉风行之势奋起改革，楚更加强大。

公元前 606 年，楚庄王伐戎的分支之一“陆渾之戎”，大军经过周的都城雒（今河南省洛阳市附近），周天子派使者慰问军队。楚庄王早听说，古代夏禹铸造九鼎，代表九州，乃是国家权力的神圣象征，此九鼎经夏商两代政权递嬗，现存于周王室。于是，楚庄王咄咄逼人地向使者询问鼎的大小轻重，觊觎政权的心态已经毫不掩饰。天子使者也很高明，只回答说，得天下“在德不在鼎”，应该关心是否有德。这一番话冠冕堂皇，楚庄王一时无言以对。

九鼎既然如此神圣，觊觎它的当然就不只楚庄王一人。到了后来的战国时期，齐、楚、魏均谋武力夺取九鼎。张仪曾直白地劝秦惠王攻周夺鼎，“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

不幸的是，周亡后，九鼎不知下落。当时流传一种说法，称九鼎沉入了泗水。《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八年，“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看来秦始皇是相信九鼎在泗水的，但千人下水也没找到，只好作罢。

九鼎虽然消失，但是后世对它念念不忘。后世武则天、宋徽宗赵佶都曾铸九鼎，妄图以此粉饰执政合法性。说来也巧，宋徽宗九鼎铸成之日，徽宗亲自到九鼎前行酌献神之礼，刚刚走近，端放在北面的大鼎却突然爆裂了，水流了一地。俗话说“鼎在国在，鼎亡国亡”，结果后来徽宗真的国灭被俘，在金人的战俘营里终了残生。九鼎似乎真有那么些神秘。

城濮之战，晋国向南将楚国的势力逼退，然后掉头向北，剪灭赤狄、白狄，大幅扩张土地。经过晋国数十年的努力，狄患基本消除。在西面，秦国也与犬戎血战，雄霸西部。

随着时间流逝，朝贺往来频繁，楚国的上层集团越来越认可华夏，楚国也逐渐自认为华夏的一员了。由此，春秋霸权体系在四周消灭或同化蛮夷，扩张了自己的边界，巩固了华夏的生存。

晋楚两国武力争霸持续 80 多年。这 80 年的“国际政治史”，跟美苏争霸模

式很类似。两强都有若干附属国，经常发生“代理人战争”，到了必要的时候，两强之间也会直接开战。显然，夹在晋楚两国之间的小国倒霉了。例如，晋悼公年间，郑国被晋楚两国轮番夹击，都要求效忠。郑国一会儿归附楚国，一会儿又归附晋国，有时候两边同时纳贡。

晋、楚争取小国的归附，具体而言是军事和经济势力范围。小国对于所归附的霸国主要有两种义务：一是当它需要时，出定额的兵车助它征伐。二是以纳贡或纳币的形式对霸国作经济上的供应（贡是定期的进献，币是朝会庆吊的贺礼）。当周室全盛时，诸侯对于天王所尽的义务也不过如此。可见霸国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小太阳系，真正的周王室反倒被冷落了。

两次弭兵会盟：弱小宋国促成“国际”和平

大致在晋文公时代而略早，西边的秦国在秦穆公领导下逐渐崛起。秦穆公重用百里奚、蹇叔等名臣，国力强盛，“并国二十，遂霸西戎”，进而确立东向发展、争霸中原的战略。晋文公死后不久，秦国潜师远出，企图向东偷袭郑国。晋文公的继任者晋襄公听从大臣先轸的良策，于秦国班师回朝的途中，在崤山伏击秦军，此即“崤之战”。秦国东向的兵锋由此受到抑制。崤山在今河南三门峡，大战遗址犹在。此战之后，秦国转而与南方的楚国结盟对抗晋国。

战争局面还在继续。在晋、楚争霸的公式的复演中，战事的频数和剧烈非齐桓公、宋襄公的时代可比，而且与日俱甚。在这80多年间，楚灭江、六、蓼、庸、萧（萧后入于宋），及群舒；晋灭群狄，又灭偃阳以与宋；齐灭莱；秦灭滑（滑后入于晋）；鲁灭邾；莒灭鄆（鄆后入于鲁）。在这期间，郑国为自卫，为霸主的命令，及为侵略而参加的争战在72次以上，宋国同项的次数在46次以上，其他小国可以类推。^a

春秋战国不到600年，发生了660多次战争。春秋时期的战争使130多个国家变成不到10个。长期围城导致断粮之后，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的惨相。

为了消弭战祸，公元前579年，宋国大夫华元开始作“国际和平运动”。这时他同晋、楚的执政者都有交情；在他的努力之下，两强终于订立了和平友好、互不侵犯的条约。条约最后规定的违约责任是：“有渝此盟，明神极之；俾队（坠）其师，无克胙国。”

^a 张荫麟：《中国史纲》。

但这个违约责任，除了“明神极之”的诅咒外，并没有任何强制力能保证它的实施。于是，仅仅三年之后，楚国便背约向晋方的郑国用兵；次年便发生晋楚鄢陵大战。

鄢陵大战开始时，楚军全军靠近晋军大营列阵，形成压迫之势。接战之后，晋军一箭射中楚王的眼睛，楚军败退，幸好楚国神射手养由基射死晋军将领，又连续射死多人，晋军才止住不追。两军混战到夜晚才收兵。当夜，楚王召见楚司马子反商量策略，子反竟然醉酒不能前来，楚王感叹：“这是天要败楚！”连夜撤军。子反酒醒，自知有罪，便自杀了。

第一次和平运动由此宣告失败。

鲁襄公 27 年，宋国执政大夫向戌再度发起一场弭兵运动，他奔走于晋、楚、齐、秦之间，得到了同意，终于该年 6 月在宋国举行了 13 个国家参加的弭兵大会，以订立和平盟约。此时晋楚两国连年战争，均国力疲惫，因此都急于实现和平。

在大会现场，楚国的代表令尹子木提出一个可行的方案：让本未附从晋或楚的国家以后对晋、楚尽同样的义务，平分霸权。子木的建议经过两次小的修正后被采纳了。自此直到鲁定公四年（公元前 506 年）晋为召陵之会纠集联军侵楚为止，中原地区总算享有了来之不易的 40 年和平。

按照当时的惯例，外交宴会现场必然奏乐赋诗，通过赋诗艺术地表达感情、传递思想。晋国执政大夫赵文子会后的赋诗，是《诗经·小雅》的“乐只君子，福履绥之”，洋溢着喜悦欣慰的气氛。

其实这次盟会实际签约时，表面上晋楚两国平分霸权，实际上晋国还是吃亏。晋国是有苦衷的，此会之前，晋国已经形成君弱臣强的局面，权力从晋公室下移到越来越少的氏室，晋国有点自顾不暇。

这和平的 40 年中，中原消息平静，没什么大事发生。

但是从此时开始，各国内政却都将发生悄然巨变：晋国权力下沉到六家，直至它分裂为韩、赵、魏三国才止；齐国也是巨室大族掌握权力，后来陈氏击败其



春秋战国时期的剑

他几族，大权独揽；鲁国三桓专政，甚至赶走了鲁昭公，孔子拼命反对，然而没有什么用；郑国政治最混乱，但有幸出了个光照千古的大政治家子产，把国家治理得蒸蒸日上。子产不但重理性、轻鬼神，还公然铸造刑鼎，把法律向全民公布，让各国贵族统治者大跌眼镜。如果说子产这一生有什么遗憾，一是他出生在一个小国，没有更大的舞台让他改变历史走向，二是他的思想和政治经验没有总结成理论，也就无法影响更多的人，余泽不能到达后世。

楚国权力倒是集中在国君手中，但楚国处境也不太妙，它的背后，新近崛起的吴国已悄然壮大，它将会令楚国元气大伤。

吴越代兴：春秋争霸的尾声

弭兵会盟之后，春秋的历史进入晚期。这一时期东南方向吴、越之间的争斗构成了春秋争霸的尾声。吴国地处今江苏南部，越国地处今浙江北部，两国在中原各国影响下得以迅速发展。

吴国自称其始祖是周文王的叔叔泰伯。自泰伯君吴后，传十九世而至寿梦，中间吴国的历史全是空白。泰伯一说，不是史实，而是蛮夷之地的吴国人“华夏化”的方法，通过“创造”历史建立认同。

吴以前原是附属于楚的，在晋楚争霸时，晋为利用吴来牵制楚，曾经于公元前584年派申公巫臣向吴人传授先进的射法、御法和战车阵法，教吴王寿梦叛楚。

巫臣本是楚国的大臣，他之所以逃到晋国，是为了一场轰动史册的爱情，或者说因为一个超级大八卦。吸引他抛弃一切的女人名叫夏姬，她可能是春秋时期最“成功”的女人，可以说是中国的海伦（Helen）。所有见过她的人，不管是公卿大夫，还是陈灵公、楚庄王这样的一国之君，无不倾倒。因为她的艳情纠缠导致政治纠纷，最后陈国都因她灭亡。巫臣是楚国能臣，费尽心机送夏姬回到郑国，然后抛弃一切同她私奔到晋国。

吴本江湖之国，习于水战而不习于陆战。但从水道与楚争，则楚居长江的上游而吴居其下游，在当时交通技术的限制之下，逆流而进，远不如顺流而下的便利，故吴无法胜楚。但自从吴人学得车战后，形势便大变，他们从此可以舍舟而陆，从淮南江北间进击楚国后背。从此楚的东北境再无宁日。

吴王阖闾于公元前515年即位后，重用伍子胥、孙武治理国家，国力渐强。

公元前506年（定公四年），在晋的领导下，晋、齐、鲁、宋、蔡、卫、陈、郑、许、曹、邾、邾、顿、胡、滕、薛、杞、小邾共18国在召陵会盟，商议伐楚，

楚国东南方向的吴国也与 18 国联军夹击。第二次和平运动宣告终结。

吴军在孙武、伍子胥的指挥下，经过五次大战，攻破楚国首都郢都，楚国王室逃亡。楚臣申包胥决意复国，他出使到秦，斜倚在墙边“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深深感动了秦哀公。哀公为之赋《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仇”，发兵救楚。秦军击败吴军，楚昭王得以返回楚国。楚国此后把国都北迁于鄢郢。

吴见楚势已衰，转而与越争雄。在周代的东南诸外族中，越开化最晚。直至战国时，寓言中提到越人，还说他们“断发文身”，且光脚不穿鞋。越人在公元前 537 年以前的历史除了关于越王室的传说外，全是空白。像晋联吴制楚，楚亦联越制吴，是年越人开始随楚人伐吴。

公元前 496 年，吴、越战于携李（今浙江嘉兴南），越王勾践战败吴军。阖闾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继位后于公元前 494 年打败勾践。夫差以为已解后顾之忧，便挥师北上，争霸中原。

公元前 482 年，夫差两败齐国之后，决定大会诸侯于齐的黄池（今河南封丘）。他要学齐桓公、晋文公的先例，自居盟主。会盟时，晋人见他神色不定，料定必有事端，坚持不肯屈居吴下，幸有大夫献计，陈兵向晋挑战，晋国才屈服（黄池之会，《左传》跟《国语》说法不同，《左传》称晋国占上风，不太可信，此处采信《国语》）。

但吴国确实有变，原来，首都姑苏（今苏州）在会盟时已经被越人攻陷了。此前，勾践卧薪尝胆，在大夫种和范蠡辅佐下，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壮大力量，乘机攻入吴都姑苏（今苏州）。此后，吴越战争中，吴国屡战屡败。

公元前 473 年，越灭吴，夫差自杀。

越王勾践效仿夫差，大会诸侯，周王亦使人来“致胙”，以送腊肉的方式予以认可。后又迁都于琅琊（越本都会稽，即今绍兴，至勾践前一代迁诸暨），在那里筑起一座周围七里的观台，以望东海。“琅琊”的地名，中国有好几处，据钱穆考证，此处所称的琅琊在今连云港赣榆县，已经接近山东，与当时的邾、鲁为界了，可见越国地盘广阔，且有北图之志。会盟之后，越王勾践一时号称霸主。但是吴越的称霸已是强弩之末，远不及晋、楚争霸影响之大。

勾践与孔子大致同时代，勾践死于公元前 465 年，63 年之后晋国正式分裂为韩、赵、魏三国，那是战国时代的开始。在这期间，越灭滕（后恢复），灭郯，楚则灭蔡、灭杞、灭莒，亦拓地至山东境（莒后入于齐）。

第六章 战国：历史大转型

054

至简中国史

春秋时期虽然开始礼崩乐坏，但尚未出现社会整体雪崩式大变化。历史进入战国，展现出一派激流澎湃、天翻地覆的烈烈气象。战国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历史展开了一个急剧的大转型，这是从封建体制演进到帝国体制的关键时期。

从封建时代到帝国时代，这是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大转型。而清朝灭亡标志着帝国时代结束，中国历史开始了向现代化转变的第二次大转型，这一进程目前还没有结束。

中国的封建（Feudalism）社会跟欧洲的封建社会结构非常相似，只是时间上早了 1700 多年。可是在“封建后”（post-feudalism）的发展中，东方和西方就完全南辕北辙了。在东方，封建社会之后，我国最终形成了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大帝国模式，上面是至高无上的皇权，下面是如一盘散沙的民众。封建后的欧洲则在无数个小型的民族国家相竞争的局面中，从封建时代直接演化到现代社会。

春秋时期国家权力瓦解的局面还在继续。不仅周天子的权力下沉到诸侯手中，诸侯的权力也进一步下沉到卿大夫的手中，卿大夫的权力则进一步下沉到家臣手中。王纲解纽，古典礼仪荡然，历史进入了一种赤裸裸的力量比拼的“大争之世”。



齐长城遗址

春秋时原有 100

多个诸侯国，随着大鱼吃小鱼的不断进行，到战国时代逐渐变成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大国对抗，即“战国七雄”，其间还夹杂着周王室和鲁、卫、宋等若干小国，充当着跑龙套的角色。

战国时期，中国社会文化的各方面都起了巨大的变化，可惜关于这个时代，史料非常缺乏。《左传》《国语》记录的主要是春秋时期，《战国策》本身不很准确，《竹书纪年》在后代也已失传。司马迁在西汉时期写作《史记》时，就苦于参考资料的贫乏，以致于对战国的记载出现了若干差错。所以战国时代虽然晚于春秋时期，可是我们对它的了解却不还如春秋时期准确。

战国关键词：残酷的总体战

战国时代的特色在于大规模总体战。春秋时期的战争与战国时期相比，小巫见大巫。战国时代兵力规模巨大。战国时代几场著名的战役，各国兵力都有几十万计，而春秋末最大的晋、楚两国，其兵力不过战车四千乘左右，以一乘战士十人计算，也不过四万人。

战国时代的战争旷日持久，你死我活。春秋争霸有竞技的性质，军队规模小，战争往往一天就结束，最多也只有几个月围城，交战双方讲究规则、注重礼仪（军礼为五礼之一），但战国时期发展到以消灭对方整体为目标，战争周期也十分漫长。

战国时代的战争更为残酷，比如“屠城”这词最早就是在战国时代出现的。战国末年的长平之战，秦军一次性坑杀四十万赵国降卒，几乎摧毁了全国的青壮年。

战争技术也随之提高。以前的车战只适合平原，行动迟缓，战国时则发展起骑兵、步兵。大型的攻城器械和防守器械也纷纷涌现。军事专门化之另一表征是兵书的撰著，如吴起的《吴子》、孙臆的《孙子》、司马穰苴的《司马法》、墨家的《备城门》和尉繚的《尉繚子》全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战争深刻改变了社会的结构。春秋时期的军人都是贵族（士），到战国时期则普及到农民，甚至全民皆兵。

战国时代虽然充满战乱，但同时也是一个快速进步的时代。例如农业技术大发展。牛耕使耕地效率大幅提升，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在春秋晚期已出现，如孔子有个弟子名叫司马耕，字伯牛，将耕地与牛联系起来。到了战国，牛耕逐渐普及。战国时期的孟子曾说：“许子以铁耕乎？”说明已经出现了铁制的犁，以铁耕地比单人劳动力耕田效率大幅提高。

交通方面，道路日益开辟，远途旅行日渐普及。在孔子生活的年代，从吴都

往邾国最快的行军要走三个月。但在战国初年，从鲁都往楚都郢，个人的旅行，十昼夜便可抵达。

农业方面，水利工程灌溉事业已经高度发达。水利工程大师，如魏有西门豹（魏文侯时）、白圭（魏惠王时）、史起（魏襄王时），秦有李冰（秦孝文王时）、郑国（秦始皇时）。

随着技术、交通的进步，渐渐出现了工商业大都市和大企业家。旧贵族没落，“商贾”与“军人”代之而兴，商业大都市也陆续兴起，临淄、邯郸、大梁、郢、陶等都是有名的国际大都会。

总体来看，自春秋到战国中期三四百年间，人口繁殖，耕地日益开辟，游牧之戎狄渐次同化或消灭。国家之间原来都是莽莽荒原，现在则人烟密集。

随着商业发展，货币使用越来越广泛。《左传》所记春秋时列国君臣之间的往来，大抵为输送车马锦璧钟鼎宝器，乃至美女乐师之类，没有用黄金货币的记录；但战国始历史记录中出现了大量黄金。而更重要的，则为战国时民间自由学术大繁荣，以及“士”阶层崛起，替代血统贵族成为社会的领导力量。

国家裂变：晋、齐的蜕变与割据称雄的加剧

赵、魏、韩即所谓三晋，它们本是晋国的三个封区。

赵氏世代给周天子做驾驶员。周穆王的车夫是一个传奇的“神御”，名叫造父，以功封于赵地，于是以地名为氏。公元前582年，晋文公重耳的孙子晋景公听信谗言，疑赵氏谋叛，把这一家几乎杀尽、田邑没收，因韩氏劝谏，景公才复封赵氏一个仅存孤儿。赵氏复嗣后，不到四十年，发展成为晋国六卿中最强的一族。这件事后来经过艺术化的加工，成了著名悲剧故事《赵氏孤儿》。

悲剧《赵氏孤儿》具有感人泪下的力量，它最初是作为元朝人编写的一部戏曲，塑造了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一批人物，肯定了为正义而自我牺牲和向邪恶势力复仇的精神。它后来流传到欧洲，德国诗人歌德曾改编《赵氏孤儿》，题为“埃尔佩诺”；意大利作家梅塔斯塔齐奥改编《赵氏孤儿》，题为“中国英雄”，他们令欧洲观众变色动容。

这个故事为何在战国之后的一千年中无人问津，宋元以后才盛行呢？这其实与宋朝（姓赵）亡国之痛所带来的复宋情绪有关系。其实赵氏复封这一段历史的真相，本没有《赵氏孤儿》中那样强烈的故事性。元朝人所依据的蓝本是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可《史记·赵世家》并不足信，比如说，它跟《左传》的记载

差别很大，仔细爬梳这段时期前后的历史背景及其中人物关系，可以确定《左传》较为准确，而《史记·赵世家》太像小说了。

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最终从晋国六卿火并中胜出，索性将晋国瓜分，各自独立建国，史称“三家分晋”。晋国，春秋第一强国，从此在历史中消失了。

和三晋差不多同时，齐国也发生了蜕变。齐国卿大夫田氏（也叫陈氏，陈、田古音相同）以相位夺君权，史称“田氏代齐”。田家几代都是齐相，树大根深，他们逐步除去了国内强大的贵族，最后就直接取代登位了。周王室后来册封赵魏韩三家，等于承认既定事实。公元前386年，田氏通过魏文侯去活动，也取得了周王的册命，升格为侯。

三晋和田齐此时还需要周王册封，到三晋受封后33年，韩和赵居然合力攻周，周王室简直从凤凰变成落汤鸡了。春秋时期各国的国君一般称公或侯，进入战国，随着割据称雄的加剧，各国国君纷纷自称为王。

不论三晋还是田氏，在扩张时都吞并了国内一些小封君，为防止他人“以彼之道还治彼身”，他们不再把土地割封，而是削平各方、委派官吏，逐渐成君主集权。三晋和田齐最先走上这条路，而另外几个大国也先后变成这种君主集权制。

改革与变法：战略竞争的时代主旋律

诸侯靠武力竞争，本质上依赖国家实力的提升，这就需要改革弊政、奋发图强。这一动力终于酿成古代中国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成效最为卓著的战国变法运动。

各国纷纷进行变法，但是变法的思路各不相同。各国之间的竞争本质上为治国战略思想的竞争。所有这些改革中，最根本、最成功、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商鞅变法。在本书后文中将专门讲述，此处讲述六国变法。

魏国李悝变法是战国



战国咒字形鼻蚁钱

变法图强的第一声号角。魏国在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后形成，而在公元前403年正式受封为诸侯国。魏文侯此时起用了法家人物李悝。

李悝（音“克”，又名李克），约生活于公元前455至公元前395年，魏国人。他在魏文侯时担任过北地守，后任魏相，在短时期内帮助魏文侯实施变法。其内容可归纳为三项：一是废除世卿世禄制。取缔贵族的特权，把他们的财产、权力没收，按“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重新分配，使众多的贤才来为魏供职。此举使一些无功旧贵丧失地位，而大批出身庶民能为魏国作贡献的士人登上政治舞台。二是推行“尽地力”和“平籴”的经济政策。三是制订《法经》，以加强法制。

《法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较完整的成文法典，可惜全文现在已经亡佚。《法经》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官吏腐败的。如规定丞相以下的贪污受贿官吏要杀头，太子赌博要受笞刑甚至被废。

李悝开创的改革纲领，如废除旧贵特权、发展农业、提倡法制等，在当时都是具有普遍性的革新政策。李悝的变法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天下第一强国。只可惜李悝变法时间不长，且牵涉面太广，阻力甚大，因而改革难以彻底。但他的不少精神被后来商鞅所继承。

李悝的同学兼同事吴起也是一代大政治家。

吴起，卫国人，与李悝同为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先为鲁君供职，因遭猜忌转到魏国（在谨守周礼的最保守的鲁国，他的改革理念事实上也打不开局面）。魏文侯任他为西河守，因善用兵，颇有名声，后来落入宰相公叔痤的阴谋圈套，受到魏王猜忌，被迫出奔到楚国。

吴起大约在公元前390年离魏入楚，一年后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内容如下：一是“明法审令”，严肃法律执行。二是“实广虚之地”。将旧贵族迁往地广人稀的边地。三是“收爵禄”。针对“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局面，规定被分封的旧贵经过三代的，就将其子孙的爵禄收回，取消分封。

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变法推行迅速。吴起改革7年，冲破了旧贵族的反对，使楚国很快壮大。但是公元前381年，楚悼王病逝，以阳城君为首的旧贵族立即发动叛乱，包围王宫，吴起趴在王的尸体上，被乱箭射成刺猬。不过楚悼王的儿子继位之后，以对王尸“大不敬”为名，将这些叛乱贵族一网打尽。

吴起虽被害，但他的变法和李悝一样，都给后来实施改革的商鞅以深刻的启示。

稍后，在西边秦国商鞅变法的同时，东边的齐国也正经历着齐威王的改革。

公元前356年，齐威王即位。在位前9年他沉湎酒色，而不问政事。后来在

邹忌、淳于髡等谋士的劝谏之下，立志革新，振兴齐国。其改革内容如下：一是整顿吏治，重新制订并推行对官吏的考核标准。二是广开言路，提倡进谏。下达“求谏令”，宣布“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以致临淄王宫外，门庭若市，争相进谏；一年后，百姓“虽欲言，无可进者”。三是整军经武，把传统的义务兵制和雇佣兵制相结合，放手起用田忌、匡章、孙臏大批良将。四是发展生产，改进了国家授田制，采用份地长期使用制以调动生产积极性。

改革使齐国迅速强大，成为“最强于诸侯”的东方大国。其后齐国发动对魏国的两场战争，都使用了孙臏“围魏救赵”的奇谋，摧毁魏国主力部队。从此与秦国并列为东西两大强国，时人称之为“东帝”和“西帝”。

申不害在韩国主持了“术治”变法。法家本有法派、势派、术派这三大流派，各有不同的主张。商鞅是法治派的代表人物，而申不害正是术派代表人物，主张加强君主权力驾驭臣下，大量采用阴谋诡计的权术手段。

韩昭侯、申不害君臣为政核心是控制和驾驭官吏队伍。以权术之变代替制度改革，尽管能使韩国政治一度清明，却无法真正迎来国富兵强的大发展。申不害在韩国当了二十多年宰相，国家实力较强，但没有形成太强的国家实力。

不幸的是，“法治”思想在汉朝灭亡秦朝之后断绝，法家三派中的糟粕——权术思想却大行其道。商鞅被束之高阁、申不害却成为枕中秘籍。后来的帝王和儒家吸收术治思想后化出一种所谓“外儒内法”的控制体系。但是此“法”非彼“法”，权术而已，其流毒染黑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赵国则推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

赵武灵王是赵国第六位国君，他奋发图强，决心推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当时中原各国战争，以车战为主，甲士身着宽袍大袖，再披上笨重的铠甲，山地作战很是不便。而同赵接壤的胡人都善于骑马射箭，衣服简便可体。赵武灵王不顾群臣激烈反对，自己带头“胡服骑射”，穿紧身服、组建骑兵。此前古人衣着不穿裤子只穿裙子（称“裳”），这种习俗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才改变。

新骑兵部队组建后不久，就战败林胡、楼烦，“辟地千里”，还屡次攻陷并最终消灭了鲜于中山国。这些都是晋文公摧毁蛮族事业的继续。

赵武灵王通过军事改革，建立起强大的骑兵部队这一举措，对中原国家军队的发展影响极大。从此，各国逐步以步骑兵代替了车兵而成为军队主力。

不过赵武灵王在权力交接问题上心思闪烁不定，先是主动退休，自称“主父”，后又想阴谋联合被自己废除的太子章，重新掌权，最终导致“沙丘政变”，继位的赵惠文王与公子章发生火并，公子章被杀，赵武灵王被赵惠文王的军队围

困。各方心照不宣，虽然畏惧“弑君”罪名而不敢直接杀死赵武灵王，但却不给他供应食品，赵武灵王被围三月，断粮断水，只好捕麻雀充饥，最终被活活饿死。

沙丘，位于今河北省广宗县，赵武灵王在此死后 85 年，秦始皇巡视天下途经此地，时值夏天，暴病而死。

历史的特例：合纵连横后强秦一统天下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秦国开始强势崛起。向西，秦国称霸西戎；向南，秦国灭蜀；向东，秦国越过黄河耀武中原，击败战国初年第一强国魏国，迫使魏国迁都躲避。

秦孝公之后的秦国国君是秦惠文王。他先是任用公孙衍（头长得像犀牛头，所以人送绰号“犀首”），继续富国强兵，而后任用张仪，在大国间纵横捭阖，尽得渔翁之利。

犀首被排挤之后，回到魏国老家任宰相，联合五国形成“合纵”集团，谋求对秦国的均势，希望遏制秦国的侵略力量。合纵，指的是合众弱对付一强，与之相对应，连横，指的是以一强瓦解众弱联盟。合纵让秦国大感恐惧。为了抗衡，秦惠王采用了张仪的连横战略。他的策略是使楚、魏臣服，攻赵亡韩，让齐、燕不敢西向。

张仪是魏国人，他的主要功业是辅佐秦国继续强大，而苏秦的主要事迹是通过“无间道”的方式，诱惑齐国灭宋，从而最终达到削弱齐国、替燕国报仇的目的。

公元前 322 年，张仪到魏国游说，劝魏王与秦友好，同时秦对魏加以武力压迫，最终使魏背弃合纵与秦连横。公元前 319 年，张仪被赶走，公孙衍取代他成为魏相，联合魏、楚、燕、韩、赵“五国伐秦”，并推楚怀王为纵约长，然而实际上几国各怀心思，出兵的只有韩、赵、魏。公元前 317 年，联军在修鱼（今河南原阳）被秦军击败，合纵再被瓦解。

不只这一次，整个战国期间，东方六国心思都不一致，各有自己的算盘。

实际上，谁能最后胜出，当时确实未可知。例如齐国，也是霸权一极，就经常破坏“合纵”联盟。但总体来看，战国的历史由秦国主导。东方六国之中，楚国和齐国在多数时候担任领导角色。

在齐、秦强大之后，魏、赵、韩夹在中间，成为齐、秦必争之地，合纵连横战争更加复杂激烈。在强秦的压迫下，魏、韩臣服于秦。齐、楚成为秦的两大对手。

秦为了牵制齐国，必须与楚联合，破坏齐楚联盟。公元前313年，张仪游说楚怀王，以让地为条件，让楚怀王与齐断交，楚怀王信以为真，便和齐国断交，与秦连横，结果秦食言。得知自己被玩弄的楚怀王怒而发兵攻秦，但两次皆惨败。公元前306年，齐国又邀楚国合纵攻秦，本来楚怀王也答应了，但又一次没有经受住秦的诱惑，还与秦联姻，因此被齐、魏、韩讨伐，楚怀王以太子为人质，换来秦出手解围，结果后来楚太子又在秦国惹了祸，秦又联合齐、韩、魏攻打楚国。再后来秦对楚又忽然友好了起来，秦昭王约楚怀王赴秦会盟，楚怀王一去就被扣押了，关在咸阳，试图逃跑失败，最终病死在秦国。楚国就这样在接二连三的失利中逐渐衰落了。

在楚国衰弱以后，秦要东进，赵国是最主要的障碍。如前所述，经过“胡服骑射”改革，赵国军力雄健，摧毁过北方许多蛮族，是一个劲敌。

秦为打击赵国而谋取与齐的联合。齐是东方大国，也是合纵抗秦的主要力量，在楚怀王死后，公元前288年，秦昭王约齐湣王并称西帝、东帝，并订立盟约准备联合五国一起伐赵，但在谋士苏秦建议下，齐湣王主动放弃帝号，以孤立秦国。

从犀首开始的一百年里，东方各国断断续续有四五次大规模的合纵攻秦。这一次，齐国就在孟尝君领导下，联合其他几国军队合纵攻秦，迫使秦昭王也废弃了帝号。

这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个宋国崛起的插曲。宋国郊外一只鸟雀孵蛋，竟孵出一只雏鹰，占卜结论是：吉，将要称霸。宋康王本来就很勇武，且“面有神光”，看了这个卦以后信心爆棚。于是接连出兵，“东伐齐，取五城。南败楚，拓地三百余里，西败魏军，取二城，灭滕（国）”，又鞭笞天地、烧毁宗庙，表示威服诸神。但国内不久发生内乱。

公元前286年，宋国内乱。野心勃勃的齐湣王觉得这是个机会。谋士苏秦大力支持，用雄辩的口才论证灭宋的好处。齐湣王信了。但苏秦其实是燕国派来的特工，别有用心。原来，三十年前，齐国曾经趁燕国内乱发兵来攻，并占据了燕国都城长达三年，两国因此结仇。燕昭王继位后，励精图治，终于国富兵强。他表面上向齐国献媚，却暗暗派出纵横家苏秦，择机搞垮齐国。苏秦建议齐国灭宋，其实是给齐国设下了一个美丽的陷阱。

齐湣王出兵灭宋。

宋地处中原，历来是齐、楚、魏几个大国争夺的对象，齐的做法打破了列强的均势。秦便乘机与楚、赵、魏、韩等国君接洽，组织合纵攻齐。

宋是个中等强国，齐灭宋对国力损耗很大，而仇家四起，这也就是燕国所设

置的美丽陷阱，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接着，公元前 284 年，燕将乐毅率领燕、秦、赵、魏、韩五国兵力攻齐，大军一直攻下齐国都城临淄，并对当年齐军的暴行以牙还牙，把齐国都城的财富掠夺一空，之后燕军继续拿下了齐国大部分地方，仅剩莒和即墨两城未被攻下。齐湣王逃至莒，不久被人杀死。

齐王室的支裔田单在即墨与燕军对峙。公元前 279 年燕昭王死，他儿子与乐毅不合，田单趁机实施反间计，乐毅被撤换。田单随即布置“火牛阵”反攻，大败燕军。

齐国、燕国，两败俱伤。

公元前 278 年，秦将白起率兵攻克楚都郢，楚被迫迁都，损失了大量土地的楚国仍不得不向秦求和。公元前 266 年，秦昭王用范雎为相，采纳了范雎的“远交近攻”之策，即远交齐、楚，近攻三晋。

如前所述，三晋之中，赵国实力最强，秦国终于决定灭赵。

公元前 262 年，秦赵之间因为争夺韩国的上党郡而对战，即长平之战。赵国老将廉颇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秦国名将白起率军久攻不下，向赵王施反间计，令赵王换赵括为将。赵括是大将赵奢之子，他熟读兵书，但却没有实战经验。赵括上任后，下令赵军全线出击，秦军佯败，待赵军追至营垒前，分兵切断赵军后路，粮草断绝，将赵军分割包围长达 46 天。赵括突围不成，战死，40 万大军尽被坑杀，赵的壮丁几乎在此役死尽。

公元前 259 年，赵都邯郸被秦军包围，后来虽然幸有魏国公子信陵君“窃符救赵”，通过盗窃国君虎符私自调动军队，率魏军击退秦军解赵国之围，但赵国消耗太大，再也无力抗秦了。

随着楚、齐、赵几国削弱，战国七雄的兼并战便到了尾声。长平之战后 4 年，秦灭西周（周王室此时已经分裂为东西两个，西边的亦称西周），西周君赴秦顿首受罪，尽献所属 32 个属邑，逃剩的三万户人口和一些未散的宝器。



战国时期的虎符

同年东周的周赧王死，再没人给他立后，周王室的残喘终于断绝了。

楚的东迁，给苟延残喘的弱国鲁国带来了压力，楚向西打不过秦，就到不起眼的鲁国找补偿。公元前 256 年，楚考烈王灭鲁国，鲁国并入楚国领

士。鲁顷公废为平民，历史悠久的周王室嫡亲鲁国，终于绝祀——这个诞生了儒家思想的地方，未能免于被灭亡的命运。

不过公元前 247 年，秦庄襄王去世，他 13 岁的儿子嬴政即位。

青年嬴政以铁腕扫除国内叛乱势力，自公元前 230 年起，发动灭六国的战争，首先是三晋，秦不断攻赵使其不能救援韩、魏，三晋中最弱的韩国被先灭，在攻打赵国过程中，秦军又使计令赵王处死大将李牧，令赵军心涣散，公元前 228 年，秦攻克邯郸，擒赵王迁，赵公子嘉逃往代郡称代王，赵基本灭亡。

秦灭赵，获得了赵国所珍藏的“和氏之璧”。此玉璧原为楚国人发现并献给楚王，后在楚国一次宴饮时，不知去向。若干年后，被赵国一个宦官获得，献给赵王。和氏璧入秦，秦王嬴政命令李斯以鸟篆文撰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刻在和氏璧上，制成传国玉玺，后来成为天下公认的政权的象征。在后来的历史中，这块玉玺充分见证了国运的跌宕起伏。

在攻打赵国时，秦已兵临燕境，燕太子丹派刺客前去刺杀嬴政，这就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行刺失败后，秦命王翦、辛胜挥师攻燕，在易水以西歼灭燕军主力。公元前 226 年攻克燕都蓟（今北京城西南），燕王喜逃往辽东。

伐燕的同时，大将王翦之子王贲（音“奔”）奉命率兵南下伐楚，攻占楚 10 余城后回军伐魏，魏军困守大梁，王贲引黄河、鸿沟水灌城，同年三月大梁城破，魏王假被杀，魏国灭亡。

公元前 224 年，老将王翦率 60 万秦兵攻楚，次年攻破楚都，楚国灭亡，继而渡江作战，于公元前 222 年平定楚国江南各地。灭楚以后，秦派王贲出兵扫除燕、赵残余，燕、赵彻底灭亡。公元前 221 年，王贲率军由燕南下攻齐，昔日大国齐没做什么有效抵抗便投降了，至此，秦差不多用了 10 年时间兼并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 500 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

春秋战国最终走向一统，在世界史上其实是个特例。在欧洲，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进入中世纪封建社会，小国同样混战不断。欧洲人期盼出现一个强国来统一天下，但再也没实现。

法国的雅各·德·吉尔贝伯爵，在 1772 年出版的著作《试论普遍战术》一书，他严厉批评当时欧洲战争的模式，长期战争消耗资源、蹂躏社会，却毫无结果。

“但是，能否设想一下：欧洲将出现一个民族，人民天资聪颖，社会资源雄厚，政府领导英明；在其国内，稳重的美德同坚实的军力在平抑扩张的政策下连接起来；这个民族决不会忘掉自己的目标，懂得如何进行廉价的战争，如何在胜利之后过好生活，而不至于因财政困难而束手无策。我们将见到这样一种民族，能像

北风压倒柔嫩的芦苇那样制服它的邻居，并推翻他们脆弱的政治结构。”

吉尔贝认为无法预见到这种民族的诞生。他悲伤地说：“这样一种民族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欧洲不会再有一个国家能够立即强大起来，焕然一新。她们的成长一模一样，都在彼此腐蚀。”吉尔贝生活的时代，相当于清朝乾隆年间，此时的中国，帝国体制已经确立了一千多年了。^a

无法统一的原因，主要是在大炮发明之前，守城一方占据绝对的优势（还有欧洲各国地理分裂零碎、人数很少，财政薄弱导致君主无法组织大规模军队等许多原因）。但在中国，即便在春秋战国时期，攻城和守城技术都已经到了高度发达的阶段。例如春秋时期的重型攻城武器，已经有楼车（高空射箭）、冲车（撞击城门）、横楯（掩护工兵进行挖掘作业）、修櫓（掩护部队至城墙下）、抛石机等。一旦开战，火力压制、重甲掩护、特种作业齐上，攻城能力十分强大。

华夏的本来面目：士的精神

战国时期，“士”这一阶层开始崛起并成为社会的领导者，战国历史是他们大显身手的舞台。

“士”集团领导社会，这一特色一直延续到后世。中国人尊重文化人，并非因文化人会写诗，而是因为文化人与“士”高度重合。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他们是社会良知和社会的领导力量。

考察古代中国的立国精神，至少有如下几根砥柱：天下为公的立国理念，士族集团的领导，尚武重教的观念。中国历史上的治世和乱世，都与这几个立国核心理念密切相关。汉唐之盛世，是这几个理念发扬光大的产物；晋、宋、明之衰弱，是这几个理念遭荒废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士的来源主要有二：底层的贵族和受教育的平民。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王官失守，一方面，一部分接受过礼乐教化的贵族沦为只保留贵族之名而无贵族之实的士民；另一方面，私人办学兴起，不少庶民有了接受礼乐教化的机会，由庶民转变为士。

春秋战国时期是贵族精神和尚武精神最为浓烈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上至君王将相下至商人游侠、渔夫村妇，多有光明磊落的人生风范，有慷慨悲歌的豪侠气概和勇武人格。

^a [英] 迈克尔·霍华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在“国际”交涉中，对有损于国家权利者，他们不畏强暴、以生死相争，如华元、曹沫、蔺相如、毛遂、唐雎等人。如果身死而有益于国家，他们甘愿赴死而无怨无悔，如郑叔詹、安陵、宠高、侯嬴、樊於期、荆轲等人。对于尊长，他们常忠实服从。但若有损于国家大计或名誉，虽出自尊长，必抗命不从，但事定之后，也不能原谅自己的犯上之罪，而常自杀以谢罪，如鬻昧、先轸、魏绛等人。不幸犯罪，慨然负责、坦率接受惩罚，决不鼠窜逃刑，如庆郑、鹰然等人。为完成职业使命，不辞万难，甚至以死相赴，如齐太史兄弟，及李岬、申鸣、孟胜等人。

受人之恩，以死报答，如北郭骚、豫让、聂政、荆轲等人。朋友有急难相托，不惜牺牲一切乃至生命加以救助，如信陵君、虞卿等人。他人的灾难，虽然与我无关，但大义所在、大局所关，愿意为其赴汤蹈火，如鲁仲连、墨子、墨家巨子孟胜及其为楚国守城而死的180名弟子等人。与人共事，而一死可以为其保密、助其成功，则自愿赴死而无悔，如田光、江上渔父、溧阳世子等人。战败，宁死不为俘，如项羽、田横等人。两方道义相冲突，导致进退皆错，不能两全，则择其尤合于义者为之，但事过之后自杀身殉，以表明不得已，如锄麇、奋扬、予兰子等人。

子贡曾问孔子：“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的回答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在孔子的心目中，士的上品是内圣外王兼备的人才，既能对自己的行为怀羞耻之心，又不负重托，能担当一方重任的人。

士是无恒产的，他们并不代表经济势力。但是孟子说：“无恒产者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究其原因，正是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所以，士具有独立不倚的人格，坚强、果敢的品质，在他们身上，负有重大的历史使命和落实这一使命所必需的艰难崎岖的人生历程。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他们留给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由此，贵族阶级对士倍加礼遇。国君养士始于魏文侯、鲁缪公，而大盛于齐威、宣王的稷下学宫。极端礼遇士人的例子，如齐宣王对王斗、颜觸(chù)，燕易王让位于子之，秦昭王跪见张禄先生，燕昭王筑黄金台师事郭隗，皆当时国王礼贤下士的榜样。国君养贤进一步发展到公子养贤。公子养贤，以“战国四大公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最为著名。

1904年，梁启超游日本，痛感国家衰弱，且听闻欧洲和日本人常评论说：“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乃奋发著述《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国之武士道，也就是中国士的精神。

梁启超在书中选取了七十多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作为“中国武士道”

精神的体现者，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身份、地位迥异，有侠客、有刺客，既有君主、将军、宰相、太子这样的显贵高官，也有地方官员、陪臣、谋士、士兵，还有仆人、渔夫、民妇、屠夫等社会下层的普通人。他们重朋友、重道义、重名誉、重然诺，轻生死、淡功名、有血性、有个性，除暴安良、扶危济困、急人所难、行侠仗义，可杀而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梁启超认为自黄帝以来，华夏族就是靠武力征服夷蛮在这广博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并且自有正史开始的五百年间，卓越的尚武人物不计其数，他从“穆然以思”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国民族之不武，则第二之天性也”。

梁启超眼中的所谓中国武士道，不是某种身份如武士、侠客、刺客，也不是某些行为如生猛、鲁莽、讲义气、敢拼命，而是一种精神，一种刚健昂扬、积极果敢、有原则、有坚持、不苟且、不委琐的生活态度。

梁启超所生活的时代，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原来，虎虎有生气的“士”，才是华夏本来的性格和面目。《中国之武士道》以空谷足音般陌生而又熟悉的话语告诉我们：中华的尚武传统源远流长，中国有自己的武士道传统和武士道精神。只是年代久远，那些豪侠气概和勇武人格已经湮灭了。

第七章 百家争鸣：中华文明灿烂原乡

社会的大变局，促使人们思考过去、思考现在、思考未来，思考自然、国家、社会、人生，思考战争、和平、秩序、人性，并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解决方案。因此，到了春秋末叶、战国时期，在战争与和平交替的社会局势中，各种学术流派蓬勃涌现、异彩纷呈，私人讲学授徒之风大盛，形成了思想的大繁荣。

春秋时期，各种学说雏形已现。战国初期，儒、墨两派成为对抗的显学。到了战国中期，则“百家之学”并起争鸣，而像儒、墨、法等大家中又分派。这一时代的思想家及其学说，或中正、或深奥、或怪诞、或玄妙，异彩纷呈、无奇不有，有的劝人学禽兽恣情纵欲（它嚣、魏牟），有的劝人学石头无知无觉（田骈、慎到）；有的主张大公无私（墨子），有的主张人应该完全追求利己（杨朱）；有的追慕圣贤之治（孔孟），有的认为圣贤才是社会混乱的本源（老庄）……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学术思想辉煌灿烂的时代，分别是春秋战国和清末民初，其他时代，思想界总体沉闷。这两个时代为何能够盛开思想创造之花？还是因为自由的环境。思想生长犹如植物生长，需要土壤和空气。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一手遮天时，思想界同样万马齐喑，因为“异端”思想死于火刑的也不在少数。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结果，是为后世两千年打下了两个生存基础：思想基础与制度基础。以后的两千年，中国主要思想皆从这里发源；以后的两千年，主要制度（帝国制度）皆由此时奠定。

孔子的身世与儒家学派的形成

春秋时代王纲解纽，社会秩序崩塌式，在多数国家，“周礼”已经被逐渐荒废。但鲁国这个周王室嫡封的邦国，却对周礼谨守不渝，并把它当作一种学问去讲求。当时鲁国有一批人，专以传授礼文，以祭祀中的司仪为职业，这种人叫做“儒”。

儒者本是氏族社会当中掌握祭祀礼仪的人，起源可谓悠久。“儒”字从人从

需，“需”是柔软的意思，凡是从“需”往往含义不佳（如懦、蠕），所以“儒”本来并非褒义词。自西汉以后，儒家文化官方化，从此以后中国人确实越来越“软”了。

孔丘，字仲尼，后人尊称为孔子，他是一个周礼造诣最为渊博的“儒”。周礼经孔子的改造，被内化为一套关乎个人修养和人格的思想。在实践层面，他教育学生不要靠司仪工作蹭饭，那是“小人儒”，而要有利于天下，谓之“君子儒”。

孔子是商代贵族的后裔，祖上原是宋国的贵族，先辈孔父嘉和华氏成为政敌，曾祖孔防叔为了躲避华氏的迫害逃亡到鲁国。据说孔子的父亲是一位军中有名的大力士，老来与颜家少女“野合而生孔子”，即孔子是个私生子。以往的书籍往往为避尊者讳，隐瞒这一点，其实大可不必。

孔子少年时期家事已经破败，为了谋生存，孔子曾经四处打工：替贵族当过会计、管过畜牧；他从小就好学不倦、多才多艺。

鲁国是周朝文献典籍所在之邦，故孔子得以集礼学之大成。“周礼”治国体系是周公的创造，孔子对其十分服膺。孔子不仅懂得当时现行的一切礼（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及其他），还注意研究礼的沿革和其本源。三十几岁时，孔子开始成为一个民间教师，他已经成了鲁国最博学的人。

王纲解纽、权力下沉已经是时代趋势，鲁国也不例外。有一天，鲁国大夫季氏用64个歌女一起跳舞，按规定这是周天子才能享受的规格（季氏的级别只能用32个）。孔子一向主张复古，经常批判当时一切“非礼”的行动，对季氏这一践踏周礼等级的僭越之举十分光火，骂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35岁时，鲁国内乱，他放弃了教师职业，随鲁昭公奔逃到齐国。为了接近齐景公，他在齐国贵族高昭子家做了家臣，又向齐国太师请教古典音乐，在齐国社交圈名声渐起。次年，景公向他问政，孔子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森严，秩序井然，景公赞许。此后，景公又向孔子问为政，孔子说：“管理国家最重要的是做好财经工作。”景公点头，打算重用孔子。但齐国大政治家晏婴却反对，他评价孔子道：此人能言善辩，圆滑世故，喜欢在官场上活动，到处游说以求取官禄，很不可靠！晏婴更指出：现如今礼乐制度已经崩坏，他那一套不切实际，不足以强国，景公听信。孔子这边，大骂晏婴是小人。鲁昭公此时又乐不思蜀，不再有回国夺权之志，孔子失望，只好回国。

孔子回国后，后来终于受到鲁国国君赏识，在52岁时担任鲁国司寇（司法部长）。他立即部署恢复古来的权力等级秩序——毁掉季孙、叔孙、孟孙三家权臣的城堡，即他们的根据地。在“弑君三十六”的春秋时代，历史潮流滔滔而下，

孔子挺身与之对抗实行复古，终于品尝到螳臂当车的苦果。执政失败，鲁国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他只好流亡。

孔子带着一群弟子出游卫、宋、陈、楚诸国，去游说国君、寻找机会，国君们对这位周礼大师很尊重，但没有一个愿意任用他。这流亡在外 14 年的坎坷磨难，把孔子折磨得如同一条丧家犬^a。

在成功与失败、出世与入世之间，孔子心里有一种可贵的矛盾。他有时想“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都想好了可以由勇敢的子路陪伴。然而这只是一时起意，实际上，无论是卑鄙小人的陷害，还是平民百姓的误解，无论是他崇拜的老聃的反对，还是他敬重的隐士的嘲笑，他都义无反顾。以至于有人谈论到他时便说：“就是那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吧！”

鲁国局势大变之后，孔子才得以返回鲁国，此时他已经是个花甲老人。

孔子晚年，博学的名声更大，虽然没再做官，但是受到朝野的尊重。越来越多的贵族子弟和平民子弟慕名而来，缴纳学费、拜他为师。

孔子抱改革天下的宏愿，所以在政治活动之外更注重于教育。因此他虽然政治失败、教育事业却成功了。教育在当时本是贵族专利，师儒本是贵族的寄生者。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即不分贵贱贫富，一律施教。他自己说过，拿着“束脩”（十吊腊肉）来做赘见礼的，他都加以训诲。这件事看似平常，在当时却是一大革命。

孔子晚年，教育产业颇为红火，学费收入足以支持他舒适的生活：出门有专车，衣服必配毛皮（缁衣羔裘、素衣麕裘、黄衣狐裘），吃饭堪比美食家（饭不厌精、脍不厌细），而且十分讲究〔失饪不食，不时（不合时的菜）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

公元前 479 年春，他卧病七日而死，享寿 74 岁。孔子去世 70 多年后，晋国三分，战国时代开始。

孔子坚持了一生的信念，到底是些什么内容呢？



孔子像

^a “丧家犬”一词是《史记·孔子世家》中的原话。

孔子念兹在兹的是恢复古礼。他要求保持、恢复远古时期那温情、和谐的氏族统治体制。这固然是开历史的倒车，但远古的部落生活的确也充满着民主性和自然正义。孔子的学说体系就建立在这个矛盾着的基础上。他身后的儒家学派，也一直继承着这种既迂腐复古又饱含人性关怀的气质。

在孔子思想中，关于“礼”“仁”“中庸”的阐述是主要内容。

礼本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东西，它包括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人与人间的交往准则等等。礼当中最主要的是等级制原则。为了保持等级的尊严，孔子强调必须“正名”，就是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礼中最重大的是祭祀，孔子推原祭之心理根源为“报本反始”，即源于人类之孝悌心。孝悌心推而广之便是“仁”，又延伸为“忠恕”。仁学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主张把外在的规范内化为个人品德修养。

孔子还认为，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适当的标准，即“中”，既不过分也非不够。而善于运用“中”这一标准的做法，就叫作“中庸”。

自孔子之后，儒家渐兴。孟子、荀子都是著名的儒家学者。到了汉武帝时期，经改造后的儒家学说被采纳为意识形态基础，从而长久地影响了中国历史。

墨子：不尚空谈的伟大行动家

墨子，名翟，约生于公元前468年，卒于公元前376年，生活于孔子之后、孟子前的春秋末战国初。他曾是造车的工匠，故自称“贱人”，先后向史官的后代和儒家求教学习，创立了一个与当时儒家名气相近的墨家学派。

工人出身的墨子，可谓“工人阶级”的最佳代言人。

墨子开创的思想体系有十大内容：“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

其中“兼爱”（即博爱）是墨子学说的核心，其他许多观点都是围绕“兼爱”展开的。“兼爱”就是爱一切人，视人如己，是一种不别亲疏，不分远近的普遍之爱（儒家的仁爱是分等级的，父子最亲，其次兄弟，依次往外推，越来越淡）。由“兼爱”而主张消灭一切战争，即“非攻”。

墨家与其他诸子学派有一个很大不同点，就是在逻辑学、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方面很有建树，如他们较早提出了有关逻辑学的“名辩”思想。

墨家学派绝不崇尚空谈，而是坚决地把理论付诸行动。法家不过是些异时异地，各不相谋的人物，后世因为他们理念相近，给以一个共名而已。儒者虽然有



《墨子闲》书影

时聚集于一个大师之下，也不成为什么组织。唯墨家与他们不同。墨家则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兼有技术的传授和职业的合作。这就像一个“精武体操会”，它的主营业务是当雇佣兵——墨子反对侵略战争，却绝不是一个无抵抗主义者，消灭侵略的战争只有靠比侵略者更顽强的抵抗。所以他和弟子们讲求防守技术、制造守城器械，受君相禄养而替他们守城。墨家奉行一个独特理念：只替人守，不替人攻。

公输般（鲁班）为楚袭宋造云梯，墨子步行十日十夜去见公输般，与他斗智斗勇，终于保全了宋国一城百姓。楚国吴起死难后，楚国中央政府派军平叛各路反变法力量，墨家钜子（学派领袖）孟胜带领 180 名弟子为楚国阳城君守城，全部壮烈牺牲——这种惨烈不断的牺牲，直接导致后来墨家学说断绝。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有说服力得多。儒家高高在上，坐而论道，不耕而食为君子。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来，真应该感到惭愧。

道家：奠定中国人的世界观

道家学说的创始人是老子，他的代表作是《道德经》，又称《老子》。

司马迁在《史记》中著有《老子韩非列传》。这篇传记很长，但重点在韩非，关于老子的那一段非常短，为什么短？因为关于他的史料太缺乏了，实在没法写。

老子很神秘，也许就是个隐者。史书列举有三位“老子”：一是春秋时周藏室之老聃；二是春秋时的老莱子；三是战国时的太史儋，周王室的首席历史学家。具体是谁，司马迁无定论。后世学者通过词汇分析等很多方法，认为《老子》一

书乃是战国时作品（晚于孔子）。而老子到底是谁，至今众说纷纭，并无定论。

世界上再没有五千字比《老子》涵义更富，影响更大的了。《老子》是世界上除《圣经》以外被翻译次数最多的典籍^a，老子的思想传遍世界，也征服了不少欧洲人，如在德国，他就是最受欢迎的哲学家之一。马克思·韦伯在1915年曾写道，当时研究道家，几乎成为一种时尚。除了专业汉学家和哲学家推崇老子外，许多普通人对老子也很神往，例如德国作家克拉朋特就自认是道家思想信徒，他在一战后撰文呼吁德国人要“按照道的神圣精神”去生活，做“欧洲的中国人”^b。

《老子》是中国人世界观的重要来源之一（另外两个最大的来源可能就是《易》的阴阳学说和邹衍的五行学说了）。在仅有5000余字的《道德经》中，作者阐述了“道”是宇宙的本源。生生不息的大自然、风云变幻的人世间，都是道的产物。

老子的视角有异于常人。我们在河边看见河床上的水草，水流中的游鱼，那么我们关注的往往是水草和游鱼，但是老子关注的却是水本身。如把天地万物视同水草和游鱼，则道就如同水一样，既浸入它们的体内，也将它们所包围。没有任何事物能脱离道而存在^c。但是与对水的感受之不同，我们只要稍加留意，还是能意识到它的存在。而对于“道”毕竟是视而不见的“无”，因为它不会阻挡我们视线，所以我们更加留意的是天地之间，万物纷纭，生生灭灭的有形世界，但是老子用透彻的眼光捕捉到了它的存在。所以老子说“湛兮似或存”，“道”是如此的透明清澈，却仍能让人感受到它的存在。

道，渊兮若海，生生不息，它是宇宙、是人生的源头活水。德国哲学家曾经提出“唯意志论”，以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尼采的强力意志为代表。从道家角度来看，自然界和人类的生命意志，都是道的体现^d。

老子还阐明“物极必反”，“福兮祸所伏”的原则，并提出“柔”的哲学观念：以柔制刚，以弱胜强；老子还指出，治理天下最高的境界是“无为而治”。通观《老子》全书，可以时刻感受到它冷静的气质、宏大的视野、极具高度的命题。推究其原因，与记录总结历史上的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有关。

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代表是庄子。庄子名周，宋国人，他一生逍遥于世而不愿为官，追求一种自然而又超越的生活。在他看来，世间万物在道的面前都是无

a 《〈老子〉译介与老子形象在德国的变迁》，载《德国研究》2011年第2期。

b 《〈老子〉译介与老子形象在德国的变迁》，载《德国研究》2011年第2期。

c 这个美妙的比喻，是网友“糊涂真水无香”的作品，特此注明。

d 这是本书作者的想法，道在自然界为生命意志，在人类为强力意志。

差异的，人生要追求自由无羁，不应浪费于低级的蜗角之争，人生要有高境界。

庄子说，至人的追求，是一种人生的至高境界。

庄子用徐无鬼相马的故事、鹓雏之鸟的故事、河伯至于东海的故事，来比喻人生的境界高低。世俗生活的蝇营狗苟，在庄子眼中，哪里值得一活。

现实生活中，楚王派人前来聘请庄子任宰相，他也一笑置之，他宁愿做一只草原上自由觅食的雉鸡、大泽中任性浮游的乌龟。清贫日子难以为继时，他也被迫出门去借点小米，但思想却从未因贫穷而动摇。在战国政治局势中，哲学家惠施担任过魏国宰相，主张抵制张仪，进行合纵。惠施跟庄子是好友，二人经常辩论哲学，但庄子却并没托惠施什么福，他还看不上惠施的俗气呢——像猫头鹰喜欢腐鼠那样喜欢肮脏的权力，太等而下也。他宁愿飘然一身，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庄子绝不是不懂政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权者的权力来源——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而儒家的孟子还在到处宣传权力是上天所赐、权力依靠“德”，难怪庄子会发笑，说儒家所主张的“礼”，才是是祸之始而乱之首也。

哲学中最重大的命题之一是如何理解死亡。庄子并不害怕死亡，它只是人生回归了“道”，就像一滴水回归于大海。庄子的妻子去世，朋友来吊唁，却发现他正践行自己的观念——踞坐在地上，岔着两脚鼓盆而歌。庄子善用恢奇的譬喻解说玄妙的道理，其想象之瑰丽、情思之飘逸，令人叹为观止。

法家有三派：治国有利弊

法家学派是战国时期晚出的新学说。今人对法家学派，存在普遍的误解，例如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法家完全为着君主的利益，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云云。

其实法家原有三派，各自很少往来，并不成为组织性的“学派”。法家一词，是后人给他们分类时的冠名。法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管仲、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李斯、韩非等人。

法家三派中，其一重“术”，以在战国中期相韩昭侯的“郑之贱臣”申不害为代表。所谓“术”，即人主操纵臣下的阴谋，那些声色不露而辨别忠奸，赏罚莫测而切中事实的妙算。其二重“法”，以和申不害同时代的商鞅为代表，主张依法治天下（本书秦朝部分详细讲述）。其三重“势”，以和孟子同时代的赵国人慎到为代表。所谓势即是威权，要把政府的威权尽量扩大而且集中在人主手中。

术治本质上是人治主义的一种类型，势治派、法治派都反对人治主义，所以

本质上跟术治派对立。法家不仅反对暴君用术恃势，而且连明主的勤政任智也反对，所以法家在根本态度上就不主张人治主义。

韩非子的学说，总结了当时各国的经验和教训，集法家三派之大成。他认为法、术、势都是“帝王之具（工具）”。

韩非对于当世的君主大致有如下的劝告：

你们不是希望国家强大，甚至用武力统一天下吗？这无可非议。但你们自认高明的政策，尤其是儒家所讲献的手段，跟你们的愿景南辕北辙。儒家（以及墨家）不是教你们用贤人治国吗？你们试伸手一数，国内真正的贤人有几个？

崇尚贤人技术上无法实现。“尚贤”就会奖励人的“饰伪”心理，臣子为获功名利禄，一定会投机钻营，揣摩君主的心思，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以君主的好恶为好恶，从而将丧失一切客观公正的标准，君主根本得不到所谓的贤才。

贤人少见，于是政权就会落入奸人手中，导致天下大乱，国家危亡（韩非子的预言太准确了，这种乱象以后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所以，根本不能靠人治，唯有“法治”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依靠法治，不需要贤人、不需要尧舜之君，中等人才就可以治理国家，这就能实现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

儒家教你要爱民，有什么用？管理国家靠爱不行，要靠法。“母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法治是先苦后甜的长期战略，而儒家的仁道则将“偷乐而后穷”。孟子的“保姆政策”只会养成人民倚赖政府的根性，但法家却能让人民受磨炼而自立。

对于乱世，儒家的救世方案注重道德影响，以“贵德”为价值取向。法家的救世方案是以武力统一中国，以此制止战争继续。《商君书》中的《开塞》这个篇名，意即开启久已堵塞的“汤武之道”，以武力征伐统一中国。韩非子明确主张用实力说话，与商鞅一脉相承。

《韩非子》一书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后感慨：“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而无憾！”（韩非子后来果然去了秦国，也跟秦王嬴政见了面，但不幸被他的同学兼同事李斯谗言下狱，陷害身亡）。

由于时代所限，法家学派也不免有其弊端：其法律本身有过于严苛、残酷的内容，即使严格按法办事也会引起许多问题；在强调法律作用的同时，又错误地将道德与法律对立，对儒家的道德教化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完全否定；法家之法源于君主的权威，一旦君主乱法或守法之君去世，就面临崩溃的危险。

邹衍、杨朱、陈仲、许行

齐国的稷下学宫是战国时代的最著名的学府，上千名“稷下先生”聚集在此进行学术研究和教学，并且定期举行学术辩论大会，辩论大会上的名嘴，还被取了绰号。稷下先生们的研究范围包罗万象，不但包括哲学社科的各个领域，也涉及采矿、冶金、制造等工程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原理，他们在《考工记》中，还记叙过勾股定理、凹面聚光的光学知识、振动发声的声学知识等。

邹衍，齐国人，稷下学宫著名“教授”，人送绰号“谈天衍”。他糅合、发挥此前已经流行的五行学说与人世间的政治更替，发明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五德终始说”。

“五德终始说”自从被邹衍发明之后，广为流传，信徒遍布天下。秦始皇就相信秦代表威猛严酷的“水德”，在颜色上则崇尚黑色。汉儒董仲舒也用以论证说，汉朝推翻秦朝是继承了“天命”，秦是水，汉是土，汉灭秦，乃是五行相生相克的直接体现。

五行学说用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来论证世间万物的变化，在那个科学还不太发达的年代，听上去确实很有说服力。

那么，五行为何命名为“五行”^a？所谓“五行”，指的是肉眼能够看到的太阳系的五颗行星，即水星、金星、火星、土星、木星。现在我们知道，太阳系里一共有八颗行星，按照由近及远排列，分别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星、海王星。但在古时科学还不发达，人们只发现了五颗（离地球较近的），乃据此演绎，发明出一套“五行学说”，它可以理解为一个“五力模型”。

五行学说对中国的影响力极为普遍，至今儿童取名字还经常要考虑五行



下学宫遗址

^a 五行的起源，也有其他一些说法，如气象、方位等。

因素。但太阳系既然还有另外几颗行星，那五行学说的理论根基恐怕是有问题的。今人对五行学说的相关理论，不妨重新梳理优化。例如中医领域，尽管中医之神妙已历经数千年证明，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完美。中医理论部分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其中的五行部分恐怕就有改造的空间^a。

邹衍具有恢宏奇妙的想象力，他的著作有十余万字，可惜都已亡佚。邹衍的学说，现在所留传的除了“五德终始说”之外，还有“大九州说”。

大九州说是一种世界观。邹衍以前的学者想象全世界是一块大陆，四围是海，当时的中国（包括七雄和若干小国）几乎就是这大陆的全部；这大陆相传曾经夏禹划分为九州。邹衍却认为世界有很多块大陆组成，被海洋所环绕，“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以现在的地理知识看，他倒是猜得更对。

杨朱，是孟子攻击最力的论敌。据孟子说，当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杨朱的著述早已亡佚。我们只能从战国人的称引中，管窥见他学说的一斑。与墨子的兼爱相针对，他提倡“为我”（个人主义），人生的最高目的，应当是各求自己舒适地生活下去——不放纵，也不吃苦，为达到这一目的，人们应当“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毛”。杨朱以为倘若人人能如此，天下便太平了。

稍后于杨朱而与孟子同时的著名隐者有陈仲、许行。

陈仲本是齐国的贵族，他的两个胞兄都食禄万钟。他却提倡“不恃人而食”的新道德；以为他们的禄是不义的禄，不肯食；以为他们的房屋是不义的房屋，不肯住。他带着妻室，避兄离母，另立家庭。他让妻缉练麻丝，自己织麻鞋出卖谋生。一日，他回旧家省母，适值有人送了鹅来，他厌恶道：要这鸟东西做甚？后来他的母亲瞒着他宰了那鹅给他吃。正吃时，他的一个兄长告诉他这就是那鹅肉。陈仲立即走到门外把它呕出来。他所实行的新道德，据说很“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吸引了许多信徒，可惜现在莫知其详。

楚人许行托为神农之言，提倡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经济上的绝对平等。他主张国君应当废掉府库，“与民并耕而食”。

许行闻得滕国（齐、楚间小国）新即位的文公要行仁政，便率领弟子数十人

a 2014年9月《中医研究》杂志上有一篇论文，提议以“六合”理论取代“五行”理论，这种探索很有价值，说明学界对探索中医理论改造的问题已经有所注意。

来到滕都。他们虽受文公的礼遇，还穿着短衣，织席出卖以为生活。同时在宋国的儒者陈相，也受文公的吸引，和兄弟陈辛，肩着耒耜，走来滕国。他们听到许行的教说，立即把旧时所学的“周公仲尼之道”抛弃，而变成许行的信徒。

神秘的人物：鬼谷子其人与纵横家

鬼谷子、纵横家显然是战国时代最神秘、最传奇、最耀眼的人物。因为神秘，历史上的误读也就特别多。

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张仪、苏秦乃至孙臧、庞涓，都是鬼谷子的学生。

但鬼谷子其人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由于史料极度缺乏，尽管不少人加以考据，现在仍然渺茫难辨。春秋战国时期隐士很多，有一些奇人也是完全可能的。也有人认为，鬼谷子可能是当时天下学术中心——齐国稷下学宫的一位学者，后隐居。唐朝以后，有人著书称鬼谷子名王诩，或称王利、王禅之类，都是信口编造。汉朝的司马迁尚且不知鬼谷子姓名，唐人并无新史料，何以忽然得知了呢？

苏秦和张仪是鬼谷子的学生这一说法尚有《史记》记载。而孙臧和庞涓是鬼谷子的学生，鬼谷子还对他们进行毕业测试云云，这一说法来源于明朝《东周列国志》等演义小说，纯属讲故事而已，没有信史可征（《史记》只说他们“俱学兵法”，没有指出老师是谁）。

第二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来自《史记》，记载张仪、苏秦是鬼谷子的两个学生，两个人联手策划了合纵连横，宰割天下。

很遗憾司马迁老师其实搞错了。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后来被整理命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对这批帛书的研究表明，苏秦的主要活动时间大约在张仪去世20年之后，也就是比张晚了一辈。苏秦影响力没有张仪那么大，是后人的附会塑造了他。

而张仪在世时的主要对手，是公孙衍（犀首）。公孙衍、张仪“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天下熄”，纵横家们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总体而言，纵横家指的是战国时期游说各国君主、从事合纵连横运动的一批外交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们大多数出身于贵族集团最底层的“士”，但是修炼得一身文武双全的好本事。他们擅长谋略、参与国家的政治决策，他们精通兵法，长期参与军事活动，甚至亲自带兵攻战，他们对于外交和国际事务有深刻的理解，擅长演讲、辩论，代表国家出使四方。他们洞察人性，善于揣摩君主的心思并说服之。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有公孙衍、苏秦、张仪、邹忌、范雎、蔡泽等。



鬼谷子像

纵横家的崛起，源于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著名的有战国四大公子，其中楚国春申君待士尤其优渥，士中上客竟然穿着珍珠做成的鞋子会见赵国平原君的使者。齐国的稷下学宫，鼎盛时期学士们可达到上千人，皆有优厚的赏赐，“不治而议论”。邹衍、荀卿（荀子）、慎道等名士都曾在稷下学宫长期工作。

鬼谷子本人渺茫难辨，《鬼谷子》一书也有疑点。这本书在唐朝时修订的《隋书》中才首次出现，自战国至此已八九百年，期间竟无书籍征引或提及，所以有人怀疑这是后人所著的伪书（如梁启超就断言其为伪书）。但笔者认为，不宜武断下结论，比如《鹖冠子》一书也曾因类似原因被怀疑为伪书，后来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才间接确证《鹖冠子》乃是战国时期真书。从内容和文风判断，《鬼谷子》是战国时期真书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汉代之后被儒家学说所笼罩的社会，很难创造出如此精彩玄奥的作品。

纵观中国战略思想发展史，虽然《孙子兵法》等古代兵学名著对战略原则、方法、要素等基本理论问题都有十分精彩的阐述，但在具体战略实践的层面上，纵横学派大师们贡献为巨。

今天所见到的《鬼谷子》一书，是一本纯理论著作，不谈具体事件、具体案例、具体人物，只从抽象的理论高度来阐述，诸如外交斗争的战略情报搜集、敌国利益和领袖心理分析、游说方法和言辞艺术等。如它称搜集战略情报、评估各国实力为“量权”，组成要素有国家经济、民众生活水平和民心凝聚力、战略地理、战略谋划能力、君臣关系和外交结盟状况甚至天象吉凶等。

它称游说对手时进行心理分析为“揣情”，在具体的游说方法上，《鬼谷子》以“捭阖”“反应”“内榷”“抵牾”四篇来论述打开对手心扉，通过试探来了解对方心理，从内心进行谋划等不同办法。

弱小的燕国在与强齐对抗时，苏秦辅佐燕昭王韬光养晦，消减了齐国对它的敌意，同时鼓动齐国攻击宋国，最终得以联合各国“十年破齐”事例，可谓体现了《鬼谷子·抵牾第四》所说的“自天地之合离、始终，必有罅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阖，能用此道者，圣人也”的道理。



第三卷
帝国时代

第八章 秦：法治昙花一现

080

至简中国史

在中国历史上，秦朝是一个独特的存在。那黑色的战旗、磅礴的铁骑、肃穆的庙堂、简朴森严的吏治，都在描绘着一种不同于后世的气质。秦的崛起，是中国原生古典法治思想的产物，它的灭亡，也把这一思想埋葬。

正是以秦为代表，中国历史完成了从封建制向帝国制的大转型。这一演化的意义，正如历史学者吴思先生评论：帝国制度是在多种暴力—财政实体并存、优胜劣汰的环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组织形式。这套制度调动资源的能力、战争能力和稳定程度接近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化。这是一套经过上百个国家和二十多人断断续续的积累和摸索，将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制度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体系。这套高效率的综合性适应体系，依仗着最适者生存的强大生命力，成为称雄两千余年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历史活动主题，占据了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篇章。

秦人前传：源于山东、称霸西戎

从造字上看，“秦”字从手从禾，可见秦人也是农业部族。秦人历史悠久，《史记》曾记载，秦人祖先是帝颛顼后裔，还曾辅佐大禹治水，也曾辅佐大舜驯化野兽、放牧牲畜，舜为其赐姓嬴氏。尽管《史记》的说法并不很准确（当时王者恐不能给臣下赐姓，姓自母亲部族而来），不过仍可反映出秦人的悠久历史。

秦人发源地在哪里，曾让历史学界困惑了很久，“秦出东夷”和“秦为西戎”两种观点争辩不休。近年来的学术研究逐步印证了“秦出东夷”之说，新发现的《清华简》更是直接指出秦人先世是“商奄之民”，即从今山东曲阜一带起源。

到了周朝，嬴氏为周王养马、驾车，因功受封。嬴姓先后建立的诸侯国有十几个之多（如赵国也是）。其中的一支，受封于戎狄混杂的秦地，即秦国，作为

周王室的对外屏障。

周平王东迁时，许诺给秦人一个惠而不费的人情：若攻占了戎狄之地，就赐给你们。秦人于是向西向北浴血奋战，逐渐扩张地盘。

到秦穆公时，穆公与百里奚、蹇叔等名臣一同努力，使国力强盛，“并国二十，遂霸西戎”，进而确立东向发展、争霸中原的战略。秦穆公扶持晋惠公夷吾（晋文公重耳弟弟，在位早于重耳）践位，并施以仁德、武力双重策略，最终迫使晋国屈服，将边境东拓至黄河边。穆公后来又扶持晋文公重耳即位，并与之联军伐郑。此时的秦、晋两国，几代公室通婚，形成“秦晋之好”的联盟。

但中原争霸，终使两强由友好变为对峙、由对峙变为仇敌。“崤之战”是秦晋关系的最终解决，秦国东向之路由此被遏制，进而在晋楚争霸中与楚国结盟对抗晋国，因此，远在南方的楚国反倒成了“崤之战”的最大受益者。

当时各国都兴衰起伏不定，秦国亦不例外。穆公以后，晋国渐强，与楚国形成南北争霸态势。秦晋之间也多次爆发战争，秦国败多而胜少。

秦穆公去世 115 年之后，即公元前 506 年，时间已到了春秋晚期，在晋的领导下，晋、齐、鲁、宋、蔡、卫等 18 国在召陵会盟，商议伐楚，楚国东南方向的吴国也与 18 国联军夹击。吴军在孙武、伍子胥的直接指挥下，攻破楚国首都郢都，楚国王室逃亡。楚国使者到秦，站立倚在墙边“七日不食，日夜哭泣”，秦哀公最终答应发兵车 500 乘救楚。秦军击败吴军，楚昭王得以返回楚国。在东方的鲁国，此时孔子已 45 岁，几年后他会成为鲁国司寇。孔子死时 74 岁，他死后 6 年越灭吴，又 70 年晋国三分，那就是战国的开始。

春秋时的秦国，在中原各国眼中，差不多只是武力强大的蛮夷。当中原之国奏响《昭虞》《武象》等雅乐，当孔子在齐国听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时，秦国上下还在“击瓮叩缶，弹箏搏髀，而歌呼呜呜”，一派粗俗狂野的景象。

到了战国时期，秦人还不脱戎狄之俗，例如他们还父兄子弟和姑媳妯娌同寝一室（这种陋俗后经商鞅法令严禁才消除）。

一般人印象中，似乎一入战国时期，就是秦国最强，其实当时最强的是魏、齐、楚三国，而秦国十分疲敝虚弱。

转折点发生在秦献公时。他少年流亡到魏国，壮年才得返回。献公继位后 4 年，吴起在楚国被杀，卷入吴起内乱的楚国阳城君聘请墨家团队为其守城，墨家钜子孟胜率 185 名墨者战死。这一战，墨者的热血与决绝，给远在西北的秦献公以深刻印象。于是他也聘请墨家设计制造攻防机械、强化军事训练等，国家军力

逐步强化^a。但秦国的真正崛起，还要等到献公之子秦孝公与商鞅的联手合作。

风云际会：公孙鞅入秦

中原有个小国叫卫国，卫国有一个世家子弟，名公孙鞅^b。公的儿子称为公子，公子的儿子称为公孙。所以“公孙”实际上很多，许多也渐渐有名无实、几乎成了平民了。公孙鞅从小“好刑名之学”，后来又遍学儒、墨、道、兵、阴阳各派学说。魏惠王时，少年公孙鞅去魏国宰相府实习，任宰相公叔痤的秘书（“中庶子”），由此身处魏国的政治中枢，参与机要。

春秋霸主晋国分化出来的魏国，当时正是列国中最强大的一个。魏国地处平原四战之地，并无先天优势，魏国之强大在于思想，法家鼻祖李悝、吴起等人曾在这里播撒下强国思想的种子。

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所受的教育，是一种能文能武的通才教育；魏国的治国经验和理论，也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知识体系，这就是公孙鞅的人生基本背景。

公叔痤是一个老资格政治家。多年前，他为了争夺相位，曾以阴谋诡计排挤吴起。吴起怀有治国雄才，但由此失去魏惠王信任，只好奔逃楚国，在那里协助楚王变法成功，然而最终也死于楚国的政治斗争。

经过多年共事和观察，老公叔深感公孙鞅乃是人中龙凤。

公叔痤已经年老，病重期间，魏惠王问他相位的后继人选。公叔痤推荐青年公孙鞅，魏王嘿然。公叔痤认真地说，如果不用他，就杀了他，当下最重要的是人才！如果被别国得到，后果很严重！魏王苦笑。

魏王辞别后，公叔痤告诉公孙鞅：我只能先君后臣，对不起了，杀身在即，你快跑吧。不料公孙鞅一笑：既然他不听你的话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而杀我呢？在公孙鞅看来，死，固然不至于。可是，魏国既然没有工作岗位，自己又该去向何方？

时间的脚步已经走到了公元前362年。这一年，在西边的秦国，献公去世，21岁的嬴渠梁继位，即秦孝公。这位出身军旅的年轻君王面对的是一个严峻的局面。

秦国的西方，戎狄混杂而居，局势复杂动荡。秦国的东方，有六七个强国以

^a 详见何炳棣：《墨者：秦转弱为强的枢纽》。

^b 公孙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姬姓公孙氏，名鞅，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之地，号为商君，故又称为商鞅。

及十余个混杂其间的小国。这些国家今非昔比，他们已经纷纷走上了改革图强之路。他们互相串联勾结，都以武力相争，周王室早已不在他们眼里。其中赵、韩两国，更是趁着秦国君位更迭时期，直接出兵来攻。

东方各国中，最强大的正是魏国。战国初期，魏国经过李悝、吴起变法，练就一支精锐重步兵“魏武卒”。魏国武卒，每人身披三重铠甲，背负十二石的强弓和五十枚箭，持戈带剑，另外身背三天的口粮，在这样的重装备之下，行军半天就能走上百里路，其作战能力可谓强悍。

吴起曾经带领魏武卒，击败十倍于己的秦军，侵吞黄河以西之地。这一大战的阴影，长久投射在秦人心中。而魏国更欲图沿河西行，蚕食秦国。

孝公冥思苦想：要图生存，必须改革。

约在公元前360年，秦国发出一份《求贤令》，雪片般洒向各国的大都会，开始了一场人才招聘。《求贤令》有一说一、开门见山，承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国家“分土”，的确很有诚意。看了“招聘广告”，公孙鞅决心已定。这个不满30岁的青年把李悝著作《法经》打包放进行囊，迈步西行，走进秦国的风沙，也走向历史的风云。

帝道、王道、霸道，秦孝公选择“霸道”

公孙鞅来到秦国，通过秦孝公的爱臣引荐，见到了秦孝公本人。

公孙鞅讲述了三种不同的强国战略：帝道、王道、霸道。秦孝公年方青春，理论造诣不高，但他有自己的判断。“帝道”和“王道”玄而又玄，直听得他昏昏欲睡，但“霸道”战略却让他精神一振。他跟公孙鞅热烈讨论起来，连续几天都不觉疲倦。风云际会，正如王安石的词句：“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笑谈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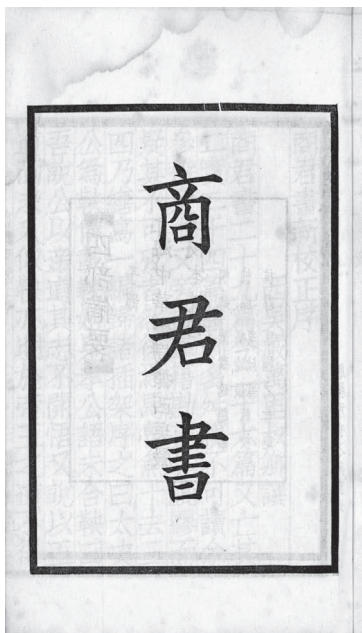
“霸道”战略一席谈之后，秦孝公认定，眼前这个公孙鞅，是这个大争之世中的一只巨笔屠龙手，是振兴秦国理想的操盘手。

公孙鞅终于得君行道，自然有“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欣喜与豪情，但他同时却也抱有遗憾：秦孝公急于求成，所以只看中“霸道”。但这三种战略中，霸道其实是等而下者，其见效虽快，却非上乘学术。帝道、王道之学，长期才能见效，但却是国家治理的更高境界。公孙鞅隐然感觉，与秦孝公合作，恐怕是不可能达到商、周两代那种盛德伟业了。

商鞅的法治思想

与中国类似，西方也经历过混乱的王权政治运行时代，甚至出现不少无政府状态时期。古罗马灭亡之后，法治的再次出现已经是千年之后，期间经历了一个在习惯法基础上的漫长演化和博弈过程。而中国，并非只有人治这一条泥泞路，法治思想也曾经出现过，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商鞅（公孙鞅）就是法治思想的代表。综合《商君书》和其他历史资料，我们得以管窥其法治思想之一斑。商鞅的国家观是一种生存竞争的国家观，类似现代西方政治学现实主义派。商鞅认为，国家战略是以实力争利益，而良好的法律制度乃是国家实力的根源。商鞅思想的核心在于法治。商鞅主张，以法治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皆按法断事。法要公之于众，天下人人皆知，尤其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a。



商君书

在制度设计方面，商鞅提出了独立法律官的思想，独立的法律官在中央设置三个，一直设到诸侯郡县。独立法律官要对民众解释法律，使民众可以依法对官员行使监督权，同时，法律官也对各级官员进行法律解释、审查、监督。法律官的工作目标是，官吏不敢以法愚民，民也不敢犯法以阻挠官吏执法。

在权与法的关系问题上，商鞅主张法治国家是“治不听君，民不从官”^b，权力高度集中与法律规范下的地方和民众自治并行。商鞅主张国君（中央政权）掌握国家的大权，但同时也从两个方面限制集权的界限。

一、国君（中央政权）的权力主要体现在立法权、司法权，而行政权、人事权由规定的法律限制。一旦立法，即使国君也不能随意改

^a 《商君书·赏刑》：“所谓董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b 《商君书·说民》。

变，官员的选拔任免由法律规定，官员只负责依法办事。民众依法自主自治则国家强大，国君干预社会运行则国家混乱。即“国治：断（于）家王，断（于）官强，断（于）君弱……治则家断，乱则君断”，因此，商鞅的结论是：实行法治的国家，“治不听君，民不从官”。君王权力再大，国家也不能以权力来治国，“以治法者，强；以治政者，削”（《商君书·去强》）。能用法律来治国，国家就强；专靠政令来治国，国家就削弱。这就解决了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治理只能靠法治，而不能靠权治、政治。

由于一切按法行事，也为社会和民众在法律之下的自由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如果“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那么，就能够实现社会的“自治”——“自治”这个词，在汉语中首先出现，就在《商君书》中。

二、在权与法的关系中，商鞅还提出，国君自己要自制自胜，就是立法者、司法者首先要遵守法律。^a 权大还是法大，这个很关键。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论调，称法家是君权最忠诚的奴仆，但这只是法家“术派”的观点，商鞅却是主张法律至上的。

把最高权力关进笼子里，恐怕不是个人智慧所能够设计出来的。欧洲也只有英国实现了限制君权，而且反反复复、走两步退一步，花了几百年时间才最终做到，近邻的法国、德国都没有演化出限制君权的体制。

商君的高远理想，由一种民本主义意识和“公天下”思想组成：“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五伯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商君书·修权》）商鞅创造了一个同时代古希腊雅典和斯巴达所没有的有效的国家制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政府制度，比西欧早两千年。商鞅具有非道德主义倾向，是世界上最先使政治理论摆脱道德的学派，也是中国政治学比较发达的标志之一。^b

假令秦孝公选择了“帝道”或者“王道”，中国历史会不会走出另外一条路径？秦孝公选择了“霸道”，对后世影响很深远。

“霸道”是一种举国动员型总体战体制，秦国由此崛起为“强秦”，最终一统天下，但这一体制也埋下了严重透支民力、进而导致灭亡的祸根。

a 商鞅说“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人者，先自胜者也”（《商君书·画策》），又说“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商君书·君臣》），就是说，国君是否是明君，其中的一个标准就是，是否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明君守法，无道之君则舍法而行私。不仅臣民要守法，而且“法者，君臣所共操（守）也”（《商君书·定分》）。

b 叶自成：《华夏主义：中国的本土人文精神》，《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2月。

其实，以法治国在思想本质上是反对个人集权、反专断、反暴政的。后来的秦始皇的个人乱法专断导致秦朝暴政与秦的短命，正是违背商鞅以法治国精神的恶果（当然，商鞅的思想并非完美无缺，我们不必以现代社会的水平去苛求古人）。西谚云“制度是智慧与机遇的产儿”（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当商鞅变法之时，智慧与机遇都已齐备，新的制度呼之欲出。

商鞅变法：改变中国历史的推手

公元前359年，30岁出头的公孙鞅，被秦孝公任命为左庶长^a，秦国开始实行变法。

变革政策在秦国政坛激发了大辩论。甘龙、杜挚等旧贵族群起反对说：祖宗的遗产多么好，效法古人、遵循古礼，准没错。公孙鞅批驳道：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而都能称王，春秋五霸，法术不同而都得以称霸，因此，治国并非只有一种不变之道，只要有利于国家，又何必效法古人！

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中，类似的辩论还经常出现，只是获胜的一方却再也不是商鞅了。秦孝公旁观了这场大辩论之后，更加坚定地支持商鞅。

商鞅变法共有两次，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是废除世卿世禄制。新制度规定只有靠军功可以封爵，取消“官二代”的世袭权利。二是奖励军功，禁止民间私斗。秦国素来民风彪悍，民间私斗成风。新法实施后私斗逐渐绝迹。三是编制户籍，实行“连坐法”。一人犯法、众人检举，否则同罪。这个制度意在使新法迅速渗透进秦国人的日常生活^b。四是奖励耕织。规定凡使粮食和布帛产量超常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此法意在鼓励秦国经济产出增长。



商 变法：废井田开 陌

新法在颁布之初，看上去很不可思议，它太有颠覆性了。民众很狐疑，街谈巷议、窃窃私语。

怎样让新法快速普及，并在人民心中树起威信？靠电

^a “庶长”似乎是个军职，跟“不更”之类官名一样，秦国所独有，在史籍记载中，东方六国都没有此类官名。

^b 何炳棣指出，连坐法自墨者辅佐秦献公时便已经开始。

视台广播吗？靠宣传员上山下乡宣讲法条吗？靠商鞅本人到街头演讲吗？这些措施都有用，但投入产出比太低了，不够巧妙。

一天，商鞅下令，在首都栎阳城南大门竖一根巨木，张榜下令道：谁把它搬到北门，赏十镒（每镒二十两）黄金。大家都闹哄哄过来围观，看哪个傻子相信。

果然没人干。

加赏金、再加赏金、再加赏金。已经加到了 50 镒，人越聚越多。

有一个傻子实在忍不住，决定豁出去了：万一政府说话算数呢？他扛起这根木头，在人群簇拥尾随中穿过秦的都城，竟真的赚到了 50 镒黄金。

这件事像闪电一样迅速传遍了全国，秦政府的信用巍然矗立起来。商鞅顺势将法律公布，新法很快家喻户晓。民众摩拳擦掌，盼望政府设立新任务。

商鞅将法律予以公布，是一种巨大的革命^a。原来自古以来，法律都秘而不宣，以威吓、驾驭庶民（欧洲亦然）。商鞅明确表示法律要通俗易懂、公布天下，便于全国人民学习，这样人人遵守法律，官员也不敢非法欺负人民。

2000 多年前能有这种卓识实属不易，梁启超赞叹说：“欧洲之法律公开，率皆经人民几许流血仅乃得之。我国法家对于此一点，其主张如此诚恳而坚决，且用种种手段以求法律知识普及于一般人民，真可谓能正其本，能贯彻主义之精神也已。”

商鞅新法逐渐开始发挥作用，10 年时间，秦国已经日益富强。

商鞅亲自带领所练就的新军出征魏国。商鞅对军事并不陌生——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都是“通才教育”培养出的文武全才，外交宴会时他们赋《诗经》，战争爆发时他们亲自上阵（遗憾的是，这种教育体系以及承载它的贵族集团，到汉以后都消亡了）。前有高额赏金利诱，后有严酷法律惩戒，内部有严整的作战法则，平时有系统的训练体系，法治化的秦国新军，不再是刚放下锄头的农民，他们犹如洪水猛兽，令敌军肝胆俱裂。

大军接战，秦军击败魏军，收复河西之地。魏国被迫迁都到大梁，以躲避秦军的锋芒。此时，魏王回想起当年公叔痤的话，后悔莫及。

魏国身处中原四战之地，腹背受敌。期间，还发生了著名的“围魏救赵”之战。这一大战，齐军按照孙臆的奇谋，在魏军远征回国的途中设下埋伏，大破魏军主力“魏武卒”，魏军名将庞涓战败自杀、太子申被俘虏。魏武卒的培养，耗资巨大、周期极长，魏国一旦失去这一作战主力，便很难恢复元气。战胜后的齐、

^a 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第一个公布成文法，比商鞅早，性质与商鞅相同。

秦两国由此崛起，而魏国在魏惠王手中，完成了从强到弱的转折。

魏国的衰落过程很漫长。魏惠王有长寿之福，执政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在整个战国时期首屈一指。但魏惠王才能中等，他的长寿对处于四战之地的国家来说却不是件好事。他以后还会跟秦相张仪打交道，被张仪牵着鼻子走，他还让儒家名人孟子帮着想办法，但很不幸孟夫子最擅长空谈。老年魏惠王兢兢业业却无可奈何地看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被打垮。

《吕氏春秋·不屈》描述魏国的苦辛，称：

当惠王之时，五十战而二十败，所杀者不可胜数，大将、爱子有禽（擒）者也。……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罢路，国家空虚，天下之兵四至，众庶诽谤，诸侯不誉……名宝散出，土地四削，魏国从此衰矣。

我们回望、分析这段历史，魏惠王的失败，和他在政治上不能因时制宜严格推行法治有关。与之相对比，实行了法治的秦国，则蒸蒸日上。

公元前 350 年，秦国迁都至咸阳，这是商鞅亲自规划督建的一座气势恢宏的城市。在咸阳，商鞅又推出了“变法 2.0 升级版”，这是改变中国历史的推手：

一是推行县制。合并乡村城镇为县，全国统一划分为 31 县，县设令和丞，由国君任免，代替了以往的分封采邑制（封建制）。历史悠久的封建制度直接被废除了，帝国制度的雏形已经建立起来。“封建制”原是一种从“部落主义”（tribalism）演化出来的职责不分、组织松散、以封君个人为中心的一种原始性的部落制度。而“帝国一文官制度体系”则是具有严密组织、职责分明、效率卓越、法则灿然的高级文明的政治制度。它和落伍、原始的封建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以大历史眼光来看，从鸿蒙时代一直到商鞅，华夏族的政治组织程度一直在攀升前进。

二是废井田，开阡陌。平毁井田中的纵横疆界。奖励垦荒，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土地，按土地多少纳税。这以法律形式废除了封建制度所依赖的经济基础——井田制。

三是统一度量衡。

四是制定秦律。现在出土的秦简显示，秦国的法律规定非常细致，对判例有精深的见解。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见司法案例中，刑事侦查的缜密，审讯与判决相分离的制度，以及疑难案件的奏谳制度，无不透露出秦刑事诉讼程序的成熟与发达。秦律甚至对刑讯逼供都做了严格的限制和使用规定。汉朝初年的学者，每每

攻击秦法多么残酷，从出土秦简的众多案例来看，秦法固然十分细密，但量刑准确而恰当，并不过于严酷^a。

五是烧诗书，禁游学。打击儒家复古思想，以确立法家意识的主导地位。

秦国崛起：制度的力量

商鞅变法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变法成功后秦国强盛的场景，司马迁在《史记》里描述道：

（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腊肉）于孝公，诸侯毕贺。

所谓盛世，不只是经济繁荣，也不只是国力强盛，还有人们的心态和精神风貌。“大悦”“道不拾遗”“大治”这几个词，无疑是描述商鞅变法的画龙点睛之笔。而周天子致胙于孝公，孝公后来又派公子会合、率领诸侯前往答谢，则标志着秦孝公正式称霸天下。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19岁的太子嬴驷继位。初称惠文君，后来自封为“王”，即秦惠文王。

当年的仇恨，并没有消失。

公子虔等人诬告商鞅“欲反”，商鞅被迫逃亡，最后在自己的封邑武力抵抗失败，全家被杀。商鞅的尸体被带回首都咸阳车裂，即“五马分尸”。此时商鞅50岁出头。

商鞅虽死，他设计和建立的法治体系却继续发挥作用。商鞅死后七八十年，赵国的大儒荀卿（即荀子）游秦，据他所记，这时商鞅变法的成绩还历历在目。荀卿说秦国不但地势险要、物产丰富，而且“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淫荡）汙（猥褻），其服不挑（佻），甚畏有司而顺。……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入其国（首都），观其士大夫……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观其朝廷，其朝（早）间听决，百吏不留，恬然如无治者。”人民淳朴守法，官吏忠信廉洁，一派秩序井然的气象。荀子发

^a 详见肖洪泳：《岳麓秦简所见秦刑事诉讼程序的历史价值》，《湖南大学学报》2013年5月。



秦兵马俑 出土的超级强

现，连秦国的音乐和服装都很正派，绝不轻浮浪荡。

荀卿又曾比较齐、魏和秦的军事制度，结论是：“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王之锐士。”魏武卒固然强悍，但商鞅的兵

制，是一套以赏罚为核心的体制化的力量，技术装备优势在制度优势面前，只能折戟沉沙。

制度，是一国长期兴衰的根源。商鞅所代表的法治学派，终极理想是“无为而治”，即社会治理不依赖于个人的能力，而靠一套制度体系。制度体系建立之后，社会运转就像一根车轴，自身不动而能前行。商鞅之后，秦国依赖它所创设的一套制度体系，实现了长期兴盛。遗憾的是，在汉代以后，商鞅的法治思想并没有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汉代以后所谓“外儒内法”，那个“法”却不是商鞅的法。商鞅反对人治，历史也证明，人治的辉煌不可持续。

法治思想是人类群体的治理模式之一，也可以内化为一种思维模式，大到国家、小到企业，用之则成、失之则败。这一规律至今仍很常见，例如土皇帝型企业十分多见，兴衰系于老板一人，人亡则政息。但实现了法治化治理的企业，命运就完全不同，如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丝毫没有影响企业命运。当国美电器式的法治化企业星火燎原，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微观基础就十分稳固了。

一统天下，终结五百年混战：“皇帝”的诞生

商鞅在世时所确定的秦的基本国策，是把东征作为长期的战略方针以争夺中原。商鞅虽死，但秦国东征的战略不变。

秦惠文王灭蜀、破魏，任用张仪等人以连横政策分化六国，秦国更加强大。秦惠文王的继任者是秦武王嬴荡，他机智英明，又有天生神力，上任短短时间，就很有有一番作为。遗憾的是，一次他跟大力士比赛举鼎，用力过猛导致血管破裂，竟然当天猝死。他仅仅做了四年国君。

秦武王猝死，一时出现接班人混乱，楚国嫁过来的秦惠文王妃子芈八子（芈，音“米”）在幕后掌控了权力。此后数十年间，秦国又经历了秦昭襄王（在位 56 年）、秦孝文王（在位仅 3 天）、秦庄襄王（在位三年），期间充满复杂的合纵连横战争，具体过程已在本书前文讲述。

公元前 247 年，35 岁的秦庄襄王英年早逝，他 13 岁的儿子嬴政即位。此时，辅佐秦庄襄王获得王位的丞相吕不韦独揽大权。嬴政母亲情夫、假太监嫪毐也掌握一支私人武装，伺机政变。

秦王嬴政手段非凡。实现亲政之后，他派出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除嫪毐叛乱集团，又逼死了吕不韦。嬴政虽然年轻，但理想远大。时代的大患，他决意去消除。时代的大目标，他决意去实现。

当时华夏大患有二：一是华夏不能统一，各国战乱不断。战国时代总共 250 年左右，各国间的战争竟有 330 多次。二是夷狄交侵，直到战国时，我国境内和境外常有外族的侵略，而北方的夷狄危害最大。所以战国时代，北方诸国或者跟他们讲和，或者筑长城以自卫，但是因为内部分裂的缘故，始终不能一致对外，这件事关系到民族的存亡，要保持民族的生存，必须抵抗外族。

自公元前 230 年起，嬴政开始发动灭六国的战争。

秦王嬴政个性勤奋、强势、霸气。他极其刻苦，每天要批示 120 石重的竹简文件，不批完决不休息。即便是对鬼神的挑衅，他也毫不畏缩，坚决镇压。他后来南巡时在湘水上遭遇大风恶浪，疑是湘水之神作怪，大怒，下令尽伐湘山之树以示惩戒。东巡期间，他乘船入海，又亲自射杀巨鱼。

26 年之后，他的大军已经先后灭掉六国，实现天下统一，五百年来的混战局面归于和平。

在睥睨古今、踌躇满志之余，嬴政觉得一切旧有的君主称号都不适用了。战国以前，人主最高的尊号是王，天神最高的尊号是帝。李斯取法上古，取有广大之义的“皇”字，建议称“泰皇”。



秦朝疆域图（据谭其《中国历史地图集》）

但嬴政别出心裁，把泰字除去，添上帝字，合成“皇帝”；又废除周代通行的谥法，自称“始皇帝”，预定后世计数为二世皇帝，三世皇帝，“至千万世，传之无穷”——当然，他所想不到的是，大秦江山没有传万世，而只传了15年便被彻底推翻。

邹衍的学说，此时已经流行于天下。始皇也接受了他的学说，以为周属火德，秦代周，应当属克火的水德；因为五色中和水相配的是黑色，于是礼服和旌旗皆用黑色；又因四时中和水相配的是冬季，而冬季始自十月，于是改以十月为岁首。邹衍是相信政治的精神也随着五德而转移的。他的信徒认为与水德相配的应当是猛烈严酷的铁血政治，这正合始皇的心意。

秦自变法以来，侵略所得的土地，直接隶属中央，大的置郡，小的置县，郡县的长官都有任期，不能世袭。始皇每灭一国，便分置若干郡。秦国成为一个纯粹郡县式的大帝国。

列国竞争，本质上是思想的竞争。回顾这数百年的大国竞争过程，商鞅的思想最终胜出，他奠定的军队基础，横扫六国，他设计的国家模式，由此复制到当时的全天下。整个中国社会，遂由封建制转型到帝国制。

始皇分全国为三十六郡，每郡设有郡守，掌民政；设郡尉，掌兵事，设有监御史，常监察。这种制度也是中央政府的复制版。郡县下面又设乡，乡有管理教育事宜的“三老”，管理司法和税赋的“啬夫”，维护治安的“游徼”。

大致而言，秦在开国初的境域，北边包括今辽宁的南部，河北、山西及绥远、宁夏两省的南部；西边包括甘肃和四川两省的大部分，南边包括湖南、江西和福建；东以福建至辽东的海岸为界。从前臣服于燕的朝鲜，也成为秦的藩属。此外西北和西南边外的夷君长称臣于秦的还不少。与周朝初期华夷混杂、领土狭小相比，这八九百年间，华夏地盘的扩张和政治组织的进步，是极为巨大的。

峰山的始皇纪功石刻里说：

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攻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阡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

大致意思是，自古以来，天下战祸不断，古往今来，只有皇帝一人彻底平定了天下，实现真正和平，人民康定，利泽长久。

这段话真不是自吹自擂。

帝国的建设：统一文字与交通

政治的统一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全国的文化不能统一，那么政治上的统一仍旧不能稳固，因此秦始皇要进一步去做到全国文化的统一，首要的就是文字和交通的统一。

我国的文字在周朝以前原有一种古文，叫作“籀文”。到了战国时期因为各国分裂，各国所使用的文字各不相同，秦国所用的是籀文大篆，六国所用的是东方古文。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李斯等人创造出一种小篆，程邈又创造出一种便于书吏书写的隶书，从此全国都成为“书同文字”的局面，原来的大篆和东方古文都废止了，代之以小篆和隶书，这在全国国民的精神统一上极其重要。

秦始皇又发起气魄恢弘、重组山河的帝国建设工程，例如秦直道、都江堰工程、灵渠、万里长城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道路交通体系。秦所建设的“驰道”，是古代版的高速公路。“驰道”分两条干线，皆从咸阳出发，一条东达燕、齐，一条南到吴、楚。这些驰道实用而又美观：道宽五十步，道旁每隔三丈种一株青松，路身筑得坚固厚重，容易崩坏的地段还打下铜桩。四方有事，军队可以沿着驰道快速到达。将军蒙恬为了便利行军，又修通了一条 1800 里的直道。此外，还开通了五尺道，连接西南，后来形成了陆上南边丝绸之路。

秦始皇把全国的文字统一，把道路体系建成之后，我国才第一次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民族国家。

在秦始皇看来，武力应该完全由中央政府掌握。于是在帝国成立之初，始皇令全国民众以酒宴狂欢来庆祝（秦法平时禁三人以上聚饮）。当众人还在醉梦中的时候，他突然宣布没收民间所有的兵器。没收所得，运到咸阳，铸成无数大钟和 12 个巨大的铜人。

这 12 个铜人被塑造成一个个狄人端坐的形象。最小的约 30 万吨，最大的约 80 多万吨。小的高 8 米，大的高 13 米，恢宏地陈列在大秦宫殿之



秦始皇陵铜车马

前。背后那可以容纳万人的巍峨宫殿，是帝国的象征。

这 12 个铜人的命运，见证了时代的动荡和历史的苦难。几百年之后，他们被董卓、石虎等军阀销毁，或被用来铸钱，或被用来制作兵器。秦始皇又把全国最豪富的家族共十二万户强迫迁到咸阳，放在中央的监视之下。

除了武力，还要加上思想文化的统一。始皇的朝廷里，养了七十多个儒生和学者，叫做博士。始皇 34 年，有一博士献一篇颂赞秦始皇的大文章，始皇很高兴，另一位博士却上书责备作者拍马屁，并且是古非今地对郡县制度展开批评。始皇征询李斯意见，李斯复奏说，天下思想混乱，应该统一，并建议烧书，只留医药、技术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

臣请史官非秦纪者，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得，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以吏为师。

对执行缓慢、执行不力的，处以“弃市”（死刑）、“灭族”等重刑。始皇轻轻地在奏牍上批了一个“可”字，便造成了千古叹恨的文化浩劫。这被后世史家称为“焚书坑儒”。

不过，“焚书坑儒”在历史上被严重妖魔化了。“焚书”是确有其事。只是秦朝下令烧毁天下之书，这些书在宫廷里却仍然保存。^a 秦廷没有销毁全部书籍的意图，实际损失也没想象的那么严重。秦灭亡后，藏书有相当一部分被转移到了汉宫廷。“坑儒”却不然，其实是在咸阳坑杀了 400 多个神棍巫师，这类人之前屡次以妖术欺骗始皇。而博士和真正的儒家学者，则继续着自己的学术生活。

西汉时期秦朝被彻底妖魔化，但是从东汉学者王充开始，便不断有学者为“焚书坑儒”辩冤。以下仅举近代几个例子：

鲁迅说：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梁启超则直言那些术士本来就是些“五利之徒，左道欺罔”，原本“在法宜诛也”，活该坑杀：“凡若此辈，皆何足惜！始皇一坑正可以扫涤恶氛，惩创民蠹，功逾于罪也。”章太炎指出，秦焚老百姓家藏的《诗》、《书》、百家语，是为了独占这些思想，实行愚民政策（私其方术于己，以愚黔首），但对儒者却是“博士如故”。

a 烧书思想不是法家的专利，儒家也一样。董仲舒要求对其他理论流派“绝其道，勿使并进”；唐代儒家后学韩愈直接要求对佛家学说“烧其书”，只是唐朝皇帝没听他的，还差点把他处决了。

秦国的国防：北击匈奴、南征南越，建成万里长城

统一中国之外，秦始皇的第二大目标是肃清外患。

自从战国中期以来，为燕、赵、秦三国北方边患的有两个游牧民族，东胡和匈奴——总名为胡。东胡出没于今河北的北边、辽宁一带，时常寇略燕、赵。匈奴出没于今内蒙古、山西、陕、甘的北边一带，燕、赵、秦都受其害。这两个民族各包含若干散漫的部落，还没有统一的政治组织。他们和春秋时代各个戎狄似是同一族类，但其和各个戎狄间的亲谊关系到底如何，现在无从稽考。

战国时期武力肃清边患的，有三个著名的人物：第一个是和楚怀王同时代的赵武灵王，他“胡服骑射”的改革，在本书战国部分已经详述。第二个是秦舞阳（随荆轲入秦行刺的副使）的祖父秦开，他曾在东胡当人质，甚得胡人的信任。回到燕国后，他率兵袭击东胡，把他们驱逐到千里之外（这时大致是乐毅破齐前后）。第三个是李牧，秦开破东胡后三四十年，赵国名将李牧，守卫雁门、代郡。他经了长期敛兵坚守，养精蓄锐，然后在匈奴稍有懈怠时突然出战，斩匈奴十多万骑，此后十几年间，匈奴不敢靠近。

当燕、赵对秦作最后挣扎时，胡虏得以短暂喘息，又来抢掠。

始皇后来派蒙恬领兵三十万北征。蒙恬不久收复河套，并推进至更北边，秦始皇在那里设立九原郡。为求一劳永逸，始皇又启动一项宏大工程：把燕、赵北界的长城结合整修，最终建成万里长城。综合历史所记录的多次战争细节来看，长城确实使游牧民族的相对优势转化为相对劣势，加强了中原防御。

秦大军北击匈奴、南征南越，所向披靡。由于中国的东面是茫茫大海，西面是浩瀚沙漠，秦国大军几乎是击败了当时已知世界上所有的敌人。而秦国的统一，也是当时东亚文明世界的统一。

大秦帝国政治：“利维坦”猛如虎

随着研究的进步，人们已发明出许多衡量社会进步的技术指标，例如人均热能消耗水平（从饥寒到饱暖）、人均GDP、人类发展指数（HDI）之类。这些指标中，有一个看上去有点抽象，但是很重要：社会组织的丰富和复杂程度。在中国，大学生社团看上去百花齐放，但专业程度、复杂程度都停留在浅表层次，跟哈佛大学波斯廉俱乐部、耶鲁大学骷髅会之类严密的组织，还是没有可比性。

秦一统天下、建立帝国，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建设来说，是很大的进步，但从社会组织的丰富和复杂程度角度看，却是退步。随着秦政确立，封建社会生态组织几乎全部消灭，犹如大树之下寸草不生。秦帝国模型可以大致这样简化：金字塔尖是依托于暴力的最高权力，中间是受其雇佣分利自肥的文官集团，庞大的金字塔底，是亿万散沙顺民，散沙顺民为其输送膏血而没有谈判能力。

一旦有外来入侵，其实只要摧毁金字塔中高层部分组织，就会完成对整座金字塔的征服，亿万散沙顺民无法构成有效抵抗力。对劫掠者来说，这是入主中原、夺得国家神器，对历史上的华夏来说，则是亡国亡天下。元灭宋，清灭明，都曾是这个模式的上演。当然，这是秦始皇所始料不及的。

大一统成立，和平降临，同时，“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越来越突出，国家有驾驭人民的绝对权力。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把强大的国家机器比喻为怪兽“利维坦”，现在，大秦这个利维坦，固然提供了和平与秩序，但它也开始饕餮食人。

秦始皇执政后期，秦国对民众的役使、压榨乃至摧残，是前无古人的。单说服役一项：秦朝徭役十分繁重，服役人员群体不断扩大。最初被征发的是犯罪的官吏和商人，后来推广到曾经做过商人的人，最后又推广到“闾左”——居住在巷子左侧的穷人。修筑阿房宫和骊山陵墓，动用了70万名工人。将军蒙恬带去北征的有30万人，将军屠睢带去南征的有50万人，后来添派的援兵和戍卒，及前后担任运输和其他力役的工人，当在两军的总数以上。仅这两面的军事行动，始皇至少摧残了200万户家庭。赴北部边境的，据说死亡率达到六七成，有的半途不堪虐待，自缢于路边大树，死尸沿路不断陈列。当时天下总人数也不过3000万左右，按每户5人计算，总计约600万户，天下大部分家庭都遭到了摧残。

在轰轰烈烈进行工程建设的表象之下，社会矛盾在累积。不过变局的发生，还要等到国家机器的最高驾驭者——秦始皇本人出现什么意外变故的时候。

公元前210年，连续发生凶兆、怪事，如陨石坠落、星象变化。此外，多年前始皇帝亲手扔进江水中镇压风浪的玉璧，竟被一个神秘人物送还人间，并被迅速上报到朝廷。披览相关报奏之后，始皇帝心神不宁，最终决定巡视天下以求攘除灾祸。

始皇帝的车队逶迤而行，周游了大半个中国。回程途中，经过河北沙丘时，始皇帝突然病重，很快去世。

始皇死前，写给长子扶苏的遗书已封缄，尚未交给使者。始皇一死，近臣赵高、李斯联手发动突然政变，扣留诏书，控制随行车队，同时扶持始皇次子胡亥夺权。为了阴谋顺利进行，他们暂时秘不发丧。时值夏天，秦始皇尸体腐烂变臭，

赵高、李斯命令载上一车鲍鱼随行，以图蒙混，对外只说皇帝喜欢吃鲍鱼。

公子扶苏被用假诏赐死，次子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公子扶苏本来很有人望，始皇帝对接班人没有早作安排，成为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秦始皇生育了 30 多个子女，胡亥继位后，为保住权力，伙同赵高等人陆续将其他子女残杀——近年来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了若干秦宗室墓葬，墓主死相惨烈，很可能就是他们。宗室大臣也大批受牵连，一时间秦廷中弥漫着恐怖气氛。

第二代权力很关键。秦、隋都是二世而亡，即便是汉、唐、明等朝代，二代接班时也经历了血腥的武装斗争。胡亥本人倒颇思奋发有为，他上任后就巡行天下，不到半年时间便覆盖了上万公里的路程，不可谓不高效、不可谓不辛苦。而历史也给了他一个机会：他即位之初，天下人十分期待、观望，当时并没打算造反。但胡亥的治理思路不是缓和社会矛盾，而是加强领导。他“用法益深刻”，对始皇的苛政变本加厉。天下人的期待和观望，最终变成了绝望。

强秦为什么灭亡

矛盾终于要爆发了。秦二世元年九月，即秦始皇去世后一年多，在南方去往渔阳（今北京密云）的路上，900 名农民工被绵绵秋雨和满地烂泥困住了。误了报到期限，按律当斩。这群人已经被逼到了生死线。反正是死，于是他们的队长陈胜、吴广二人索性决定造反。

此时社会，早已“天下共苦秦久矣”。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群起响应，纷纷造反，向秦朝设在各地的政府机关进攻。被秦所灭的六国遗臣，起到很大的组织领导作用。秦廷则立即赦免骊山刑徒，组建临时军队，并从边疆调集大军回国，以资镇压。

陈胜、吴广建立了张楚政权，陈胜自封为王，吴广为副，一度声势颇盛。但仅仅大半年时间之后，他们还是被秦军击破、身亡。陈胜做了半年的王，就被他的车夫杀死，首级送给秦军。陈胜死后，被辗转埋葬在芒砀山。刘邦称帝后，追封陈胜为“隐王”，派 30 户丁役



陈胜、吴广起义纪念邮票

守护陈胜墓，并按王侯待遇年年杀牲祭祀。

反秦的各路军马中，战斗力最强的是项羽的军队。秦灭楚国之前，楚国有名将项燕。项燕有子项梁，项梁有侄子名项籍，字羽。项羽少时不爱学习，学书不成，废弃；学剑，又不成。项梁怒责他。他说：书写只可以记姓名罢了，剑是一人敌，也不值得学，要学万人敌！项梁于是教他兵法。他略通大意，再不深求。

项梁曾因事杀人，带着项羽，逃匿于吴（吴县，秦会稽郡治，今苏州），吴中名士大夫都奉他为领袖。项羽长成，身材魁岸，力能扛鼎。吴中子弟对他十分敬畏，后来追随他成为八千子弟兵的主干。

据说项羽年少时曾经见秦始皇巡游车队，说：“彼可取而代之！”

秦二世元年九月，项梁打算响应陈胜、吴广而造反。项羽袭杀会稽郡守，又连杀了好几十人，会稽郡府衙内全部慑服听命，共奉项梁为会稽守。项梁收召徒众，得八千人，正式造反，从苏州渡江北上。项羽为裨将，时年24岁。

项梁一路收纳豪杰，到了下邳（今江苏省邳县）已有了六七万人。居酈有一个70岁的老人名叫范增，生平好奇计，此时成为项梁谋士。项梁得知陈胜确实已死，听从范增建议，访得楚王之孙（名心）于牧场中，立以为王，仍号楚怀王，都于盱眙（安徽省今县），项梁自号武信君。

次年，项梁军叔侄与秦军转战于今苏北鲁南及豫东一带，连获大捷。项梁由此轻视秦军，时露骄色。后秦将章邯破项梁军，杀项梁，继而派兵围困北方赵国故地项梁军所盘踞的巨鹿城。项梁军破时，项羽不在军中，而是听上级派遣，与刘邦一起出征去了。

巨鹿围急求救于各路起义军，怀王派兵救援。途中，项羽因意见不合，刺杀顶头上司宋义，诸将慑服不敢动。项羽使人报告怀王，怀王就派他代为上将军。自杀了宋义之后，项羽威名传播开来。

在巨鹿，起义军与秦军形成战略决战之势。

项羽率全军渡河，然后凿沉船只，破毁灶具、焚烧房舍，令士卒每人只带三日粮，示以决死无归还之心。到巨鹿，反围秦军，绝其粮道，九战而大破之，秦将王离被虏，其部下诸将或战死、或自杀，秦军遭遇战略失败。

此前，各路起义援军扎寨于巨鹿城外，都壁垒高筑，不敢出战。及楚军开始进攻，诸侯军将领皆从壁上观看。楚兵无不以一当十，喊声震天，将秦军杀成一片血肉狼藉，诸侯军看得肝胆俱裂。项羽破秦军后，召见各路起义军将领。自然的，项羽成了联军的统帅，诸侯军将领皆甘愿隶属于他的麾下。

巨鹿之战后，项羽又大破秦将章邯的军队，章邯遂投降。秦军主力由此被消

灭殆尽。秦二世三年七月，章邯与项羽相会于洹水南殷墟（即今河南安阳殷墟），立盟定约。章邯对项羽说起赵高往事，为之泪下。

在此期间，沛县人刘邦也在快速向咸阳进军。

刘邦，字季，泗川郡沛县（今属江苏徐州）人，他只比秦始皇小3岁，不过秦始皇从来不知道他卑微的存在。秦始皇挥师统一六国时期，刘邦在家乡当农民，秦帝国成立之后，刘邦当了沛县泗水亭长，秦时十亭为一乡，刘邦的级别仅仅略高于今天的村支书。岁月流逝，刘邦已经是47岁的中年人。在刘邦的老父亲看来，这孩子好吃懒做、从来不愿勤苦上进，没什么前途可言。

刘邦是个底层官油子，他酗酒好色、疏财乐施，县署的属吏，常跟他嘻嘻哈哈。据《史记》说法，刘邦年轻时也曾挤在人群中眺望秦始皇巡游车队，感慨道：“大丈夫当如是也！”

陈胜发难后，年近半百的刘邦率领一帮刑徒、壮士，与县吏萧何、曹参一道造反。造反有风险，谁都不愿意当头领，刘邦在半推半就中被父老乡亲推举为“沛公”，陆续聚集到县中子弟两三千人。此后七个月内，他们转战于今独山湖以西苏鲁两省相接之境，先后取沛、丰、砀（皆江苏省今县）做根据地。

在留县，刘邦遇到了张良。张良原是韩国的贵公子，其先人五世辅佐韩王，亡国后散家财谋报国仇。秦始皇曾在博浪沙遇刺，就是张良策划，不过这次行刺并未成功。张良此时有百来号人，遇到刘邦，情投意合，便以众相从。刘邦往见项梁，项梁给他补充五千人。他攻下丰县，从此归附项梁。

经楚怀王派遣，宋义、项羽等北上救赵之军和刘邦西进之军，同时出发。正面战场上见不到刘邦身影。项羽在巨鹿力战时，刘邦从洛阳南下向西，一路用张良计策，躲避劲敌、打游击、迂回前进。同时收拢各路起义军，发展自己的实力。

刘邦军逐渐逼近关中，向秦的首都咸阳挺进，形成压迫之势。

赵高弑秦二世，扶立胡亥的侄子（扶苏之子）子婴即位，使人来约降，刘邦等以为诈，继续前进。九月攻陷峽关。当月秦军再战于蓝田南，又大败。子婴于是自动贬去帝号，称秦王，继而袭杀赵高。刘邦兵压咸阳。大势已去，子婴只好以绳系着脖子，乘着素车白马，捧着玉玺，在霸上的帑道旁迎候刘邦，正式投降。强大的秦帝国，就在这素车白马的画面中灭亡了。

秦的大败局，很自然的成了后世帝国统治者的反面教材。

在总结灭亡原因方面，儒生——法家和秦的死对头，掌握了绝对话语权。儒生总结秦朝灭亡是因为“不施仁政”，不过他们的总结也太表面。秦朝的根本问题在于权力无法得到制约，法治没有真正实现。不同的理论认识对应不同的解决

思路。儒生的思路是：怎样实施仁政？答案是教化君王。另一种思路是：怎样制约绝对权力？答案自然不同。

楚王之约：楚汉争霸的伏笔

刘邦进入帝国首都咸阳，见宫殿华美，便陶醉于其中。樊哙和张良等苦劝，刘邦才把宫中的财富和府库封起，退驻霸上，以等待各方起义军领袖来共同处置。他又把父老召来，宣布废除秦朝的苛法，只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人民大喜，纷纷送上牛羊来犒军，刘又一概辞谢不受。

项羽平定河北，率楚军、诸侯军及秦降军向关中西行，至新安，听闻秦降卒有怨声，担心发生兵变，下令将秦降军全部坑杀。当初楚怀王曾与诸将约定，谁先入关中，即以其地封王。刘邦因此以关中主人自居。而项羽西进之前已封了章邯为雍王（秦地古称雍州），大有否认怀王初约之意。刘邦闻讯，派兵守函谷关，拒外军入境，同时征关中人民入伍以扩充实力。

项羽至函谷关，不得进入，大怒，派军攻破。进驻鸿门，与刘邦军相距只四十里。项羽在鸿门设宴招待刘邦。期间范增暗示项羽杀掉刘邦，项羽不听。最后刘邦安全溜走。随后项羽入咸阳，屠城，杀子婴，烧秦阿房宫，号令天下。

然后，各路领袖聚在会议桌前，对着地图分割中国。基本思路为恢复封建，分封对象一是六国后代，二是革命功臣。最后封立了十八个王国，其中项羽为西楚霸王，占旧楚魏地九郡，定都于彭城（今江苏徐州）。刘邦为汉王，管辖南郑、汉中、巴蜀一带。另外分封秦朝投降的将军章邯为雍王、董翳为翟王、司马欣为塞王，号称“三秦”，以牵制刘邦。其他十几路人马，各有归属。

项羽主导局势，楚怀王被尊为义帝，却只得到湘江上游弹丸之地，都于郴（今湖南郴州），跟没落的周天子并无差别。他后来在就国途中，被项羽派人刺杀。

汉元年四月，在咸阳新受封的诸王分别就国。张良辞别刘邦，往佐韩王。临别，劝刘邦烧掉所过栈道，表示无北还之心，以韬光养晦，刘依计。此时，表面上天下初定，但实际上所封的诸王心里都不满足，各怀怨念、暗流汹涌。

不久，齐赵地尽反，天下复归于战乱，刘邦也伺机而动，开始了楚汉争霸。最终刘邦战胜项羽，建立了汉朝。

第九章 汉代：奠定中国人的性格

公元前 200 年冬天，山西大同白登山，朔风暴雪中，厮杀呼啸之声阵阵传来，如大海潮音。此时，汉高祖刘邦及其先锋部队，被 40 万匈奴骑兵包围。30 万汉军步兵主力，还在数百里之外逶迤前行，7 天之前，就已经与统帅部失去联系。

此前，在楚汉相争之时，北方草原上的冒顿单于逐渐崛起。冒顿本是匈奴部落首领头曼之子，个性凶狠强悍，后率领亲兵发动政变，以箭阵射杀父亲头曼，自立为匈奴单于，此后率领骑兵东征西战，统一了千年来部落林立的北方草原。东胡的乌桓等部落，以及西域数十个小国家，此后皆向总人口不过 200 万左右的匈奴俯首称臣。匈奴强大后，便南下压迫中国。刚当了两年皇帝的汉高祖刘邦，在白登山已经变成了匈奴大军的瓮中之鳖。

汉代的历史，就在这种重大的国运竞争中开场了。

汉代的伟大及其流弊：帝国定型与尚武精神的丧失

从商鞅变法前期开始，我国社会开始了一个长达 300 年的社会大转型，秦、汉帝国都是这次社会大转型完成的产物。封建体系结束，帝国体系诞生，并走向稳定和成熟。如果从秦始皇开始计算，帝国体系在中国运行长达 2132 年，直到清王朝灭亡。

秦朝末年爆发平民革命，后来国家暂时统一于项羽所领导的楚；楚汉争霸，最终统一于汉。这一场残酷的改朝换代，消灭了大量人口。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全国时，秦朝的人口估计有 3000 万或略多，到西汉初只剩下 1500 万—1800 万。随着朝代推移，人口日渐繁衍增多，汉代最高峰时期中国人口多达 6 千万左右，许多荒地得以开辟，关隘道路免费通行，人烟喧哗，社会越来越繁华了。

在中国历史上，汉代是一个枢纽和转折点。秦是帝国时代的正式开端，但路只走了一半，汉代才定型。秦为后代奠定了制度框架，汉继承了制度而替换了其

中的思想基础。汉朝是几百年历史大转型完成的产物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高峰，但在这一时期，许多古典时代的精华却也消失殆尽，而另外一些导致长期衰弱的因素，则由此产生、滋长，并且源远流长。

汉代在国家版图、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民族气质乃至生活民俗等多方面，大致确定了华夏族未来两千年的基本形态。由于汉朝的关系，华夏族以后被称为汉族（“汉”一词，原本是个地理名词，指的是刘邦受封于巴蜀汉中一带，当“汉王”）。“汉”这一称呼在历史上沿用了千年之久，直到近代才由梁启超定名为“中华民族”（“汉”这个称谓其实不能准确反映中国的特点，扩大版的“中华民族”或者其古义“华夏族”更好）。

汉代中国的政治、军事、科技、文化都领先于世界。汉代产生了全世界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最早的医学麻醉技术、最早的造纸技术、最早的地震测量等。像今天的美国一样，汉朝也对高科技出口进行限制。

汉代的核心工业技术之一是冶铁术，所造兵器锋利坚实（比同期古罗马军队兵器先进得多）。西汉铁器已出现彻底柔化处理的黑心可锻铸铁，这一工艺比西欧国家早出现了约 2000 年。并出现了高碳钢、中碳钢和锻铁制成的兵器。特别是河南省巩县铁生沟村出土的一件铁镢，经化验，有良好的球状石墨，有明显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结构，与现行球墨铸铁国家标准一类 A 级石墨相当。战国时期铁制兵器尚属罕见，大多数只限于楚地。到西汉，不仅能够生产铁制的长剑、长矛、环首大刀，而且生活器皿和杂用工具也广泛使用铁制，如灯、釜、炉、剪等都已西汉中期的文化遗址中发现，这说明西汉铁器的使用已相当广泛。

其实人类有史以来，钢铁业便是大国兴衰的晴雨表。汉代以后的 1500 年里，中国的钢铁业一直领先于全世界。英国实现工业革命之后，钢铁产量居世界第一，逐渐称霸全球，号称“日不落帝国”。又百年之后，德国取代英国成为第一，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年轻时留学德国，实习时所在的克虏伯公司就是德国钢铁工业的代表。时运变迁，钢铁产量最大的国家如今又成了中国。

汉代虽然伟大，但也有许多影响深远的流弊。

一是战国法治思想和古典法治精神在汉代被全盘抛弃。法家三派之中，最糟粕的“术派”思想被吸收糅合，用于驾驭臣下，形成了所谓“外儒内法”“王霸杂糅”的统治体系。人治，成为历史的主流。于是乎，宫廷暗斗、宦官弄权、官员腐败、社会糜烂。

到东汉时期，人治思维已经根深蒂固，例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总结西汉、东汉的兴衰根源，结论是“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

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君子小人的角度，是儒生惯用的泛道德化分析模式。

如果把春秋战国时期管仲、李悝、商鞅、吴起、邹忌、范雎、张仪等人放在诸葛亮的位置，去分析两汉兴衰的根源，他们一定不会得出诸葛亮式的结论。跟500年前的商鞅等同行们相比，诸葛亮的水平已等而下也。个人高度的差距，反映出时代高度的差距——时代整体在矮化，从茂密森林变成了灌木和草丛。

二是儒家学说在思想界形成垄断地位，塑造了后世中国的思维。此后两千年，国人在思想领域的研究范围、方向、重点、模式大致定型。自汉代到清朝，士大夫们沿着前人的道路拾遗补缺，功夫越来越细腻，却再也没有大规模思想创新。华夏本是最具文明原创力的民族，这一场思想创造的窒息漫长、严重。

三是华夏的价值观自东汉开始转为文弱，尚武精神逐渐消亡，中国历史由此走向弱势格局。尚武精神因何丧失呢？首先是因专制政权的抑制，其次是因为儒家意识形态的长期“教化”作用。东汉以后，每当华夏重振尚武精神，便会走向复兴，反之则走向衰弱乃至亡国亡天下。隋唐盛世的出现，是因为五胡乱华时期浴血求生的遗风犹在，尚武精神复振。唐代中期以后再度走向衰落。宋代更趋文弱。故考察历史可知，华夏重振尚武精神之日，便是复兴之时。

下文再概略讲述一下汉代建立前楚汉争霸的历史。

前传：楚汉争霸的经过

项羽所封的诸王，心态错综复杂。造反的潮流暗中涌动。不久，北方的齐赵地尽反。刘邦乘齐变，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策出川，于汉元年八月突入关中，楚汉争霸自此开始。

项羽权衡各方敌人的轻重，决定首先击齐，很快取得胜利。刘邦则趁机联合诸侯出兵，从背后直攻项羽的都城彭城（今江苏徐州）。项羽以精兵三万人长途奔袭还战，汉军大败。再战于灵璧之东，汉军又溃，睢水几乎都被死尸填塞了。楚军围困刘邦，碰巧有飓风从西北方向而起，飞沙走石，阴霾蔽天，白昼昏黑。楚军因飓风散乱，刘邦带了几十人狼狈逃跑。

此后战争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汉正面大败，而侧面猛进。在



刘邦像



项羽像

正面，汉失荥阳、成皋（都在今河南省成皋县境）。刘邦再一次狼狈逃走，又捡了一条命。在侧面，汉将军韩信攻取赵地。期间，项羽中了汉的反间计，对首席谋臣范增起了疑心，范增愤而告退，回乡路途中病死。

第二阶段为相持阶段。韩信南下攻取齐地，楚军救援，两军在潍水（今山东诸城境内）会战，楚军大败，韩信遂定齐地——汉军此战得胜，颇受益于战略家李左车的方略。至今犹有李左车祠，他在民间很受爱戴，被老百姓敬为雹神，

据说分管降冰雹相关业务。

潍水之战后，楚汉对峙于广武。项羽以前方粮绌而后方又受韩信的威胁，想和汉决一死战，而汉按兵不出，只得与汉约和。楚汉约定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其东属楚，其西属汉；楚放还先前所掳汉王之父及妻。约成，项羽便罢兵东归。

对峙期间，项羽曾抓住刘邦的父母、妻子，威胁要炖汤。刘邦说：咱俩结拜过兄弟，我爹就是你爹，你炖了汤分我一杯。见威胁无效，项羽只好放弃。项羽又要求和刘邦单挑，刘邦拒绝：“我宁愿斗智，不能斗力。”项羽又令壮士单枪挑战汉军，汉军中有神射手名叫楼烦，项羽三番派出壮士，都被他在壁垒中射死。项羽大怒，披甲执戟，亲自出阵挑战。见楼烦引弓，项羽催马驰骋而来，放声怒吼。这一天神般的怒吼，竟吓得楼烦浑身颤抖，躲进壁垒之中再也不敢射箭。

第三阶段为汉灭楚。初时刘邦也打算罢兵西归，张良等力劝他乘势灭楚。汉五年十月，汉追击项羽军于固陵（今河南淮阳县西北），大胜。十二月，项羽行军至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兵力损耗殆尽，被汉军包围。

当夜，项羽在帐中听到四面楚歌，吃惊道：“难道汉军已经攻破楚地了吗？为什么楚人这么多？”感慨往事，乃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慷慨悲歌，美人虞姬和之。左右闻之，无不落泪。

夜色浓时，项羽率八百余骑突围。次日，被数千汉军追及。经历了渡河、战斗后，仅剩28骑。项羽认为败局是因天时不利、天命不在我，愿坦然面对这个悲剧。他勒马说：“我年少从军，至今七十余战，百战百胜，从未失败，今天被困，是天要亡我，非战之祸。若不信，我为你们亲自表演快战，杀汉将、夺军旗，领你们突围，三战三胜，然后在山的东侧会合。让你们知道，只要我战斗就一定能

胜，只是天要亡我！”言毕，令大家分路突围，自己纵马怒吼冲锋。

项羽催马奔腾，汉军望风披靡败退，项羽斩一汉将。汉赤泉侯纵马追项羽，项羽怒目大喝，赤泉侯人马俱惊败退。汉军追及合围，项羽再度冲刺，杀一名汉都尉，又连杀数十人突围。众人成功突围，到既定会合点聚拢时，清点人数，仅损失两骑。项羽问：“如何？”众人拜服：“果然如大王言。”

26 骑奔驰到了长江西岸的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乌江浦）。长江在此处拐了个大弯，呈南北走向，故东南方向古称“江东”。乌江浦渡口单摆着一只小船。乌江亭长请项羽立即下渡，说：“江东虽小，也有几千里地，几十万人；现在只有这一只船，汉兵即使追来，也无法飞渡。”面对最后的逃生，以及可能东山再起的机会，项羽却放弃了，从容说道：“我当初领八千江东子弟渡江出征，如今无一人归还，我太惭愧了，就算江东父老继续奉我为王，我也无颜以对啊！”

世代为贵族的项羽，灵魂中还保留着一种春秋时遗留下来的贵族精神。面对生死抉择，项羽想的不是自己这个小我的生死，而是一个贵族应有的责任、担当、风度，不苟且偷生、慨然面对死亡，这种勇武的风范是贵族的自我修养，不是常人所能为，当然，更不是刘邦所会选择的。

项羽把所乘的乌骓马赏给亭长，令他先走。自己与剩余人马步行，持短兵接战。他连接杀了几百人，身受十几处伤。大军混战之中，项羽一眼看见了故人吕马童，现任职汉骑司马。项羽高喊：“听说汉重金买我人头，今天我就送你这个人情！”遂趋近吕马童，然后自刎。汉军为了争夺项羽尸首，相互残杀数十人而止。吕马童抢到了项羽身体的一块，以此被封为中水侯。

在这里，项羽的慨然高风，与那些争抢他尸体并为此自相残杀的人的行为是多么泾渭分明，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才是贵族风度，看到这种超功利的人格魅力和美学价值。而这，正是让这个故事流传千古的原因所在。

对楚汉之争，后人有不少错误印象。例如有人认为成败的原因，是因为刘邦圆滑世故、阴险狡诈，而项羽太光明磊落了。其实，将楚汉成败原因归结到人品，是完全错误的。若必要谈个人的差别，则关键在刘邦虽然出身草根，但战略判断力却在项羽之上。一例为证：韩信曾追随项羽，多次给项羽提建议，未获理睬（本质是项羽无法理解韩信的思想）。而韩信与刘邦彻夜对谈，刘邦惊为天人，立即封韩信为大将军。

胜利后，各路诸侯向汉王刘邦上了一封献进书，劝他当皇帝。刘邦经过一番逊让之后，在汜水之南即皇帝位。初定都洛阳，后迁都于长安。

史上第一个庶民王朝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庶民建立的王朝，领导集团的刘邦、萧何、曹参、陈平、韩信、英布、彭越等核心人物，都曾是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群，这与六国贵族迥然不同。实际上，中国古典贵族精英的培育体系，自从汉朝以后便断绝了。

刘邦和他的小公务员同伙们，也就是现在大权在握的政权核心人物，满怀敬畏地继承了秦朝的中央—郡县制度。不过汉朝在初期，还是一个帝国体制和封建体制的混合体。秦朝本来有 39 个郡，刘邦留下 15 个作为汉直辖，剩余 24 个分封给韩信、彭越等人，各自成一国。刘邦称皇帝，其余国君称王，受皇帝羁縻。后来刘邦用武力把分封的异姓诸侯王一一翦除，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才逐渐走向定局。

帝国草创之初，各路诸侯仍有创业时期的兄弟情、江湖气，跟刘邦称兄道弟，醉酒后拔剑起舞、争功劳，甚至砍柱子，刘邦暗暗不悦。

此时，在秦朝政府任过博士的儒生叔孙通毛遂自荐，为汉廷制定礼仪。排练数月后，新仪式开始实施，效果竟至于“群臣震恐，无敢失礼者”，刘邦大爽，感慨：“吾今日乃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提升叔孙通为“太常”，赐黄金五百斤。

刘邦以前鄙视儒者，初起兵时，有人戴儒冠来见，他甚至把它解下来，往里撒尿。但现在，他对儒者另眼相看了。后来他行经鲁国，竟以太牢祭祀孔子。

刘邦做了七年皇帝（公元前 202 至公元前 195 年）而死，庙号太祖高皇帝。

叔孙通是个拍马屁大师。汉惠帝时，宫中修建了一条空中走廊，叔孙通评论这路修得不妥，会影响汉高祖的庙，惠帝立即打算拆了重修，叔孙通却又主张不能拆，因为“人主无过举”——皇帝永远没有错误。他想得太周到了，他要吸纳所有的神秘主义因素，把皇帝包装成圣人、神明，把皇权装饰成永恒的天命。

“人主无过举”，从此以后，所有皇帝都要永远端着，假装自己是圣人，沿着历史长路一路装下去。

汉初的经济繁荣

刘邦死后，经历了汉惠帝（母亲吕后实际掌权）、文帝、景帝而到汉武帝。

文帝、景帝奉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黄老学派哲学，对社会放任自由，经济一度繁荣，史称“文景之治”。

文景年间，经济政策自由，轻徭薄赋，旧日关口和桥梁的通过税多数被废

除，商旅往来十分便利。农业方面，牛耕逐渐推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发展经济本是华夏的擅长，只要秩序安定、政策宽松，经济增长自然出现。汉初六七十年，经济便繁荣起来。



汉服实物

这时期工商界的盛况，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有很

好的描写，据他估计，当时的大都市里，至少有三十几种企业，规模巨大，企业家每年的收入比得上食邑千户的封君（每户年收二百钱）。他们的生活，据贾谊描述，“白谷之表，薄纨之里”的丝织敝绣，古时天子用来做衣服，到了文景年间，大户人家竟用来当墙纸、做窗帘——“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

汉朝建国之初，天下马匹奇缺，官员大部分都坐牛车。经过几十年的积蓄，国家富厚，牛马遍野。这是后来卫青、霍去病建立骑兵部队的基础。到了汉武帝初年，国力已经非常雄厚，而正巧汉武帝是一个奋发有为的君主，于是，武帝年间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枢纽时段。

汉武帝亲政：派李广、霍去病大破匈奴

如同商周时期的鬼方、春秋时期的戎狄一样，到了汉代，匈奴成了华夏最大的威胁。匈奴人没有文字，他们的起源无法准确稽考。到战国末期，匈奴已经成为中原的祸患。

秦始皇时，出兵北击匈奴，匈奴远遁。秦汉之际，乘着中国内乱，匈奴又来骚扰。冒顿单于统一北方后，对中原压力更大。当时，南越等地也趁中原内乱恢复独立，但不构成严重威胁。汉代国防的重点在于匈奴。

刘邦亲率大军北击匈奴，在平城白登山被冒顿单于围困七昼七夜后，妥协求和，冒顿考虑到得了汉地也无用，又顾虑到汉的援军，遂允许刘邦撤出。匈奴军队让开一条通道，汉军持弓拉满指向匈奴人墙，仓皇撤退出围。

此时，谋士刘敬献计：把嫡长公主嫁给单于，并每年奉送财宝、特产，谋求两国修好。两国既然成了亲戚，匈奴又有财宝收入，就安稳了。刘邦愿意向强敌行贿买平安，只是舍不得公主，于是用了同宗一个不幸的女儿去替代。由此，汉初七八十年间对匈奴采取忍辱修好政策。不过，其总体结果是自取其辱。刘邦死

后，冒顿单于遣使送来国书，言辞之间竟然调戏吕太后。

从高祖初年到武帝初年间共修了七次“和亲”，而遣“公主”的只有三次，其他以别的女子假冒。和亲并不能使单于满足，每度和亲大抵只维持几年的和平，便又纵兵来洗劫。

汉朝廷内多次讨论，终觉得底气不足，只好忍辱作罢，也曾出兵防卫，但往往大军还没到，匈奴骑兵早已远遁，根本无法构成决战。堂堂大国反向游牧民族纳币献女，前无古人，真是莫大的耻辱。

汉文帝之后，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彻”字，是开辟之意，刘彻一生功业，可谓名副其实。

武帝年幼，窦太后实际掌权，对外温和维持。窦太后死后，武帝实现亲政。窦太后一死，汉朝的执政理念也为之转变。在她之前，汉朝皇室宗奉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而武帝的政策取向大变，政府从无为变而发奋，对社会由消极放任变而为积极干涉，在学术界，则是儒家学派获得正统地位。

汉武帝亲政，决意奋发振作。

汉武帝的事业可以大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专心击破匈奴的时期，第二阶段则为征服南越、西南夷、朝鲜时期，国威远播至当时已知的全天下。

窦太后死后的次年，武帝便派重兵去屯北边；又设定计策，派人诈降引诱单于带兵入塞，同时在马邑伏兵三十万骑，要把单于军队一举歼灭。这个阴谋被单于察觉，没有成功，但一场国运对抗从此开始。

匈奴人在马背上往来如风，占据很大的机动性优势，因此，其总人口虽然只有一两百万，战斗力却不亚于人口数千万的汉朝。

在对匈奴作战中，汉朝边打边学，边学边改，骑、车、步各兵种不断调整，重新组编。从汉武帝时代起，骑兵发展迅速，公元前119年春漠北之战时，仅卫青、霍去病两军的战马数量就达到了14万匹。最终汉军骑兵完成了向战略军种的转变，成为军中的第一主力兵种，从而使汉军能够以机动对付敌之机动，既可远程奔袭，也能迂回、包抄、分割、围歼，赢得了战场上的主动地位。

而且汉军特别注重将骑、车、步兵联合作战。汉武帝时卫青出塞作战，就曾以武刚车（有皮革防护的战车）环绕为营，以作防御，同时纵精骑5000出击匈奴。在实战经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汉军形成了一套以骑兵野战、步兵攻坚、车兵防御的克敌制胜战法，协同作战方式渐渐炉火纯青。此外，汉军组织管理严密，长短兵器装备十分精良，这些都远非游牧民族可比。

武帝征匈奴，涌现出许多传奇故事。

李广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代名将，被匈奴人称为“飞将军”。李广的先祖李信是秦朝名将，曾率军击败燕太子丹，李广家族世代传习射箭。李广少年从军，有军功。景帝年间，与匈奴对阵，李广转战多地，都以力战闻名。

一次，一队三十人左右的汉军在草原上遇到三个步行的匈奴人，发生冲突。匈奴人开弓射箭，竟连伤数十名汉军。逃生者向李广报告，李广断言这一定是匈奴射雕手，即带骑兵追赶。射雕手没有马，几十里之后被汉军追及。李广一马当先，射死其中两人，活捉一人——果然是匈奴射雕手。

李广的军队曾不幸被匈奴左贤王的4万大军包围，匈奴军队箭如雨下，汉军死伤过半，箭也即将射尽。李广命令汉军围成圆圈向外，持弓引而不发，又令儿子李敢率轻骑兵冲击匈奴阵线，自己拿“大黄弩”射死数名匈奴副将，匈奴军惊扰。天色将晚，匈奴军散去，汉军吓得面无血色，而李广镇定自若，整军收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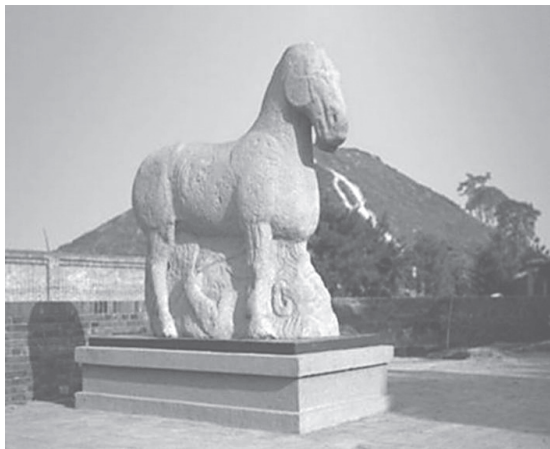
有一次李广出猎，见草丛中一块大石头，以为是虎，竟一箭射进石头。后来听说驻地有虎，便亲自去猎杀，与老虎搏杀中被虎所伤，但最终李广亲手把虎射死。不过李广带兵只凭着天赋、个人能力和个人经验，缺乏章法，军纪散漫，组织很不严密。所以李广个人虽然赫赫有名，但一生无大功。

霍去病则是更加传奇的一代战神，他一生四次领兵正式出击匈奴，都以大胜回师，战功于整个中国军事史来说，都是彪炳千秋的传奇。

《史记》对李广的描述像一部美国西部片，男主角是一位孤胆英雄，而对霍去病的描述却像是一本枯燥的会计账簿，只是罗列数字，没有精彩的文笔（太史公本人卷入了双方的派系斗争，很难做到客观报道）。但霍去病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仅仅是一组组数字，足以令人震撼。

霍去病17岁时首次跟随舅舅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这俩人因功勋卓著，被后世并称为“帝国双壁”）。霍去病率领800轻勇骑奔袭数百里，斩获敌人2028人，其中包括匈奴单于的叔叔等匈奴高层人物，因功受封“冠军侯”。25岁那年，于春、夏两次率兵出击大破河西（今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地区匈奴浑邪王、休屠王部，歼敌4万余人，俘虏匈奴王5人及王母、王子、相国、将军等120多人，同年秋，奉命迎接率众降汉的匈奴浑邪王，在部分降众变乱的紧急关头，率部驰入匈奴军中，斩杀变乱者，稳定了局势，浑邪王得以率4万余众归汉。

元狩四年，霍去病27岁，他率骑兵5万及大队步兵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霍去病率军北进两千多里，越过离侯山，渡过弓闾河，与匈奴左贤王部接战，歼敌70400人，俘虏匈奴屯头王、韩王等3人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乘胜追杀至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并举行了祭天封礼，在姑衍山（今肯特



霍去病墓前石刻《马踏匈奴》

山以北）举行了祭地禅礼，兵锋一直逼至瀚海（即今俄罗斯贝加尔湖）。经此一战，匈奴在漠南的势力被荡涤殆尽，单于逃到漠北，即“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此战为汉朝进击匈奴最远的一次，“封狼居胥”成为流传千古的强国符号。

霍去病少年英雄，深受汉武帝喜爱。汉武帝曾为霍去病修建一座豪华府第，霍去病却

拒绝了，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然而天妒英才，霍去病年仅 29 岁（虚岁）便因病去世了^a。

汉武帝非常悲伤。他调来铁甲军，列成阵沿长安一直排到茂陵东的霍去病墓。他还下令将霍去病的坟墓修成祁连山的模样，追思他力克匈奴的奇功。

霍去病墓在今陕西兴平，墓前有“马踏匈奴”等多件石雕。

遗憾的是，霍去病虽如此传奇，如此显赫，史书对他的记载却不详细。一千多年之后，明朝名将戚继光镇守北方，很想学习霍去病的战争智慧，却发现历史记载十分稀少，只写道汉武帝欲教授霍去病孙吴兵法，霍去病却说，古人之法不必学，看我现在的方略怎么样？

对于他的死因，史书同样语焉不详。《史记》只有一个“卒”字，《汉书》只有一个“薨”字。霍去病的弟弟霍光曾在奏折中说霍去病“病死”，这是史料中关于他的死因的唯一说法。但霍去病擅长骑射、身体矫健，到底是什么病，竟然致死呢？后世有人推测说匈奴可能在水源地埋了牛羊，造成瘟疫，而霍去病行军喝水，染上了病毒。当然，真相如何，是永远无法得知了。

经历过多年大战，汉军大伤匈奴的元气。

人口方面，汉初匈奴有控弦之士 30 万（估算其总人口 200 万左右），汉兵共九次出塞征伐匈奴，前后斩虏总计在 15 万人以上，浑邪王败于霍去病之后，怕

^a 《史记》等书籍只记录了霍去病去世之年，没载明他出生之年，对他生平的介绍也语焉不详（描述年龄的话，有几种断句方式都说得通），因此霍去病的年龄难以准确断定，一说他 23 岁去世。本书采纳钱穆观点，认为他 29 岁去世。

被单于斩杀而带领4万多军士投降汉朝。如此算来，匈奴壮年折损大半。

在土地方面，匈奴也损失惨重。霍去病大破匈奴后，匈奴有一首歌谣，哭诉道（依汉人所译）：

失我焉耆（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秦末沦陷于匈奴的河套一带，被将军卫青光复。武帝用《诗经》中赞美周宣王征伐玁狁，“出车彭彭，城彼朔方”的典故，把收复的河套地置为“朔方郡”。

在元狩四年的大战中，匈奴远遁到瀚海以北，汉把自朔方渡河以西至武威一带地（今宁夏南部，介于绥远和甘肃间地）也占领了，并且在这里开渠屯田，驻吏卒五六万人，以武装殖民的方式逐渐向北蚕食。

开疆拓土，设立十三州

大破匈奴之后，汉武帝把眼光投向了西南、西北等更远的地方。

在秦汉时的世界观中，西域是世界的终点，遥远得成为神话。战国时的著作，往往描述西边昆仑山是日月的居所，并有仙人居住往来。

武帝从匈奴将卒口中听说西域有一个月氏国，同样与匈奴为敌，便募人去和它通使，以求左右夹击。汉中人张骞应募。当时从长安去西域，要经过千里匈奴控制带，显然十分冒险。张骞带领一百多人出发，在匈奴被扣押，10年后才趁机逃跑，最终成功到达西域。月氏国果然找到了，但他们已被匈奴逼得西迁到今乌兹别克斯坦一带。新的土地富饶平安，月氏国的父老已经不想再回去报仇了。

西域当时有36个国家，张骞详细考察了各国国情，然后返回长安复命。东归之路又是九死一生。出发时139个人，只剩下了两个活着。13年过去了，几乎被人遗忘的张骞，从西域回来了，朝野轰动。他带来了另外一个世界的宝贵信息，因功受封“博望侯”。

元狩四年，匈奴兵败后，武帝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此次目的地是乌孙国，为的是“断匈奴右臂”，并结交西域诸国为外藩。

第二次出使场面十分盛大。受张骞统率的副使和将士共有三百多人，每人两匹马，队伍还带着上万匹牛羊，以及价值巨万的金币。

张骞至乌孙，未达到目的，于元鼎二年（前115年）返回，过了年余便去世。

但乌孙也派了一行数十人跟他前往汉朝报谢。这是西域人第一次来到汉朝，瞻仰到京都的宏大（跟汉朝相比，这些国家都很小，如楼兰总人口仅1万多人）。

张骞死后不久，他派往别国的副使也陆续领着报聘的夷人回来。汉朝和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由此加强，官方使者往来频繁，民间商业贸易也得到发展，西域各国接受汉帝国的封赠，佩戴汉家印绶的王侯和官员多达376人。更远的国家，如安息（今伊朗）、乌戈（今阿富汗境内）也有使者前来。

武帝继续派往西域的使者也络绎不绝，都携带着丰盛的礼品。此后，长安的时髦青年纷纷请求出使西域或应募前往西域。西域的土产如葡萄、苜蓿、石榴等植物，音乐如摩诃、兜勒等曲调，也成了长安的时尚。

公元前108至公元前102年间对西域两次用兵以后，汉在西域的影响力更加确立。楼兰、姑师、大宛都被征服。大宛以东的小国纷纷遣派子弟随凯旋军入汉朝贡，并留下作为人质。

在西南方面，汉派使者前往晓谕，令其归顺，设置长官管理。

西南方面群山密集，民族众多，在秦汉之前，有些被楚国征服，有些则从来没听说过中原。滇国国王、夜郎国国王都问汉的使者：“汉大还是我大？”传到长安，成了笑谈。然而他们贪图汉赠赐丝帛礼品，又觉得道路不通汉朝廷不能实际控制，于是答应汉设置行政机构，表面归附。汉朝廷于是大举动员巴蜀劳工修路，又从水旱两路出军，对军事挑衅者予以摧毁，西南夷数百小国方才知大汉天威。经过多年镇抚、征战以及武装殖民，汉朝的控制力到达今日云贵川一带。

在东北方向，汉军到达朝鲜半岛，并在那里设置郡县。

最终，在武帝领导下，帝国疆土扩张了一倍有余。他先后辟置了二十五个新郡；此外征服而未列郡的土地，还有一大片。总体来看，经过自秦始皇到汉武帝百余年的时间，华夏的区域大幅扩展了。



滇王金印

武帝调整了行政区划，除畿辅及外藩，全国分为十三州；国土太大，为了便于监管，每州设一个督察专员，叫作“刺史”。

武帝在位长达54年，他一生致力于武力开拓，长期征战使得国家财力严重耗竭，他又用严酷手段搜刮民间财富，甚至因此催生了专业“告密公司”，通过向官府举报富户藏匿资产而发财。他的财税政策使得“天下中产，大抵破家”。所以，武帝的政策引起不少批评。

但从长期看，痛苦在一时，功在千秋万世，武帝仍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位伟人。

武帝晚年，诸事不顺。又因听信谣言导致宫廷政变，太子冤死。武帝临终前的心情很低落，以一道忏悔诏书为自己半个世纪的执政生涯书写了结尾。

汉武帝之后的几十年当中，匈奴爆发内乱，又遭受雪灾，牲畜死伤大半。最终匈奴分裂为东西两部，相互敌对，分别向汉朝讨好、称臣，将王子送入长安当人质，总体上不能再构成重大挑战。

下一次重要冲突已经是半个世纪之后的汉元帝年间，西边部分的匈奴首领郅支单于渐生反心，欺骗汉王朝将儿子要回去之后，竟杀了汉朝使者，又害怕汉朝报复，于是带兵向西迁徙遁逃。西迁途中死伤众多，军力仅剩数千人，但凶悍老练。在西域一带，仗着兵马剽悍，侵袭各西域小国，气焰嚣张。天高皇帝远，汉朝感到鞭长莫及，一时竟无可奈何。

汉朝有个边防官员名叫陈汤，是个低级小干部，此人悟性强、注重学习、擅长奇谋、雄心勃勃。他决意找机会击破郅支单于，建立“千载奇功”。

陈汤经过缜密策划，最终趁着上级病倒，竟然假传天子旨意，集合汉屯田军和西域各小国，分六路大军向刚修建完毕不久的“单于城”进军。当时联军数万人，力量对比占据绝对优势。包围单于城之后，各兵种联合作战，攻防有序。箭如雨下，匈奴损失惨重，郅支单于的十几个妻妾也都亲自上城射箭作战，大部分被联军射死，郅支单于被一箭射中鼻子，退下城墙。郅支单于唯一的盟友西域康居国派骑兵来援助，阵前剽掠，汉军岿然不动。两天后，单于城破，西部分匈奴被一举消灭。康居骑兵遁逃。

该战役收到了战略性的全局功效，从此各国震恐，莫不宾服。匈奴东边部分的呼韩邪单于（王昭君第一任丈夫）更加驯服，亲自到长安表示敬意，愿世代称臣。这一战为汉带来了长期的和平，以后王莽内乱时，匈奴也没有趁机入侵。

大胜之后，陈汤和他的上级给汉元帝发去一封著名的疏奏，一方面自责矫诏之罪，另一方面汇报战绩，并说出一句千古名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剿灭西部匈奴之战，不仅是陈汤个人的成功，也是整个汉代国力积蓄、政治制度（西域行政体系）和军事制度（屯田等军制）的成功。但陈汤毕竟是以违法方式立功，这在朝中引发了大辩论。不过，最终政府宽大为怀，陈汤因功封侯。

陈汤其实个人人品不高。年轻时贫而无行，经常借钱不还。他脑子灵活、喜欢读书、博学多才，但是个大嘴巴，经常捏造政治流言，而且非常贪婪，下属行贿无不笑纳，接受托请，替人上奏折，曾一次就收受五十斤黄金的重贿。

后来陈汤数次因腐败或往年罪行下狱，然后被发配到敦煌。但他有赫赫军功，

毕竟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经常有大臣为他辩冤，最后汉天子允许他回到长安终老。有功封侯，有罪惩罚，汉王朝对陈汤还是很公正的——相比之下，一千年后的宋王朝对武将的态度就十分阴暗了，爱国名将都不得好死。

汉室因革除秦的暴政而立国，拯万民于水火，因而对自己的法统很有自信。相比之下，晋、宋等王朝得国不正，统治者十分心虚。心虚导致控制加强，控制导致扭曲，扭曲导致社会变态，社会变态导致国家虚弱，国家虚弱导致外族入侵、亡国亡天下。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为帝国政权所用

自孔子以来，历代儒者一直积极谋求跟政权合作，但一直不受待见。到了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终于迎来了机会。

二人联手合作之后两千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在学术思想领域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以至于后世普通中国人只知有儒家，不知有诸子，儒家文化几乎等同于中国文化。

董仲舒能够获得如此成功，主要是他写的《天人三策》系列论文。这些论文用庞大的理论，论证了汉朝取得政权实施统治的合法性。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吸收糅合了战国以来许多其他流派的思想，如已经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构建了一个从宇宙模型到人事兴衰的庞大体系，成为集大成者。董仲舒用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来论证朝代更替，得出的结论是，汉朝推翻秦朝是继承了“天命”，秦是水，汉是土，汉灭秦，乃是五行相生相克的直接体现。

五行学说犹如古希腊托勒密的地心说天文学体系，逻辑完整、解释力强大，看上去很有说服力。在论述了汉朝取得政权的合法性之后，董仲舒还为天下一统量身订制了思想和意识形态基础。

儒家本来是复古思想的渊薮，封建制度和周礼体系是他们的理论根基，民主化权力运行（公天下）思想是他们最珍爱的古老记忆。董仲舒顺应时代新潮进行理论改写：拥护中央集权大一统制度，拥护一家一姓的私有朝廷权力体系，并为之作神学上的美化。显然，他是一个修正主义的儒家。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有其时代背景：自从战国末年以来，各个流派相互吸收、借鉴，形成日趋综合的趋势。在董仲舒之前约100年，试图集大成的作品是《吕氏春秋》，与其大致同时代的则有《淮南鸿烈》，只是理论基础和侧重点不同。在《天人三策》的策尾，董仲舒总结道：“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

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由来。

在董仲舒之前，学术界仍然十分活跃，虽然秦曾烧书，但这些学问的流传并没有断绝。《汉书》卷六《武帝纪》记载：“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据绾所奏可以看出，当时苏张纵横之术仍属热门学问。各地举荐的贤良，也分属于不同的学术流派。

儒家本是法家的死对头，罢黜百家之后，我国不管是制度上，还是思想上，都废弃法治思想，而走上了儒家这一“不归路”。

儒家思想被选择为巨大帝国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有其必然性。自从夏朝建立，国家由“公天下”变为“家天下”以来，国家机器的根本性质，便由公共设施演变为以暴力为依托的统治集团，对不掌握暴力的普通民众——被统治集团实施剥削统治的工具（少数帝王如李世民具有理想主义人格，国家机器的公共性随之增强）。

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的矛盾关系，是儒家学说所希望协调的核心内容。对被统治集团（不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包括农民，也包括许多地主、商人），儒家学说以“天命”理论论述政权合法性，进行人心控制，削弱他们反抗的意愿；对统治集团，儒家学说进行道德规劝，劝他们以低税负、提供公共福利等方式实施“仁政”。儒家通过总结历史，设想出一个包含“十一而税”等内容的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的均衡关系，并在理论上加以描绘，希图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汉朝总结秦帝国的教训，重新调整了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的均衡关系，并调整了统治策略和控制形式。统治集团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并以意识形态和人心控制，来降低统治的成本。由此，儒家思想上位，水到渠成。

但是现实中，儒家对统治者集团的道德规劝大部分时候无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帝国官僚集团，不懈地追求和扩张利益，越来越偏离儒家所设想的“王道”，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的关系逐渐走向失衡。平衡被彻底打破之后，便开始了王朝的循环。

武帝虽然采用了儒家学说体系，他本人却不是一个儒家的忠实信徒。他所任命的得力助手，例如公孙弘、桑弘羊等



海昏侯墓主 室出土的龙凤纹玉佩饰

人，都不是儒生。他的战略思路也不受儒家影响。儒家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他却深知外患只能以武力对待（他对匈奴的政策，董仲舒曾予以婉谏，而汉武帝不采）。

汉朝政权对于儒家学说，主要是利用，并非真心信奉。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对此也曾有直白的说明。

汉武帝去世后，汉昭帝刘弗陵继位，但7年后便以弱冠之年去世，其后是汉武帝曾孙刘询继位，就是颇有才略的汉宣帝。《汉书·元帝本纪》记载，“柔仁好儒”的汉元帝还在当太子时，曾向父亲汉宣帝提建议，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怒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任周政乎？然后批评儒家说：“且俗儒不达时宜，好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遂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西汉去古未远，对各个学术流派的性质，心里还是清楚的。

王莽改制：一场儒家原教旨主义大败局

武帝死后，昭帝和宣帝两朝和平而繁荣，共历经44年，然后传至元帝。

元帝即位，皇后是王政君。因为皇后的关系，王氏家族逐渐占据核心位置，演化出外戚专权的局面，枝繁叶茂，势力日益强大，时人称“尚书九卿，刺史郡守，皆出其门”。

汉元帝死，成帝立，舅舅王凤四兄弟相继以“大司马”（最高军政长官）的资格辅政。王氏公子，个个骄奢淫逸，唯独一个名叫王莽的，谦恭俭朴，勤学博览，交结贤俊。他入朝为官后，爵位愈尊，待人愈恭谨。散财产车马衣裘，以赠送宾客、赡养名士，又广交名公巨卿，于是为一时人望所寄。

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莽的叔父大司马王根因病辞职，推荐年仅38岁的王莽继任。王莽虽位极人臣，但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有一次母亲生病，公卿列侯的夫人前来问候，王莽的夫人穿着不拖地的粗布衣服（是时贵妇的衣服是拖地的）出来迎接，来宾还以为她是婢仆，问知是大司马夫人，无不吃惊。王莽还把受赏赐所得的资产完全散给寒士，又延聘贤良充任属吏。

几年后，汉成帝死，绝后，19岁的侄子刘欣立，是为汉哀帝。汉哀帝是一个有名的同性恋者，他宠爱董贤（男），恨不得把江山让给他，二人常同卧同坐。曾有一次白天睡觉，董贤头偏枕了汉哀帝的衣袖，哀帝想起床却不想惊动他，于是用剑截断衣袖后才起来，由此衍生出一个成语典故“断袖之癖”。

董贤刚 22 岁，便被册封为大司马。不仅如此，哀帝还宴请董贤父子，酒酣时竟然说道：“吾欲法尧舜如何？”

尧舜禅让，儒家先师孟子早就大力提倡，正是儒生们梦想中的政治模式。

哀帝册命董贤为大司马是在元寿元年（公元前 2 年）十二月。次年六月，他还没来得及实行禅让，便突然病死了。

哀帝在位这几年间，因有新的外戚（哀帝祖母、母亲家）专权，王莽称病引退，闭门韬晦了三年。期间，吏民上书替他说情的有一百多次。后来应举到朝廷考试的士人又在考卷里歌颂王莽的贤德。哀帝于是召他还京，陪侍太皇太后。他还京年余，哀帝死。哀帝又是绝后，他的母后及祖母又皆已先死，大权又重新回到太皇太后王政君之手，这时她 72 岁了。

哀帝死后，全朝几乎一致推举王莽复大司马职，太皇太后王政君诏令许可。王莽复职后立即罢免董贤，并选立中山孝王九岁的儿子即位，是为汉平帝。

王莽命令平帝的亲属一律不许进入京城，以杜绝新的外戚之患。接着，他把傅、丁两氏外戚全部赶出京城。王莽复出执政，全社会欢欣鼓舞。这一年，王政君封王莽为安汉公，实际总理国政。

公元 2 年（平帝元始二年），发生旱灾蝗灾。王莽实施了一系列赈济政策：自己带头捐款 100 万钱，捐地 30 顷，救助穷人，230 个贵族跟进。又下令：民众捕蝗虫，按数量多少给钱。全国无灾地区凡是财产不满两万钱、受灾地区财产不满一万钱的贫民，免交租税。在疾病区腾出大房子专供病人医治。一家死六人以上给葬钱五千，四人以上给三千，两人以上给两千。

王莽又下令：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五个里共二百个廉租房小区，供贫民居住，并扩大太学招生，太学生数量破纪录地超过一万人。他还下令各地兴建学校，让更多的孩子读书增长知识。

平帝 12 岁时讨论结婚，成千上万的士人百姓涌向政府大门，不肯离去，要求平帝必须娶王莽的女儿，以王莽之女为国母，别的女子完全丧失竞争力。王莽女儿当然被选为皇后，平帝因娶王莽之女赐给王莽的 25600 顷土地，王莽都退回了。此后，朝廷公议赏赐王莽，王莽拒绝，结果朝廷收到 487572 人上书，恳请王莽接受封地。据当代学者估算，当时全国人口 5000 万左右，但识字率很低，



王莽

汉朝识字者 200 万左右，长安及周边地区能上书的知识分子差不多也就是 48 万多人，几乎所有识字的人都参与了这个运动。

这时，王莽处处以孔子最崇拜的周公为榜样，朝野也以周公看待他。传说周公辅政时，有南方远夷越裳氏来献白雉，为周公功德及远的表征；是时也有益州塞外（今越南境）蛮夷，自称越裳氏，来献白雉和黑雉，其后四夷声言因慕义而来朝贡的络绎不绝。

公元 5 年（平帝元始五年），汉王朝为王莽加封九锡。一个推举王莽代替刘氏当皇帝的运动开始兴起。

秦汉以来，深入人心的“五德终始”说早已明示没有一个朝代能够永久。自汉昭帝以来，常有儒者公开声称汉运将终、天道将替。昭帝时有一位学者名叫眭弘，因天变上书朝廷，称汉室气数已尽，建议汉皇室“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眭弘以“妖言”罪被下狱处死，但禅让的信念信众很广，自然不乏后来人。二十年后，宣帝时，有一位盖宽饶，亦因同类的言论被处死。成帝时，大臣谷永、方士甘忠可又同样上书。

到了王莽时代，禅让理念被越来越频繁地提及：为什么无能的刘氏后人永远坐江山，而王莽这样的圣人却不能当皇帝呢？人们认定，只有王莽才能让弊病丛生的国家重新振作起来。

不久平帝病死，又是绝后。王莽经占卜和看相之后，选了两岁的刘婴立为皇太子，王莽实行“居摄”，即代理皇帝。

公元 8 年，宣示天意要王莽做皇帝的“符命”接连而起。王莽却是一个劲地推辞。形势演变到了非常迫人的地步：他越推辞，臣民就越急；他越展示出无私，臣民就越狂热。全国推举他做皇帝的势头已经汇成汹涌大潮，“祥瑞”和“神迹”每天都大量出现。臣民们也每天都在议论和催促，不容王莽后退。

是年十一月，王莽奏上太皇太后，请许莽号令天下，并学习周公，待子婴长大后再还他帝位。

次月，某日黄昏时，有个名叫哀章的人，穿着黄衣，拿了一个铜盒，送到汉高祖庙。盒里装着两卷东西：一卷题为“天帝行玺金匮图”，一卷题为“赤帝行玺刘邦传子黄帝金策书”。策书的大意是说王莽应为真天子，太皇太后应从天命。守庙的人奏闻王莽。次日一早王莽便到高祖庙拜受这铜盒，即所谓“金匮”，然后谒见太皇太后，然后还坐殿廷，下书称听从天命，建立“新”朝，即位天子。

王莽废掉刘婴的皇太子名号，封他为定安公，赐给他一块方圆百里的地方，把汉朝的宗庙放在那里。西汉 214 年的历史，就此画上句号。纵观王莽当上皇帝

的过程，几乎是一场全民选举，所以历史学家邓广铭曾评论说，王莽是顺应历史要求掌握政权并制订改革方案的。

王莽即位后，除了“改正朔，易服色”等外，还要按照儒家的仁政理想，依据《周礼》的记载，对社会进行一番大改革。

公元9年，王莽下诏，批评社会弊端，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和奴婢问题。诏令说到权势之家占田无数，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置奴婢市场，把奴婢同牛马关在一起，专断奴婢性命，太不人道了。

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复古，而井田制曾经被孟子推崇为最理想的土地制度。王莽决心恢复古代井田制，用的是“王田”的名义——商鞅亲自废除井田制，到此时已经有300多年了，王莽这个历史倒车开得太大了。针对当时土地和奴婢的不良情况，王莽诏令宣布：天下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天下奴婢，一律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男口不足8人而土地超过1井（900亩）的人家，把多出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有敢表示违抗者，流放。

这个貌似决绝的诏令，其实根本无法扭转局面，结果仅仅是冻结了土地和奴婢的买卖，后来引发全社会的普遍抗议。始建国四年，王莽不得不改变这个诏令，宣布王田皆可买卖；犯买卖奴婢罪者也不处治。这样，王莽解决当前最主要的社会矛盾的尝试，很快就失败了。

王莽也痛恨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决意加以改革。于是在大城市设立行政机构，决定物价。民因祭祀或丧葬需钱，可向政府借贷，不取利息；欲经营生产而缺乏本钱的，也可低利借贷。一个物价体系，一个融资体系，这是市场经济的两大核心要素，王莽都一手操办了。结果当然一败涂地，只养肥了一群硕鼠。

王莽又改革币制，除了铸新钱以外，把龟甲、贝壳也作为货币。人民对王莽发行的钱币毫无信心，都私用汉代原来的五铢钱，王莽又严加禁止，人民反抗不已。货币变革闹剧引起了经济混乱，加速了财政的崩溃和社会经济的破产。

王莽满腔热忱，但是好心办了坏事。

国内矛盾越来越激化，王莽为了转移视线，主动挑起与四周各族的斗争。他故意贬低附属国的地位，加以



新莽钱币中的两种：大布黄千及货布

侮辱，如把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其后，又连续发动对东北、西南各族和匈奴的战争。先是派 10 余万人镇压西南的钩町族，其中有十分之六七死于饥饿病困之中；又从各地征发 30 万人进攻匈奴。沉重的徭役、兵役负担，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与灾难。当时广大农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谷价腾贵，百姓流离。到王莽末年，“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饥死者什七八”（《汉书·食货志》）。

社会要乱了。

天凤四年（公元 17 年），荆州一带发生饥荒，饥民数百人共推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为领袖，发动起义。起义军以绿林山为根据地，称“绿林军”。

西汉宗室、南阳大地主刘縯、刘秀兄弟，以“复高祖之业”相号召，联络附近各县地主豪强，并且把宗族、宾客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军队，称为舂陵军，加入到反对王莽的行列。

绿林军连败莽军，发展到十余万人。绿林军领袖为了扩大影响，于宛城南面的淅水上拥立刘玄作皇帝，恢复汉的国号，年号更始（公元 23 年）。

舂陵军、绿林军联军后与王莽军在昆阳发生大战，莽兵大溃，士卒相践踏，奔走百余里。政府军与起义部队的力量对比在发生逆转。消息所播，四方豪杰，风起云涌地举兵响应，他们大都杀掉州牧郡守，自称将军，用更始的年号，等候着新主的诏命。另一支绿林军直奔长安，关中震动。长安城中市民亦起暴动响应，王莽在暴乱中被杀，手刃他的是一个商人。他的尸体被碎裂，首级被传送到绿林军。王莽从摄政到灭亡，总共不到 20 年。

王莽的失败，不只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中国政治演进到这个阶段所经历的一次总失败。儒家学说在解释王莽问题上陷入了尴尬。后代史书，只好说王莽是伪君子，那些高尚的品德都是装出来的。其实王莽真的是个信仰真诚的好人，错误在于他过于依赖儒家思想——它的理念也许可以用来修身，也许可以用来引导治国哲学，但它的实际政策主张确实不太适合直接用来治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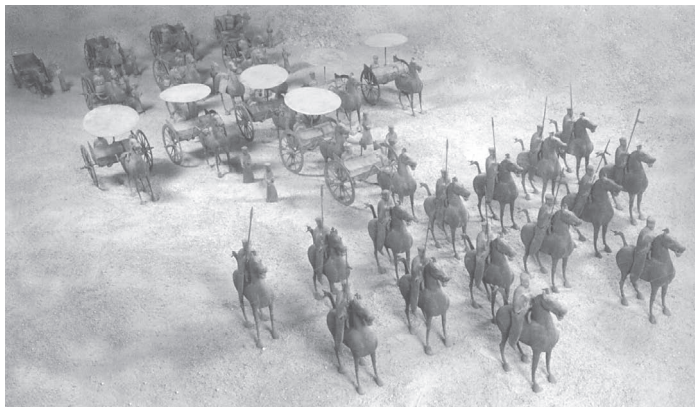
王莽失败，汉儒的禅让理论随之破产。但王莽之乱的根源，却没有被正确认识，这场大乱局并没有带来人们思想认识的提高——中国的学费白付了。

东汉：以小市民的心态立国

至西汉末的公元 2 年，中国人口已经增长到 6000 万。王莽时到东汉初，战乱使得总人口剧烈下降到 3500 万。到东汉后期的永寿三年（157 年）稍后，才重

新突破 6000 万^a。

新朝倒塌后，革命势力分化和冲突不断，分裂和内战持续了十四年，然后全中国最终统一于刘秀之手。他即皇帝位后，改元建武，仍以汉为国号，因为他光复了



东汉时期铜车马仪仗队

汉高祖所建立的汉朝，所以被称为光武帝。刘秀以后的汉朝，史家称为后汉或东汉，而别称刘秀以前的汉朝为西汉。

刘秀本是一个没有多大梦想的俗人。他少年虽曾游学京师，稍习经典，但他的理想只是“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执金吾是京城的公安局长，是朝中的第三四等的官吏。阴丽华是南阳一个富家美女，在刘秀起兵的次年，便成了他的妻室。刘秀起兵并不是抱着什么政治理想。做皇帝以后，心目中最大的政治问题也只是怎样巩固自己和子孙的权位，他在制度上的少数变革都是为此。

最重要的改革是兵制的变革。刘秀在建武七年三月下了一道重要的诏令，废除“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原来，西汉时从平民中选拔“材力武猛者”，任命组建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兵种，分别对应平原战（轻车、骑士）、山地战（材官）、水战（楼船）。他们在每年秋后，集中讲课、训练。

这道废除的诏令，使得此后东汉的普通人民不再有受军事训练的机会。全国武备与对外征讨，由京师卫军担当。人民由此脱离军事，日渐孱弱，东汉的士大夫已经观察到，汉民在胡虏面前，犹如羔羊。

东汉后期，因郡国兵虚弱，边疆有事，每倚靠雇佣的外籍兵即所谓胡兵；而胡兵凶暴，蹂躏边民，又需索犒赏，费用巨大。后来推翻汉朝的董卓，就是胡兵的领袖。

郡国材官、骑士等之罢，刘秀在诏书里明说的理由是中央军队已够强大，用不着他们。这显然不是真正的理由。刘秀真正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政权，预防被颠覆——他当初起兵，就是计划借立秋后本郡“都试”即壮丁齐集受训的机会发难的。

^a 人口数据为当代学者估算。

这是专制权力对尚武精神的阉割。它为东汉的灭亡埋下了后患，也为华夏族的千年积弱埋下了后患。

东汉时代，是华夏族尚武精神丧失的关键时期。春秋时期贵族，人人能文能武，普遍学习的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中，射箭、驾战车是基本功。汉代之后，六艺竟逐渐变成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本书。而随着刘秀有意压制民间的武力，尚武精神更加弱化了。民国著名军事家蒋百里说，秦汉以后，政权、武力、知识分裂了（从前集中于贵族阶级，他们能文能武，分裂后知识分子普遍文弱化，沦为政权的附庸），政治上又不断竞争，而华夏就逐渐趋于弱势。

历史学家钱穆评论说：东汉的立国姿态，可以说常是偏枯的、静的、退守的。

在这种员外爷式的心态之下，刘秀对于匈奴和西域的事务均不感兴趣。他放弃了汉武帝和汉宣帝花费百年时间在西域建立起的霸权，闭起玉门关，但求省事省钱。短期来看，这倒也合理，可是西域形势分化，莎车国和匈奴壮大，以后再次成为华夏的威胁。

暂时强盛，持久暗弱：东汉给后面四百年投下的阴影

东汉共有十二帝，历经 196 年。

东汉时期，中央政府的运行一直比较混乱。皇帝专制权力更加集中。朝廷机构中设尚书台，总揽行政权柄，丞相一职变成徒具其名的空衔。在正常情况下，皇帝裁决政事，然而一旦皇帝早死太子年幼，这时由谁来辅政，便出现了新的问题。太子年幼即位，年轻的太后临朝，不便直接接触大臣，不得不重用她娘家父兄来协助处理政事，这就为外戚窃取大权制造了机会。外戚自恃亲贵，骄横擅权，无视幼主，朝中大臣均仰承他的鼻息谢事。皇帝成年后，不甘忍受外戚胁迫，为了把大权夺回，就结纳在自己身边的心腹宦官，发动政变，除掉外戚。皇帝亲政后，自然重用夺权有功的宦官，于是又演成宦官掌权的局面。可是，皇帝死后，宦官政治身份卑贱不能辅政，接着又有新的外戚上台。这种外戚、宦官的交替专权，成为东汉后期政权运行的一个特点。

东汉朝是一个典型的人治社会，其特点：一是有法不依，游戏规则随人事而变化；二是善治局面不能持续、长久，随时可能人亡政息。光武帝刘秀在波诡云谲的竞争中胜出，自然有他超群的能力。此后的明帝、章帝二帝，虽谈不上雄才大略，倒也比较稳当老成，政策决断也算得上明智。故光武帝、明帝、章帝年间，社会还颇有振兴的气象。其后便局面朽坏、政治黑暗，国势江河日下。

汉明帝是光武帝的继任者。明帝眼光稍远，他看到了外面的威胁，知道仅靠闭关锁国是不行的。当时匈奴又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面部分依附于东汉，后逐渐与华夏同化，北面部分与东汉为敌。明帝命窦固、耿秉征伐北匈奴，大破之。

匈奴之祸，东汉时期基本结束。匈奴自此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越来越黯淡。他们最后一次演出是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匈奴人一度建立了两个割据政权，还取了国号。但南北朝分裂的局面结束之后，匈奴就消失在中国历史中了。匈奴后裔进入中原之后，逐渐改为汉姓，如独孤（刘）、贺赖（贺兰、贺）、郎、宇文等。

十几年后，窦固的侄孙窦宪再度率军北征，穷追北单于直至远离边塞三千余里的燕然山（今内蒙古杭爱山脉），窦宪与副将等登山望远，并由大学者、历史学家班固撰写《封燕然山铭》文，刻石纪功。

窦固最大的政绩在于派遣班超（班固的弟弟）出使西域。自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至此，西域与中原断绝关系65年后又恢复交往。后汉室又设立行政机构“西域都护府”，统管着大宛以东、乌孙以南的五十多个国家，各国王公大臣均佩戴汉朝印绶，确认为汉朝官员。

班超是东汉时期一个杰出的人物，他在西域工作三十多年，只领着一只外交小分队，全靠临机应变、文韬武略，竟击败敌对军力，最终使得西域51个国家臣服。起初，他出使几个小国，适逢北匈奴的使者也在那里活动。他以奇谋袭击北匈奴使者，将他们全部斩杀，所在国国王大为震惊而慑服。此后，他用“以夷制夷”的策略，率领这些国家的军队，在西域立君定乱，西域各国最终完全听从汉朝的号召。班超在西域极有威望，汉朝曾打算召他回国，结果当地人民抱住他的马腿不放，甚至有将领自杀以挽留，说：“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班超乃决意留在西域，年老临终前才回到了洛阳。

班固又曾经派甘英去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到了黑海，在茫茫大海前止步，东西方两大帝国未能握手，这是一个历史性遗憾。

然而班超虽可以在外立功，却无力阻止国内政治的腐化。他也没有考虑过如何设立一个长效机制和体系，可以在自己离任后确保汉室在西域的影响力——当然，这本来应该是皇帝操心的问题，可是皇帝更没有考虑到这一层。不过话说回来，班超的成功靠个人天赋，并没有系统性的方法和政策，因此他也未必有能力对自己的成功经验进行正确总结，所以他的继任者向他请教心得时，得到的只是一些笼统的空谈。班超去世之后，他在西域建立的以汉为圆心的体系便烟消云散了。

章帝的儿子是和帝。从汉和帝开始，东汉王朝的“气数”便十分低迷，连续

九个皇帝都是短命，平均寿命不到 20 岁。皇帝都是年幼即位，于是外戚势力与宦官横行朝堂，朝政日益衰败。汉灵帝即位之后，沉迷酒色，重用宦官，甚至公开标价卖官。终于，在 184 年爆发了以道教来组织的黄巾之乱，朝廷调集重兵才将这场声势浩大的变乱镇压下去。

在农民军的蹂躏下，东汉逐渐名存实亡，公元 190 年，权臣董卓又把持政权，皇帝大权旁落，而地方豪强也趁势崛起，揭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大幕，导致三国局面的形成。

公元 220 年，北方最大军阀曹操的儿子曹丕逼迫汉献帝让位，在洛阳称帝，国号“魏”，史称曹魏，东汉结束。中国自此进入了一个长达 400 年黑暗的大分裂时期。

如果把国家机构体系比作一台机器，那么这台机器是有使用寿命的。从中国历史经验来看，一台机器有效期在 100 年左右，100 年后就进入腐蚀、朽坏、报废阶段，两个阶段相加一般不超过 200 年。这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兴衰周期率。

组成这个兴衰周期率的关键部分，主要是政治腐败，此外，还有残酷的“马尔萨斯定律”。地处东亚大陆的古代中华文明，是典型的以农业为主导的文明。农业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土地。在历史上，中华文明垦殖的区域逐步扩展，中国人口的数量也有很大增加。但相对而言，土地资源的增长要受到自然和社会条件的限制，人口增长的幅度则常常超过土地的承载量。每当社会财富被新增人口稀释，社会就趋向贫困化，人们对生存资源的争夺就会加剧。事实上，历史上的所谓“太平盛世”无一不是过眼云烟，最后都走向衰落。消灭过剩人口的方式，往往是最残酷的战争，使得人口与土地重新达到一个平衡。笔者粗略估算，从秦朝末年到清朝，因改朝换代的战乱所消灭的人口，有数亿人之多。

东汉，给后面的四百年投下了一个长长的阴影。“五胡乱华”的根源，源于西晋的弊病，而西晋的弊病，病根还在东汉。门第大族以腐败手段垄断了官吏选举，在野名士崇尚玄言清谈，为在士林中出名，男人也涂脂抹粉、注重自我包装，这些西晋时期的社会病态，在东汉时期都已经出现了。

一切要等到隋唐兴起以后，重振尚武精神，打破门阀士族对权力的垄断，大胆启用平民中的优秀人才，社会才重新振兴。在这中间，是阴暗的 400 年。

繁荣一时的科技：科学为什么长不大

东汉大兴儒学，太学林立，学术气氛浓厚。西汉时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大

学——太学，到了东汉，天下士子踊跃参加考试，在一个总共 5000 多万人口的国度，太学生竟然有 3 万多人，几乎每 2000 人中就有一个太学生。2000 人大约是一个村庄的规模。

因此，东汉在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和文化发展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如蔡伦改进造纸术、张衡发明地震仪和浑天仪。

汉代所培养的太学生，张衡是一个杰出的例子。张衡，字平子。“衡”这个字，造字原理非常优美、有趣，值得一说。“衡”是“鱼”“行”结合：一条鱼在游动前行时，左右两侧必须保持平衡。张衡出生于累世高官家庭，自幼好学上进，后来又入太学求学。

在那个只能靠肉眼观测的年代，张衡一生记录了一万多颗恒星的资料。他根据天文观测提出了新的宇宙观：宇宙无边无际，地球就像蛋黄漂浮在宇宙中（请想一下被烧死的布鲁诺），不过他认为地球是半球体，下半部分是水（这是受当时的观测条件所限）。张衡还提出月亮只是反射日光而自身并不发光，并正确解释了月食的成因：月亮围绕地球转动时，太阳照过来的光线被地球遮挡。

张衡对地震的原理有深入的研究，并制作了地震仪。有一天，地震仪中的一个铜球从龙嘴中掉落入蟾蜍的嘴中，表示西北方向发生地震。但是大家都没有感觉到，于是纷纷议论地震仪不管用。但是几天之后，陇西果然派人来报告发生了地震（史书所记载的这一地震事件，经现代科学推算，确证真实发生过）。

张衡还是个机械大师。他亲手制作了模拟恒星运转的浑天仪，复杂而精密；又制作了一个有趣的自动日历，名叫“瑞轮莢”。这个日历模仿神话中奇树蓂莢的特征，靠流水作动力，从每月初一开始，一天出现一片叶子，到满月出齐 15 片，然后每天再收起一片，到月末为止，循环开合。张衡还利用差速齿轮原理，制作了指南车、计算行车的里程的“记里鼓车”，该原理的发现，比欧洲早了 1800 年。

张衡太有才了。他还计算过球体的体积、计算过圆周率、写过数学方面的专著。他的文学作品《二京赋》《思玄赋》《归田赋》，同样达到了文学的巅峰境界。但是在帝国体制之下、在人治的微妙叵测的政治环境中，张衡生活得很不容易。他在汉顺帝朝中任“侍



浑天仪

中”时，有一天汉顺帝问他，天下百姓最痛恨哪些人——当然是弄权的宦官，这还用问。宦官们就站在两侧，两眼直盯着他，张衡只好云山雾罩地绕了一通。但宦官们怀着警惕，最后还是把他排挤出朝廷。

如果大环境是一摊污水，生活在其中的科学之鱼是无法长大的。华夏天才多，但是很难发挥天赋到极致。张衡晚年很郁闷，不再愿意写作，以至于“著述多不典详，时人追恨（遗憾）之”。他的宝贵智慧当时就没有传播开来，所著的寥寥几本书，后来也大部分亡佚了。他制作的地震仪也已经失传，现在的地震仪只是效果粗劣的仿制品。能制作地震仪，必然要求对地球物理学、地震波有深入的研究，可惜地震仪的理论部分也亡佚了。相比之下，受到政府支持的董仲舒则“所著十万言，皆传之后世”，天壤之别矣！

东汉影响了欧洲历史

大约与汉代同时代稍晚，在欧洲，罗马帝国已经在地中海一带崛起、征战。东西方两个大帝国，中间隔着中亚大沙漠。

公元1世纪以前，罗马帝国和中国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人员往来。商业往来主要靠中亚地区的中间人。但中国人和罗马人相互都很关切对方的存在。中国人对罗马人的印象不错，听说他们身材高大长得很像中国人，所以给罗马帝国取名“大秦”——比起视其他民族为蛮夷，这待遇不低。

甘英出使大秦失败，最终未能渡海。直到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汉与罗马帝国才有正式接触。《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王安敦遣使献象牙、犀角、瑇瑁（大海龟），“安墩”正是马可·奥勒留（161—180年在位），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的继子。近年来，洛阳市北郊还出土了几枚古罗马金币，乃是当时罗马商人在中国生活的写照。

中国人早已发明了丝绸（看到蚕，想到并做成衣服，确实很神奇），这种西方人从未见过的华美面料，令他们如痴如狂。今天我们在油画中看到的罗马元老院的元老们身着丝绸，正是来自中国的进口货，这是当时罗马的奢侈品。

如今罗马所在地为意大利，该国 Gucci、Zegna 之类“奢侈品”目前正在中国大受追捧，其实这些奢侈品相比当年的丝绸地位可是差得远了。一直到公元552年左右，罗马才获取了取卵养蚕的技术，向阿拉伯人炫耀，阿拉伯人十分吃惊。今天，意大利跟中国并称丝绸业强国，而意大利的设计水平略胜。

不幸的是，罗马帝国的两次灭亡，都跟中国有间接关系。

东汉时，华夏大破北匈奴后，北匈奴在中国的历史书中就消失了，“不知所之”。后世欧洲学者考证，北匈奴残部一路向西溃逃、迁移、侵略，经历了一两百年之久，进入了欧洲，把欧洲搅得天翻地覆。他们先是侵占日耳曼蛮族的土地，日耳曼蛮族被驱赶继续向西向南，一部分（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了英格兰当地人，演变成日后的英国；一部分进入罗马帝国腹心，并最终蚕食掉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剩余的东半部分，被称为东罗马帝国。匈奴人在欧洲历史书中被称为匈人（Huns），他们在匈牙利草原逐渐定居，最著名的领袖是匈奴王阿提拉（Attila）。匈人与马扎尔人混血后，变成今天的匈牙利人。上述过程历时数百年。^a



席卷欧洲，使西罗马帝国名存实亡的阿提拉

隋唐时，中国大破突厥，突厥西遁，杀入东罗马帝国腹心之地，建立土耳其（Turkey，即突厥音译），突厥人后来攻破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陷落。上述过程亦历时数百年。

东汉具有崇高的国际威望，被周边的朝鲜（高句丽、百济），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多个国家尊为宗主国。在日本列岛上，东汉时有一百多个小国。公元57年，日本国王遣使入汉都洛阳进贡，愿为汉臣藩，求汉皇赐名。汉以其人矮，遂赐“倭国”。其王又求汉皇赐封，光武帝又赐其为“倭奴王”，并赐封“汉倭奴国王印”金印（《后汉书·东夷列传》）。这颗金印已于1784年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出土，成了日本国宝，现藏于福冈市博物馆。

^a 中外史学界有许多历史学者认同此说，并有详细的论证。但也有不少人反对。北匈奴消失，到匈人在欧洲史书中出现，中间隔了280年，中间过程不容易准确考证。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方毓强《匈牙利人与匈奴关系的历史之谜》、蒲彩军《匈奴与匈牙利人的渊源》等文章。笔者综合参阅多篇学术论文后，认为匈奴即欧洲人所谓Huns一说值得采信。

第十章 魏晋南北朝：华夏第一次生存危机

公元190年，离东汉灭亡只有30年的时间了。2月底，帝都洛阳城外，寒风催迫着一支长长的难民队伍，他们扶老携幼，嚎哭声远近可闻。这是被权臣董卓下令全部驱赶到长安的京师百姓，总共数百万人。身后的洛阳城，此时已经被董卓统帅的胡兵洗劫一空，成为一片废墟。

就在董卓下令迁都长安后第五天，人们共同目睹了一个怪异的天象：白虹贯日。所有人都惴惴不安地感到，这不仅是汉室将亡的征兆，也意味着一个灾难深重的乱世将要来临。

中国古代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段风雨晦暝、血腥黑暗的历史。如果从196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今河南许昌）算起，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共有393年。这一时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四个阶段，其中西晋曾经在全国实现短期统一，其余则都处于分裂割据和战争状态。在内忧外患交迫之中，华夏面临着有史以来第一次整体灭亡的危机。

东汉末年，饥民四起造反，中央部署军队镇压。随着起义军被消灭，各路军队羽翼丰满，而中央朝廷的实力却日薄西山，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由此逐渐形成。经过数十年的战乱，社会元气大伤。

东汉盛时，全国有接近6千万人口，到三国末期，只剩700多万，正所谓“十室九空”。社会经济极度萧条，商业活动几乎消失，商品买卖已经很少使用“五铢钱”等货币，而退化为使用布帛。

昔日繁华大都市长安、洛阳，成为荆棘狐鼠之乡：旅者行路数百里不见人烟，唯见白骨缠草根；入夜苍茫，时闻沉沉大野唱荒鸡^a。

社会发展水平，几乎倒退到春秋时期以前。但春秋时社会的精神系统很稳固，古典学术体系保存完好，社会斗争并未失去它的底线。魏晋时期，除了流传下来

a 夜间鸡叫，称为荒鸡，因天还没亮、未到天时，古代荒鸡被视为不祥之音。

的一些残书，几乎什么遗存都没有了。人们不堪承受生命之痛，转而向新传入的佛教求慰藉。

西晋统一全国之后，社会秩序有所恢复。西晋统治者好几代都是富家子弟，一旦安稳了，便开始奢靡腐败的竞赛。皇室司马氏家族内部又爆发了争夺政权的“八王之乱”，社会再度动荡。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国家衰弱，遂有外族入侵，匈奴、鲜卑、羯、羌、氐（氐）乘机举兵，屠杀民众，抢夺财货，建立割据政权。

从民族的角度看，这是一个丛林法则横行的时代，充满了原始而残酷的生存竞争。当五胡在中原相互残杀混战之际，北方的鲜卑、柔然、突厥乃至契丹等族又渐次崛起，加入了民族生存竞争的混战。有史以来，华夏第一次如此羸弱不堪，北方在战乱与屠杀中所剩不多，江南则在文弱中苟延。

从文明的角度看，这又是一个中华文明单向扩张、各民族之间相互融合的时代。中华文明通过同化^a其他族群，从而在文化边界上逐渐扩张。

五胡乱华前夜：华夏族的腐化

东汉末年，饥民四起组成流寇式军队，各路诸侯纷纷率军平定，逐渐演化成军阀割据之势。军阀相互征伐兼并，逐渐演化出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魏国的领袖是曹操，蜀国的领袖是刘备，吴国的领袖是孙权。

魏国统一北方之后，积蓄力量准备南征，打算一统天下。此时曹操的儿子曹丕强迫汉献帝“禅让”，以篡权的方式取得了政权。统一天下之战陆续进行。蜀国、吴国先后灭亡。与此同时，曹魏政权内部的权臣司马懿父子也已经坐大，遂重演禅让的一幕，篡夺了曹魏政权，是为西晋开国。

魏晋两朝是政治腐蚀社会的两朝，政权合法性是社会的一切正义之源，僭主扭曲法统，自然形成源头上的污染。曹魏篡汉已经臭不可闻，乘隙而起的司马氏再来篡窃曹氏的天下，更是没有任何光明正大的理由可说。

对此，天下人都看得很明白，连蛮族、晋王室自己人都看不下去。几十年后五胡时期羯族的领袖石勒，原是个目不识丁的奴隶，鄙夷道：“曹孟德、司马仲达以狐媚取人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大丈夫不为。”至于晋王室自己人，则有这么一件事：东晋时，大臣王导对晋明帝陈述其祖上篡权建国等过程，明帝听后又一头扎在座位上，愧疚道：“这样的政权哪能长久啊！”（帝闻之，覆面着床，曰：“若

^a 这个时期也偶有一些“逆向同化”，例如高欢、高洋父子的鲜卑化，但这一现象不构成主流。

如公言，祚安得长？”）

晋室僭主政权自然不能获得世族与士族精英集团等衷心拥护。司马氏无法公开探讨法统，只能以阴谋毒计来摧残、控制社会。纯暴力统治成本又太高，风险也很大，司马氏也想借助于思想认同来优化统治效果。于是又大力提倡名教，试图以此来凝聚曹氏所不能凝聚的人心。然而，逆贼说伦理，先天不利，大家都看得很明白。他们也只能提倡“孝”，而不敢提倡“忠”，效果是只能为私门张目而已（后来多个名士被以“不孝”的可笑罪名屠杀）。

考察古来中国的立国砥柱，是天下为公的立国精神、士族集团的领导、尚武重教的民风。自东汉中期开始，这几个立国根基已经在历史演化中逐渐坍塌了。

跟西汉时期相比，魏晋时期社会风气已经大变。这个时代贵族的生活方式腐化，盛产各种奇葩纨绔子弟。例如，曹魏时期有一个著名的美男子名叫何晏，因肌肤洁白犹如搽了粉，人称“傅粉何郎”。何晏常年酒色伤身，大量服用含毒性的丹药“寒食散”，服用之后精神亢奋，如同现代人吸大麻。何晏官至吏部尚书，负责全国的官员选拔，影响力可想而知。在他的影响之下，贵族纷纷服药，然后穿着宽袍大袖散热，一时间竟成为社会风尚。据后世研究，此后百年间服药者可能有百万人之多，中毒死者也有十万以上。荒淫的例子不胜枚举：西晋开国皇帝是晋武帝司马炎（司马懿之孙），他在后宫中放了上万名美女，每天乘坐一乘羊车恣意游巡，停留之处即行淫乐，众人经常不知皇帝所在。

武帝的继任者是惠帝司马衷，他是个天生白痴，听见蛤蟆叫，就问左右，这蛤蟆叫是为官还是为私啊？又听说天下有百姓饿死，他就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糜？

晋代大臣们主要兴趣在于近乎变态的生活享受。例如名士王济（又名王武

子），以人奶蒸乳猪，以钱铺地。大臣王顗（音“已”）令妓吹笛，小失声韵便杀，又令美女敬酒，客饮不尽亦杀。再如大司马石苞之子、卫尉石崇，与晋武帝舅父王恺斗富，王恺用麦糖洗锅，他用蜡当柴；王恺用紫丝布作步障40里，他作锦布障50里；他用椒泥涂屋，王恺则用赤石脂。石崇每



石崇请客宴饮，以美女劝酒，客人不喝便杀美女

次宴客，让美女劝酒，客人不喝，便杀美女。有一次石崇的朋友、大臣王敦故意不喝，看石崇杀美女取乐。

魏晋时期，还有同性恋、男色之风大盛，与之相应，涌现出一大批病白羸弱的美男子。《宋书》记载：“自（西晋）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皆相仿效。或有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

在穷奢极欲之外，晋代的贵族们“尚于玄虚，贵为放诞”，沉醉于清谈、侃大山，视政务为可耻的俗务。他们既不学武，又不学文，考试雇人作弊，宴会找人代为写诗。为维持奢侈的生活方式，则千方百计地聚敛财富，广占园田土地，收受贿赂。更有甚者，如石崇在荆州任上竟派人抢劫过往的使者和客商。

后世所倾慕的所谓魏晋名士，其实是知识分子精神苦闷却又不敢正面表达的产物，如阮籍、嵇康终日醉酒、作庄老玄谈。阮、嵇其实是有苦难言，他们之后的所谓名士，照猫画虎，对社会毫无担当，对于世务漠不关心，却被认为是高境界。

居于金字塔顶端的王室、士大夫精英集团糜烂腐败，整个民族也随之下沉。国家的构成是：一群醉生梦死的统治者，一批痛苦的士大夫和一千多万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苦难农民。

西晋统一不到十二年，朝政即乱。共历4帝、52年便覆灭。遗老遗少南渡长江，建立东晋政权，继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本来就很低下，这一群敲骨吸髓的统治者掌管这片土地，普通民众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此时距离班超经营西域不过200年左右，为什么这短短一两百年间，社会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除了魏晋僭主政权的功劳外，还有一部分责任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东汉政治风气尚文抑武，那时还没发明相对公平的科举制度，政府官职逐渐被门第大族所垄断。士子们入官和晋升，不靠能力才学，而靠权贵门下、名利场中的社交知名度。流风所及，士子们从那时开始便逐渐形成了修饰容貌、涂脂抹粉、崇尚玄谈的风气。

国家本是民族所组织的治理机构，对内实施社会治理职能，对外实施安全防御职能。到晋代，国家领导集团已经腐化，对内只有统治和剥削，而无从实施有效的治理，对外则文弱怯懦不足以御敌。神州陆沉、国家毁灭，乃是势所必至了。

五胡乱华之初的社会形势

两汉以来，中原不断与西北蛮族作战，战后基于“怀柔远人”的观念，把

投降的部落迁入塞内，与华夏杂居。魏晋之际，北方又有一些少数民族内迁，他们在中原居住，大多成了国家的编户民，但仍保持聚族而居，与汉族有许多往来。这一多民族杂处的局面，是春秋之后首次出现，很像欧洲社会的情形。

长城以外，还有柔然、契丹等民族，伺机南窥。

中原经过汉末战乱，人口剧减至不到一千万。诸胡与汉族的人口比例，已经有很大变化：汉族的比重大为降低了。西晋江统说：“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

此时汉族统治集团已经极为腐化，加之连年大旱，百姓饿殍遍野。晋建政后，用王室成员镇守边疆，各自封地建政，实质上倒退到秦以前的封建制度，这导致了武力争夺政权的“八王之乱”，诸王带兵相互残杀长达16年之久。

天灾人祸交加，华夏族已虚弱不堪。主体民族既然衰弱，乱局自然发生，于是有五胡乱华。五胡，指的是匈奴、鲜卑、羯、羌、氏（氐）。

鲜卑源于东胡，当南匈奴内迁，北匈奴西遁之后，鲜卑人于是占有了匈奴故地。中、东部鲜卑的慕容氏、宇文氏、段氏渐强，都卷入了西晋末年的动乱。羯人高鼻、深目、多须，实行火葬，信奉袄教，可能源于西域胡人。他们原是依附于匈奴的部落，随匈奴进入中原定居。氐族是一个世代生长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山地部族，东汉时开始陆续内迁。对西晋首先发难的是氐族——李特流民起义和羯、羌的小规模反抗，然后是匈奴贵族的起兵。公元304年，匈奴人刘渊趁西晋社会混乱之际，举兵而起，建国号名“汉”，兵锋指向首都洛阳。

匈奴在西汉、东汉军队四百年来的不断打击之下，已经分化。一部分向西溃逃，逐渐经中亚进入（杀入）欧洲。剩余的部分归降汉朝，在中原附近划定的区域居住。此时的西半球，西迁的匈奴人部落，正在亚欧大草原上驱赶着日耳曼人向西，后者像滚滚波浪一样冲向罗马帝国，并将罗马帝国逐步蚕食。而居住在中原的匈奴人，此时已部分汉化，例如刘渊父子就粗通儒学，刘渊的侄子刘曜还擅长书法。

匈奴兵一起，士大夫纷纷变成缩头乌龟，“衣冠之士无不变节，未有能以大义进取者”。公元311年，匈奴兵攻陷了洛阳，掳走晋怀帝，杀太子司马诠、宗室、官员及士兵百姓三万余人，并挖掘陵墓焚毁宫殿，这一年正是晋怀帝永嘉五年，史称“永嘉之乱”。

屋漏偏逢连阴雨。永嘉之乱后，北方多个地区又爆发了蝗灾，蝗虫所到之处，“草木及牛马毛皆尽”。随后盗寇四起，“百姓又为寇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饥荒、瘟疫流行，老百姓甚至卖儿卖女。

公元 316 年（建兴四年），匈奴攻陷长安，西晋政权灭亡。

从 304 年匈奴贵族刘渊称汉王起，北方地区进入了政权不断更迭的阶段（见图表）。史称十六国，而实际上存在过的大小割据政权有 23 个。这一期间，战乱相继，屠戮酷烈，社会经济文化又遭到严重的破坏，人民苦不堪言。长安、洛阳两大帝都，几乎成为布满荆棘的荒土。

十六国简表

朝代名	起讫年	创建者	国 都	灭于何朝何国
汉（前赵）	304~329	刘渊，刘曜	左国城（山西离石北）；长安（西安）	后赵
成汉	306~347	李雄	成都	东晋
前凉	317~376	张轨，张寔	姑臧（甘肃武威）	前秦
后赵	319~351	石勒	襄国（河北邢台）；邺（河南安阳北）	冉魏
前燕	337~370	慕容皝	邺（河南安阳北）	前秦
前秦	351~394	苻健	长安（西安）	后秦
后燕	384~409	慕容垂	中山（河北定州）	北燕
后秦	384~417	姚萇	长安（西安）	东晋
西秦	385~431	乞伏国仁	苑川（甘肃榆中东北）	夏
后凉	386~403	吕光	姑臧（甘肃武威）	后秦
南凉	397~414	秃发乌孤	乐都（属青海）	西秦
南燕	398~410	慕容德	广固（山东益都）	东晋
西凉	400~421	李暠	酒泉（属甘肃）	北凉
北凉	401~439	沮渠蒙逊	张掖（属甘肃）	北魏
夏	407~431	赫连勃勃	统万城（陕西横山西）	吐谷浑
北燕	409~436	冯跋	龙城（辽宁朝阳）	北魏
代	338~376	拓跋什翼犍	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	前秦
冉魏	350~352	冉闵	邺（河南安阳北）	前燕
西燕	384~394	慕容泓	长子（山西长治）	后燕

其中，羯族石勒、氐族苻坚以及鲜卑拓跋部所建立的政权曾经基本上统一北

方地区，但最终又复归于瓦解。

亡国丑态与衣冠南渡

公元311年，刘曜攻陷洛阳，怀帝被虏。5年后，愍帝建兴四年，刘曜攻陷长安，愍帝出降。自此西晋覆灭，中国分南、北部。

晋统治集团当了俘虏之后，其惨状与丑态，令读史者唏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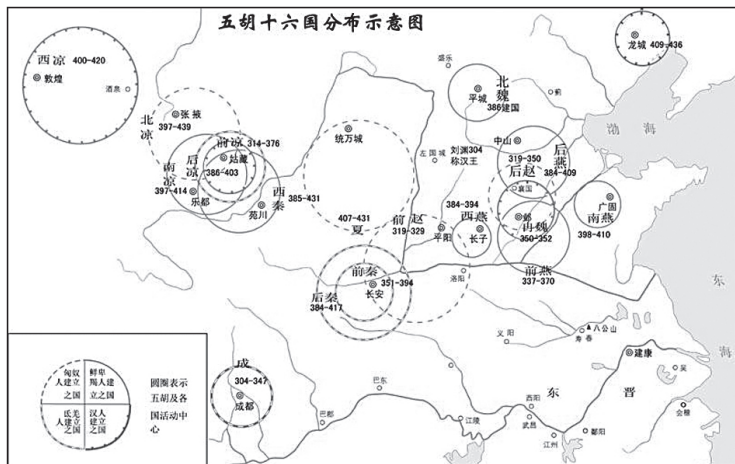
晋怀帝被俘后，刘聪（刘渊第四子）封他为“会稽郡公”。刘聪想起年少时曾前往拜见的往事，从容说道：“昔日你还当豫章王时，朕与王武子（王济）曾经一起前来造访，还记得否？”晋怀帝回答：“臣安敢忘？恨当时不早识龙颜。”刘聪说：“卿家为何骨肉相残？”（指八王之乱）晋怀帝回答：“为了给陛下您扫除障碍，这应该是天意。”

另外还有，刘聪命令怀、愍二帝在正月朝会上穿青衣，作仆人，负责为来宾斟酒，有晋朝旧臣当场失声号哭。刘聪出猎，令愍帝戎服执戟为先导，百姓围观指点说：“此故长安天子也。”家国之痛浮起，百姓多有痛哭者。

皇后羊献容被俘后，刘曜纳为妾，问曰：“我跟司马家儿相比，怎么样？”羊皇后答：“怎能相提并论？陛下是开基之主；司马氏是亡国之暗夫，连家人都不能保护。妾还有何不知足？妾生于高门（尚书右仆射羊瑾孙女、尚书郎羊玄之女儿），原以为世间男子皆然。自侍奉陛下，才知道天下有大丈夫。”

再看“名教”教育出来的大臣。

刘渊部将、羯族领袖石勒俘虏了晋大臣王衍，问晋往事。王衍陈述晋政权祸



五胡十六国分布示意图

败原因，并为自己开脱说国家政策不由他制定，又表示未参与国家核心机要，随机劝石勒称帝。王衍本是晋朝重臣，石勒怒斥他推卸责任，下令处决。王衍成俘虏后，又曾后悔当年不努力，否则不至于如此下场，然而悔之晚矣。

庾敳、胡母辅之、郭象、阮修、谢鲲等人都是当代名士，曾与王衍同在晋东海王司马越军中。他们皆崇尚玄虚，不理政务，纵酒放诞。司马越军败，一同被俘虏。石勒道“此辈不可加以锋刃”，遂夜间使人推墙杀之。

北方政权被摧毁后，晋王室的遗老遗少、门阀士族们纷纷逃亡，南渡长江，在建康（今南京）组建东晋政权，史称“衣冠南渡”。

东晋王室，依赖豪门大族支撑，最终气数奄奄，权臣篡权，各建国号，演化出宋、齐、梁、陈小朝廷相继替代的局面。这几个小朝廷，除了刘宋略出彩外，苟安偷生、奢靡浮华、腐败弄权的气质一脉相承。

东晋南渡，自元帝至恭帝共103年。其后宋60年，齐24年，梁56年，陈33年，共170年为“南朝”。北方的诸政权相应地被称为“北朝”。

衣冠南渡之后，北方继续混战，而南方秩序基本稳定。逃亡而来的遗老遗少们，又继续醉生梦死。江南此时的风气与西晋时无异。

北军压至长江边，南朝将领褚湛之让儿子穿草鞋跑步锻炼，竟然受到全社会讥笑嘲讽，儿子感到抬不起头；武将张世兴的儿子张欣泰，喜欢隶书、爱好文史，害怕骑马、无力拉弓，有朝中大臣闻之惊喜。

后来“侯景之乱”时，羯族人侯景（此公自封“宇宙大将军”）纵兵抢掠建康，士族们“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连逃跑的能力都没有，死者相枕藉。侯景以区区万把兵马蹂躏富庶的江南，竟至于“千里绝烟，人迹罕至，白骨成聚，如丘陇焉”。^a

建康令王复，性格儒雅，从未骑过马，逃亡时，见马嘶喷跳跃，大为震骇，说：“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b

豪门大族如此，皇室也不例外，南朝盛产变态皇帝。南朝宋皇帝刘昱，喜欢虐杀为乐，用大铁锤破人睾丸，左右有皱眉者，他一矛刺穿其肩胛骨。其他皇帝们，又有喜欢入庙偷香的，给母亲配备壮男、给妹妹配备帅哥淫乐的，又有喜欢看皇后与数十男子一起淫乐的，有嗜钱如命的，有纠集贵族恶少黄昏时上街抢劫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这种风气下，有个别杰出的将领（祖狄、桓温、刘

a 《颜氏家训》。

b 《颜氏家训》。

裕等)想收复北方,并一度取得战果,但是无法获得苟安小朝廷和享乐大家族们的战略支持,最终不能成功。

移民的流动,带着原有的文化一起流动。所以中国历史上南逃的小朝廷,都完整地继承了原来的种种流弊,无法自我改革那致败的基因,最终免不了灭亡的命运。后世的南宋、南明皆然。

相继举兵争权:北方的混战

话分两头。衣冠士族们南渡逃亡之后,北方继续混战。五胡相继举兵而起,北方所有人都被卷入了争夺统治权的相互厮杀。

在匈奴之后起兵的是羯族,其领袖名石勒。石勒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在战争中逐渐出头,成为匈奴刘渊的部将,在与晋、刘汉叛军、北方鲜卑部落的经年血战中,实力愈发壮大,后杀刘曜自立,建国号“赵”,在辖区内实行“胡汉分治”。

石勒南北征战,胜多败少。对他威胁最大的是“闻鸡起舞”“击楫中流”的东晋名将祖逖。祖逖艰苦经营,一度牢固占据黄河以南地盘。石勒被迫与之修好。但祖逖无法获得苟安的东晋政权支持,不久忧愤而死。石勒遂继续壮大,在北方公开挑战匈奴政权,最终在匈奴人起兵 25 年后将匈奴族全数剪灭,一度统一北方。

数十年后,羯赵政权发生内乱。

冉闵(汉族)本是羯赵政权下一员猛将,因受疑忌,国恨家仇交织,于是索



冉闵, 350-352 年称帝, 国号魏, 史称冉魏

性自立。冉闵在邺城下令:愿听令者留下,不愿者自行离去。结果羯族人纷纷离去,致道路堵塞;而方圆百里之外的汉族人纷纷汇聚而来。冉闵见民族间的仇恨竟如此深刻,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当时羯族统治者十分残暴。例如石勒的长孙,曾把美女的头割下来,洗净后放在盘子里,传阅给宾客取乐。石勒的继任者石虎强征百姓入伍,又横征暴敛,导致上吊自杀的民众挂在树上,沿路不断。

冉闵决意以武力铲除胡羯,涤荡胡乱。又打算联合东晋政权,以汉族人组成联军驱除胡虏,对冉闵发出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吁,

江南的东晋政权打着争夺“皇权正统”的小算盘，不予响应，只作壁上观，坐等拾取胜利果实。

冉闵独立作战，下“杀胡令”，经惨烈战斗，胡羯死者二十余万，石虎三十八孙全部被杀，羯族基本整体灭亡。公元352年冉闵灭后赵时，令汉人、胡人各归本土，“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掠杀”，结果回到家乡的只有十之二三。

冉闵作战从不退缩，十分惨烈，连年作战虽不断获胜，但军力消耗严重。

此时，东北的鲜卑、西北的氐族，都悄然崛起，南下进犯中原，一路扫荡前进。鲜卑慕容氏（鲜卑分支之一）大军南下，与冉闵部队遭遇，冉闵部被包围。冉闵单枪匹马突围，奔驰二十多里之后，他所骑的千里马突然死亡，冉闵被俘。

永和八年（352年）五月初三日，鲜卑首领慕容儁把冉闵送到龙城，并在遏陁山将其斩杀，据《晋书》记载，杀冉闵后，山左右七里草木全部枯萎，蝗虫大起，自五月起天旱不雨，直至十二月。慕容儁后派使者前往祭祀冉闵，谥号为武悼天王，当天降大雪。这种天象灾异是巧合还是感应，我们无从得知。但慕容氏之所以祭祀冉闵，主要是考虑到他在当时极受汉族人拥戴。

来年就是永和九年，那年春天，王羲之写下了不朽作品《兰亭集序》。王羲之在文章当中描述的是一派惠风和畅的景象，对比北方的腥风血雨，真有天渊之别。

在北方，氐族军队已经横行中原。370年，氐族大军摧毁了鲜卑慕容氏的“燕”政权，然后荡平“凉”等小型政权，逐渐统一了北方，建立了新的政权“秦”，史称“前秦”。此后整顿兵马，准备南下统一中国。

氐族入中原既久，逐渐接受中华文明影响。首领苻坚自幼生长在中原，此时已经是一个虔诚的儒家文化信徒。他相信用圣人所提倡的仁德能感化一切人，因此对异族军马无不好意安抚，很少加以防范。真诚的他没有料到，这将会给他带来灾难。

383年，苻坚亲自率领各族联军，浩浩荡荡南下，准备渡江消灭东晋政权，武力统一中国。南方东晋王朝此时正是谢玄执政，几年来重新练就了一支新军。

双方的战役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淝水之战在历史上很关键，如果北方打胜了，苻坚的氐族政权就能一统中国，类似于后世元朝征服南宋；如果南方打胜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就可以稳固。

东晋军队进至淝水，要求北方军队后退，以便渡河决战。苻坚企图乘晋军渡

河时攻其不备，便下令后撤。不料他的多民族联军是一群典型的乌合之众，一退竟然无法收场，各自趁机大溃逃，兵败如山倒。

淝水战败，氏族前秦政权威望丧失，北方政治秩序顿时土崩瓦解，鲜卑、羌族举兵而起，汉人也不断发生小规模起义（但都达不到之前冉闵所组织的规模）。南方的胜利赢得了长期的和平，南北对峙的局面由此形成。此后的一百多年中，南方北方谁也没有能力把对方彻底吞并。

最终，实力较强的鲜卑拓跋部灭西夏、北燕、北凉，荡平各方，建立北魏政权，统一了北方——花木兰的故事，应该就发生在这一时期鲜卑征伐柔然的战役中，所以《木兰辞》中有“可汗”之类称谓。

在江南发生小朝廷相继篡权更替的时候，北方的鲜卑北魏政权却岿然不动约一百年。

北魏在当时的世界上很有影响力，几乎成了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令西域、中亚乃至天竺（印度）诸国闻风而拜。北魏使臣去西域、中亚、天竺出访，所到之处如果国王不下跪，往往当面斥责^a，其国际地位可见一斑。北魏朝在文化上也颇有自己的特色，今天看到的龙门石窟、魏碑体书法，都是北魏文化的遗存。

鲜卑拓跋政权汉化程度很深。根据《洛阳伽蓝记》中的描述，他们的诗词歌赋衣冠礼仪，甚至比江南还要讲究——除了统治者姓拓跋以外，几乎是一个纯正的中华政权了。到后来鲜卑统治者索性连“拓跋”的姓都改了，改姓汉姓“元”。

一百余年后，北魏政权发生内部分裂，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相互敌对。而此时的更北方，突厥已经崛起为一个很有作战能力的大部。西部分（北周）最终灭掉东部分（北齐）后，北击突厥、南灭陈国，即将一统天下。而隋朝已经孕育在强大的北周政权之中了，一个统一的盛世即将诞生。

灭亡与同化：诸胡的结局

总体来看，经过这一场残酷的生存竞争，当时的诸胡或被战乱所消灭，或被汉族所同化，只有极少数生存到了今天。

- 匈奴：主体在东汉时期被汉人消灭，剩余部分西逃至欧洲，与马扎尔人融合，构成今天的匈牙利人。残余部分在五胡乱华时代被羯族整体消灭殆尽，

^a 《洛阳伽蓝记》记载天竺某国王接北魏国书不跪拜，北魏使者大为诧异，予以质问，可见跪拜是常规。

剩下的少部分被汉族同化。

- 乌桓和鲜卑：东胡秦时被匈奴灭亡，之后分成两大部分：乌桓和鲜卑。乌桓被曹魏消灭；鲜卑主体被汉族同化，剩余的残部归为柔然，总之消亡。
- 柔然（蠕蠕）：被突厥击败，分化为室韦（蒙古）和契丹（一说分别加入了室韦和契丹，总之消亡）。
- 氐：五胡乱华时代大部分被消灭，剩余部分被汉族同化。
- 羯：被冉闵下令一次性屠杀 20 万人，导致羯族基本灭绝。
- 突厥：此族有可能是匈奴或者丁零的一个分支（当时人数极少，总共只有几万人，且没有文字，故其祖先难考），南北朝末期才忽然崛起，灭亡了柔然，其自身的主体在唐朝被回鹘和华夏所灭，剩余的向西奔逃，形成了今天的土耳其人。
- 羌：一直生存到今天，汉化程度很深。羌族的余部吐蕃，即今天的藏族。

当时诸胡之间也相互敌视、相互鄙视、相互残杀，北方成为各少数民族枭雄逐鹿中原的战场，留在北方的汉族人则像羊一样任人宰割，成为异族的奴隶^a，命运极为悲惨，只有冉闵组织了一次有效的反击。

民族融合与中华文明扩张

诸胡进入中原与汉族混居后便迅速汉化。

氏族领袖苻坚是一个虔诚的儒家文化信徒，他按照儒家的理想推行了不少仁政。如何治理一个混杂的多民族国家问题上，他相信圣人所说的仁德，可以感化一切对手，实现天下大同（不过最终酿成失败）。

《资治通鉴》载：魏入中国以来，虽颇用古礼祀



龙门石窟北魏孝文帝礼佛图浮雕

^a 正如高欢对鲜卑士兵的训话：“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何以陵之？”又北齐、北周骑兵作战，每驱汉民为肉篱。

天地、宗庙、百神，而犹循其旧俗，所祀胡神甚众。（司徒）崔浩请存合于祀典者 57 所，其余复重及小神悉罢之，魏主从之。

宗教与神祇，本是一个民族的核心文化认同，北魏政权竟然下令一举废弃，由此可见鲜卑拓跋部汉化程度之深。

北魏政权曾有元宏（拓跋宏）全盘汉化的改革：禁止使用鲜卑族的语言文字，一律改说汉语；禁止穿鲜卑族的服装，一律改穿华服；鲜卑姓氏一律改为汉姓，自己以身作则，首先将拓跋姓改为元姓，如此等等。

也有一些汉族“胡化”的现象，例如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部后，两边的执政者高氏以及宇文氏，都推行了一些鲜卑化的政策（高欢在血统上是汉族人，但自视为鲜卑人，在他看来，汉儿是懦弱无能的代名词。华夏族的沦落，亦可惊矣）。当时的北方，学习鲜卑语一度掀起热潮。但总体来看，“胡化”现象不构成主流。鲜卑语这一官方语言，在隋朝之后就彻底消亡了。

根据历史书描述，华夏族与周边的游牧民族，经过历史上几次大的民族融合，形成现代中华民族。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这样一次典型的民族大融合时期。但民族融合的程度如何，传统史书无法定量描述。但随着科学的发展，现在基于对线粒体 DNA 的生物统计学分析，可能会颠覆人们的原有印象。现代人类遗传学学者们通过对古代墓穴骨骼采样进行研究，获得了许多新发现。有一些研究表明，当代汉族与 3000 年前的汉族人口（如秦始皇陵劳工墓人群等），遗传基因基本完全一致，而匈奴、鲜卑等族对遗传基因的影响，却微乎其微。鲜卑曾长期统治中国北方，但民族血统混合的程度看来并不像以前想象中的那么大^a。

公元 581 年，北周国戚、重臣杨坚替代北周皇帝自立，建国号隋。这虽然也是篡权，但在人们心中，这跟司马氏的篡权性质却大不相同：这次帝位更迭，标志着正统的恢复。

杨坚本人是文武双全的一代英主，他很快整顿秩序，然后挥师消灭陈朝，一统天下。陈后主陈叔宝所写的《玉树后庭花》，成了有名的亡国之音。

在杨坚的领导之下，中国古来的立国精神一一恢复，一个盛世即将来临。

a 《汉族起源与发展的遗传学探索》，载《吉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 年第 4 期。

第十一章 隋唐：帝国的正午

南北朝末期，一天，西魏丞相宇文泰率军狩猎于龙门。正寻猎之时，林中突然窜出一头猛兽，众军士张弓欲射，只见一个黑影窜上去与猛兽肉搏。经过一番惨烈搏斗，此兽竟然被牢牢制服，众人定睛看时，发现这名勇士正是将军杨忠。宇文泰拍掌叫好，当即赐他字“擒于”（音“掩于”，鲜卑语“猛兽”之意）。

不仅是杨忠，连同他身后这支军队，他们威武的阵形弥漫着浓烈的尚武之气，那是一种自东汉以来便已耗散殆尽的精神。数十年后，他们的后人正是凭着这股精神开创了一个极盛的时代。

杨忠的儿子名杨坚——那时还叫“普六茹·坚”，“普六茹”是鲜卑姓氏，长辈则称呼他的鲜卑语小名“那罗延（金刚不坏）”——他少年时便沉静肃穆，成年后气场极大，连北周的鲜卑族皇帝都觉得在他面前无法自安。

北周皇帝宇文邕在防范权臣坐大，而杨坚要积攒力量自保。气运站在杨坚这边，他不但数次涉险过关，还在这一场博弈中最终胜出，竟有实力取代北周皇帝而自立。

公元581年二月甲子日，北周静帝最终下诏宣布禅让，杨坚三让而受天命，即皇帝位于临光殿，定国号为大隋，改元开皇。自南北朝结束后的三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隋唐时代。隋唐在制度、经济、文化各方面几乎完全一致，故后世常常合称。这一时期，国家重新统一，帝国步入了最辉煌的正午。

隋唐共历326年，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期一百多年强盛繁荣，后期逐渐衰落。

在整个中国史上，隋唐的地位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两代以自身的强盛书写了一部大国崛起的传奇，而此时开创的一整套体制设计、文化思想，也大多流传后世，为近世千年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代，南北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隋朝立国短短20年，人口已达4500万，耕地5500万顷，“资储遍于天下”。而唐经战火而立，经过贞观、开元两次盛世，人口亦达5000多万，富庶繁华冠绝世界。

此时，长安、洛阳已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商品流通频繁，外贸发达，唐朝的GDP一度占到当时世界的60%。经济社会繁荣带动了科技进步，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和火药也出现在这时。

唐朝承继周隋传统，时人也一改南朝萎靡之气，变得自由奔放，积极昂扬，文化艺术上遂成光辉灿烂的盛唐气象。而在尚武精神的驱动下，隋唐先后北逐突厥，东进朝鲜，西征中亚，连续百年保持对外优势。

从当时的世界来看，文明古国埃及、印度早已湮没无闻，强盛的罗马帝国也已毁灭，中世纪的欧洲暗淡无光，只有西亚阿拉伯帝国堪与大唐抗衡。唐朝既是文明先进的超级大国，于是万邦纷纷来朝，大唐的国际威望达到新的高度。

回首隋唐，历经四百年衰乱洗礼的华夏族之所以能重新崛起，主要在于古来立国的理念，包括天下为公的精神、士族集团以及尚武精神在此时全都复活了。但是，唐虽强盛百年，却遭安史之乱而衰。安史之乱的爆发：一是由于承平日久，民族忧患意识丧失；二是体制僵化，调控失衡。当然根本原因实乃人治。

中唐以后，国势衰微，伴随的是开放包容之气的消弭。到了五代两宋，整个民族更趋内敛保守，而北方的契丹、靺鞨（女真）、党项却趁势而起，并陆续南下建立征服性王朝，所以，唐朝后期的变迁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历史格局。

以下为隋唐史的大致脉络。

杨坚代周灭陈：其兴也勃焉

三国末期，全国人口不到1000万，经过魏晋南北朝400年时增时减的波折起伏，迄隋时全国人口约为2000万。历经血火淬炼、弱肉强食的考验，北方迎来新生，而南朝依旧萎靡消沉，北强南弱成为定式。

西魏时代，宇文泰依靠武川（今内蒙古武川县，北魏为防柔然在此设了军镇）军人，融合关陇豪强组成了胡汉杂糅的关陇军事集团，这是门阀社会后期一股著名的贵族势力，它构筑了周、隋、唐三朝的根基。北周宇文氏借助这一集团，统一北部中国，而统一的隋王朝也即将在此基础上诞生。

杨坚称帝标志着华夏正统再度确立。普六茹·坚掌权后恢复汉姓“杨”，并让宇文泰鲜卑化政策中改姓的汉人恢复汉姓，连宫廷音乐都加以改革，恢复“华夏正音”。

隋朝初立，南存陈国，北有突厥。南陈较为弱小，而突厥占据草原，不时南窥，成为隋朝首要大患。

突厥姓阿史那氏，有自己的文字。由于早期的史料太少，史学界至今也无法弄清它的来源。仅有的史料表明，在南北朝后期，其部族已迁居金山（今阿尔泰山）为柔然族锻铁，被称为“锻奴”，总人数不过几万人。此后，其首领阿史那土门在一次遭遇战中击败并吞并高车（铁勒）部落5万余帐共计20多万人，然后将这些人马收归己用，势力陡然壮大。北方各游牧民族中，突厥最为凶悍善战，遂雄踞漠北而成北方盟主。隋的前身北周、北齐均向它低头纳贡。

突厥不时寇边，令隋文帝杨坚颇为忧虑。这时，长孙晟（唐朝重臣长孙无忌、太宗长孙皇后之父）提出一个制服突厥的策略。他因多次出使北方，深谙突厥虚实，遂建议“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大意是用和亲拉拢分化突厥贵族，继而各个击破。隋朝坚定推行这一政策，果然逐渐挫败突厥，而后使之分裂。

北方稳定后，隋朝兵锋转向南陈。

开皇八年（公元589年）冬，文帝倾52万军队南征，大军势如破竹，一举攻下建康。城破之时皇帝陈叔宝携妃躲入枯井。隋军搜寻未果，听闻井里有声，叫喊几声却无人应答，遂威胁向下投石。此时，下面断断续续地传出求饶声。士兵投下绳索，拉上来的除了陈叔宝以外，还有皇后和贵妃二人——后主就这样戏剧性地被活捉了。

全国统一后，新国家建设随即展开。文帝先后整理户籍，均分土地，发展生产，隋朝很快强盛。汉朝经高、惠、文、景四帝六十年，到武帝才达到繁盛，但是隋朝统一之后很快即已富足。隋文帝执政期间，人口数量快速增长，达到4500万。隋朝政府在洛阳附近建设了几个巨型粮仓，里面堆满了可供百万人长期食用的粮食。到文帝退休之时，政府的储备多到难以计量，到了唐朝贞观年间，马周还对唐太宗李世民谈到：“隋家西京府库，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

文帝又综合秦汉以来官吏选拔和中枢体制，创设了科举和三省六部制。

科举以考试选拔人才。魏晋以来实行九品中正制，但在世家大族的权力垄断下其机制早已失灵。科举的实行促进



南陈后主陈叔宝

了各个阶层的人口流动，让底层的人更多地参与到政权中，统治基础得到扩大，门阀亦被削弱。科举绵延千余年，到清末才被取消，影响甚至流及国外（如英国19世纪的文官制度亦参考此制）。

三省六部是在中央设立中书、门下、尚书三机构，分管起草、审核、执行诸事，再在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实施。三省六部因为分工明确，施政效率提高，成为历代中枢设计的模板。

这一时代，经济社会重回轨道，史称“开皇之治”。

隋朝国祚短促：其亡也忽焉

文帝在位24年而死。此后，次子杨广继位，也就是著名的隋炀帝。

隋炀帝雄心高迈却又暴虐无常，和秦始皇有几分相似。秦王东征六国适逢而立，而他领军伐陈，才年方二十。隋炀帝好大喜功，也严重透支了全国人力。

他役使天下民力的程度，从以下数字可见一斑：

当时全国人口总计4000多万，男的占一半。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他刚上台便下令营造洛阳作为东都，每月征发丁夫高达200多万。东都完工之后，开凿大运河又被提上日程。这一工程耗时六年，征集民工又是数百万，期间男丁不足，连妇女都被役使。待运河凿通，又建造巨型龙舟巡游，拉船的船夫就有8万人之多，锦帆浩荡如云，其奢华程度令人震撼。

而每年外商、使者聚集洛阳之时，为了炫富，他下令招歌姬三万，在端门外摆场唱戏，戏场绵延数里。嘉年华通宵达旦足足搞了一个月，花费巨万。又下令首都酒店统一装修，对外商殷勤招待，并宣传：中国富有，酒食免费供应。大街小巷，更以绸缎缠树。老外感到很震撼。不过也有个别老外感到纳闷：“中国穷人不少，人尚且穿不暖，咋还将丝绸缠在树上呢？”接待人员“惭不能答”。^a

隋炀帝为了征高句丽，下令在山东打造300艘巨型战船。督促急迫，工匠昼夜站在水中赶工，以至于造船工人腰部以下都腐烂生蛆，死的人有十之三四。如此繁重的徭役逼迫之下，百姓纷纷自残，残肢竟然被称为“福手”“福足”。

然而，隋炀帝依然无视民怨。大业八年（612年），他率领水陆113万大军东征高丽，但劳师远征却落得大败，数十万陆军仅有不到3000人生还。辽阳丧师之后，国内反抗力量蜂起，帝国根基动摇。绝望的炀帝却掩耳盗铃，转而巡游

^a 《资治通鉴》。

四方，图个一时痛快。

公元618年，炀帝游至江都，局势更加恶化。自知时日无多的他醉生梦死，终日沉沦。随行卫士久客羁旅，思乡情切，共推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炀帝被弑，短暂的隋帝国宣告灭亡。

炀帝死后由萧后草草埋葬，葬地几经迁移，破败荒芜竟不为人知（后世屡有考证，均系错认）。2013年人们在扬州西湖镇发现一处古墓，学者据其墓志和随葬品判断墓主正是杨广，这才还原真相。一代帝王生前好大喜功，死后仅葬于无名寒酸之地，令人唏嘘。

其实隋炀帝本人并非一无是处，他出身贵族，既具有贵族的严重缺陷（视民众为草芥），也具有贵族的一些优点。他本人极具才华，少时即“好学，善属文”，常与虞世南等同游，“以师友处之”。后坐镇江都，又“置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成书万七千余卷”。他深沐南方文学之风，40多首诗作被录入《全隋诗》，自己还曾豪言：“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

另外，作为古今第一包工头，他开凿运河的做法历来为人诟病。但京杭大运河实具有巨大价值。千余年后，运河申遗成功，也算是对炀帝的一种肯定了。

隋唐轶事：李氏家族的非同寻常及李唐血统之谜

隋末，全国陷于四分五裂。中原有李渊、李密、杜伏威、窦建德、王世充等数支势力相互竞争；塞北，突厥虎视眈眈，时有南下之意。20年的动乱之后，黄河下游已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人口由4500万锐减到1000多万。

公元618年，隋旧将李渊袭据长安，称帝建唐。此后，经过数次兼并战，中原大小势力全都荡平。

李氏这一支，也不简单。李渊的爷爷名叫李虎，是杨忠的同事。一次随宇文泰检阅军队，忽然有豹子跳出，李虎立即上前一棍打折了豹子的前腿，豹子疼得在地上打滚，但仍张牙舞爪，士卒不敢上前。李虎见势一跃骑上豹子，右手摀住顶瓜皮，左手挥拳做武松状，还笑问宇文泰：丞相，你要死的还是要活的？

杨李两家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不仅先世同为关陇军人集团重要成员，而且还有姻亲关系（李渊之母是杨坚的独孤皇后的姐姐，李渊也就是杨坚的外甥，与杨广互为表兄弟。李世民娶了杨广的女儿，也算得上是杨广的女婿）。所以隋唐的改朝换代可以看作同一集团内部权力交接，只是政权换了姓而已。

易代之际风云变幻，《隋唐演义》等评书小说已经充分展现了这段历史的精

彩，只是这些演义小说戏说成分很大，不能全当做信史来看。如李元霸，传为隋唐第一英雄，善使双锤，力大无比，其实是演义里虚构。其原形为李玄霸（唐高祖李渊第三子），16岁就早逝。还有“四猛十三杰”的传说，也属杜撰。

而李渊这个人，历史上面貌一直都很模糊，似乎有点庸庸碌碌。其实李渊绝不庸碌。当年周武帝外甥女窦姑娘出嫁，采取比武招亲的方式：在门屏上画两只孔雀，谁若是双箭射中孔雀眼睛，便中头彩。众多考生中，只有李渊以神射技法抱得美人归，这便是“雀屏中选”的故事。

隋末动乱，民间谣传“李氏当兴”，炀帝于是对李姓大臣加以迫害，对李渊亦不断派人监视。老李也十分狡猾，故作沉沦并申请外派，终于躲过一劫。

新旧唐书等正史，一会儿说高祖李渊庸碌无为，一会儿又赞他智勇兼备，自相矛盾。为什么会如此呢？原来是历史底稿遭篡改。太宗李世民上台本是抢班夺权，为构建自己继位的合法性，遂经常“照顾”史官的工作，如干预起居注的修纂。在塑造自己形象时，有时需要贬低老父，所以，李渊的形象便被歪曲。

真实的高祖李渊，颇有雄才伟略，起兵之时，温大雅在其幕府担任机要秘书，亲历这段历史，此后著成《大唐创业起居注》，这才是更可靠的史料。

同样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还有李氏的血统问题——他们是不是胡人？

据陈寅恪考证，“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其与胡夷混居，乃一较晚之事实也”。李氏先祖确为汉人，但发迹后多次与鲜卑贵族通婚（太宗祖母独孤氏是鲜卑化的匈奴人，母窦氏出自鲜卑乞豆陵氏），故唐朝皇帝身上带有一些鲜卑血统是无疑的。

正唯如此，唐朝时胡风盛行。

比如太宗长子李承乾，曾令下人扎胡发、穿胡服、说胡语、跳胡舞，自己还在宫内搭起毡帐，自封可汗，经常杀牛宰羊，聚众狂欢。玩高兴了，还装死让众人按胡族仪式围着他号啕大哭。他甚至浪漫地幻想，如果自己做了天子，要率万骑远赴边疆金城，做一个自由的突厥人。此外，李家不重纲常伦理，唐太宗占兄嫂、弟媳，唐高宗封父亲的才人武则天为后，五十多岁的唐玄宗强纳儿媳杨玉环，这也和北方民族的粗犷风俗有关。

但李唐王室，也因此全无东汉以来优柔文弱的贵族习气，变得风华卓著而武功赫赫，当时的朝中大臣也都是能文能武的军人集团，即所谓“出将入相”。风气所及，唐朝的精神风貌与魏晋时期已有巨大变化。唐朝的诗歌已没有优柔艳丽之气，而是慷慨豪迈、意气风发，唐朝的书法也不再是南朝那种流利精雅、金枝玉叶，而是肃穆端庄、雄浑强健、激情澎湃。

贞观政治：重振士的精神

唐定鼎中原后，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射杀自己的哥哥太子和弟弟齐王，同年继位为帝，是为太宗。

太宗本人虽是夺位称制，但继位以来文治天下，优待士人。在他执政期间，古老的士族集团复兴了，并成为大唐繁盛的中坚力量。比如魏征曾在太子李建成府中担任参谋，政变以前力劝太子除掉太宗。但是太宗上任，惜才如故，并没反攻倒算，反而予以重用，魏征倒也不负所托，成为有名的谏臣，这一时期的名臣还有房玄龄、杜如晦、王珪等。

此时，以天下为己任的士的精神也复活了。当时太宗有意让皇族与勋臣官职世袭，“非有大故，无得黜免”。长孙无忌被封为赵州刺史，改封赵国公。但他却将国家利益置于家族利益至上，和房玄龄一起上表陈述世袭刺史制度之大弊，太宗顿时醒悟，遂停止分封。

纵观太宗朝，中央官员最少时仅有 643 人，而全国也就 7000 余人，几乎成为历代最精简的政府。太宗将小政府的治理模式发挥到极致，既考量了行政成本，又兼顾施政效率，适应了建国初期民生凋敝的国情。

贞观君臣齐心协力，“善治”局面逐渐形成。

当时政治清明，“官吏多自清谨”，贪腐现象很少。“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豪强地主不敢欺压百姓，人民安居乐业，犯罪率很低。贞观三年，全国被判死刑的也就 29 人。太宗特恩，准许囚犯回家处理后事，次年秋天再回来，结果犯人全都如约而至，无一逃跑。

这一时期经济恢复，物价低廉，一斗米不过三、四钱^a，一斗米价值万钱的战乱时代，已



唐太宗李世民像

^a 贞观年间经济是否繁荣，学界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所谓贞观经济繁荣纯属粉饰。此处篇幅所限，简单援引《旧唐书》，未加考辨。

经恍如隔世了。平时盗贼罕见，家家夜不闭户，旅行之人不用带太多干粮，一切供给都可以在路途中获取。

对唐初的百姓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时代，即便偶有灾害和困难，他们也“未尝嗟怨”。不过从财政角度来说，太宗朝未必有隋朝富裕。隋末中原大乱，唐初的人口还不及隋盛时的一半，民户凋残，“百不存一”，高昌国使者入贡时“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故言盛世不免夸大。另外，太宗初期留心治国，但后期骄奢起来，“行游”“修造”不断，还远征高句丽不遂，可见贞观政治也是虎头蛇尾的。

玄奘的高僧之路：“留学”19年，推进佛教繁荣

南北朝以来，社会动荡，佛教成为下层民众的寄托，故而快速盛行。入唐以来，中外佛学交流益加密切。

武德九年（626年），印度僧人波颇来到长安，传播大师戒贤（传为印度第一高僧）的学说。当时长安的一名叫玄奘的和尚，听其讲座后对天竺（印度）圣地心生向往，又听说那里藏有宏富的佛经典藏，于是决定不远万里去求法。

当时唐朝初立，法令禁止国民私自出关，但玄奘毅然决定偷渡出境。果然，政府得知消息，沿途关卡遍贴缉捕令。几经磨难后他终于出国，到达高昌时，国主麴文泰对他颇为礼遇，欲强留国内宣扬佛法，其计划差点再次夭折。玄奘无奈，绝食明志才得以西行。

辛苦跋涉了四年，玄奘终于到达佛教圣地天竺。他的大致路线是由长安往西北方向行走，绕经中亚腹地，然后自北向南进入天竺。在天竺，玄奘走访了很多寺院，最后在当时最高级别的研究院——那烂陀寺师从戒贤大师。他谦虚、开明，追求广博渊深。后终于得到大师真传，功业日益精进，留寺担任首席教授。

经过数年的刻苦学习，玄奘终于成为名震四方的大学者。

有一次，两个国家争着要邀请他去开讲座，为了争先后次序，竟然差点开战。结果，鸠摩罗王、戒日王出来调停，让二者同时加入，将大会地点定在两国边境。当时与会的有各国国王18位，大小乘佛教徒，那烂陀、婆罗门及其他外道各三千余人，合计六千多。玄奘讲解了他原创的《真唯识量颂》，宣扬大成，并承诺，若里面有一字没有道理，请斩他以谢罪。讲座进行了十八天，各地听众无不敬服。

玄奘留学19年回国，终于获得了成功：唐太宗亲自接见，并为他开坛讲学

提供支持。玄奘自回国起就开始译经，直到死前 20 余天方才停笔，这一译便是 1600 余卷。他还创办了“法相宗”。这一派虽不如禅宗、天台宗那般强势光鲜，但翻译外来经典最多最好的，宣扬佛教最积极的正是他。



玄 译经图（局部）

其实，在他之前去印度留学的还有东晋的法显，他们都为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做出杰出贡献。不过玄奘的成绩更加斐然，空前绝后。

佛教的传入是中西文明的第一次大交流，自汉末 2000 年来，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盛唐时代，佛学在中国达到最高峰，一切都预示着华夏文明将于此时走向一个新的鼎盛时代。

唐初的拓边：丝绸之路扫清障碍，白江口击退倭国

唐新朝初立，天下疲敝、国力虚弱，四夷见此情形无不轻慢。这时，东北有高句丽，漠北活跃着东突厥，西域则为西突厥。和隋朝一样，唐的北境不时被突厥所袭扰，所以唐初的对外战争首征突厥。

突厥尽管在隋初就已分裂，但此时仍控弦百万，时谓“戎狄之盛，近代未有”。当年高祖起兵时曾修好，但太宗刚即位，突厥即毁约寇边。此次，突厥 20 万人马在颉利可汗率领下攻到渭水北岸，唐朝举国震动。但京畿兵力有限，远不足以御敌，太宗思前想后，只能布下疑兵之计，令全军广插旌旗，虚张声势。接着，太宗亲率六骑，隔着渭水怒斥颉利背约。颉利师出无名，又见唐军行伍严整，无隙可乘，便与太宗在便桥杀马盟誓，敲诈了一大堆金帛、粮食后退去。

政局稍稳，唐廷决定强势回应。贞观三年（629 年），突厥抢掠河西，太宗认为时机已到，这年秋便令李靖、李勣等统 10 万大军分道反击。此役直插汗廷，俘其人口牲畜无数。颉利败降，东突厥遂亡。突厥既败，漠北出现权力真空，四夷纷纷内附，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当日，太上皇于凌霄阁置酒庆贺，并亲自弹奏琵琶，太宗则当众起舞（唐朝的风气如此，宴会时大家都跳舞），满朝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

击败突厥的胜利是隋唐两朝共同的成果。唐代民族同化取得相当成果，实际上是以强盛的国力和武力为后盾的，再加上强大的文化向心力，华夏同四夷才能长期和平共处。

北部忧患既除，大唐乘胜经营西域。

西域之地，自汉末丧失已有四五百年。贞观年间，高昌入贡，见秦陇萧条，遂起轻唐之念，不仅勾结西突厥，而且频频在商路上抢劫唐朝的使者、商人，为祸一方。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朝一举平定高昌，将其地改为西州。此后西域各国慑服，纷纷遣使交好。唐朝在此设置安西都护府，统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疆域扩至今天的南疆。

西北暂定，太宗把目光投向东北高句丽，但东征事业不太顺利。几年后太宗病死，李治继位，是为高宗。高宗继承太宗事业，将拓边事业推进到第二期：先击垮西突厥，向西蚕食至咸海，又于庭州设北庭都护府，整个西域都被囊括进来。

西突厥败后，部众从此西迁至西亚阿拉伯帝国，成为雇佣兵。但后来又灭阿拉伯，建立了塞尔柱帝国。后世蒙古人西征之时，突厥再次西遁，并于1453年攻入君士坦丁堡，建立奥斯曼帝国，直到1922年才灭亡，故今天的土耳其和突厥渊源很深。西迁的过程伴随的是信仰的变化，原先信奉萨满教的突厥人，逐渐被穆斯林同化，最后一批突厥人也皈依了伊斯兰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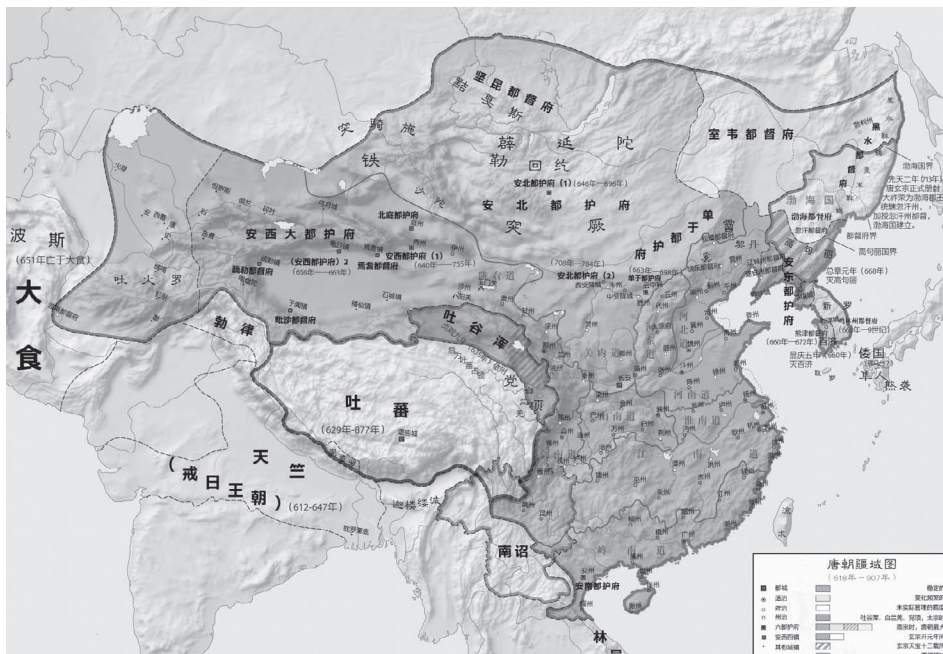
突厥势力退出后，丝绸之路重新通畅繁荣，而大唐的声威也沿着这条路向西传播。

与此同时，朝鲜半岛问题诱发了中日首次军事冲突。

自汉到唐，朝鲜半岛处于三国时代，即在唐朝初年存有高句丽、百济与新罗三个“国家”。其中，高句丽名声最大，军力最强，对中央王朝一直是时降时叛，时慕时倨。隋炀帝亡国，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征高句丽。

当时高句丽、百济勾结日本（倭国）侵略新罗，新罗求援于唐。高宗派出使团仲裁无果，遂令大军东征。公元663年，中日在白江口发生遭遇战，此战唐军以少胜多，日军死伤数万，于是龟缩回本土再不敢窥视外界。天智天皇恐惧唐军进攻本土，还在国内修筑了4道防线以自卫。之后，日本认识到中国的强大，遂称臣拜师，学习中华文化。此役之后，日本再次向中国叫板已是明万历年间的事了，白江口一战也算是打出了千年的和平。

高宗晚年体弱多病，作为不多。死后皇位先后传至中宗、睿宗，但权力为皇后武则天所掌握。公元690年，武则天建周代唐，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她在位共十五年，虽阴毒残酷，政绩倒也斐然。武后退位后，中宗、睿宗相继复



唐朝疆域示意图（据谭其《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

位，宫廷内部却又先后出现韦后、太平公主意欲夺权事件，在帝位争夺中，李隆基最终胜出，是为唐玄宗。于是，乱局告终，唐朝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历史华章：开元盛世

公元725年12月的一天，一支队伍从长安城浩荡开出，逶迤奔赴遥远的东方。恢宏开阔的长安城大街上，音乐声缭绕回荡。长安百姓万人空巷，群拥着观看这一盛大游行。黄罗伞盖之下，有一人不停地向百姓挥手致意，此人正是唐玄宗。这支华美盛大的队伍，此去乃为封禅泰山。

十余年来的安宁祥和造就了国家的富庶，帝国的盛世光景让谦逊的皇帝也难掩自豪之情。队伍历经数月到达泰山，玄宗在山顶举行了仪式，并撰写了《纪泰山铭》，今日还可以在山顶的大观峰看到。

自武后去位，八年之间，唐朝内部历经五次政变，江山易主五人，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多次让政权摇摇欲坠。玄宗亲历了这一切，故而深谙稳定的重要性。于是登台以来，他就以复“贞观故事”相号召，启用一批名臣，广开言路、鼓励进谏，形成开明进取之势。

他从财政经济着手改革，先后检田括户，打击豪强，劝课农桑。那时长安位

于关中，人口百万，远离产粮地，加上隋末运河淤塞，后勤供应很是问题，高宗以来，皇帝们总是在洛阳和长安来回奔波以就食。为此，他命人用陆路拉纤的方式改造河道，终于解决了漕运难题。

玄宗也延续前代重文的传统，收典籍，办学校，兴文教，礼乐文化渐至隆盛。体制的改革也同时进行。此时三省首脑不再全任宰相，皇帝不用事必躬亲，宰相被赋予较大的自由度，决策更加开明有效。他和众臣创设了一套“使职差遣”制度（使职是临时的，完成君命随即解职），官吏选拔也增加铨选程序（考试只是第一关，能否做官还得通过资格审查）。

玄宗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设计师，他的理想和情怀为国家的强盛注入了希望。经过十余年的治理，大唐迎来太平盛世。此时海内安宁，财富殷实。杜甫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一时物价低廉，斗米不过数文，百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在大唐的疆域范围内，每乡都会设置学校一所，国家图书馆整理的藏书多达53915卷。史书记载，开元之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玄宗指令御医编辑《开元广济方》，分发各州医药学校。

这亦是一个奔放热烈的时代。每年的正月十五日上元佳节，五万盏灯轮如万花开放的巨树，数千名丽人在灯轮下踏歌，三天三夜没有间断。这是古代中国非常罕见的集体狂欢。整个开元年间，帝国官员和百姓都在歌舞升平中度过。

在这个黄金时代，大唐以中国文化为主流，吸纳外部文化的精粹，形成一种开放、融合、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文化。据《唐六典》记载，是时与唐通使的国家多达三百个。日本遣唐使到达长安15次，东罗马帝国先后7次遣使至长安，阿拉伯帝国曾36次派使节，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佛教的高僧大德居住在长安的佛寺中，景教、摩尼教、袄教，在长安都有自己的寺庙。而大唐则把木版印刷术、城市规划、服装样式和诗歌传给它的邻人——中世纪的远东地区，尤其是日本、朝鲜、吐蕃和安南。

奇珍异宝跨越大海，翻过大山而来。波斯的商邸珠宝，石国的宝石琴瑟，西域的胡姬酒肆，在长安城随处可见。西方的宝刀良马、香料药材每天都在运往长安，长安的丝绸、瓷器、技术和茶叶也在源源不断地输往西方。国际性大都市长安奇货云集、人文荟萃。《唐新语》中说，长安城里，胡人戴着汉人的帽子，汉人穿着胡人的衣衫，谁是胡谁是汉，连官府也无法分辨。外国人可以在唐朝谋求官职，亦可以长期居住，胡人几乎融进了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中亚的舞女和琴师在帝国的首都受到热烈欢迎。

唐初，波斯为大食颠覆，其王子卑路斯遣使赴唐，诉求援兵。唐朝帮助他建立波斯都督府保存复国力量。而后大食侵逼，卑路斯一族最后迁居长安，唐政府礼遇如初，末代王子遂终老大唐。

武后的陵外立有 61 尊石像，这些石像双足并立，两手前拱，大多被发左衽，他们是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藩臣”。历经千年沧桑，后背文字虽已模糊，但他们至今仍然静静地诉说着唐朝的开放友好。



唐代服饰

又如李圣天——五代宋初的于阗国王，本叫尉迟僧乌波。他从小深受汉文化影响，自认“唐之宗属”，以李为姓，穿汉服、行汉制。即位后主动归服，与宋朝重续“舅甥关系”，国制亦沿袭唐制。在他的努力之下，穆斯林多次入侵均被挫败，西域千里尽汉歌，汉文化血脉得以延续，此乃唐朝与异族真正友好之典范。

总体而言，盛世加速了华夏文明向外扩展的进程。通过经济文化纽带，中国的制度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世界。而唐朝对外的优势一直保持到玄宗后期，直到在西域遇到了东进的阿拉伯帝国（时称大食）才告终止。

怛罗斯之战：影响深远的一次碰撞

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帝国源起于西亚，自建立以来不断扩张，8 世纪以来已逐渐形成地跨亚欧非的庞大帝国。盛唐时，穆斯林进至中亚，兵锋直指西域。也许一切正应了先知穆罕默德那句“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名言，当时世界两大文明终于进行了一次较量。

公元 751 年 7 月，此时已到玄宗执政中期。中亚怛罗斯城外（今哈萨克斯坦境内），旌旗蔽空、战云密布。交战双方正是大食与唐朝。

唐军长官是高丽人高仙芝，此公乃百战名将，曾以千骑大破西域小勃律国，被誉为山地之王。此时，他已是安西四镇节度使，相当于西域军区总司令。

战前，唐朝因“石国”背唐降蕃而加以征讨，大胜。逃脱的石国王子向大食求救，正给穆斯林以东进之由，呼罗珊总督阿布随即领军东征。而高仙芝欲先发

制人，遂率军长途奔袭，两军在怛罗斯遭遇。

此役，高仙芝所率兵力为安西都护两万汉军，外加拔汗那、葛逻禄一万军队，共三万余人马^a。而阿拉伯方面，呼罗珊本部宗教兵士四万，加上仆从国十万人，总兵力在十五万到二十万之间，人数远超唐军。

战役开始，城池上下战鼓雷鸣，杀声震天。

唐军无论装备、素质、士气还是将帅能力，都达到了冷兵器时代的高峰。唐军步兵人手一把弓弩，平均持有至少三件武器，比之秦汉军队，火力强出数倍。骑兵一改南北朝时的重装化，战甲不多，但防护性能提升。兵士每人身背长枪，持圆盾、弓箭，以及横刀各一，全副武装。

唐军御敌战术也很完备：开战时，万箭齐发实施远程打击，敌人近后，又以巨型床弩进行大力杀伤。最后，若敌军到达阵前，则摆起“陌刀阵”——陌刀是长刀的一种，由西汉斩马剑演变而来，二三十斤重，极其锋利——此阵专砍骑兵，相当于今天的反坦克武器，令敌方“人马俱碎”。双方近战的同时，往往派骑兵迂回到敌军后方，实施夹击。

怛罗斯一战下来，唐军先胜，敌军遗尸七万。但唐军人数本不占优，加之劳师袭远，情报、补给不足，历经5天鏖战，犹未能攻破怛罗斯城。

战至五日，阿拉伯援军杀到，胜利的天平逐渐向阿拉伯方面倾斜。见局势不妙，大唐盟军葛逻禄部率先溃逃，导致局势大乱。在内外夹击之下，唐军溃败，高仙芝趁夜色逃脱。收拢数千残兵之后，高仙芝并不甘心，还想回身再进行一次反击战，但在部将劝说下最终放弃。而阿拉伯人国内也爆发了叛乱，他们对保住中亚心满意足，也没有进一步扩张。

怛罗斯之战以唐军战败告终，这一仗对中亚格局的划分产生了深远影响。战后唐朝因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无力经营西域，勉力维持并最终退出了对中亚霸权的争夺，自张骞通西域以来的中国版图被更改，而中亚逐渐伊斯兰化。武则天时代则进一步主动放弃了安西四镇（主要覆盖今新疆一带）。我国新疆一带（西域）原宗奉佛教，自怛罗斯之战后，伊斯兰教逐渐蔓延开来，等北宋初年宗奉华夏文明的于阗国（在今新疆和田）被宗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国灭亡之后，这一代便逐渐伊斯兰化，浩荡千年至今，再也没有逆转。

怛罗斯之战中，一位名叫杜环的人被俘，他此后随阿拉伯军游历中东、非洲

^a 关于唐军具体数量，历来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6~7万，另一种认为是2~3万。国内外学者多认同后者。

十余年，写了一本《经行记》（已佚），成为第一个到达非洲并留下著述的中国人。同样被俘的还有唐朝工匠，他们将造纸术这一当时的高科技带到中西亚，以后逐渐传遍欧洲，造纸术以及因此带来的信息传播力，为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基础。

唐朝在怛罗斯的挫折，为刚刚经历的盛世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这只是一个插曲，唐朝接下来面临的内政危机，才是地动山摇的大变局。

江河日下：动乱前夜的帝国

开元以来，河清海晏，歌舞升平。玄宗大概也陶醉了，此后不再进取。整个帝国逐渐在浮华中沉沦下去。

先是玄宗强娶了儿媳杨玉环，并十分溺爱。她喜欢荔枝，玄宗便下诏专辟一条从岭南直通长安的贡道，以飞马运送。“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他不再那么勤奋，转而耽于享乐。

朝中，正直的宰相张九龄被罢，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上位。二人打击政敌、一手遮天，后者专权更是到了极致。这一时期，边将邀功好战，屡起战端，以致“边庭流血成海水”：时南诏被唐边将逼反，杨国忠荐亲信鲜于仲通讨伐，唐师三征三败，丧师二十万；此后哥舒翰讨吐蕃、安禄山伐契丹，又有十几万人战死。

帝国局势江河日下。

开元以来边境共设十节度使，拥兵 50 万，而中央禁军才 12 万，渐成强枝弱干、守外虚内之势。这时，原先的府兵制为募兵制所替，这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大的转变——此后职业军成为主流。此制虽然解决了征兵问题，但财政负担增加，致命的是，将兵容易形成隶属关系。天宝以来，边地战事骤多，节度使连任、兼任的情况日益普遍，调控机制遂逐渐失灵，而地方军阀因此坐大。

军阀之中，安禄山最为得势。

安禄山乃胡人，通多种蕃语、聪明多智。他贿赂朝野政要，打通关节，逐渐接近玄宗。为讨好皇帝，干脆认比自己小的杨贵妃做义母，每次进宫都先拜贵妃。玄宗觉得奇怪，他答道：“臣是胡人，胡人把母亲放在前面。”而杨贵妃则用大襁褓把他包裹起来玩弄逗乐。安禄山本人很胖，大肚垂至膝下。玄宗调侃：“你肚子这么浑圆，里面装的什么？”他不假思索答：“里面只有一颗对陛下的忠心。”机智的言辞很得玄宗欢心。

安禄山官运亨通，权势极盛时已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相当于一大军区总司令），独揽该区军政大权，拥兵 18 万。势力壮大给了安禄山造反的

基础。不过很难说安禄山是蓄谋造反，实际上，他起兵反唐的心路历程曲折漫长，跟政治腐败关系很大。李林甫去世后，再无能镇得住安禄山的人物，而杨玉环的哥哥杨国忠继任宰相，贪婪弄权，蓄意排挤安禄山，处处与他作对，最后发展到在玄宗面前告状说安禄山要反。形势发展到最后，安禄山只能以造反求自保。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仆固怀恩后来也是类似的下场。

天宝末年，矛盾终于迎来一次总爆发。

安史之乱与体制问题：渔阳鼙鼓动地来

公元756年6月13日这天，天色灰暗，宫城寂静。朝臣们三三两两还和往常一样来到大明宫等候上朝。早朝的时间终于到了，但有人发现同僚没来，而皇帝也没出现。大臣们如坠五里雾，后来才知天子早已逃离了长安……原来，安史叛军已经攻破潼关，兵锋直指长安，吓破胆的玄宗再也坐不住，半夜就出了城。

其实一切早在前一年便已经开始。这年11月，安禄山、史思明以清君侧之名，杀奔国都，史称“安史之乱”。这是大唐建国以来经历的最为艰难的一个寒冬。由于帝国承平已久，官民不识兵革，而渔阳铁骑皆为边防军队，故叛军所至，吏民望风而降。由于唐廷昏庸，得力干将相继被撤，洛阳、潼关等要塞失守，长安门户洞开，遂有上述一幕。

两京既陷，肃宗、代宗相继撑起流亡小朝廷，唐朝上下展开复国运动。

艰苦奋斗近八载，举国终于迎来了和平——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最后一支叛军投降，战事平息。但这场战争已然没有胜利者。

数年的战乱使盛世所积财富化为乌有，中原地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废墟”，汝、郑等地的百姓只能以纸糊衣，全国人口从5292万减至1699万，社会元气大伤。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祸乱使“四海南奔似永嘉”，中国人口再次大量南迁，秦汉以来富饶的关中走向衰落，汉文化从此流落南方，而蛮族入侵的序幕才刚刚拉开。

总结安史之乱的原因，体制问题是一重要方面。更深层次的祸根还在“人治”。玄宗晚年重用佞臣，放纵军阀，国家痼疾逐渐积重难返，教训深刻。唐代也有“律”，但是“法自君出”，法律只是人治框架下的法律，社会运行依赖的是大大小小各级统治者的个人意志。

安史之乱后，有一个令人五味杂陈的美谈：平定安史之乱的主将、中兴名臣郭子仪有一习惯：会客必带姬妾。有一次患病，御史大夫卢杞前来看望，郭子仪

却将侍妾全都屏退，自己一人接待。这是为何？原来卢杞长得丑陋，个性比较阴毒。郭子仪怕女人看见会讥笑他，惹火烧身，因此十分谨慎。

国之重臣不敢得罪一个小吏，这个老成的生存智慧流传了千年，颇受到一些赞许，其实这是十分悲哀的。赞许者所看不到的是法治缺失的悲哀：在人治社会中，即便是在盛唐，没有法治保护，大臣也一样生活在恐惧中。对一个国家来说，法治可以确保秩序稳定、国运稳定，对个人来说，则可以减少生存的痛苦。“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一种无奈，真正的“王道”其实是可以做到合而不分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更是一种悲哀，真正的“王道”其实是可以鼓励木秀于林、青出于蓝的。

郭子仪只能忠，不得不忠——作为生于兹、长于兹的汉人，他没别的选择。但平定安史之乱的另一名将仆固怀恩就不同，其家族在安史之乱中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可谓满门忠烈，但后来受挤兑，最终背叛唐朝。以此相推，郭子仪虽貌似无比温和、知足，但他的生存苦衷，一定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西风残照与晚唐衰象

战乱虽已结束，山河亦被重拾，但繁华的烟云早已散去。战后的帝都荒草丛生，破败萧条，唯有断壁残垣在静静地诉说着帝国不堪回首的痛楚。西风凛冽，残阳斜照。自中唐大乱以来，华夏式微，内忧外患迭起，而王朝已是步履维艰。

南诏在天宝战争之后，倒向吐蕃，不时北犯；吐蕃虎视眈眈，安史之乱后趁火打劫，连长安城都一度沦陷，此后西域、河陇尽丧其手。北方，回纥屹立，虽屡次助唐平叛，但仍不时抄掠，黎民苦患。

此时，搬回长安的朝廷，不得不大封安史降将，虽然剜肉补疮终不能收买军阀，但作为政治妥协，主政的代宗也别无选择。他温和的处理方式，终究没使倾颓的大唐走出阴霾。自他开始，割据之势愈演愈烈。

中晚唐的历史几乎都是藩镇的舞台。节度使气焰嚣张，招募私人武装（即凶悍的牙兵，是方镇叛乱的资本），设官自治，截留赋税，对抗中央。

典型的如德宗时的“四镇之乱”。时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请求继任。但德宗上任，决议削藩，结果引发四镇（魏博、淄青、成德、山南东道）联合反叛，德宗欲借西北方镇打击叛镇，但诸路军阀各怀鬼胎，大军过京反酿兵变，德宗自己也狼狈逃离。

此后削藩偶有胜利（如宪宗元和削藩），但各路军阀也只是表面顺服而已。

唐末。昭宗天复年间，宰相崔胤引朱温尽诛宦官，但后者顺势篡位，宦官和唐朝遂同归于尽。宦官专权比较特别，历代贵族权势大，能分掌中枢大权时一般不会出现，若集权发展方能趁势而起，汉唐明均如此。

文宗之后，唐朝历经武、宣、懿、僖、昭、哀帝各朝。晚唐时皇帝频换，多则十余年，少则几年，国家如病马拉着的破车，驶在陡峭的山路上，时有倾覆之虞。

终于，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浙东人裘甫首先发难，紧接着庞勋、王仙芝、黄巢相继起义。这其中尤以黄巢起义最为惨烈。黄巢占据长安后，其军队“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待唐廷反扑，首都百姓倒向官军，“巢怒，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后黄巢军围陈州，以数百巨碓，同时开工，将大批活生生的百姓、俘虏，无论男女老幼，全部投进巨舂，瞬间磨成肉糜以作军粮，人称“捣磨寨”，且流水作业，日夜不辍。黄巢“纵兵四掠”，河南、山东十余州又遭荼毒。战乱再次吞噬大量人口。

战乱中，官军无力，各地藩镇作壁上观，唐廷被迫引沙陀（西突厥的一支，晚唐时内迁，五代时曾建后唐）、党项平乱，外族趁机入侵。

联合绞杀之后，黄巢败死狼虎谷，起义结束。但唐廷也是奄奄一息，以致“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可谓名存实亡。哀帝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朱温废帝自立，给唐朝的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子。

唐末残局继续发展，中国即将进入另一个大动乱时代。

纷乱的五代十国：静海军独立，传国玉玺失踪

唐亡后，世袭的节镇遍及东南。自907年到979年，中原各藩镇经过不断兼并战争，先后成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命王朝；而南方及河东地方军阀先后自建吴、南唐、闽、南汉等十个小政权，史称“五代十国”，这是中国史上的第三个分裂时代。五代十国是藩镇割据局面的继续。其间定难军（后来的西夏）和静海军（交趾）相继独立，而静海军自此永久脱离中国。

定难军大致在今天陕西、内蒙古交界处。唐末僖宗时，党项人拓跋思恭因助剿黄巢，被赐姓李，封定难军节度使，以夏、绥、银诸州为世袭封地。宋初，李氏叛宋，至李元昊时建立西夏，正式独立。

而静海军位于越南，历来受中国管理。唐末一度为南诏吞并，懿宗时被安南都护高骈收回，改称此名，列入唐朝藩镇。五代和宋初，越南人两度叛乱，从此

第十二章 宋代：一个文弱的时代

分裂与胡尘

——北宋立国的时代背景

三百年巍巍大唐，终抵不住历史的转轮，他从青年到中年，从壮年到暮年，最终在黄巢等起义军的驰骋狼烟中崩塌分裂，留下了北方走马灯般的“五代”和大致散在南方的“十国”。

又一次，中国由统一走向分裂。

北方的五代始于朱温，朱温原名朱全忠，就是这个叫“全忠”的人，先是黄巢的部下，然后叛变投唐，反过来镇压起义军，而对唐的这份忠也没保持几年，904年，朱全忠杀唐昭宗，立李祝为太子即位，是为哀帝。在905年大杀朝官的“白马驿之祸”之后，907年，他终于撤掉唐臣的外衣，废哀帝自立，建后梁，都开封。

北方在50多年中先后建立了五个政权，称为五代，南方则分立着十个小国，大都奉北方的五代政权为宗主。后梁后面的唐、晋、汉、周几乎都是由位居河东节度使的割据军阀或其部将反叛而建立的。河东节度，治太原，与朔方节度互成犄角之势，防卫京师，抗击草原民族的入侵，所以历来都是唐政府的军事重镇。在分裂年代，手握雄狮劲旅的河东节度使，轮番坐起了帝王位。

而在五代的帝王里，后晋的建立者石敬瑭应该说一说。石敬瑭原是后唐李克用的部将，为了自己的称帝野心，借助游牧民族契丹兵力灭后唐，契丹国主辽太宗立石敬瑭为晋帝，作为交换条件：石敬瑭向辽太宗称臣、称子，当“儿皇帝”，把幽云十六州割给契丹。这看似不经意间开出的条件却成了整个宋朝三百多年的痛。称臣之约成了后来宋辽、宋金合约的惯例，而向契丹人称子这样的奇耻大辱，也只有“儿皇帝”石敬瑭能干得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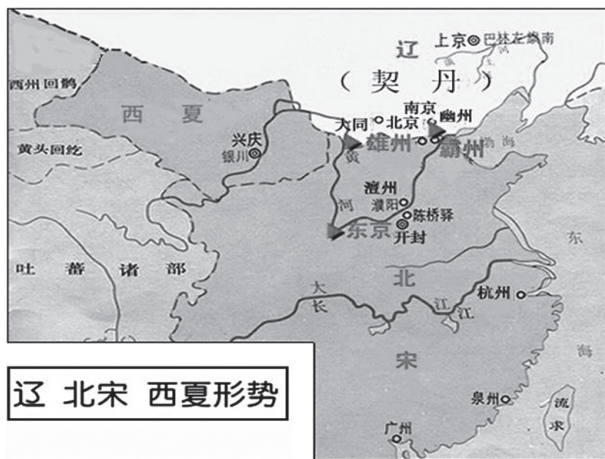
对宋代历史乃至整个近古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正是割弃幽云（今北京一带）。

这为一己之私而不顾大局的愚蠢之举，无异于自毁长城，引狼入室。幽云之地自古以来就是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接过渡地带，也是双方在战争期间的战略缓冲地带。幽云之地以南，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最便于游牧民族骑兵冲锋。石敬瑭的拱手相让，直接导致了宋朝在宋辽、宋金对峙中的劣势地位，自此宋朝的北方面对契丹弯刀、女真铁骑、蒙古骑兵的时候，已经无险可守，将整个中原暴露在铁蹄之下。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两宋三百多年的外患之困都是石敬瑭此举种下的恶果。对于石敬瑭，明代著名学者王夫之曾痛斥：“德不可恃，恃其功；功不可恃，恃其权；权不可恃，恃其力；俱无可恃，所恃以偷立乎汴邑而自谓为天子者，唯契丹之虚声以恐吓臣民而已。”

幽云之地收复的希望，也曾经因为两个人而闪烁过两次，一个是柴荣，一个是岳飞。然而也只是一闪而过，这两次前途光明的北伐，一次因为英主早逝，一次因为政治土壤不容，都是壮志雄心，无疾而终。

柴荣是后周太祖郭威（后汉部将）的养子，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史家称之为“五代第一明君”，他15岁从军，24岁拜将，33岁称帝。在位六年，整军练卒、裁汰冗弱、招抚流亡、减少赋税，使后周政治清明、百姓富庶，中原开始复苏。又南征北战，西败后蜀，夺取秦、凤、成、阶四州；南摧南唐，尽得江北、淮南14州；北破契丹，连克二州三关。正当议取幽州之时，这位伟大的帝王却无奈地病倒了，不久去世，年仅39岁。后周的繁盛为继之而起的宋朝所继承。

当我们审视这段历史，会发现跟南朝宋齐梁陈是何等的相似：短暂混乱的更迭，昏君充斥的朝野，南北对峙的局面，子杀父、弟弑兄的丧德，部将反上立国的无道……只是一个在北，一个在南。



北宋周边民族形势图

而这时与五代对峙的南方十国：吴、南唐、吴越、楚、前蜀、后蜀、南汉、南平（荆南）、闽、北汉（北方），也在各自的进程里，在彼此的征伐中，兴壮衰灭，像大鱼吃小鱼一样，最终都被北宋这条大鱼吃掉了。

在五代更迭、十国散立的同时，周边少数民族

也逐渐兴起、壮大。北方有契丹人的辽，西北有党项人的西夏，西南有一度强悍的吐蕃、大理，而最为强劲、对中原威胁最大的当属契丹人。当北宋正在忙着征战各方割据政权，统一南北的时候，北部边地上，寒风吹着戈壁的砾石，扬起的黄沙里，一群群战马若隐若现，烈阳打在锃亮的弯刀上，折出道道寒光，他们眼里充满着欲望，觊觎着疆土、金钱和食物。

北宋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局势下诞生的，民族间的碰撞，胡尘飞扬，躲不过的是一次次生存竞争的较量。

权术迷雾：宋初三大疑案

1. 黄袍加身，陈桥兵变

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十一月初三的一夜，寒风刀割般地吹着每个士兵青色的脸颊，出征的将士们讨论了整夜，决定拥立皇帝护卫队首领赵匡胤为天子。

看到军心已起，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和部下赵普一方面通知在京的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候王审琦做好应变的准备，一方面部署诸将，环列待旦，准备拥立劝进。军人拥立皇帝，这是五代十国间惯常的景象。

漫长的黑夜伴着焦急的等待终于过去了，黎明时分，当士兵们刚刚能在微红的日光中看清人脸，当赵匡胤刚刚起身伸个懒腰，赵光义和赵普就把早已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了赵匡胤的身上。

“万岁！万岁！”门外的士兵齐声呐喊。

而此时京城里的一切都在石守信的控制之下，城门一开，大军进城。然后挟持，禅让，就这样，赵匡胤毫不费力地成了北宋的开国皇帝，是为宋太祖。

在宋代的官方文献中，都把陈桥兵变说成赵匡胤事前并不知情，这当然是不足信的。事实是，正是赵匡胤制造了辽国与北汉合兵南下的假情报，后周决策当局才匆忙派他率禁军前往抵御的，而他就趁机兵变夺权了。

考察历史，君权的来源有四种：继承、革命、征服、篡位。赵匡胤跟曹丕、司马懿父子等人一样，君权正是篡位而来，自然缺乏执政合法性。赵匡胤对此十分明白。所以，为了防止大宋出现第二个赵匡胤，即位之后，他导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让开国武臣们功成身退，享受生活，不要再参与政治。在这样的开国背景下，宋朝深深忌惮武力，抑武、尚文的价值取向贯穿了宋朝三百年。

不能再让军人操握政权，是宋王室历世相传决不放弃的一个家训。北方威

胁既然存在，宋朝自然不能作消兵之想，但同时又不让军人操握政权，故宋王室另一个历世相传的家训，便是优待文人士大夫，永远让文人压在武人头上。宋太祖制有誓约，藏之于太庙，内容是“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赵光义则曾直白地说：文官即便个个贪污腐败，危害性也不如武将的十分之一（“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臣，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

隋唐初设进士，每年一般录取三四十人，多不过百。宋太宗时，亲御便殿面试贡士，广泛选拔，任才升擢。太平兴国二年进士中第多达七百人，后遂为成例。应进士试者，太平兴国八年多至 10260 人，淳化二年更是多达 17300 人。

到了宋朝，专制制度也更加集中，宰相大臣的地位已然下降。古时三公坐而论道，唐五代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天子命坐赐茶。宰相坐论之礼到宋朝逐渐废除，宰相见天子，站立汇报工作——当然，后世更惨，站立犹然不足，要下跪了。

历史学家钱穆对比唐宋立国差异时评论说：就王室而论，“宋无女祸，无宦寺弄权”，看上去唐不如宋；然而唐承北朝方兴之气，宋踵继五代已坏之局。唐初天下文教已盛，规模早立，宋渐弛渐圯，乃以奢纵败度。

2. 太祖之死，烛影斧声

赵匡胤在后周的基础上南征北战，基本上统一了中国。

攻打南唐之时，南唐后主李煜曾派使者向太祖乞求，愿意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您就别出兵了。赵匡胤却说，虽如父子，毕竟是两家。当使者再次辩论时，太祖辞屈，按剑怒吼：“不须多言！江南也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于是出兵伐唐，俘虏了李后主。没有武力做基础，怎么会有和平呢？李后主是一个政治天真的文人，只有悲叹“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了。

谁会想到，宋太祖这么一位霸气的帝王，死得却十分蹊跷。在中国历代帝王之死中，他的死可以说是最神秘、最具传奇色彩的了。

开宝九年（976 年）十月十九日的夜里，几阵呼啸的阴风吹过，天气陡变，似雨似雪的冰体纷纷落下，几声闷雷远远传来，宫殿的烛火在风中摇曳。此夜，太祖召弟弟赵光义入大内，令宦官、宫嫔都退下，只剩下老哥俩酌酒对饮。烛影之下，光义时而离席，像是在谦让退避。夜过三更，殿外已经积满了厚厚的雪。忽见太祖手持柱斧（文房用具）击地，大声对光义喊了两声“好做！好做！”，便解带就寝，鼾声如雷，四更，太祖暴死。

这段历史就像是小说传奇，烛影斧声中太祖的死，内幕究竟如何，谁也说不清楚，成了千古难解之谜。可以肯定一点的是，太祖属于非正常死亡。有人说是

饮酒过度，一夜猝死；有人说赵光义在其亲信术士预知了太祖的死期后，在酒里做了手脚；有人说是宋太后和赵光义联合谋逆。

至于太祖临死之前的那声“好做！好做！”，更是猜测纷纭，我们不知说此话事出何由，但我们可以推测，或许太祖得知了赵光义的行举，情绪激动，用尽力气，发出生命最后的呼喊。就像恺撒被刺之时，看到他最信任的布鲁图，惊呼的那句“啊，还有你，布鲁图！”一样。

3. 继位之忧，金匱之盟

太祖死后，赵光义以弟承兄，是为太宗。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太宗北征契丹，大败，中箭溃逃，宋军夜惊，不知太宗是死是活，有人便准备拥戴随征的太祖之子德昭。太宗深怕，回师以后，逼死了德昭。两年以后，太祖的另一个儿子，年仅23的赵德芳又不明不白地死去了。《宋史》称“寝疾薨”，也是在睡梦中死去。

德昭、德芳一死，秦王赵廷美的准皇储地位就成了太宗的一块心病。太宗早年的幕僚曾告发廷美“将有阴谋”，太宗显然对廷美是有猜忌和防备的。就在这为难之时，太宗想起了被自己罢去相位的开国元勋赵普。

赵普，太祖的立国治国的智囊核心，开国元老身兼宰相，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遇事沉稳，应变老练，文化虽不高，却是个政治老手。

太宗召回赵普，赵普便上了一份密奏，称自己早年曾有奏札论及皇位继承事，并受到太祖、杜太后的顾命，书写过一份金匱之盟，俱在宫中。

就这样，赵普为太宗解去了接班人问题这一大心病，这对昔日的老冤家摒弃前嫌，为了共同的权力目标，走到了一起。关于金匱之盟，是否存在此事，誓约的内容是什么，难以考证。

陈桥兵变、烛影斧声和金匱之盟并称为“宋初的三大疑案”，我们无法穿越到当时，于是留下了后世的众说纷纭。而这重重迷雾，也为宋初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

大宋朝的弱势国防

长城是古代历史上的一条天然国界线。长城以北不适宜农耕，中原华夏之人对这片土地并无兴趣，而游牧民族保持着相当的原始性，抢劫、作战都习以为常，加之气候变化常常带来游牧经济的极端不稳定，南下中原一带“牧马”（抢劫）

常常是他们的梦想。

与秦、汉、隋、唐的统一相随并来的，是中国的富强，而宋朝虽然统一，却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大秦，打赢了；大汉，打赢了；大唐，打赢了。而到了大宋，却懦弱得连和亲都和不成，只能靠屈辱的盟约和行贿维持着不挨打的和平。暗弱的大宋，成了契丹、女真、蒙古南下“牧马”的猎物。

979年，宋太宗攻取了北汉，雄心勃勃地对契丹开战，挟胜利余威，欲收幽云故地。辽朝名将耶律休哥先以弱兵五千诱敌，再以精骑三万绕道宋军南侧，发动猛攻，席卷而北。双方在高粱河激战，宋军在辽军猛攻下，全线崩溃。太宗在混战中腿部中箭，无法御马，只好换上驴车，狼狈败逃。赵匡胤当年攒下不少家底，准备征辽，或从辽国手中买回幽云之地，这一战把多年积蓄都打没了。

宋王朝与契丹的第一次较量就铩羽而归，冥冥之中仿佛奠定了宋军一败再败的基调。但毕竟是第一次，太宗并不甘心，堂堂大宋，怎能让胡儿欺负？

终于还是等到了一个机会，巡边的探子报“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太宗听后，喜上眉头，报仇和出气的时候终于来了！

新继位的辽圣宗年方16，确为“主少”，政事都出于承天太后，也确实是“母后专政”。然而主政的承天太后（萧太后）和她的搭档韩德让，却开创了辽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军事最辉煌的时代，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边防战备上，都十分鼎盛，宋太宗认为的最佳时机恰恰是最坏的时机。

雍熙三年（986年），经过长期筹备，大军还是认真地出征了，兵分东中西三路，摆出了凌厉的攻势，直取辽朝南京。辽朝增援兵力，由耶律休哥统一指挥，抗击宋军东路，宋军终因粮草不济，退守雄州。受西路军频频捷报的刺激，东路军的将士也请求出战，然而当曹彬率领着这支疲惫之师到达涿州时，承天太后率领的大军早已驻扎在涿州东北，而正要撤军之际，休哥率领精锐，全力追击宋军，两军在岐沟关激战，宋军大败，一路溃逃。

当得知东路溃败，太宗忙令撤军，中路军安全返回，而西路军接到指令，要掩护寰、朔、云、应四州的居民迁至内地，而这支孤悬敌后的西路军，也就成了辽军痛击的对象。

西路军的副将杨业，时人赠美名“杨无敌”，他就是杨家将故事的原型。杨业率兵奋勇作战，几致全员战死，而先前主帅潘美说好的接应，却迟迟不到，杨业最终因寡不敌众，力战至竭，堕马被俘，绝食三日而死。

雍熙北伐失败后，战争的主动权虽然转向辽朝，但边境上的较量，双方互有胜负，辽朝也不是占有绝对的优势。景德元年，辽军大举南下，宋朝廷或许是被

打怕了，是战是和，动摇不定。但在主战的寇准的指挥之下，辽军进展得并不顺利，先锋大将萧挞凛在视察地形时，被宋军用床子弩射死，还未开战便折大将。这场大战之前，无论怎么看，宋军都不像是处在劣势。



宋代活字印刷字模板

然而欲战欲和的宋朝，最终没有勇气挺起胸膛和辽军再打一仗，辽军一发出议和的信号，宋太宗的继承人宋真宗就以避免生灵涂炭为由，迫不及待地接受了。澶渊之盟由此订立，两国称兄道弟，宋给辽赔银赔绢，每年“行贿”不断。澶渊之盟，给宋带来了一百多年的和平。

辽国大有斩获，宋朝西边的二号劲敌西夏也坐不住了。由于宋朝长期边防不修，范仲淹主张坚壁清野，固守抗敌。而宋朝官方却决定采取韩琦的主攻方针，继三川口受埋伏兵败之后，好水川一战，宋军又被打得鼻青脸肿。在宋朝“一战不如一战”的战况里，在辽朝的干预下，西夏也跟宋朝达成合约，虽然是向宋称臣，但也得到了“岁赐”的实惠。

在战战和和里，北宋一直很被动。不过虽然面对西边的少数民族，大宋连连败退，但在东边日本国眼中，大宋仍然是令人向往的天朝大国。宋朝人笔记里载^a，日本的一条船载了二三十人，遇风暴漂到宋国境内，而船上的人却把美貌的妇女选出来，推荐其去主动服侍宋人，这个改良人种的办法名叫“度种”。该史料是否真实，不好判断，不过明治维新后日本确实曾有鼓励妇女引诱欧洲白人以“改良人种”的国策，以此推断，宋朝就有“度种”也不是不可能。日本史学家宫崎市定曾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魅力的时代”，除了打仗之外，宋代在其他方面或许具有别的朝代无法比拟的魅力吧：它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和指南针都出现在宋朝（隋朝时发明雕版印刷）；宋代有灿如繁星的诗词文化；有繁华发达的经济贸易，当时的京城更是一片昌荣：“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

^a（宋）周辉：《清波杂志》。

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a 这些繁华，至今仍然可以在《清明上河图》中看到。首都之外，泉州等城市还是国际贸易中心。宋朝使用着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踢着世界上最早的足球、放着世界上最早的烟花、使用着世界上最早的计算器（算盘）、驾驶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轮船、使用着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大炮和类似手榴弹的火器、实行着当时世界上最早的果树嫁接……

王安石变法：大宋自救能否成功

宋真宗之后是宋仁宗，他浑浑噩噩地当了近半个世纪（41年）的皇帝，然后传位给英宗，又5年后英宗就去世了，由宋神宗即位。宋神宗贵为天子，命运似乎对他无比垂青，可他面对的却是一个烂摊子。

第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政府缺钱。

养官、养兵、养闲人，让宋朝财政不堪重负，且不说遍布官僚系统每个细节的腐败。

为了贬抑武人，宋朝对文臣的待遇极为优渥，以至于后来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唐代的举子考中进士只是具有了当官的资格，还要经过吏部身、言、书、判层层标准的铨选，达标者方许以官职，而宋代一登第就释褐授官；宋代财政拨款中，文臣俸禄（工资、补贴）的支出也频频增添，时称“恩逮于百官，惟恐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余”，可以想见宋朝优待官吏之情态；而宋代的状元更是荣耀无上，以至于时人说状元及第的光荣，就算是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出疆寇，凯歌劳旋，献捷太庙这样的功勋也比不上。

军费支出是另外一个财政大窟窿。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军人割据，宋朝把军权都收归中央，实行更戍法，定期让士兵流动戍卫，不能形成士兵和将帅之间固定的隶属关系，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其指挥效率和战斗力可想而知。又由于怕兵士作乱，政府宁愿花钱维稳，军队成了安排上访户、困难户就业的慈善机构，所以宋朝常备军多达百万之巨（同时期欧洲各国常备军往往只有几千人），远超历朝历代，但是每战必败。

养官、养兵，都需要大量的经费，再加上战败后要缴纳的银绢，重重压力之下，北宋财政捉襟见肘。而北宋又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穷者窘困，富者想方设

a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

法逃避赋役。这就是当时大宋社会的病态：积贫积弱。

军事失败和财政窘境，其实反映了宋朝的腐朽暗弱。西汉建国百年时，正是最强盛的武帝时期，而建国还不到百年的大宋，已经面临着财政几乎破产的困局。如果不改革，国家必将糜烂到无可救药。

面对危机，宋代士大夫领头的改革有两次：一次是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另一次是王安石领导的熙宁新法。庆历新政主要是以政治改革为中心，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等十事，但最终在反对派的攻击下失败，成效微乎其微。王安石变法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比庆历新政更根本、更全面。

在北宋的政坛上，甚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王安石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科举考试发榜时，他很淡定，根本就没去看成绩（中了进士第四名）^a，也许他早就认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区区科举考试，算得了什么呢；他中进士以后被任命在皇帝身边服务，这个人人艳羡的工作他却加以拒绝，而自愿申请去基层；他从不跟领导发展私人关系，刚参加工作不久，上级领导包拯宴请敬酒，他坚持自己的原则滴酒不沾，包青天不免有些尴尬（在那场饭局上，平时不喝酒的司马光也喝了一杯）^b；官做到宰相，他也没有任何奢侈浮华的生活，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朴素的作风，穿衣简朴，吃饭简单（菜只吃离得最近的那个，别的没心思碰）。他不迷信古人，不迷信经书，也不怕得罪皇帝。

王安石之所以如此特立独行，原因在于他怀有远大的理想。王安石的理想超越于具体政治策略之上，他不但要改革当代政治，还意在改革古今学术、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为此，他著书立说、重新解释古典典籍，甚至打算废除科举、重振先秦时期的学校制度。

宋朝是一个儒家学说笼罩下的人治时代，宋朝的党争喜欢贴上道德标签，政策争议最后都被归结为品德。学术思想态度、政策策略上的不同，往往排斥异己者为“奸邪”。一流文人、不入流政客苏洵、苏轼父子也是如此。程颐被洛学学派奉为圣人，而苏轼评论：“我一贯痛恨程某之奸邪。”孔文仲则弹劾程颐的奏疏称：“其人品纤污，天资儉（xiān）巧。”

王安石处在这种生存环境之中，指责和攻击自然漫天横飞，但王安石的特立独行，使得对方无把柄可抓。苏洵写了一篇《辨奸论》影射王安石^c，可是拿不出

a 《宋史》称王安石是受欧阳修擢拔而登进士，不可信。明登进士第四名为后世学者所考证。《宋史》为元人编修，质量极差，向来被评为“芜秽”。

b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c 《辨奸论》作者是谁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也有人认为是邵伯温托苏洵之名而作。

任何有力的证据，只能扯什么“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之类空话。然而，没有把柄可抓并不值得庆幸。王安石在这种斗争漩涡中，孤身一人与流俗作战而不被理解，最终只落得精疲力竭。

20 岁的神宗，血气方刚，怀强国雄心，起用王安石进行变法。王安石针对时弊，从理财（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强兵（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法）、育才（科举新法、三舍法、三经新义）三个方面颁布了一系列措施。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于积重难返的社会，改革在实践中却出了不少问题。熙宁六年七月，大旱，灾民涌向开封城。灾荒烈烈，人们不禁嘀咕起变法措施的烦扰折腾和空虚无力。监开封安上门的郑侠直言青苗、市易等法的弊病，面对羸弱愁苦的灾民，他把当时现状手绘成画卷呈送神宗，并附言：“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斩臣宣德门外！”神宗看过，长吁短叹，夜不能寐。

神宗开始动摇了，不知对错，也不知所措，只是疲惫地将画卷交予王安石，一言不发。在政治改革的泥潭中，王安石几经沉浮，罢相又复职，复职又罢相，但最终变法还是失败了。

王安石所提出的改革政策，即便以现代眼光看来，也很有创意，而且有可行性。但为什么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齐威王、赵武灵王、商鞅变法纷纷获得成功，王安石却最终失败？这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权力顶点的宋神宗从来没有从事过基层工作，不了解实际情况，无法判断政策的好坏和真正效果。因而，他经常出现动摇和犹豫，无法将一种策略贯彻到底。一方面权力越来越集中于皇帝，另一方面皇帝本人的见识、能力却越来越与他的职权不匹配。

辩论是政治的重要程序，应预先设定合理的规则。王安石所处的北宋政界，辩论极其激烈，但最后全都变成人身攻击，无法以科学的方式分出胜负、作出决议。宋朝辩论没有议事规则，事情容易被道德化，但道德却是说不清楚的东西。新法的实际效果到底怎么样？没有数据化、可证明的测量手段，辩论双方总是看上去各有各的道理。作为辩论仲裁者的宋神宗，最后也被折磨得心力交瘁。如果时代穿越，宋朝人也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局面也许会好得多。

双方的主张，许多都缺乏研究的支撑，这也造成了辩论的混乱。如社会财富总量是固定的还是增长的这一基本问题，双方无法达成共识。王安石认为，只要政策得当，社会财富总量就会稳步增加，而司马光等人认为，社会财富总量是个固定数值，官多就民少，所谓改革不过是剥夺民财的零和博弈。其实在经济学实

证研究支撑之下，我们现代人知道财富总量是可以增长的，但古人很难论证出这个结论。

王安石在人治的框架之下推进改革，必然被人治的泥潭吞噬，这个结果并不意外。没有对官僚集团的法治化监督体系，改革会变成官僚集团自肥，



王安石晚年故居半山园遗址

底层民众所受到的压迫和剥削反而更加严重了——这正是王安石的手们所极力批评的，而他们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例如保甲制度，本是学商鞅，对训练民兵大有好处，但在官僚手中却被异化为对百姓的欺压。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法，有点像现代的小额贷款制度。这个类似于现代银行制度的方案，它要健康运行，必须要有信用、法治、责任等规则相配合，而王安石的时代，全无此种社会氛围和保障。

北宋政界缺乏基本的价值观共识。儒生的复古价值观在宋朝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司马光等人甚至反对强兵，北宋唯一一次对西夏的军事胜利，算是王安石变法的成果之一，却被司马光攻击为“侵扰四夷”。而王安石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学派改革家有几分赞同，这更是捅了儒生们的马蜂窝。

围绕着变法，产生了激烈的党争。党争早已有之，唐朝时的牛李党争就曾延续数十年。这是一种不讲规则、不讲底线的相互倾轧。熙宁变法之后，新旧两派以人事权为核心的相互倾轧和打击，极大地损耗了宋王朝的元气。

王安石变法失败，说明大宋已经失去了自我革新的能力，只能是一步步走向沉沦。在这个被儒学意识形态所笼罩的帝国里，很少有人能提出治理国家的新方案，即便提出了，也会遭到围攻。天才和圣哲王安石，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头脑清醒的决策者，可是他无法抵御社会的大泥潭。大宋的命运，不言自明了。

屈辱溃败：靖康之变与建炎南渡

靖康二年四月，北行路上，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帝都穿着白色的囚衣，披头散发。日落、风起，天边晕染着残血般的赤霞，夕阳拉长了这对父子沉重的背

影，身后是皇后、嫔妃、太子……还有大臣、工匠、倡优等各色人群，这十余万俘虏哭声不绝，犹如长河浩荡。他们背后的开封城，已经成了人间地狱。北宋最后的一幕就定格在了这北撤的途中。

命运难料，昨天徽宗还在御花园里书着独步千古的瘦金体，赏着苏州运来的花石——为了勒索这些花石，江南富户几乎破产，房子院墙都被强拆，然后花石被装上船，千里迢迢运来帝都。这些民间浩劫，徽宗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总之他并不关心。一切恍如昨日，转眼间他已成了亡国之君、金兵的阶下囚。

北宋改革自救失败期间，外部的格局也悄然地发生了变化。契丹人（辽）的强势渐渐消去，北方霸主地位逐渐动摇——东北的女真人不堪辽国的剥削而奋起抗争，竟然将辽军接连打败，他们建国号为“金”。

自从宋辽“澶渊之盟”后，宋有了一百多年的弱势和平。女真人起兵抗辽，宋廷使者在海上与之密约南北夹击，显然，这是一个收复幽云一带领土的契机。然而，宋军十分臃肿虚弱，不堪一击。北方女真人势如破竹，南方宋军却被辽军痛殴。夹击辽国之战，宋军把自己的虚弱尽情暴露，并且花光了王安石千辛万苦攒下的家底。

辽国摇摇欲坠之际，辽使臣到宋营议和，主要讲了三点：一则金更加凶暴，如果辽灭，对宋没好处；二则局面已成辽弱金强，宋辽应该联合抗金；三则抛开实际利益不说，从道义上看，金本来就是辽的附属，起兵乃是造反犯上，辽予以镇压实属应当。宋助金，在道义上说不过去。

道义怎么样，自然不必理会，但辽使者所陈述的形势分析却很正确。宋应该在辽金之间玩平衡游戏，谁弱帮助谁，促使辽金相互消耗。但宋廷的决策水平，跟宋军战斗力一样不入流——宋廷方面让辽使滚开。辽使痛哭：“宋辽两国，百年和好，（澶渊之盟）盟约誓书，字字俱在，尔能欺国，不能欺天！”

两国之间的和约，向来都是容易被撕毁的，因为国家利益在不断变化转移。以往中原帝国很少主动撕毁和约，通常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变卦，这次大宋倒是不怕“天谴”而宁愿不诚信，不过却是一次愚蠢的不诚信。

女真人崛起的速度很快，自起兵至灭辽，前后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锋芒之盛，可以想象。女真人不简单，后来被蒙古和南宋夹击消灭之后，并未在历史上消失，400年后，他们再度起兵南下中原，征服中华，建立清王朝。

辽共历九主，219年（辽亡后，残部建西辽国，复延88年）。

当北宋君臣正做着海上之盟约定的收归幽云的美梦，等着金国把幽云之地交割过来。他们却忘了一个基本的真理：政治要靠实力说话。金当然不会把幽云之

地交还给宋。

因为交还幽云之事，宋金都搞得快快不快，对于自身实力不如人的北宋来说，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边努力交涉，一边忍吞委屈。而早已覬覦宋朝这块肥肉的金国却得寸进尺，主动挑起战争。这样，辽宋的屈辱史翻页，金宋的屈辱史翻开，而这次翻页，连同整个北宋一起翻过去了。

金太宗刚刚宣布伐宋，才43岁的徽宗就匆忙禅位给长子赵桓，是为宋钦宗。钦宗开始下诏亲征，以新任兵部侍郎李纲为东京留守，领导开封保卫战。然而当得知徽宗避难江南，钦宗也打算逃往陕西，在李纲的力谏之下，才打消去意。李纲临危受命，三四天就巩固了东京的防务。宋军防守严密，金军死伤累累，却难以攻下。

金军见不易得手，便派人议和。钦宗一听议和，十分感动。宰相李邦彦也力主答应金朝的条件，以免遭兵刃之祸。只有李纲坚决反对，钦宗碍于李纲的守城之任，答应慢慢商量议和之事。但李纲刚离朝部署守城，钦宗马上就派使者赴金营求和，纳币、割地、遣质所有要求一一答应。其实在此期间，各地的勤王之师已经陆续抵京，名将种师道也在列——种师道可是一代军神，《水浒传》里鲁智深的上级领导“小种经略相公”指的就是他。鲁智深是何等霸气，可是一提到小种经略相公便肃然起敬。《水浒传》固然是民间戏说，但种师道在宋朝人心目中也确是极有威名。

李纲的防御才能，种师道的名将才略，这时的东京君臣本不该惧。另一名将姚平仲急于建功，说动钦宗，以奇兵劫营，然而走漏消息，反遭迎击。其实宋军这次的损失并不大，但这小小的挫折也足以使本来就已如惊弓之鸟的钦宗的“恐金症”再发，完颜宗望趁机施加压力，钦宗在惶恐中罢免了李纲和种师道，撤销亲征营司，遣使谢罪，交割三镇。

所遣的使者是谁？就是后来当了皇帝的宋高宗赵构。此次出使，他心惊胆战，终其一生，对金国的胆气都没有恢复过来。

金军一退，宋朝的君君臣臣又开始了内斗。先是把种师道罢为宫观使，称其老迈，令其赋闲，对其集中关中、两河之兵，扼守黄河阻遏金军南侵的建议置之不理。尔后命李纲代种师道，去解太原之围，将其排挤出朝。钦宗将前线武将的指挥权握于己手，李纲根本指挥不动军队，愤然辞职。这样一来，朝内最会打仗和最会防守的人均已去矣，北宋还拿什么对抗再次扑来的金军？与此同时，钦宗和徽宗父子俩也因为权力问题而钩心斗角，整个北宋的末年，已无一点团结御敌的迹象。

撤到半道的金军，洞穿了北宋骨子里的腐败无能，当年八月又调转马头，兵分东西，再次袭来，克太原，渡黄河，直逼开封。这时的东京城里，剩下只会屈膝议和的乌合之众，钦宗此时才想起了李纲，急招回京，然而李纲未至，东京就已经陷落了。

金军收缴了城内的马匹和武器，宋朝失去了反抗的能力，然后金军就疯狂蹂躏。此时的开封城，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据《开封府状》记载，金兵围攻陷汴京前后，大肆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期间俘虏了 6000 多名女俘，宫女嫔妃 3000 多人，民间美女 3000 多人，而这些女俘中，仅公主就有 21 位。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东京城里有人提议，“拥戴”靖康元年做过两个月宰相的张邦昌出来应命，从而避免了屠城的厄运。而徽、钦二帝作为人质，被押往金朝。从而出现了本章开头的那一幕。

北行途中，几位皇室女子相继坠马流产，其中就有赵构正妻邢秉懿。北行抵达北国之后，赵构的生母韦贤妃、妻妾邢秉懿与姜醉媚，以及其两个女儿赵佛佑、赵神佑等 300 多名宋王室的女人，都被送进浣衣院（官妓院）。钦宗的朱皇后不堪受辱，投水而死。邢秉懿数年后病死，而赵构的母亲韦贤妃后来被送归南宋，在杭州活到 80 岁才去世。

金军北归的第二日（四月二日），张邦昌听从元好问的建议，派人寻访康王赵构，九日迎哲宗废后孟氏入宫，尊为元祐皇后，垂帘听政，自己退位。赵构随后接到张邦昌派人送来的传国玉玺，移师南京应天府，即位改元，是为高宗。

金朝当然不能坐视高宗稳定局势，建炎三年二月，完颜宗翰奔袭扬州，宋军大溃，高宗一路南逃，金军一路紧逼，杭州、越州、明州、定海、昌国、台州，高宗在浙江境内东避西躲。天不亡宋，正当金兀朮攻克明州，打算搜山检海捉赵构时，遇上风暴，被宋军击败。三月，金军又在黄天荡被宋朝名将韩世忠击溃。此时的金军已经无力再战，全军北撤。高宗逐渐把朝廷迁回临安，宋室南渡最终完成，历史也随之进入了南宋时期。

做武将难：宋代武人的命运

在宋代这样一个特殊的朝代里，做武将难，做一个忠义的武将更难。军权与政权的关系一直无法解决，所以这块土壤上就容不下优秀的武将生存。那些赤胆忠心的武将们，结局好点的侥幸解甲归田，结局不好的便是含恨屈死。

赵匡胤篡权起家，深知军权是足以动摇政权的，因此对武人深深忌惮。在宋

代的政治生活中，文臣得到了大量的提拔和重用，武将正好相反，在导向上抑制，在制度上设定统兵权和调兵权分开，“更戍法”又使得兵帅相互隔开。武将割据、颠覆政权的内忧是避免了，但外患却严重了。这一窒息性的制度体系，直接导致了后来中原帝国被游牧民族全面征服的生存危机。

宋代的武将就在这样的背景中存在着，一边抗击着外部的侵略，一边饱受着主上的猜疑，像是被线拴住四肢的木偶，线的另一端系着主上，皇上怕被他们拉下来，所以不可能让他们自由挥开手脚。就在外部侵犯、主上猜疑和小人谗陷中，奏着一曲曲武人悲壮的命运交响。

中国历史上天才很多，宋朝也不例外。在军事领域，宋朝同样出现了天才。南宋叶适曾经说过，“若狄青、岳飞辈，盖数十百年而一，有寥落相望，无复继者，则其为存亡安危所系”，那么这两位社稷所系的武将的命运又是怎样呢？

狄青，北宋时期河朔间人，面有刺字，人称“面涅将军”，出身贫寒，善骑射，勇而善谋。因为长得过于俊美，不适合威慑敌人，所以每战披头散发、戴铜面具。在宋夏战争中，冲锋陷阵，身负重伤也不退缩，二十余仗，打得西夏军闻风丧胆，为大宋抗夏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也得到了重用和殊荣，做到枢密副使，相当于今天的副司令。在平定侬智高过程中，虽然历经挫折，但狄青凭借高超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能力，临危不乱，沉着冷静，最终安定岭外。

正当狄青在其军旅生涯蒸蒸日上的时候，患有“恐武症”的宋朝文人谏官集团又开始散布谣言，说什么狄青家的狗生出两角，并且时不时地发光；说什么京师大水，狄青避水搬到相国寺佛殿居住。终是人言可畏，狄青被调任陈州知州。宋《清波杂志》载，狄青临行前曾心情沉重地对亲友说：“青此行必死。”问何故？他说：“陈州出一梨子，号青沙烂，今去本州，青必烂死。”这是多么令人寒心的一种预感。即便这样，朝廷对这位武将仍不放心，“每月两遣中使抚问”，名为抚问，实为监视，无论他在哪里，做什么，总有一双眼睛如影相随。

一代杀敌无数、战功累累的良将之才狄青，如今却发配远乡，与囚徒无异。在陈州的那些日子里，他夙夜忧叹，痛苦难当，惶惶不可终日，第二年便在陈州发疽而死。

其实如此国之名将，不可能因为民间谣传的几件小事就被远贬陈州的。在朝廷讨论如何处置他的时候，狄青曾找过宰相文彦博，向他坦承自己的忠心，表明自己的心迹，并追问朝廷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文彦博冷冷地回答说：“无他，朝廷疑尔。”狄青死了，威胁没了，朝廷对已经死去的他又爱惜起来，给他追赠中书令，谥号“武襄”。

到了南宋时期，最有名的武将是岳飞。岳飞一生都在领兵抗金，几乎从未战败（在军事史上堪称奇迹），收复了北方大部分失地，但最后也是死于政治的泥潭。

岳飞，相州汤阴人。他天生神力，还没成年就能拉开300斤硬弓（在宋金时期的历史中，传说有如此神力的只有两个人，另外一个是一名女真大将，但他正处于壮年时期），又向本县武术家周侗学习，后来“一县无敌”。岳飞作战，喜欢单枪快马率先冲锋，以震慑、摧毁敌军的心理和意志。岳飞的作战风格是喜欢正面力战，又擅长以少击众，故率领岳家军身经大小百余战，无坚不摧。

宋军原来有严重的“恐金症”，经岳飞累年苦战，劣势渐渐逆转，金军对岳家军闻风丧胆。这时，北方的义军也纷纷响应，黄河南北大片失地被收复，捷报频传。岳飞对部下畅言：“今次杀金人，直捣黄龙府，当与诸君痛饮！”眼看北复在望，形势一片大好。

岳飞是主战派的灵魂。但最高决策层的核心利益却是保住自己在国内的权力。高宗赵构的总路线是向金朝求和，以维持局面，确保自己的统治，宰相秦桧是他最默契的助手。于是朝廷连下十二道金牌，命令岳飞立即班师。当时张俊、韩世忠、刘琦等部已奉命后撤，岳飞成孤军。岳飞痛贯肝胆，仰天长叹：“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

中原百姓听说王师将要撤退，哭声遍野，岳飞命令大军多停留5天，以保护中原百姓逃难。回师之后，有御史弹劾岳飞，岳飞为了自保，立即上奏辞去一切军职。就算这样，岳飞还是难逃一死。赵构与秦桧一起确立了求和的总路线，而岳飞作为主战派的灵魂，与之水火不容。另外，岳飞掌握国家大部分军队，早已犯了宋王室的大忌，宋高宗对此深深忌惮。其实当年岳飞还红的时候，有一次宋高宗闲聊时忽然感慨道，岳飞真是个好忠臣啊！秦桧在旁边立即说道，太祖皇帝也是大周的忠臣。宋高宗沉默无语。

在赵构、秦桧、将领张俊的部署下，一个阴谋网已经布好。很快，有人告发岳飞，罪名很老套，当然也很管用——“谋反”。宋朝立即派禁卫军带走岳飞，投入监狱。审了两个月，当然什么结果也没有。倒是有一名主审官看到岳飞背后所刺的“精忠报国”四个字，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愤然辞职。

审理过程中，岳飞被毒刑拷打。一个历史细节令人沉痛：拷打后，岳飞站立稍有懈怠，狱卒立即呵斥岳飞“叉手立正”，而岳飞，这个指挥百万大军的战将，立即“悚然听命”。

岳飞入狱已是冬天，一天天过去，除夕来了。岳飞的旧部带着过新年的屠苏酒到狱中探望。看到屠苏酒，岳飞潸然泪下——他已经戒酒多年，上一次说喝酒，还是收复中原的时候，许诺将士们打到金国首都黄龙府后痛饮，这个新年，眼前这杯屠苏酒，也许是他人生最后一杯酒了。

决策者宋高宗和操盘手秦桧，都不愿意等下去了。岳飞没有罪，“莫须有”——应该是有的。不几天，秦桧手书一张纸条交给监狱。很快就传出了岳飞的死讯。岳飞具体是怎么死的，史书写得语焉不详。一种坊间流传的说法是，岳飞被狱卒猛击两肋而死，死时年仅 39 岁。

岳飞死后被抄家，人们发现岳家财产并不多，倒是抄出了几千卷书。

顺便说一下，如今杭州的岳飞墓前，树的是秦桧夫妇等人的跪像，但正义并没有真正实现，真正的第一责任人乃是宋高宗赵构，秦桧等只是次要责任人。真正能够对历史谢罪的，应该是一尊宋高宗赵构的跪像。

宋朝容不下武将。为了维护统治地位不惜国家衰弱，也容不下尚武精神的存在，大宋的命运已经是注定了的。

国家机构本具有双重功能：对外竞争以维持本民族的生存，对内实施社会管理，以促进本民族的发展。此时的南宋朝廷，基本上成了一个压迫劳动人民的机器，国家最基本的功能都已经无法履行。一个公权彻底被个人所操纵的国度，一个全社会文弱，连审美都变态到喜欢妇女缠足的民族，一个标榜道德，空谈心性的思想系统，难免走向衰败。天造地设华夏 3000 多年后，文化和制度再次设定了其命运，等待他的是天崩地陷，是神州陆沉，是一场被灭绝的生存危机。

崖山兵败，南宋灭亡

回过头来看，金人在北方建政后，热心学习中国文化制度，颇有一番成就。金世宗号称北国尧舜，一方面学习中原治国经验，一方面强调女真尚武精神，去世之时，国力鼎盛，国库十分充盈。

金朝到了章宗之后，慢慢变成了第二个北宋。金章宗崇拜宋徽宗的书法（瘦金体写到可以乱真），宗室大臣有的崇拜司马光，有的崇拜苏东坡。内政方面，外戚得宠，权臣干政，国内权术斗争不断，猛安谋克之类女真贵族不劳而获，逐渐腐化变质。

而在更北方，蒙古人已然崛起，铁木真统一草原各部落，号“成吉思汗”，然后举兵南侵。宋金夹击灭辽的历史再次重演，只是主角变成了宋蒙夹击灭金。

在蒙古人的打击下，金把首都南迁到汴梁，然后再度出逃，几乎是北宋靖康之难的翻版。金哀宗逃到了蔡州，被蒙古、南宋联军包围，城内易子而食，死亡军士都成了军粮。金国灭亡。金朝共历九主，历时 120 年。

对于辽、金先后灭亡，忽必烈的看法是“辽以释废，金以儒亡”，他们分别因佛教、儒教丧失了尚武精神。留在中原的女真人被汉化。三百年后，留在东北的女真人，再度崛起并南下征服中国，建立起清王朝，他们是唯一一个两次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

对南宋来说，灭金之后不再是唇亡齿寒的问题，而是唇亡齿无了。

公元 1234 年的“端平入洛”事件，为蒙古侵宋提供了口实，蒙宋开战，蒙古军一再深入四川，宋军开始组织的钓鱼城保卫战中，蒙军主帅蒙哥战死，士气大丧。然独木难支大厦之将倾，现在的南宋，早已不复有岳飞时期的战斗力了。忽必烈夺权完毕，卷土重来。鄂州之役中郝经事件所折射出来的南宋君相在军国大事上的颞顽嘴脸，都说明南宋离亡国不远了。而襄樊又在庸臣误国中遗憾失守，南宋已无险可守。元军兵临临安，益王赵昞和广王赵昺在专人护卫下，又开始了亡命之旅。

南宋行朝几经波折，转移到了崖山（今广东新会南崖门镇），而元军下定斩草除根的决心，对其紧追不舍。祥兴二年（1279 年），元军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弘范包围了南宋枢密使张世杰的部队，双方准备着最后的决战。张世杰虽为宿将，却不知兵，把千船铁索连环。决战在这年 2 月 6 日打响，这日乌云密布，阴风怒号，一切都好像在昭示一个悲惨的结局。元军兵分三路向崖山发起总攻。宋军南北受敌，战争从黎明一直打到黄昏，元军突破了宋军的防线，张世杰水师阵脚大乱，但铁索连贯，进退不得，这才下令砍断绳索，率战舰护卫太后。

这时，暮色四合，阴云席卷天地之间，一时间风雨大作，冷雨伴着呼啸的阴风，连对面都辨不清人影。而帝昺的坐舰却被外围的战舰壅塞阻隔在中间，张世杰无法接近，便派小船去接应。

帝昺的船上还有宰相陆秀夫的妻儿，风雨天际之间，陆秀夫隐约看到了前来的小船，在这个唯一可以逃出的机会面前，他还是犹豫了，万一元军假冒，一朝君相俘到元营，与其受尽屈辱，还不如死了痛快！他拔出腰间的剑，疯子一般地驱使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妻子死拉着船舷不肯自己，他喝道：“都去！都去！害怕我不来？”这才松手沉海。最后船上只剩下陆秀夫和帝昺，风雨之中已经辨不出陆秀夫老泪纵横的脸，8 岁的帝昺只是听到他的宰相说：“国事至此，陛下应为国死，德祐皇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在那个年纪和那个情形之下，帝昺可能还

没明白荣辱和生死的概念，也没时间去权衡，更没有机会去选择。说完，陆秀夫背起帝昺，跳入大海。

茫茫海上，风雨依旧呼啸不止，只剩下那叶扁舟横在海上。陆秀夫背着帝昺“嘭”的那一秒沉海声，敲响了整个大宋的尾声。

宋代虽然武力不济，但是经济和文化都比较繁荣，尤其是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在思想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在此思想影响下的文人士大夫，谨循君臣、父子之道，有时候，生命轻于鸿毛，而忠义重于泰山。到了宋代，那种民族大义，那种舍生取义已经超越了门阀士族的界限，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禀赋着那一身的正气，慷慨赴难，不惧生死。宋、明的知识分子至今也是值得我们称道的。

当南宋气数已尽，宋朝渐渐远去，天下已成了蒙古人的天下，有一个人还在坚守着，他就是文天祥。被俘后，蒙古群臣奏道“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忽必烈也曾极力地挽留过文天祥，他本人去劝过，同朝的官友去劝过，甚至文天祥的妻子儿女也去劝过，只要归顺，便是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而他却坚定地回道“管仲不死，功名显于天下；天祥不死，遗臭于万年”，但求一死！忽必烈苦心用尽，仍无法劝归。

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初九，冬风凛冽，兵马司监狱内外，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卫兵，文天祥踱着从容的步子，从监狱走到刑场，他问清楚哪边是南方，然后朝南庄重地拜了拜，再没有多说一句，从容赴死。自己的信念，他早说清楚了：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诗中所写的惶恐滩，是赣江一处激流滩头，在今江西省万安县。400年后，历史上演了类似的一幕：清灭明。明朝伟大的哲人、科学家、政治家方以智被清捕获，途经惶恐滩，不禁想起了文天祥，他仰天长叹，在惶恐滩慨然自尽。

回首来看，北宋的最后一幕是在北归的途中，历太祖、太宗、真、仁、英、神、哲、徽、钦，凡九主，共167年；南宋的最后一幕在崖山的海上，历高、孝、光、宁、理、度、恭、瑞、帝昺，凡九主，共153年。两宋加起来共有三百多年。

第十三章 元世界帝国简史

180

至简中国史

蒙古前传：困境崛起，铁血统一

蒙古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起初并不生活于蒙古高原，其祖先是室韦人的支系，与鲜卑、契丹属于同一语系。隋唐时期，他们大体分布于大兴安岭北端与额尔古纳河一带。这一时期，他们还很弱小，被突厥称为靺鞨，处在突厥的统治之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室韦人的崛起与唐朝的强盛和扩张有一定关系。大约在7世纪，唐朝不断向北用兵，突厥备受打击，势力逐渐衰落，室韦人趁势摆脱了突厥的控制，转而向唐俯首称臣。也是在这一时期，室韦人不断向西迁徙，逐渐遍布于蒙古高原。

随着唐朝势力的扩张，原本继承突厥衣钵的回鹘政权在蒙古高原和西域的统治岌岌可危，势力范围迅速收缩。室韦人西迁的规模更加盛大。到了10世纪，室韦人遍布蒙古高原和西域各地。其中，蒙古支系主要生活在蒙古高原东部斡难河、土拉河、克鲁伦河的共同发源地不儿罕山（今蒙古国肯特山）一带。

到了12世纪，蒙古大概有四十多个较为稳定的氏族部落，大致可分为两支：尼鲁温蒙古和迭儿列斤蒙古。此时的蒙古部落四分五裂，矛盾重重，不仅内部纷争不断，还经常与同样生活于蒙古高原的蔑儿乞、塔塔儿、克烈、乃蛮等部落产生摩擦。蒙古和其他部落先后受到辽（契丹）和金的统治。

时势造英雄，蒙古后来的崛起与孛儿只斤氏族的强盛息息相关。

孛儿只斤氏族是蒙古的“黄金家族”，但这一荣耀不是天然的，而是在生存竞争中拼杀出来的。在孛儿只斤氏族内部又分化为几个支脉，其中孛儿只斤·铁木真的曾祖父合不勒创建的乞颜部和合不勒的从弟俺巴孩创建的泰赤乌部是最强大的两个部族，担负着蒙古崛起的使命。

此时辽朝已经腐朽不堪，眼看要走向穷途末路。合不勒称汗后，试图摆脱外

族统治，但这为新兴的金朝不能容忍。金朝妄图继承对蒙古的统治权，想通过谈判迫使其屈服，但逐渐强大的蒙古人不愿再受欺压，谈判最终失败。金朝便唆使同属于室韦人的塔塔儿部进攻蒙古部。自此，蒙古草原开始征战不休。

合不勒、俺巴孩相继死去，合不勒的儿子忽图刺即位，继续与金朝和塔塔儿部作战。此时历史前台又走出一位英雄人物。忽图刺的侄子也速该作战勇猛，威望日隆，逐渐成为草原上一颗耀眼新星，为以后真正统一草原的儿子打下了基础。

抢掠是游牧民族存来已久的习惯，也速该就是在一次狩猎中偶遇同属于室韦人的蔑儿乞人的娶亲队伍，发现新娘子河额伦非常美丽，便抢夺回家，据为己有，而这个被抢来的女人就是铁木真的亲生母亲。

其实“铁木真”这个名字也是抢别人的。1162年，忽图刺再次率领蒙古军与塔塔儿人作战，也速该也随军出征。在一场战役中，也速该俘虏了一位名叫铁木真·兀格的勇士，恰逢河额伦为他生下一子，也速该十分惊喜，便也给儿子取名“铁木真”，亦是希望儿子成为像铁打一般坚强、刚毅、“志武功”的人。

铁木真9岁时，也速该带他去河额伦的娘家为他寻觅对象，路上遇到蒙古弘吉剌部的贤者特薛禅，后与他结为亲家。按照蒙古部落习俗，许婚后，男方要在女方家里住上一段时间。也速该便将铁木真留在岳丈家，只身赶回家中，不料半路遭遇塔塔儿部落，被毒死。

铁木真失去父亲后，开始了艰难困厄的青少年生涯。而早期衣食不足“艰辛而严酷”的生存环境，磨砺出铁木真赏罚严厉、黑白分明、说到做到的铁血性格。在他眼里，原则高于手足，秩序重于亲情。弟弟别克惕抢了他一条鱼、一只雀，被他亲手射杀，那时铁木真还不到10岁。

因为也速该的死，部落首领的地位也随之落空，但依旧有忠诚于铁木真的战士围绕在他身边。铁木真18岁那年，昔日仇敌蔑儿乞人抢走了他的妻子，铁木真向蔑儿乞部开战，打败了蔑儿乞人，名声小震。1184年前后，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乞颜部可汗。

铁木真治军有方，战斗力超强。他后来又在脱斡邻和扎木合的军力增援下，直取蔑儿乞人的老巢，由此声名日盛，军威大壮。面对铁



蒙古袭来绘词（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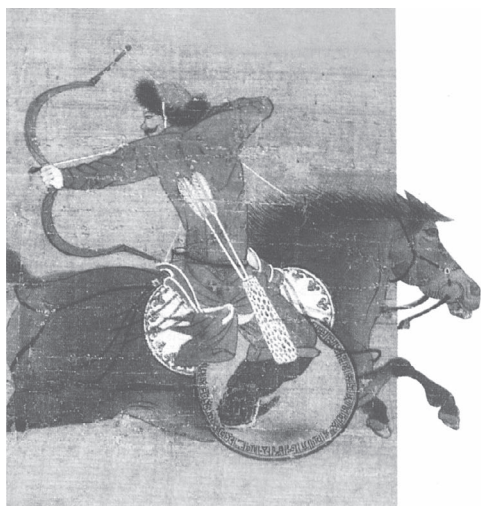
木真的崛起，曾经一同在草原上放过牧的发小扎木合是心悸的，尤其是铁木真的不辞而别，使得他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1191年，双方大战于克鲁伦河上游的沼泽区。由于双方军马各自组成十三个部分，这场战役就称“十三翼之战”。经过激烈鏖战，铁木真大败。

但胜利一方的扎木合为了打击和肃清政敌势力，将察合安·兀洼思的头砍下来挂在马尾上，又把赤那思部各氏的亲铁木真派族长，捉来活煮。这些泯灭人性的杀戮行为，让扎木合民心大失，众叛亲离，最终在后面与铁木真的较量中败下阵来。

在利益面前，草原上没有永远的结盟，落败的扎木合投奔了铁木真曾经的同盟兼义父王汗，小人的谗言和自身的狐疑，让这对义父义子的裂隙越来越大。而王汗手下小人们自导自演的草原版的“鸿门宴”未遂，直接把战火点燃。

南宋嘉泰三年（1203年），王汗儿子你勒合·昆桑和扎木合等人以王汗答应结亲的名义，邀请铁木真来喝“许婚酒”，企图擒而杀之。而率直的铁木真也没多想，带了十个随从，拍马而来。行至半道，一名叫蒙力克的随从突然勒住马绳，把隐隐感觉到的不安，说与铁木真听，铁木真觉得有道理，便拍马折回，免了一场血光之灾。

后来，敌方内部的分裂和铁木真战术上的偷袭，将土拉河流域（包括库伦）的老霸主王汗移出历史，又经一系列的征伐，铁木真先后吞并了南部乃蛮和北部乃蛮，至此，蒙古草原基本统一。公元1206年的斡难河大会上，44岁的铁木真被各部族拥戴为“成吉思汗”。



蒙古骑兵

成吉思汗的人生追求是什么呢？

历史记载了他的一次谈话。

成吉思汗问左右：对男子汉来说，什么是最大的快乐？

孛斡儿出回答说：“男子带着冬季羽毛脱掉、现在重新长满羽毛的灰鹰，骑着养肥的好马，穿着好衣服，在初春时出去猎取灰头鸟，这就是最大的快乐。”孛罗忽勒说：“放出鹰鹞，看它从空中用爪子击落灰鹤，这是男子汉最大的快乐。”

成吉思汗又问忽必来的儿子们，

他们答：“打猎时放鹰，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成吉思汗说：“你们说得不好。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骑乘他们的后背平滑的骏马，将他们美貌后妃的腹部当作睡衣和垫子，注视着她们玫瑰色的面颊并亲吻着、吮她们乳头色的甜蜜的嘴唇，这才是男子汉最大的乐趣！”^a

显然，放鹰猎狐、征伐四方，是蒙古蛮族领袖们的价值观主旋律。而此时的南宋，士大夫们的主旋律则是在春愁黯黯、杜鹃声里，把玩着艳词残酒、幽梦罗衣，为伊消得人憔悴。所谓野蛮，不全是贬义词，硬币的另一面是生命力的强悍旺盛。所谓文明，不全是褒义词，硬币的另一面是生命力的消褪。

铁木真本人并不知道，1300年前蒙古草原上有一个匈奴冒顿单于，曾有过跟自己类似的经历。只是历史到了此时，草原上的游牧铁骑依然强悍，但中原却已不是以前的中原了。当时的汉军可以阻挡住匈奴单于铁骑南下，且后来能发起大反攻，而现在羸弱的宋朝，她的命运除了被征服，岂有其他？

历史发展有种种巧合，不能说成吉思汗的力量远超前人，他的军队人数只有匈奴的一半，只是他的对手远远弱于前人。内亚史地研究的先驱之一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说过，如果不是因为恰好生在一个适当的时候，以及刚好活动在一个适当的地理区域，仅仅以成吉思汗的天赋，他本来成不了这么大的气候。

长生天之鞭：20万人征服欧亚大陆

民族本是一个生命有机体，求生存、求强大是其天赋本能。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后，继续挥鞭向世界远征。

蒙古人的扩张路线主要有三条：一条向西，一条向东，一条向南。

当蒙古人大举西征时，西域一带众多部族邦国望风而降，而蒙古人西进的脚步才刚刚开始。

1218年，蒙古大军灭掉辽朝残余、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这样，蒙古人的势力扩张威胁到中亚花刺子模（国名，又称“回回国”）的利益。

1219年，成吉思汗以商队被劫杀为由，亲率十多万大军前往征讨，经过连续几年用兵，花刺子模被摧毁，文明涂炭。后来，成吉思汗接受了全真道士丘处

^a（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61页。

机“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的劝谏，率部班师东归，留长子术赤镇守，又命哲别、速不台继续西掠。哲别征服俄罗斯钦察地区，一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拖雷扫荡呼罗珊地区，阿姆河北岸辽阔土地变为不毛之地。

随着蒙古大军东返，继续西征的蒙古军数量大为减少，到欧亚交界地带已是强弩之末，屡遭挫折。蒙古人开始将主要事业由开拓新疆土转为巩固对已占有地区的统治。

蒙古东征的主要目标是女真故地和高丽。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草原的战争中，金朝在其发源地东北地区的统治就不断受到撼动。蒙哥汗时，又继续向东进发，高丽也很快被纳入蒙古版图。若不是上天不眷顾，东征日本的元军几番遇到了“神风”（海上飓风），恐怕日本国土也囊括在了元朝的版图之内。

蒙古向南扩张的路线首先从西夏开始，接着是金朝，然后是大理，再后是南宋。在蒙古南下的进程中，蒙古、西夏、金朝、南宋各方时而结为盟友，时而反目成仇，但最终都没能改变命运。

1205年，蒙古军为了追击乃蛮部残余势力，第一次侵入西夏，劫掠大批人口、牲畜、粮草后退回蒙古草原。1207年和1209年又两度侵犯，终于迫使西夏纳贡称臣。此后数十年，蒙古、西夏、金朝三方时而结盟，时而反目。成吉思汗后来决意灭西夏，1227年，在他病死后，继任者遵照他的遗命灭掉了西夏。

1229年，窝阔台即大汗位，灭金成为头号征伐大事。事实上，早在1208年成吉思汗获悉卫绍王当上金朝皇帝时就下定决心灭掉金朝。为此，成吉思汗做了多年准备。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金朝终于在1234年灭亡。

经过多年战争，蒙古人在欧亚大陆腹地建立了四大汗国（后来又在东方建立一个“元朝”，与四大汗国并列），四大汗国分别是：金帐（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儿汗国、窝阔台汗国。

窝阔台汗国（1225年—1309年）由成吉思汗的三子窝阔台创建，统治区域在今新疆、中亚地区一带。

察合台汗国（1227年—1369年）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统治区域在今天山南北及阿姆河、锡尔河之间。

金帐汗国（1219年—1502年）又称钦察汗国，为成吉思汗的孙子、术赤的儿子拔都创建，统治区域在今东欧、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北高加索地区。

伊儿汗国（1256年—1388年）为成吉思汗的孙子、托雷儿子旭烈兀创建，统治区域在伊朗、伊拉克一带。

日本学者（如杉山正明等）看待蒙古人所建立的帝国，常用一种世界史的眼

光，他们认为元是一个世界性帝国，而不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实际上，“元朝”也确实只是蒙古帝国的一个侧面和一个部分，其首领第一身份是世界的大汗，其次才是建都在中原的王朝的皇帝。

跟一般人想象的不同，当时的蒙古兵数量其实并不多：蒙古统一时，仅仅只有不到 13 万军队，成吉思汗西征之时，也不过 20 万人。西征路上，两倍于蒙古军的花剌子模（约 40 万人）被轻易灭掉；2 万蒙古军北侵，先败钦察、阿兰等族，又败罗斯军十余万。最不可思议的是南宋：南宋人口最高峰时期超过 5000 万人^a，但是被人数只有其零头的蒙古人彻底征服了。

蒙古习惯以屠城方式征服。《多桑蒙古史》中载，蒙古兵多用诈术，不惜以种种誓言许诺诱敌开城，对方相信而开城乞降后，仍然尽屠之。书中还载，旭烈兀西征时，一个蒙古骑兵冲进一个阿拉伯村，下令所有男女老幼站成两排，用绳子把对面的人和自己的手绑在一起，然后该蒙古人手起刀落，全部屠杀。而克赫拉特城更是惨绝，城中几十万居民几乎被屠尽，只有 40 人幸免于难。

蛮族入侵：蒙古征宋战争

西夏和金朝覆亡，下一个目标就是南宋了。

宋与金虽有世仇，但双方此时已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南宋决策集团十分幼稚，在灭金之后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光复”机遇，便趁蒙古人撤退时挥师北上，确实“收复”了不少金人从祖先手中夺走的失地，但也给蒙古人留下了违约的口实。

蒙古灭宋经过精心筹划，先后开辟了三个重要战场，从西向东依次是四川战场、荆襄战场、两淮战场。

蒙古灭宋战争的关键在西线。蒙哥的弟弟忽必烈的策略是绕道已经归附蒙古的吐蕃，先攻取大理国，再用大迂回的方式包抄南宋西南，与北线同时进攻，对南宋造成合围态势。经过几年经略，蒙古军最终征服了大理国，威胁到南宋西南边境地区，忽必烈的战略设想基本完成。

眼看神州陆沉，南宋统治者不顾偏安政权岌岌可危，依然花天酒地，得过且过，俨然沉醉于末日的狂欢。在某种意义上说，南宋汉人在 13 世纪出现的生存危机，其领导集团负有最大的责任。看看南宋的淫诗艳词就知道，当时的领导集

^a 此据赵文林：《中国人口史》。

团只不过是一群风雅的腐化分子。

此时已是宋理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距赵构携宋室南渡已有百余年。像岳飞这样能征善战的武将基本上已被赵家君臣拔除净尽，东南一隅的南宋朝廷里，只剩下一个不知进取的皇帝和一群毫无韬略的庸臣。外面的战场上，零星地闪烁着几颗像杜杲、王坚这样的抗敌将星，也在强大的蒙古铁骑面前显得格外单薄，再加上像贾似道、郑清之这样的国家蛀虫存在，南宋残喘了它最后的44年。

宰相贾似道，自恃权势熏天，甚至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当襄阳被困时，边关告急文书频频传来，他却迎娶众多娇妻美妾，在温柔乡里流连忘返，置国事于不顾。《宋史》记载：“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取宫人媚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唯故博徒日至纵博，人无敢窥其第者。其妾有兄来，立府门，若将入者。似道见之，缚投火中。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所狎客入，戏之曰：此军国大事耶？”

由于贾似道欺上瞒下，朝野上下都歌颂他是治世能臣，异己分子早被他打压下去，皇帝也对他十分倚重，特许他不必像其他臣子一样经常朝拜，还不用像百官一样行大礼。有一年宋度宗祭祀时天降大雨，胡贵妃的父亲建议度宗回宫，惹恼了贾似道。他假装弃官归乡，以试探度宗的反应。由于贾似道早被包装成“千古贤相”“军事奇才”，度宗苦苦哀求，对他百依百顺，为了迎合他，还把胡贵妃送去当尼姑。更荒唐的是，贾似道还将蟋蟀带上朝堂，虫鸣声不断，有一次蟋蟀跳到皇帝胡须上，皇帝也不介意。一面磨刀霍霍，一面醉生梦死。两军尚未开战，胜负已判。即使没有蒙古人入侵，南宋也撑不了多久。

1256年，蒙哥汗下令总攻：一路进军河南，兼顾两淮和荆襄战场，由铁木真幼弟的孙子塔察儿统领（后因进展不顺，改由忽必烈统领）；一路由云南回师荆湖，由留守大理国故地的兀良合台统领；一路出兵巴蜀，由蒙哥亲自统领。

蒙哥亲率的军队是蒙古精锐部队，与原本在四川作战的纽璘部会师后，一路攻城略地，但却在钓鱼城栽了跟头。该城守官王坚有文韬武略，率领军民做独立作战、长期坚守的准备。蒙古军反复尝试各种办法围攻了五个月，损失惨重，硬是没能将钓鱼城攻下。

时至酷夏，士气低落的蒙古士卒难以适应四川盆地的湿热气候，恶疾蔓延，霍乱流行，蒙哥只得下令用酒对付瘟疫和湿气。而此时的钓鱼城内依然粮草丰足，士气高涨。蒙哥十分不解的是，区区山城如何解决庞大的后勤物资供应？此时，守城军民为羞辱蒙古军，向城外抛掷上百张蒸面饼和两条大鱼，附带纸条说：钓鱼城数年前就开始囤积物资，准备战争了，你们北兵可烹鱼食饼，我们

再守十年都没问题。

不久，蒙哥在军中暴毙，蒙哥之死是历史上的一个悬案。《元史》的说法是蒙哥因为水土不服，早在六月就患上了病，拖到七月才死的。南宋的官方说法和《合州志》等资料则说蒙哥是被守军射死的：七月，心急的蒙哥赤膊上阵，亲自带人到城下进攻。王坚率军用猛烈的炮火、矢石反击。蒙哥在作战中负伤，熬到二十七日死在军中。后来，马可·波罗来元朝游历的时候，还从元朝的朝野上下听到有关蒙哥被钓鱼城守军打死的传闻。

蒙哥一死，蒙古汗位之争又起，蒙古大军在全世界的进攻触角随之收缩。

蒙古人的汗位继承，向来没有什么成型的规则，有尊长的时候，大家通过部族大会，开会讨论，推举表决；没有尊长的时候，则又发挥了他们“抢”的专长。正在前线的忽必烈火急撤回，参与汗位的争夺。除忽必烈之外，还有四个竞争者：忽必烈的亲弟弟阿里不哥（“不哥”二字是史官故意如此翻译的，以示贬低），蒙哥的四子昔里吉，成吉思汗最小的儿子帖木格的玄孙乃颜，成吉思汗的二儿子窝阔台的孙子海都。最终，阿里不哥被打败，昔里吉被流放，乃颜被杀死。最顽强的是海都，忽必烈抓不到他，他对忽必烈成为大汗也不服，一直以西部为根据地进行军事挑衅，直到忽必烈去世。

1260年忽必烈夺得汗位，建元“中统”，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元朝”由此建立。

忽必烈在蒙古历史上，是跟成吉思汗一样重要的人物。当时跟他有过直接接触的人，留下了若干资料，他们无不折服于忽必烈的神武大略。而忽必烈本人，也十分关心自己的历史地位。还在漠北时，忽必烈便曾经多次问左右文臣，历史上有那些伟大的皇帝，其事迹如何，据说他尤其佩服唐太宗李世民。

就在忽必烈回头夺汗位之际，跳梁小丑般的贾似道出现了。忽必烈决意主力回师，只留一小部分军队在鄂州摆个东攻的样子，无意中却吓到了驻守湖北黄州的贾似道。这位全军司令员（右丞相兼枢密使）先是背着皇帝私寄



元世祖出猎图（局部）

降表求和，称臣贡银，给正要撤军的忽必烈一个安心的台阶下（免去撤军时宋军偷袭的顾虑），然后自己跑到皇帝面前骗说打了个大胜仗，把胡族小儿打回了草原。这还不算，当湖南的兀良哈台也接到撤军命令，在全军差不多全都渡过长江的时候，无聊的贾似道又突然予以偷袭，杀了一百多人。而当对求和信以为真的忽必烈派“信国使”来收缴“岁币”时，急眼的贾似道又叫人把“信国使”关禁起来，正好让忽必烈出兵南宋找到了借口。这样，南宋丞相贾似道出色地完成了“两大使命”——“掩护”蒙古军安全撤退，为蒙古军攻宋提供口实。

抢来汗位的忽必烈巩固政权后，又开始思索灭宋的计划。一些将领为邀功请赏，鼓动他攻打南宋。由于蒙哥攻宋受挫，忽必烈不愿再打无把握的仗，而是对下一步战略战术有全盘审慎的考虑。此时，一位知悉南宋虚实的降将刘整对他说：“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之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此言正中下怀，忽必烈决意再攻南宋。

1267年，忽必烈以南宋囚禁蒙古使臣为由，大举伐宋。与蒙哥主攻四川不同，忽必烈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只用小股力量牵制四川的宋军，而以主力进攻荆襄一线，然后向东南推进。这一策略为元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不过攻克襄樊也费尽了周折。

襄阳、樊城地处汉水南北两岸，是扼守长江的屏障，易守难攻，有“襄者，东南之脊，无襄则不可立国”的说法，可见其战略地位。襄樊兵精粮多，守城军民同仇敌忾，斗志昂扬，虽然在真实的历史中，并没有金庸笔下郭靖这样禀赋绝世武功的大侠的相助，当然也没有杨过拔剑碎石，击杀蒙哥的传奇剧情，但在吕文焕、范天顺的团结抗御之下，元军用尽各种办法，却屡屡受挫。

后来，元军不断增兵，并采用降将张弘范的计谋，断绝襄樊之间的水上联络，用“回回炮”轰击城墙。就在襄樊岌岌可危的时候，“不战不和”的贾似道效率极低，救援懈怠，调度出来的援军寥寥无几，又为元军攻克襄樊间接“立功”了。城破后，宋军与元军展开巷战，终因寡不敌众，城池失守。

襄樊之战后，元军长驱直入。宋军将领范文虎、吕文焕等率众投降，南宋朝廷岌岌可危。

此时南宋皇帝是4岁的小娃娃恭帝，由谢太后垂帘听政。整个形势对元军十分有利，但忽必烈依然发扬其谨慎的优良作风，不敢轻敌，不肯妄杀，对降将多加抚略，逐渐巩固了战果。1275年，南宋权臣贾似道率领精兵十三万到芜湖堵截元军，但元军气势如虹，宋军一触即溃，兵败如山倒。元军乘胜追击，一路攻克建康（今南京）、扬州、镇江、常州、平江（今苏州）等，兵临南宋都

城临安（今杭州）。

南宋朝廷眼看就要覆亡，群臣纷纷弃职出逃。主事的只剩下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谢太后不得已，派左右丞相吴坚、文天祥见元军主帅伯颜，乞求和解。伯颜一面假意谈判麻痹南宋，一面暗中调集军马。时机成熟后，元朝灭宋决心已定，谈判必然破裂。伯颜讽刺宋使说：“你们宋朝祖上从小儿之手得天下，现在又要从小儿之手失天下。”谢太后望了一眼朝臣所剩无几的殿庭，再看看皇位上那个不知惆怅、略微惶恐的娃娃，心恨伴着耻辱，颤抖地捧起了那尊沉重的传国玉玺。元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临安城，南宋灭亡。

伯颜对和平占领临安志得意满，写下了一首诗《奉使收江南》：“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与蒙古人惯用的屠城相比，这次并没有那么惨烈，但深埋在被征服者内心的剧痛却无处宣泄，悲伤已逆流成河。南宋就这样灭亡了，当时中原华夏之天下就这样丧失了，有史以来第一次。

这是一场惊险的整体生存危机，一次中原华夏全体灭绝的危机。当年成吉思汗的近臣曾认为汉人没有用处，建议全部杀光，将中原一律改为“草木畅茂”的牧场，成吉思汗觉得有理。此时，幸有亲汉的重臣耶律楚材反对，很巧妙地说，留下汉人干活、交税，每年有大量的财富收入，不是更好吗？^a民族整体的存亡给人的感觉似乎重大而遥远，但在历史的这一瞬间，它差点成为事实。假如耶律楚材缄口不言，历史恐怕也会因之改写吧！

南宋朝廷将都城临安拱手让予元军虽然避免了一场血雨腥风，但对仍然在坚持抗元的军民来说无疑是一场战略上和心理上的失败。

临安受降后，元军如摧枯拉朽般扫灭坚持抵抗的南宋军民。崖山之战是元军与宋军之间最后一场较大规模的战役，经此一役，南宋水、陆军皆失利，难以再形成有效抵抗。在崖山之战前一个月，四川钓鱼城守将在得到元军不屠城的承诺后出降，巴蜀也被纳入元朝版图。

崖山之战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经此一役，南宋汉人抵抗势力被消灭殆尽，元朝最终统一中国。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完全被北方游牧民族统一，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被少数民族统治，古典意义上的华夏文明进程被落后的蛮族入侵打断，面临整体断代和灭绝的危机。

从各个原创文明的历史发展实践和运行轨迹来看，华夏文明若要向更高层级

^a 《元史·耶律楚材传（卷146）》。

进化需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要有一个有强烈进取心的领导集团，另一个就需要依赖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完善。到了宋朝末期，权贵集团内部贪污腐化成风，贪图享乐不思进取，大量有抱负的杰出青年才俊埋没民间，正直能干的官吏遭到排挤和打击，国家无法正常选拔优秀人才进入国家机器和权力机关，使得外部危机来临时，庞大的国力和民力完全无法正常发挥和施展出来，核心关节的腐朽和不堪一击使得这场对决毫无悬念地很快结束，剩下的就是各地抵抗被各个击破和失去抵抗核心后呈现出完全的一盘散沙状态。

在整个蒙古征宋的过程中，充当绝对主力和急先锋的是蒙古汉军，即投降或掠至蒙古军的汉人。当汉人张弘范在崖山上刻下“灭宋于此”的纪念碑时，历史的这一幕是多么的反讽。

降元，殉宋，或纠结、痛苦、徘徊于两者之间，这是时人面对的艰难抉择。

像襄阳守将吕文焕，并不是一开战就想投降的。1267年，蒙古将领阿术、刘整等围攻襄樊，他苦苦地死守襄阳，却等不到朝廷可救城危的有力外援，这座孤城苦撑六年之后，最终被攻破，在非降即死的时候，吕文焕选择了活着，到后来文天祥骂他叛臣的时候，他是感到惭愧的。当他背负起沉重的千古骂名之前，有谁能体味到他的悲辛与无奈。

而文天祥本人，也有无奈的选择。在文天祥被俘前，他的弟弟文璧已在惠州降元，以后出任临江路总管。据说文天祥在写给三弟的信中说：“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一死、一做官（赚钱养家）、一隐（不合作），明确了三兄弟的分工。实际上，文氏家族的确是靠文璧赡养，文天祥被杀后，欧阳夫人由文璧供养，承继文天祥香火的也是文璧之子。这是文天祥在亡国和家族生存面前所做的无奈选择。

有人想独善其身而不得。曾经担任宋江西招谕使的谢枋得，曾五次拒绝元朝征召。在答复那些奉命征召的官员时，谢枋得说得很明白：“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九十三岁之母在堂耳。”“且问诸公，容一谢某，听其为大元闲民，于大元治道何损？杀一谢某，成其为大宋死节，于大元何益？”也就是说，他承认宋朝已亡，元朝已立，只要元朝不逼他出来做官，愿意当一名顺民，不会有什么反抗的举动。但元福建参知政事魏天祐逼他北行，他最终只能在大都绝食而死。

有人选择坚决反抗，例如李璫。李璫的父亲李全是山东一方诸侯，蒙古人来袭，他婴城抵御，城破受降，归顺元朝，与宋对抗，后被宋军乱枪刺死。杀父之仇很重，但山东世侯李璫，虽然沿袭父亲的职位，却拥兵自重，敷衍元人，最终

叛元归正。而李璫期望与自己联手的军阀们却没有被李璫的英勇揭竿感染，作壁上观，任李璫成孤城困兽，最终被俘处死。家仇，国难，抗争，冷眼，热血，算计，这就是蒙古铁骑面前，时代真实的心境。

看一下总体情况：日本学者植松正《元代江南地方官之任用》一文，曾分析南宋进士入元后的政治动向。现有史料可稽之151人中，退隐不仕者84人（55.6%），出仕元朝者57人（37.8%），动向不明者10人（6.6%）。而在出仕元朝之宋进士57人中，22人仅担任学职。而陈得芝《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对所辑得宋理宗、度宗二朝进士在宋元之际的动向作出统计：以身殉国者71人（21.65%），入元隐遁不仕者174人（53.05%），归降及出仕元朝者83人（25.3%）。

压迫统治：四等人制度与“达鲁花赤”

古来建立征服王朝的各北方民族中，蒙古与汉文化差距最大，因而对中原传统尊崇最少。元朝建政后，一些野蛮、蒙昧的思想和习惯依然存在。

宋代的人权已经较前代有长足发展，元朝时则出现大倒退。元朝时期有四等人制度：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四等人制度虽然没有正式的官方文件，但一直存在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

元朝的法律明显体现了种族压迫：蒙古人、色目人殴打汉人、南人，对方不得还手，只许向官府申诉（申诉结果可想而知）。即使汉人被打死，行凶者也不过出些丧葬费，只需鞭打五十七下，最多充军而已。但汉人侵犯蒙古人、色目人的后果就很严重了。行凶者本人被严厉处死不说，家族也多受牵连，家产充公，纵使只是犯小罪，也会受到严厉制裁。另成吉思汗法令规定，杀一回教徒罚黄金四十巴里失，杀一汉人则只需赔偿一头驴的价钱。而一些被称为“驱口”（战争中掠夺来的奴隶）的待遇竟和牲口一样，他们被放在与马市、牛市同列的“人市”上明码叫卖，有的甚至被卖到海外为奴。

元时又有规定：汉人不能田猎，不能习武，不能聚众祠祷、买卖，不能夜行，禁民间持有兵器（辽、金亦禁民间兵器）。任用官吏方面，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的正官一般非蒙古人不授，次要官吏和地方官吏也以蒙古人和色目人居多，汉人、南人只作为补充。

元朝的治理，采用蒙汉并行的双轨制，例如“达鲁花赤”制度。达鲁花赤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各级的“一把手”，像党委书记，汉人副之，从

事具体行政事务。

元朝统治者虽然没有文化，却有一些天然的政治嗅觉，感到儒家学说是很便利的统治工具。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就评论说：“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所以元朝也继续实行科举制。

然而元朝的科举成效甚微，几近名存实亡：整个元朝科举，总共不过二十次，且通过科举出身任职的人员并不多，“科举一岁仅三十余人”，取士名额明显偏向于蒙古人和色目人。且科场舞弊不断，充满腐败，使得科举混乱不堪，失其择才而录的本意，而由于等级压迫，具有真才实学的汉人、南人多不屑应举，失意无聊之际，乃创作一些杂剧散曲。

经济方面，元朝时期出现了大倒退。据经济史专家、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绩效》，公元元年，中国的汉朝与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到12—13世纪之际，中国的人均GDP忽然被西欧拉开了距离。

宋代中国的科技水平世界领先。到13世纪，中国已经很接近近代社会，许多方面甚至超过工业革命前的英国，达到了全面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门槛（著名学者李约瑟观点），可到了关键时候，却没有“破门而入”。原因呢？学界给出了各种解释，但我们也注意到，停滞和倒退，正好发生在元朝统治期间。

元朝的官方语言文字是蒙古文。大汗写给欧洲教皇的国书，与欧洲、东南亚外交通商等都用蒙古文（只有给日本国书用汉字以示友好）。故元时的皇帝大多不通汉文，甚至所用官吏，有时全省官员几乎全是文盲，无一人通文墨。元朝时期通行于汉地的公文，往往十分可笑。其文被称为“硬译体”，语汇用汉语白话，语法则为汉、蒙两种语言的杂糅，比如引用圣旨，后面除了要加个标志语“么道”外，还常用“圣旨行了来”“圣旨有呵”“诏书里行了来”等强调引用来自圣旨，格式为“……么道，圣旨行了来”；再比如“俺每世族皇帝根底奏来……么道”；做事叫作“勾当”，诸如此类。

任何一个政权都有其两面性，既有统治剥削的一面，又有善政治理的一面。所以在《元史》中，也经常可以看到“是月西和州、徽州雨雹，民饥，发米赈贷之”“宝庆路饥，赈粟米三千石”“遣使赈济南饥民九万户”之类记载，只是这一类善政治理，也是为了巩固其统治服务，读史者勿为浮云遮望眼。

政治紊乱：四十年间九皇帝

元朝皇位继承一直秩序混乱，皇帝的登基往往是各种势力角逐和妥协的结

果。忽必烈死后，后来的成宗、武宗的继位都扑朔而无序，两人都在三四十岁的年纪匆匆驾崩。之后的仁宗、英宗都有一定的儒学素养，仁宗在位时还一度恢复了科举，但这些措施却深深地刺痛了蒙古人和色目人的神经，仁宗酗酒无度，30多岁体垮早崩，英宗树敌太多，20岁出头在南坡遇刺身亡。

后边的皇帝，有的在争权中落败，有的早夭，有的在位上荒淫无道，尽现丑态。元朝中期的四十年间，走马灯似地更换了九位皇帝，人均任期不到五年。这九位君主，除了开国之君，很难再找出有所作为的人物。

《元史》载：哈麻曾教顺帝“演揲儿”一类的房中术，顺帝乐此不疲。顺帝又聘西蕃僧为国师，然后“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更为变态的是，顺帝“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然后召集一众宠臣，与舞女在大殿上群交，“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丑声秽行，太子恶之，顺帝竟劝太子：“秘密佛法，可以延寿”，不如一起腐败。于是命令秃鲁帖木儿教太子房中术，太子学后惊喜道：“李先生教我儒书多年，我不省书中所言何事？西番僧教我佛法，我一夕便晓。”

这个时候，蒙古人所建的横跨亚欧的大帝国已走过了它的鼎盛期，四大汗国，权势消长，蒙古人的绝对统治渐渐衰弱，最终灭亡或变质：蒙古人在北部钦察汗国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上半叶，分裂后，被伊凡四世建立的俄罗斯蚕食吞并；察合台汗国在秃黑鲁帖木儿统治时期，用强制手段迫使天山以北16万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窝阔台的大汗在争夺王位中落败，部分归附钦察，部分并入元朝；而伊儿汗国在合赞汗时，取名穆罕默德，自号素丹，改宗伊斯兰教，进行了一系列穆斯林化的改革，蒙古贵族和伊朗贵族日益合流，变成一个伊斯兰国家。在最东边，伴随整个元朝始终，汉人的起义和反抗也从未停止。

在中国的元朝，蒙古铁骑用烈马弯刀拓宽了疆域版图上未曾有过的宽度，然而其野蛮黑暗的统治又快速削减了这个王朝时间上的厚度，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庞大帝国，自灭宋后维持了还不到100年（99年，自建“元”起共109年），就迎来了它的末日。

日薄西山：元朝苟延残喘之路

经历元中期的政治纷争，到了顺帝时，元朝才慢慢适应在中原的统治，逐渐有些稳定，不过此时政权已经进入了末期。

顺帝即位伊始，政局依然动荡。权臣燕铁木儿死后，曾做过其副手的伯颜取

代了他的位置，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人物，皇帝沦为陪衬，以至于史书记载：“天下之人，唯知有伯颜而已。”

为了迎合蒙古贵族，争取更多的支持，伯颜严厉打击汉大臣势力。他重申“四等人制度”，强调蒙、汉族群隔阂，还取消了科举制度。他曾劝谏顺帝说：“陛下有太子，休教读汉儿人书。汉儿人读书，好生欺负人。往时我行，有把马者，久不见。问之，云：‘往应举未回。’我不想科举都是这等人得了。”不仅如此，还禁止汉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

在文的方面如此，在武的方面也不例外。他规定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兵器，连铁叉之类农具都不允许使用，马匹也多被没收入官府（顺帝天历元年，从民间搜刮十一万余匹；元在数十年间，共搜刮民间马七十余万匹）。更有甚者，伯颜还向顺帝建议杀光张、王、李、赵、刘五姓汉人，欲行种族灭绝，顺帝不从。

伯颜权势熏天，似乎有取皇帝而代之以的趋势，终于引起了顺帝的不安。

这时，伯颜的侄子脱脱走向历史前台。脱脱料到伯颜在自掘坟墓，早晚会遭到清算，担心自己因与伯颜有亲缘关系而被株连，便主动向顺帝示好，大义灭亲。他与顺帝合谋，趁伯颜外出狩猎之机诏令任命其为河南行省左丞相，后诏徙往广东阳春。伯颜在奔赴途中病故。

伯颜一死，脱脱摇身一变成为中书省右丞相。新官上任三把火。脱脱一上台就采取了一系列“更化”的举措。先是将年号由“至元”改为“至正”，后又恢复科举考试，广泛延揽人才，尤其注重对汉人的笼络，还组织编修了《宋史》《辽史》《金史》。这些举措的确维护了元朝稳定，缓和了社会矛盾。当时就有“马中佛朗马，人中有脱脱”的说法。算起来，脱脱堪称贤相。

不过，历史发展大势不是一二个贤明的人所能改变的。顺帝朝的政治新气象是元在中原统治的回光返照，纵然迷人，终究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开河和变钞是导致其灭亡的两大诱因。

1344年，脱脱被排挤辞相。这一年刚好黄河下游普降大雨，河南地段的黄河两度决口，洪水夺走农田牲畜，导致饥民遍野，“匪患”猖獗。当权者无奈，只好请脱脱再度出山。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脱脱意识到治河需要充足的财力，但无处筹钱，怎么办？此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冒出来：变更钞法！1350年，他不顾朝野反对，以发行的新钞来贬抑流通于民间的旧钞。目的是把民间的财富搜刮上来弥补财政亏空，结果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百姓更加贫困。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措施实质上是公然掠

夺百姓的财产。原本色目人理财时推行的扑买包税制度，大量发行纸钞，就导致了通货膨胀，此时更是雪上加霜。

1351年，朝廷命贾鲁负责治河，征调民夫二十万，耗时半年多，终于使得黄河改道向南夺淮河入海。

脱脱虽暂时应付了经济问题，但无异于饮鸩止渴。其实，此时的元朝就是一座将倾的大厦，民变、起义、争斗、腐化，自内而外透露着腐败和行将就木的气息，而脱脱是支撑这座大厦最后一根折弯的稻草，开河和变钞的火线一经点燃，这根稻草也只剩灰烬，大厦崩塌，只是时间问题。

元的统治不仅打断了华夏文明原先的发展进程，还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即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统治，其根本原因在于先进文明尚武精神的退化以及领导集团的腐朽衰败。元势力作为中华历史上第一个试图灭亡中原文明的尝试，在其初期不仅仅从肉体上消灭一切反对者和潜在的反对者，更是从精神上消灭中原传统文化，希望彻底地从整个文明系统中灭绝中原文明，但是由于统治水平太低，几十年下来发现不仅消灭中原文明已不可能实现，反而自己的统治都已经举步维艰，为了使行将就木的元统治能够苟延残喘，不得已才开始放松对中原文明传统的压制，以减轻巨大的统治压力，并且试图把元自身也包装成中原文明的传承者之一，但是历史不容更改和欺骗，各地的义军蜂拥而起，迅速地终结了元势力在中原的统治。

元末大起义与元朝灭亡

《元史》记录中，“盗贼”一直连绵不断。

早在忽必烈时代的至元二十五年，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就报告说：“江南盗起，凡四百余处。”江南，就是宋的旧土，正是“盗贼”最多的地方。“盗贼”是什么人？其实正是不甘做奴隶的义士。

到了元末，民间流传一首《醉太平》：“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这一切中时弊的小令广为流传，真切地道出了开河、变钞引发的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

元末大起义在各地爆发。

起义军首先打的是舆论战。当时流传着一首扶箕诗：“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这首诗真切地道出了元末

世道不公，充满杀气。艺术含量最高的当数红巾军的旗联：“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这是借反元复宋的旗号号召百姓响应。

治河工程刚开始，活跃于黄淮地区的白莲教首领韩山童等就编造了“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谶谣，散布在河工和周边百姓中，后来又凿了一尊一只眼的石像，还在石像后刻有几个字“石人一只眼，一出天下反”，并预先埋在河道中。当石人被挖出时，果然群情震动，要变天了。

韩山童见起义时机成熟，便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在颍上一带聚众起义。他被官府捕杀后，余众在刘福通领导下继续战斗。后来，起义烈火燃遍中原及周边地区。随后，徐寿辉、芝麻李、郭子兴、陈友谅、方国珍、张士诚等豪杰都聚众起义。

元朝统治者自然不甘失败，调集人马围剿起义军。刘福通、郭子兴等一批起义领袖在战斗中牺牲，张士诚等与朝廷时战时和，徐寿辉等在内讧中相互消耗。反元的接力棒逐渐转到朱元璋手中。

朱元璋所部在战争的历练中逐渐成长为一支强大的力量，麾下精兵强将如云。他的势力范围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后来，他在南方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势力，逐渐扫灭了群雄。此时元朝统治者还在忙着内部相互残杀，实力大大削弱。

南方各派势力被扫灭后，朱元璋出师北伐，很快击溃元军主力。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即位，建立明朝，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终结。

后来，朱元璋继续派兵驱赶元军，攻占大都，元顺帝逃亡蒙古草原。到达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政府所在地附近）后，据说御座上盘踞着几只狐狸，君臣一行都惊呆了，认为这是亡国之兆。顺帝叹息道：“天意如此，朕将奈何？”

尾声：蒙古人北逃后的命运

顺帝北逃后，西北、西南、东北一带仍有元将驻守，后都被明军一一击溃，上述地区都划入明朝版图。

蒙古贵族退居漠北后又维系了数十年政权，史称“北元”，势力大不如前。明朝决意彻底消灭元朝残余，便派遣徐达屡次率军征讨北元。

1388年，一支10万人的明朝军队在大将蓝玉的率领下在合勒卡河和克鲁伦河之间、贝尔湖南岸大败脱古思的军队，残元诸王、平章以下官员三千多人及军士七万余人被俘，脱木思帖木儿逃走后被其部将缢杀。

这次的失败使黄金家族——忽必烈家族的残元政权丧失了在中国人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至于大多数蒙古部落宣布脱离它而自立。1399年，分布在叶尼塞河上游沿岸的乞儿吉斯部首领贵力赤，否认了最后一任残元皇帝孛儿只斤·额勒伯克的宗主权，于1399年将其打败并杀死，取得了统治各部的霸权。至此，苟延残喘了29年的残元政权灭亡了。

塞北是蒙古人的发源地，此处适合蒙古骑兵活动，虽然明军占上风，却并不能将蒙古人赶尽杀绝。终明一代二百余年，汉人与蒙古人始终处于南北对峙的状态。后来，塞北蒙古人分化为鞑靼和瓦剌两部，与明朝时战时和。

到明朝末年时，蒙古人分为三部分，在康熙年间全部被清所统一。

早年随成吉思汗西征的蒙古人攻取中亚、西亚、东欧一带后，试图向埃及和西欧进军。埃及和西欧诸国奋勇抵抗，蒙古人进攻受挫，势力没有向非洲和西欧扩张。后来，“四大汗国”各自为政，彼此既有联合，又有矛盾，除金帐汗国外的其余三汗国于14世纪因内外交困而被突厥人建立的帖木儿帝国消灭，蒙古人与当地各民族融合在一起。统治区域在今俄罗斯、乌克兰一带的金帐汗国由于国内矛盾重重终于在15世纪末灭亡，分裂为克里米亚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喀山汗国、西伯利亚汗国等，直到16世纪被崛起的俄罗斯帝国摧毁。

就这样，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称雄多年的大帝国最终烟消云散，消逝在历史的尘埃中。

第十四章 明朝：西方向上，东方向下

明朝开篇：恢复中华

198

至简中国史

如果现代人穿越到朱元璋的成长环境，多半会失去活下去的勇气：1328年，朱重八出生在安徽濠州（今凤阳）的一户贫苦家庭。20岁之前，他一直在贫困和死亡线上挣扎。他曾给地主放牛，并在皇觉寺当过杂役僧。皇觉寺破产解散，他托钵四处乞讨。朱重八还在少年时，他的家人基本都已饿死或者病死。

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星火燎原，儿时的小伙伴汤和写信给朱重八，叫他一起入伙。25岁的朱重八收到信后，坐卧不安，又怕被人告发，又怕错失发展机会。他于是找朋友商量，又去求神问卦，最终下定决心，投奔到濠州红巾军郭子兴的麾下，成了一名士兵。朱重八很快脱颖而出，并改了一个高大上的名字：朱元璋。郭子兴死后，朱元璋便逐渐掌握了这支军队。1356年，朱元璋攻占集庆（今南京），改名应天府，并在此建立江南行省，拥兵十万。

此时，有数股反元力量，相互构成威胁：北有刘福通、西有陈友谅、东有张士诚。这些人的心思和理想各不相同，只有朱元璋的想法非常明确：他在研究刘邦、李世民、赵匡胤等人的往事。显然，朱元璋意在荡平四方、统一天下。

陈友谅是一支劲敌，朱元璋诡计与苦战并用，花费了四年时间，终于摧毁陈友谅部。之后，朱元璋又派遣徐达、常遇春等一路攻击前进，直取张士诚的都城平江（苏州）。张士诚年轻时也算是一代豪杰，称王后早把奢华享受当做人生首要目的，这时已经腐化得不像样了。张士诚战败之后，被擒至南京诛杀。

随后，朱元璋又于1367年冬和1368年，相继消灭了浙东方国珍、福建陈友定、两广何真的势力。

到此时，南方大局已定。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他又派徐达、常遇春率军25万，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为口号，挥

师北伐，向元大都（今北京）发起攻击。北伐军势如破竹，一路攻克山东、河南、直隶等地，最终在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初二攻入大都，残余政府向漠北逃窜，元朝灭亡。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以此为都，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明朝拉开了帷幕。

明朝恢复了华夏文明、承接了自古以来的道统秩序，被认为是正统的回归。例如明朝中期内阁大学士、被历史学家钱穆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流人物”的邱濬就曾赞美道：“幽燕沦于夷狄者四百四十八年，中原变为夷狄者二百四十一年，至是复归于中国，治教于是乎大明，彝伦于是乎复古。”因此，即便到了后期，皇帝的工作十分荒废，中枢决策系统有时处于半瘫痪状态，明朝政权也没有出现合法性危机。



朱元

朱元璋的个性和明初政治

朱元璋出身于社会最底层，文化水平不高，但一直勤奋好学。兴致来了，他也写一写打油诗。例如青年时这首《咏菊花》：“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看上去面熟？没错。看看下面这首：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巢《题菊花》）

倒也未必是抄袭，不排除他们同为农民军领袖，有着同样的感触。至于“我若发时都吓杀”这种唯我独尊之势，则让人想起下面这首：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毛泽东少年时作品）

不过，朱元璋的个性，在明初政治中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洪武十三年（1380年），位居百官之首的左丞相胡惟庸被朱元璋以“擅权枉

法”的罪名下令诛杀。

胡惟庸是元末知识分子，在明朝建国之前即归附朱元璋，后成为“淮西派”官僚的重要领袖。洪武六年，他开始担任右丞相，十年，又迁至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胡惟庸权力欲很强，由于官高位显，他日益骄纵，官员升降、处决犯人，都不经朱元璋批准；还私自截留官员奏章，不利于自己的一律扣押。朱元璋岂能忍受？于是，洪武十三年，胡的人生被画上了句号。

胡惟庸案带来一个重大的制度转折，它将昭示着在中国袭用了将近十六个世纪的丞相制度即将结束。为了稳固自己及后世子孙的皇位，在胡惟庸被诛后不久，他便下诏不再设置丞相这一官位，“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在后代史家看来，朱元璋废相早有预谋，明朝建国之后他就在不动声色地架空丞相的权力，胡惟庸成为了他这局棋中的一颗制胜棋子。

洪武废相后果严重。明朝后期不可思议的政治黑暗、糜烂，就与这一制度变化有重大干系。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评论道：“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宰相始。”

胡被杀后，朱元璋内心仍觉不安，于是对昔日功臣展开了大清洗。

主要方法是罗织“胡党”和“蓝党”案。

在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朱元璋制造出一个“胡党”的说法，相关人员的罪名，也增加了“私通日本”“私通蒙古”之类。由此，朱元璋牵连诛杀，一发不可收拾，经过一番屠戮，除掉的公侯大将文臣有二十余人，最终丧命的竟然有三万多人！

“蓝玉案”也大致类似。蓝玉本是明朝开国大将，曾经带兵深入漠北，在捕鱼儿海摧毁蒙古统治者大本营，捕获成吉思汗的后裔男女数千人，残元朝廷仅有大汗、太子等数十人逃走。蓝玉后因“谋反罪”下狱，被剥皮、抄家、灭三族，株连蔓引，被连带诛杀的竟有一万五千多人。

经过这两次大清洗，大明开国的元功宿将几乎被铲除殆尽。

除却胡、蓝两案之外，还有很多功臣也都以不同的罪名和方式被杀。徐达是朱元璋儿时的玩伴，跟着朱元璋打天下，功勋煊赫，被封为魏国公。他是个老实人，胆子很小，朱元璋还在做吴王时有一次为了试验他的野心，故意把他灌醉，扶他到自己的大王床上睡觉，徐达醒来之后，吓得魂不附体，在朱元璋面前叩头如捣蒜。即便是这样的老实玩伴，朱元璋也绝不手软。洪武十八年（1385年）徐达病了，生背疽，据说这病最忌吃鹅肉，然而朱元璋这个时候却恰恰赏赐给他蒸鹅，徐达老泪纵横，当着使臣的面吃下，不多日就一命呜呼。

朱元璋的恐怖政治远不止屠戮功臣，更有锦衣卫、廷杖、文字狱等等。

明朝初年的官场上，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清代学者赵翼批评朱元璋“残忍实千古所未有”，恰如其分。

朱元璋不忘初心，依旧痛恨官员贪污腐败。他规定，凡是贪污到六十两以上者，就枭首示众，剥皮实草，就是把贪官的皮剥下来，里面塞上稻草。明朝的衙门左边，建起一个土地庙，这是前朝所没有的，这个土地庙就是用来剥贪官污吏人皮的场所。而且在官府的公座旁边悬挂上这些人皮稻草，用来警示官吏，十分惊悚。除此之外，惩治犯罪官吏还有许多种酷刑，如凌迟、抽肠、刷洗（用开水浇人，然后用铁刷子刷）、秤杆（用铁钩把人吊起来风干）、阉割、挖膝盖等。在残酷的严刑峻法之下，据《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的统计，大小官吏因贪赃等罪遭到枭首、凌迟、族诛的有几千例，弃市（杀头）以下的达一万多例。

明朝中期以后，腐败程度堪称登峰造极。然而，靠人治不可能根治腐败。

在朱元璋的残暴和独断专权之下，明初政治充满腥风血雨，也给后世带来了很多不良影响。不过朱元璋也有不少治国成绩。由于他的严厉惩治，使得明初吏治在上百年时间内较为清明，人民所受压迫大为缓解；他还重视学校和科举，当时的中央有国子学，府州县卫都有学校。经济方面，他鼓励百姓垦荒，并且轻徭薄赋，还兴修水利，鼓励种植经济作物。其为整顿赋役而设立的黄册、鱼鳞等户籍档案登记制度，清代一直延续，至今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明朝失败的帝王教育

朱元璋头一次当皇帝，颇没有头绪，经常询问，当皇帝首先该读什么书？他所询问的文臣，也就是当时所有的知识界精英，都跳不出南宋理学的手掌心——一种文化一旦形成，身处其中的人们就会被此文化所形塑。对这些儒生们来说，心性之学最为崇高。没有人给朱元璋推荐《商君书》或者《管子》，当然，那时更没有《联邦党人文集》或《政府论》可供推荐。

朱元璋问大儒宋濂，宋濂推荐《大学衍义》。此书是宋代真德秀所著，主旨是推衍《大学》之义。《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并称儒家经典“四书”，它讲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内容包括了儒家的一整套伦理、哲学、政治思想，后世儒者奉其为“帝王之学”。

在宋濂看来，政治的关键在于君主的道德，他觉得，只要帝王有德，天下一

一切都自然而然地顺了。宋濂在“辅导”朱元璋以及教育太子时，特别强调理学家的“治心”“养心”“去欲”“持敬”等观念。而管理所需要的实务知识，如经济、军事、战略、法律等，却并不在他的认知图景之中。

朱元璋戎马一生，喜爱兵法。一次，朱元璋向宋濂讲起了《黄石公三略》。这是古代一部兵法书，相传其源出于姜太公，后来有一个神秘老人把它传给汉朝开国名臣张良（其实书中有很多后人附会的内容）。朱元璋讲得起劲，而宋濂听得意兴索然，劝谏朱元璋说：《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等，那才是有关治国的“大经大法”，而且讲得全面透彻，愿皇上留意研读，了然于胸。

无独有偶。朱元璋又问范祖干，范跟宋不谋而合，推荐了《大学》。朱元璋问治国之道，范祖干昂然回答：不出是书。

朱元璋文化不高，但实战经验丰富。他对这群儒生的话，不太相信。后来他在选太子师时指示文臣们说：“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词章而已。”实际暗讽文人只会“记诵词章”，不务实。洪武九年，在授翰林学士承旨的赐诰中，他更是不客气地评论宋濂的弱点“才不兼文武”，迂腐呆气。所以，他决不会真的照宋濂的那套去办。政治权力的运作，绝不是《大学》所能解释的。

宋濂一生都在试图教化皇帝，而他自己的下场就是这场教育败局的注脚：他的孙子卷入“胡惟庸案”，最后被杀，宋濂自己也被株连，在 71 高龄时被流放到僻远的茂洲，第二年绝食死在流放途中。

宋、范二人，十分具有代表性，他们的观念是明朝士大夫们的共识。整个明朝的官僚体系，就是在这种基本观念指导之下运转的。

到明代中后期，讲官们大多迂腐空谈，不务实际，“问钱谷（财政）不知，问甲兵（军事）不知”。例如嘉靖年间，有一个吏部侍郎湛若水，被称为当世名流，但是他的学说“随处体认天理”，有人问怎么抵御倭寇，他昂然回答说：主要靠“修孝悌忠信”，引来一片窃笑。

一个人生活在一种文化中，就会为其所塑。明朝的帝王教育，看似集中了最精华的教育资源，但放在历史长河中考察，恰可以作反面教材。有明一代两百多年，以道德说教为核心的帝王教育思想一以贯之，作为自然的延伸，一切政治事务也道德化，于是上演出接连不断的大败局。

明代大臣和讲官对皇帝进行了摧残人性的填鸭，最终把皇帝培养成了一个昏君。

明代大臣希望皇帝日夜苦读，并且要达到“私欲尽去”的超高境界。他们以为，长此以往，皇帝必会接受儒家教化，摒弃私欲，成为一个“圣贤之君”。

他们要杜绝一切外在诱惑，“于凡言语必教之以真正之音，而非礼褻狎之语，不使之闻于耳。于行步必教之以端庄慎重，而非礼邪僻之事，不使之接于目。内廷之宴，钟鼓司承应，不使之观；元宵之节，龟山之戏，不使之见。至于佛老之教，尤不宜口诵其言，目观其像而信之。游戏之事，不宜任其所好，遂其所欲，而嗜之深”，同时通过教育让皇帝意识到天理、人欲的关系，“天理人欲不容竟立”。

连业余爱好也不准有。朱瞻基当太子时喜欢诗，希望大臣推荐历朝诗歌，重臣杨士奇却一顿说教：“帝王之学所重者不在作诗。太祖皇帝圣学之大者，在《尚书注》等书，作诗特其余事。”最终没有答允。神宗很喜欢书法，字写得也好，颇为得意，曾经手书一副对联赠给太傅张居正作为答谢礼物，谁知张居正第二天就义正词严地请求神宗将重心放在学习义理方面，不必再练字。

明代讲官一般都是耆老凤儒，如武宗朝的刘健、李东阳、马文升、韩文、谢迁等人，既是最重要的阁部辅臣，又曾是太子的讲官，他们的平均年龄已在70岁左右。而他们辅佐的新君或太子大多青春年少。讲官整天在小皇帝或太子面前念叨的除了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就是四书五经，内容艰涩玄妙。这种状况恰与内廷宦官为博取太子一笑而精心安排的校阅骑射、弯弓射箭、巡幸西苑等活动形成鲜明对照。毫无疑问，皇帝或太子更愿意接近内宦，与大臣日益疏远。

明代16位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独具特色的群体，他们多任性而行，背离皇帝的角色身份，不仅影响朝政，影响社会，也影响了国运。明中后期皇帝（从英宗开始）几乎都不称职，终沦为“问题皇帝”。明代皇帝和储君教育的失败使他们不仅不具备国家最高首脑的素质和能力，而且个人德行低下。

明代几个“坏学生”皇帝，如宪宗、武宗、世宗、神宗、光宗、熹宗在执政期间都出现很多问题。宪宗宠幸大自己19岁的万贵妃，任其专横跋扈，为非作歹；武宗堂堂帝王竟以大将军自居，住“豹房”（内有男宠），抢民女，终日巡游不肯回京；世宗崇信道教，任用青词宰相，常年不上朝；神宗“酒色财气”俱全，30余年不上朝，派矿监税使骚扰天下；光宗好色，一粒红丸命丧黄泉；熹宗沉迷木艺，朝中诸事悉托魏忠贤，等等。明王朝在这批皇帝的统治下日益衰败。

明朝的制度设计，使得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而皇帝如此不堪，国家的命运可想而知。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市民文化汹涌澎湃，人文思潮极具个性，连同国际格局翻天覆地的变化，近代曙光一一出现，总之，历史赋予了大明宏大、灿烂的时代背景，但朱明王朝的皇帝们却无力掌握历史赐予他们的机缘，只是尽情享受皇位带来的特权，忽略了对整个帝国的责任，使得中国逐渐丧失世界强国与贸易中心的地位，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宣扬国威与万国来朝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他在遗诏中自我评价说，自己一辈子为了国家十分勤劳、十分辛苦，然而毕竟没文化，比古人差得远（“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这番话貌似诚恳谦和，但却没说出最核心的真相：他后半生所作所为，几乎全都是为了稳固自己的一家之权力。

他在遗诏中还机警地嘱咐，所分封镇守边疆的几个皇子，都在原地哭丧，不必到首都南京来——继承人皇太孙朱允炆年幼，儿子们如果带兵来到首都，很可能发生不测。

但他所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燕王朱棣公然起兵夺权。

经过苦战，朱棣的军队攻破南京城，朱允炆失踪。

公元1402年，朱棣登基称帝，是为永乐皇帝。他先是在南京对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展开残忍的大屠杀，之后迁都到北京。

永乐皇帝无法改变僭主的本质，这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永乐篡权，明朝的法统变成了灰色，气氛也变得阴暗了。从此以后，士大夫们公开场合恭恭敬敬，书斋里、酒桌上牢骚满腹，平头百姓们的生活也越来越不如以前，感慨自从“永乐爷”登基之后，再也过不上“洪武爷”时代的好日子了。^a但朱棣毕竟是个有雄心的人，为了当代，为了历史，他都需要有说服力的政绩工程。

权力巩固之后，朱棣下令继续推行明初鼓励垦荒的经济政策，同时又积极开疆拓土，五次北征蒙古残元，收复安南，巩固了南北边防。数年之后，中国的国力强盛，国家府库充实、武力强大、版图辽阔。朱棣重视文治，下令编纂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最后，他希望万国都前来向中国朝贡、俯首称臣，自己坐享“四海宾服，万邦来朝”的巨大荣耀。

所谓“朝贡”，是中国长期以来和周边国家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外交关系。借助丰盈的物质文化，吸引四夷“慕圣德而率来”，是中原历代统治者始终追求的统治境界。这种浸润着深厚的礼仪文化精神的政治思想和外交文化，既体现了儒家的世界观，也描绘出了中原君王理想中的“华夷秩序”——一个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外交性的体系。周边夷狄按其远近，“各遵其旨”，被逐次纳

a 这种心态，在描写明朝生活的小说如《儒林外史》等当中有普遍的反映。

入到中原王朝的战略规划当中，这就在超出国家实际疆域的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统治者期待中的“大一统”天下。

那么，周边国家为何甘愿俯首称臣呢？除了被中国强大的国力所威慑、灿烂的文明所吸引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能从“朝贡”中大赚便宜（明朝早中期国际贸易需要经过中央特许，不像宋朝完全自由）。政治上，他们能和中国展开友好外交甚至能得到中国庇护。经济上，他们通过向中国供奉一些自己的土特产，便可以获得中国皇帝包括丝织品、金银在内的巨额赏赐。而且还可以和中国发展对外贸易，获得商业利润。



永乐大典

经过明初国力的恢复，到朱棣时，前来朝贡的国家已经比朱元璋时明显增多了。但是这和朱棣的预想还有明显的差距，为了尽快实现自己的光荣梦想，他决定派遣船队出使西洋。

永乐三年（1405年），朱棣派出了自己的第一支远洋船队，这支船队的领导者是郑和。郑和本姓马，云南人，回族。郑和相貌堂堂、勇谋俱备，而且信奉伊斯兰教，而要出使的西洋，也就是今天的南洋地区，很多国家都信奉伊斯兰教，因为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自然容易沟通。有的国家信奉佛教，郑和对佛教也很了解，他有一个名字叫“三宝”，据说就是和佛教“三宝”有关。

初夏六月，郑和率领着帝国的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了。船队浩浩荡荡，有六十多艘，这些船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海上巨轮。

据《明史》记载，郑和七下西洋，最大的船长四十四丈四（约151.8米），宽十八丈（约61.6米），船高四层，像楼一样，有九条桅杆可以张十二面帆。锚有几千斤重，需要动用二百多人才能启航。船的排水量达到1.4万吨（二战中德国的海上巨无霸“俾斯麦号”战列舰，排水量也不过是4万多吨）。郑和的宝船在无机动力的时代，绝对是令人震惊的。当满载宝物的船只航行在大洋之上时，它们“巍如山丘，浮动波上”，甚至“云帆蔽日”，气势浩大。

公元1500年往往被欧洲的历史学者公认为近代、现代的分界线，那是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开始，欧洲人开动轮船，开始探索、发现并征服这个世界。当时的中国与欧洲极少有往来，欧洲对繁华富庶的中国充满了向往之情，却苦于没有海

路可通。哥伦布他们如果看到郑和的船队，一定会目瞪口呆。

郑和的船队约有 2.7 万人，对比一下：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航海的人数：分别为 90~150 人，170 多人，265 人。郑和的船队中有官员、军人、水手、翻译、会计、修船工人等。其中最多的是军队，有相当于几个师的人数。军队众多，只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并不打算征伐侵略。

当郑和的船队航行到爪哇岛上的麻喏八歇国的时候，该国东王、西王正在打仗，东王战败，西王占领了东王的领地。郑和船队的人员上岸到集市贸易，有一百七十多人被西王方面误杀。明军义愤填膺，纷纷请求要向西王开战。此时西王发现自己误杀了中国船员，十分害怕，忙派使者向郑和请罪，并愿意赔偿六万两黄金。郑和思量再三，认为不宜向西王讨伐，如果此次一旦开战，其余的南洋诸国会误以为明朝是前来侵略，不利于和平外交的展开。而且鉴于西王自愿请罪的态度，他禀明皇朝之后，决定化干戈为玉帛，和平解决这一冲突，并且还放弃了赔偿请求。西王十分感动，从此两国和睦相处。郑和在此次外交事件中展示出了中国此行的外交政策，“胸怀远人，威服四海”，在郑和七下西洋中，只动用了三次武力，而且还都是因为对方先发起挑衅。

郑和每到一国，都先向当地的头人、国王宣读明成祖的皇帝诏书。告知他们明朝皇帝是奉天承命的上邦大国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来管理天下的，四方之藩都要俯首听命，各国之间不可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之后举行隆重的册封典礼，对他们进行慷慨的赏赐。赐给各国国王和官员银印、品级冠带和其他礼物。

南洋诸国被郑和所率领的巨大船队所震撼，并感受到他们强而不欺、威而不

霸的大国风范，因此纷纷表示愿意归顺大明。当郑和船队返航时，许多国王和使者都顺路搭乘，到中国向永乐皇帝朝贡。

永乐年间，海外诸国的朝贡多达 300 多次，平均每年都有十多次，远超洪武时期每年只有数国前来朝贡的规模，到此时，明朝的国际威望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翻开史书，我们仍可以透过文字感受到当年外交的盛况。



郑和画像

永乐十三年，东非麻林国来献麒麟（长颈鹿），一时轰动京城。永乐二十一年，忽鲁谟斯（霍尔木兹）等 16 个国家的 1200 多名使臣及其家属搭乘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船只前来中国朝贡，受到大明王朝的欢迎，一时间，朝堂上下皆是具有异域风情的使者。在这一年的史书上，有如此记载：“锡兰山王来朝，又遣使入贡。占城、古里、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木骨都束、柯枝、加异勒、溜山、南渤利、苏门答刺、阿鲁、满刺加、失刺思、榜葛刺、琉球中山入贡”（史官翻译辛苦了），真正形成了万国来朝的局面。

不过在万国来朝的气氛中，只有一个国家不服：日本。其实日本在永乐时期也向明朝进贡，但是却也多有冒犯。自洪武时，他们的一些封建主为了取得财富，便组织许多武士、浪人和商人到中国沿海一带进行走私贸易和劫掠骚扰，被称作倭寇。但因为明初加强海防，倭寇还不敢大肆侵略。永乐十七年，倭寇两千多人攻掠辽东望海埚，即被辽东总兵刘荣率兵全部歼灭。

但到了嘉靖朝，倭寇却变得异常猖獗。明朝当时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只允许中外之间进行有限的官方朝贡贸易，任何私人的海外贸易都不被允许。然而此时日本的商业得到发展，朝贡贸易远远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他们便到中国沿海大肆劫掠。此时中国的工商业也发展迅速，沿海地区的很多土豪大姓和海商巨贾也都偷偷和外国进行贸易，他们与倭寇合流，并成为主导力量。

而此时的明王朝则是皇帝嘉靖迷信方士，奸臣严嵩当道，边防松弛不堪，无力抵御倭寇的入侵。侵略行径愈演愈烈，甚至从沿海延伸到了内地。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一股 72 人的倭寇，自浙江穿过江西，经过徽州等地，到达明朝南都南京。他们和南京官军展开战斗，然而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八九百名明军却抵挡不住这区区 72 个强盗，竟然全部阵亡。

面对倭寇的大肆蔓延，明廷后来任命戚继光和俞大猷为抗倭将领，他们招募训练新军，最终在嘉靖四十三年肃清了倭寇在中国的势力。

郑和下西洋为何难以为继

郑和下西洋是人类航海史上的壮举，它先后抵达了亚非 30 多个国家，最远到达了非洲东海岸，第一次打通了中国到东非的航线，把亚、非之间的广大海域连成一气。他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 87 年，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 83 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路早 93 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 116 年。而且这七次航行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也都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

但当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船队于宣德八年（1433年）七月返回南京后，这支船队便永久偃旗息鼓了，后来连部分档案都被销毁。而欧洲航海事业却一直在持续发展。

郑和下西洋开始于15世纪初期，哥伦布、达伽马等人开辟新航道的航行开始于15世纪末期，后人总是拿这两件中西航海史上的大事作对比：为什么欧洲人开辟新航道使西方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且改变了世界格局；而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却没有突破农业社会走向现代世界呢？

主因在于航海的“商业模式”不同。欧洲人是为了开辟新航路，以便更好地发展海外贸易，更加“市场化”，航海行为本身能够赚钱，而郑和下西洋却是纯粹的国家面子工程，耗费巨大却没有实际利益。

欧洲寻找新航道的探险行为获得了风险投资的支持。例如，哥伦布与西班牙国王签订的协议书中规定：国王出资，所“发现”的土地归国王所有，但哥伦布可以“副王”“总督”身份进行管辖，拥有所获财物的1/10，并享有世袭特权。在王室的风险投资支持下，哥伦布四次横渡大西洋，到达了加勒比海群岛和中美洲沿岸地区；达伽马率领船队首次完成了绕道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新航路。当他们从这些地区带回来大量黄金、奴隶和土人纳贡物的时候，国内立即掀起了海外探险热，于是海外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进入到西欧。

而郑和下西洋所进行的朝贡贸易，本质上是金元外交，是一种纯粹的消耗。为了向亚非穷兄弟显示中国之阔气，经常大笔金银换当地土特产，同时对外低价出售中国的货物。比如胡椒在苏门答腊市场每百斤价值1两，而作为“贡品”，明朝政府则给出每百斤20两的高价。又对外国进行巨额赏赐，永乐皇帝1405年赐给日本国王铜钱150万枚，次年又赏赐1500万枚，王妃500万枚。竟至于一段时间内，日本甚至自己不需要铸铜钱，以永乐铜钱作为通行日本的货币。

面子工程耗资巨大，大臣们很快发现这是一大弊政，批评道：“三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万计，纵得珍宝，于国家何益？”的确也是如此，下西洋除了给皇帝带来面子外，从国外带回来的都是香料、宝石、珍奇异兽等奢侈品，无益于国民经济发展（郑和下西洋所进行的只是官方贸易，当时禁止民间对外贸易，所以其所形成的航海经验不能用来带动民间的发展）。

在财政压力和舆论反对声中，郑和的船队偃旗息鼓了。

明朝以前的西方历史，除希腊罗马时期外，乏善可陈。而明朝是一个东西方历史分野的时期，欧洲走出中世纪，开始了持续向上的历程。

这段历史的长期后果是怎样的呢？结果是欧洲发展壮大，掌握了海权。到

1800年，欧洲人占领和控制了世界土地面积的35%；到1878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7%；到1914年，达到84%以上^a。

明朝危局：土木堡之变

永乐皇帝之后，他的儿子仁宗朱高炽和孙子宣宗朱瞻基相继登上皇位，在他们统治的十一年间，政策宽松，四海承平，国家生活小康，史官们给了这个时代一张“仁宣之治”的“奖状”。

人治的好日子总是不能长久，到了随后继任的英宗皇帝之时，明朝就开始迅速走向衰朽。突出的事件就是土木堡之变，这场荒唐的战役，暴露出了大明帝国中枢的丑态。

明朝的威胁仍然来自于北方的蒙古。元朝灭亡之后，漠北的蒙古人分裂成几个部落，就像成吉思汗之前那样。此时蒙古瓦剌部的势力强大起来，首领脱欢统一了瓦剌和鞑靼两大部落。到他儿子也先掌权之后，更是大力扩张，他向西攻击哈密，控制了西域要道，威胁到了明朝的西北边防；向东击败了兀良哈三卫，控制了当时还很弱小的女真部，甚至威胁到了朝鲜。

蒙古军队从四路对明朝展开进攻，第一路攻击辽东，第二路攻击甘肃，第三路攻击宣府，最后一路由也先自己统领，攻大同。在蒙古军队的攻击下，明军连连失利。消息传到北京，大臣们很焦急，经过商议，决定派出驸马井源前往迎战——这位井源堪称文武全才，一向深孚众望。

第二天，英宗皇帝却忽然宣布，他要御驾亲征。

大臣们一打听，原来这是太监王振的主意。

王振的人生经历，十足地反映出一个官本位社会当中价值观能够扭曲到何种程度。王振本是一个地方小学官，看不到升官的希望。他思前想后，想出一个奇招：净身进宫，做一名太监。王振运气不错，进宫之后，被分配教女官们文化知识。在瞎子的国度里，独眼龙就是王。宫人都是文盲，王振鹤立鸡群，受到膜拜。后来，连英宗的父亲宣德皇帝也认为他是个人才，一纸宣入东宫，给太子陪读。

太子对王振也很信任、尊敬，见了他不叫名字，而呼“先生”。英宗登基之后，便对他委以重任，封他为司礼监太监，这是内官二十四衙门中真正的实权派。

司礼监太监有在奏章上批红之权，而且还提督特务机构东厂，加上英宗对他

^a 数据来源：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

完全信任，王振的权势炙手可热。很多阿谀之徒纷纷投靠王振，呼其为“翁父”，典型的如工部侍郎王祐。当时的大臣都留有胡须，而王振因为生理原因没有胡须，有一天王振见到王祐，见他也没留胡子，便问原因，王祐谄媚道：“老爷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留呢？”对于反对者，王振心狠手辣，绝不留情。翰林院侍讲刘球请求皇帝削弱王振的权力，被王振下狱处死，尸体被肢解。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国家大学校长）李时勉因为不肯向他行礼，被他用枷锁拷在国子监门口，当众羞辱。当年朱元璋为了防止宦官专权，在宫门内立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朝政”的铁碑，王振竟下令毁掉，而无人能够追究。

王振此刻怂恿皇帝御驾亲征，其实是为了显耀自己。他判断，蒙古军队只有两万人，而明朝能派出五十万军队，必然胜券在握。然而他只是一个太监，并没有威望可以带兵，于是他便怂恿皇帝出征，自己随从。前后准备了不到五天，粮草都未充足，7月17日，在炽热的骄阳下，五十万大军浩荡上路了。

8月1日，到达大同，此时前方的阳和却传来明军全军覆没的消息，听完前方使者描述的战争惨状，王振吓破了胆，当即决定班师回朝。

于是，五十万大军还未临敌，便开始返回北京。王振决定取道故乡蔚县，好向家乡父老炫耀。从蔚县返回北京，本来也是一条便利通道。然而刚走了五十里，王振却又想起庄稼已经成熟，大军路过可能会破坏，于是下令重返大同，通过居庸关原路回京。返回途中，忽降大雨，大军疲惫不堪。大军在8月13日到达了土木堡，此地离军事重镇怀涞只有二十五里，只要进入怀涞就安全了。然而此时王振却又做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决定，他让大军暂缓前进，因为他的一千多辆车还没有运到。军队就地驻扎。

15日，一路尾随而来的蒙古军发动突然袭击，明军猝不及防，全线崩溃。

此役明军惨败，死伤超过大半，随从的五十多名大臣全部阵亡，包括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驸马井源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益等朝廷高官。明英宗被蒙古军俘虏，而这场惨败的罪魁祸首——王振，同样也难逃此劫，明朝护卫将军樊忠在混乱中发现了，将他一锤击毙。

兵部尚书于谦在危难中担起重任，在这年十月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蒙古军被打退，英宗在第二年也被放回。

明朝是继汉唐之后宦官专权最严重的时代，除了王振之外，宪宗时的汪直、武宗时的刘瑾、熹宗时的魏忠贤，也全都权倾天下。

刘瑾甚至还被《（亚洲）华尔街日报》统计为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之一，而他有他的秘诀。他经常乘武宗玩兴正浓的时候把各司的奏疏拿给

他批阅，武宗总是回答说：“我要你有什么用？每件事都要烦我吗？”于是到后来，刘瑾就干脆直接把奏折拿回家，与妹婿孙聪、松江市侩张文冕一起商议参决，从而全面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政务。官员们都畏惧刘瑾，恐引来灾祸，纷纷贿赂，地方官到京城朝觐的时候，都要每人送给刘瑾两万两银子，没有那么多钱，就先向京城富豪借贷，待回到地方之后，再从老百姓身上盘剥。刘瑾后来被抄家时，共搜出黄金 250 万两，白银 5000 余万两，其他珍宝细软无法计数。

熹宗最大的乐趣是盖房子，太监魏忠贤控制了朝政。他为人阴险狠辣，排除异己，朝中的无耻大臣纷纷向魏忠贤投靠，认其为义父、干爷，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目，结成阉党。他们牢牢把持厂卫特务机构，实行恐怖政治，尤其对当时主张改良政治的东林党人更是大肆打击，作《东林点将录》《同志录》《百官图》，按名单对东林党人逐一捕杀。经过打压，东林党人元气大伤，魏忠贤气焰更盛，当时的朝臣们都敬呼他为九千岁。浙江巡抚潘汝楨在西湖边为魏忠贤立生祠，一时间四方纷纷效仿，魏忠贤生祠几乎遍天下。

明朝宦官专权之所以严重，在明朝初期就埋下了隐患。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繁重的朝政压在皇帝一个人身上，这自然是无法承受的，后来便形成了“内阁”制度，内阁大学士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宣德时，发展出票拟、批红制度。就是把奏折先拿到内阁，大学士们替皇帝草拟一个处理意见，写在小纸条上贴在奏疏的前面，然后呈给皇帝，皇帝参照大学士的意见口授旨意，让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在奏折上书写。英宗往后的几个皇帝昏庸无能，长期不问政事，批红的大权经常完全落到秉笔太监的手中，给他们操控朝政提供了可乘之机。

另外，从永乐开始对宦官的重用，是另外一个原因。永乐皇帝夺位，得力于宦官通风报信，他自然投桃报李。永乐帝对宦官委以重任，给予他们出使外国、监视军队、到边关巡查等大权。

总的来看，明朝宦官专权是寄生于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的，君主权力太大，当君主昏庸无能时，这个强大的权力便会落到身边太监的手里。太监们擅长阿谀奉迎，玩弄权术，在他们的专权之下，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异常黑暗。

张居正改革

英宗之后，除了孝宗时励精图治，出现“弘治中兴”之外，其他时期，要么皇帝荒淫无度或迷信方士，要么宦官、佞臣把持朝政，政治非常黑暗。同时，边境危机再次出现，嘉靖时，蒙古鞑靼部的俺答汗经常犯境，后来竟进入北京进行

掠夺；倭寇活动猖獗；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已经开始，葡萄牙在这一时期侵入澳门。土地兼并也开始日益严重，皇室、勋戚、官僚以及缙绅富户大肆掠夺农民土地，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也使得国家掌控的土地数急剧减少，明初国家掌控的土地有 850 余万顷，到弘治十五年（1502 年）仅剩 422 余万顷，由此国家的赋税收入也越来越少，到嘉靖中期之后国库竟常年亏空，入不敷出。大批失去土地的流民为了生存，纷纷揭竿而起，英宗、宪宗、武宗时分别在闽浙赣山区、鄱阳山区和京畿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明朝衰落，气数将竭。万历元年（1573 年）至万历十年（1582 年），内阁首辅张居正在全国发起了一场力挽狂澜的变法革新运动。

张居正是湖广江陵人（今属荆州），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进士，面对国家困局，他曾在穆宗隆庆二年（1568 年）上《陈六事疏》，提出一系列改革建议，但未被采纳。隆庆六年，穆宗病故，神宗继位，张居正在险恶的权术斗争中最终胜出，成为内阁首辅。此时神宗只有十岁，而且其母亲李太后也倾慕张居正，因此张居正几乎总揽了朝政，有机会大展宏图。

张居正首先设法提高官僚系统行政效率，他设计了一个“考成法”，用以对官员进行绩效考核。此法规定，各衙门在办理公务之前，要根据事情的缓急，制定出一个公务完成的最晚期限，并记在文簿上，事情在规定期限办完后，便在文簿上注销，如果没有按期办好，便要进行处罚。而且为防止徇私舞弊，这份文簿要再造同样的两份，呈给六科和内阁，接受监督。“考成法”的实施非常严格，务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明史》里描述：“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

他继而整顿武备、编练新军。隆庆五年，在他的建议下，穆宗起用谭纶、戚



张居正故居（湖北荆州）

继光、王崇古、方逢时、李成梁等著名边将，主持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和辽东边务。他利用鞑靼部的内部矛盾，在隆庆五年实现和蒙古首领俺答汗的和议：明廷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授予俺答汗属下 65 人都督、指挥等官职，并且议定开放大同等十一地为互

市市场。张居正的边防新政取得了巨大成功，从此边防稳定，国家每年减少了不下百万的征调费用，长城沿线出现了长达六十年“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繁荣景象。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开始整理土地、整顿财政。全国开展清丈土地工作，各府、州、县的勋戚庄田、民田、屯田、职田等，全部进行丈量。清丈之后，全国土地的数字是7013976顷，比弘治年间多出300万顷。万历九年（1581年），他又对经济政策和赋役制度进行改革，推行“一条鞭法”。原来的赋税有田赋、力役和其他各种杂税，现在全部合在一起，按田亩多少来征收，田多多征，田少少征。这使得政府从掌握大量田地的地主手中增加了税收，又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减轻了负担。而且田赋除了苏、松、杭、嘉、湖等地，都不再征收粮食，全部征银子，从而使大量农产品纳入市场，刺激了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同时规定老百姓不再服力役，向国家缴纳银子之后，由官府雇人服役。农民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劳动，稳定了生产。

张居正改革进行了十年，使危机重重的明王朝重新振兴，边防安定、官员办事效率提高，太仓所存的粮食足以供应京师军队六年之用，国库的储蓄达到四百万两白银，是自正德、嘉靖虚耗以来最富庶的时期，张居正本人也因为改革的巨大成效被誉为“救时宰相”。

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企图以朝鲜为跳板侵吞中国，中国出兵援助朝鲜，公元1597年11月，日本海军在露梁海战中大败，从此龟缩回日本（韩国电影《鸣梁海战》反映的只是这场战役当中的局部，明军才是决胜关键）。这一战打出了三百年的和平，三百年后的甲午战争几乎就是这一战的翻版，只是结局相反。包含这次御倭援朝之战在内的“万历三大征”的军事胜利，是明朝振兴的明确标志。

然而张居正改革却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引发反扑。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不久，反对他的势力怂恿对张居正长期管束早已不满的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家进行查抄，并剥夺了他的官爵。同时新政几乎被废止。此后，万历皇帝越来越任性，数十年不理朝政，时局急剧败坏，社会动荡，明王朝逐渐走向衰亡。

这个大败局不能怪罪于万历皇帝个人，这是国家治理模式整体性问题。万历皇帝年少时，好学上进，举止高贵，仪表不凡，曾经给大明朝的政坛带来普遍的希望。然而，一切模糊不清、纠缠不清的人治体系，最终让他精疲力竭，犹如陷入泥潭，越挣扎越深，最后彻底心灰意冷。

东西方历史分野：法律与制度的作用

这是东西方历史分野的时代。同时期略晚的西方，逐渐演化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治理体系。

明朝和明朝之前，中国经济被认为长期在世界上保持第一。晚明时江南经济十分发达，国际贸易繁荣，所生产的生丝、绸缎、瓷器、布匹等产品畅销到欧洲、南美洲，具有世界竞争力。然而从明朝后期开始，欧洲稳步崛起，到清朝之后逐渐把中国甩开，甚至后来发生工业革命。出现如此反差，原因到底是什么？

紧跟着的一个问题是：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出现在英国，而没有出现在南宋或者明朝？研究发现，早在工业革命之前600年，南宋时期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工业革命前英国的几乎所有关键特征，一些方面甚至超过英国——市场范围、劳动分工程度、金融系统的专业性，甚至铁的产量。

更宏观一些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及一个时代，影响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这是经济史学的原始命题之一，由此出发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及学派。五四运动时期的文人们发明了一种说法：原因是中国文化腐朽落后。在这个流派中，鲁迅在反思国民性，柏杨在批判丑陋的中国人。

经济学研究给出了一些真正的解释：近当代经济的历史是围绕着工业革命而展开的，新技术的应用及发明是推动经济进步的主动动力，另外有学者强调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还有的则指出了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

不过，这些理论还是没有触及根本：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些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明朝就是这样。明朝有很多新发明、新技术，许多科学研究都在世界前沿，明朝人也爱读书、爱学习，明朝活跃着很多商帮，市场信息交流比较发达。

原因还在于制度。近几十年以来，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开始研究制度的作用。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指出，那些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诺斯的研究表明：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除非现行的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明朝与欧洲的最关键差别，就是在于制度。

回顾一下同时代的欧洲历史：

明朝时期的欧洲，正处在黑暗蒙昧向现代文明过渡的时代，新教旧教之争十分激烈，新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轮船逃难去北美洲，成为了以后美国的起源。“五

月花”号轮船上的新教徒们所抱持的观念，意味着人类正在走向一个文明的新台阶。

他们的观念起源于几百年前。

距今 800 年前，英国国王约翰与贵族在伦敦郊外签署了《大宪章》。为了纪念这一日子，英国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包括巡游庆典、化装舞会、专题大合唱、鸣钟仪式、花卉节，以及有英女王皇家驳船“格罗丽亚娜”号（Gloriana）参加的泰晤士河接力活动等。

美国最高法院的青铜大门上镶嵌着八块法律史上重大历史时刻的浮雕，其中一幅就描绘签署大宪章的场景。图画上，与其说是约翰王和平签字，不如说他是在威逼之下就范：左手边男爵则做拔剑状，右手边的约翰王则一手扶剑，一手在羊皮纸上盖上印信。约翰王所签署的，就是著名的“大宪章”，而 800 年前的历史定格，的确剑拔弩张。

仅仅签署《大宪章》一个月后，约翰王就致函教皇希望废止宪章，并得到了教皇的首肯。令约翰王不满的是《大宪章》之 61 条。这一条规定一个由 25 名男爵组成的委员会将会监督、确保约翰王遵守大宪章的规定。他们有权在国王违约时没收国王的城堡和土地，直到他改正自己的行为。这种对国王施以集体强制的方式是国王所无法接受的，必毁之而后快。

《大宪章》之 39 条的法律意义与历史意义最为深远，规定“除非经由其同等地位之人或这块土地上的法律进行的合法裁判，否则任何自由的人，不应被逮捕或囚禁、被夺去权利或财产、被剥夺法律保护权，被放逐或被加以任何形式的损害”。一方面，39 条明确了法治的原则，国王并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以个人意志随意审判；另一方面，它也成为后来“人身保护令”的起源。也恰恰是因为这一条，大宪章才会登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大门。

到了明清之际，英国爆发“光荣革命”，议会（诸侯、贵族代表）与国王继续斗争，大宪章又复活了。双方最终兵戎相见，议会军队击败王师，斩查理一世，取得主导地位，此后又经几次反复、政变，终于确立起君主立宪政体。这是西方历史崛起的里程碑，东西方分野的路径清晰可辨。

早有论者指出：有法权而无财富者，法权与财富终将兼而有之，有财富而无法权者，两者都将失去^a。14 世纪欧洲各城市，无法跟当时的泉州、广州相论美，然而法权完备，终将发展壮大。明朝时期，欧洲的法学繁荣，一时间与经济发展情况的简陋很不相称，兰开斯特王朝初年，牛津大学一地法学生常在 3000 人以

a 刘仲敬：《从华夏到中国》。

上，但效果很快也显现出来（而明朝的书院里，没有人研究法学）。

以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最显赫的企业世家达比（Darby）家族为例，这个家族企业在英格兰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铸铁桥和第一列铁路火车，对推动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达比家族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强有力的英国法律体系对其财产权利所给予的保护。亚拉伯罕·达比的妻子曾在信中提到，曾有人在运送铁矿石的路上收取买路钱，地主和官员的压榨甚至让他们的事业一度濒于崩溃；所幸，法律为他们提供了保护。如此，才可创造一家经久不衰的工商企业。相比之下，明朝也有大型商业家族，而苏州巨富沈万三的悲惨下场，是他们命运的终点。

晚明的内忧外患：帝国破产

1627年，万历皇帝去世8年后，朱由检即位，是为明思宗崇祯皇帝。在他心中，没有登基的喜悦，因为此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严重的内忧外患。

在他之前，天启帝去世，魏忠贤虽然没了依怙，但朝堂上下仍然遍布爪牙，阉党依旧掌握着朝政大权。此时的国内经济则濒于瘫痪。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他们有的投奔地主成为佃户，每年向地主交纳佃租，然而佃租却高得惊人，有的一亩地就要交纳一石二三斗的粮食，经常是今天刚交了地租，明天就要赶紧借贷，否则无法度日。有的佃农甚至沦为地主的奴仆，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甚至子孙累世为奴。同时，大量失地农民被迫背井离乡，逃亡在外，成为流民。很多地区一片“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的惨状。

国家财政濒临资金链断裂。天启时，朝廷拖欠各边镇年例钱粮高达900万两。崇祯时，需要支付的宗禄是国家税收的225%，入不敷出，一些王府的禄米，甚至有“缺五十年不支者”。国家经济已经陷入难以为继的根本性危机。

崇祯元年（1628年），起义就已经在陕西爆发。这里在天启、崇祯时连年灾荒，再加上赋役苛重，人们没有粮食，只好以树皮为食。而且陕西还是明朝的边防重地，由于兵饷断绝，士兵纷纷逃亡。为求取生路，饥民和逃兵便相约揭竿而起，抢劫富户钱粮，赈济灾民。

同时，盘踞在东北的满族已经壮大。满族原名“女真”，他们曾经灭亡北宋，建立起金朝。万历年间，女真首领努尔哈赤逐渐统一了各部，自称“后金”，并开始觊觎中原。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他发布“七大恨”，历数明朝罪状，告天讨明，最终捣毁抚顺城，掳掠人畜30万而归。1619年，又和清军在萨尔浒

山附近展开大战，最终明军战败，从此失去了在辽东的军事主动权，被迫趋于防守，女真则由防御转向进攻。努尔哈赤之后，其子皇太极即位，并于崇祯九年（1636年）自称皇帝，改后金的国号为清，比拟于汉族皇帝，以大国和明朝进行对抗，企图取而代之。他在崇祯年间五次越过长城，深入明朝内地，攻克许多城池，大肆掳掠。



努尔哈赤

面对内忧外患，崇祯皇帝很想有一番作为，挽救大明江山。目标很远大，但有时几乎看不到希望，而且他才仅仅16岁，只有义无反顾地奋斗。他即位才两个月，就利用谋略铲除了魏忠贤及其党羽的势力。

同时，他也十分勤勉，每天都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且特别节俭，衣服破了，让皇后打了补丁后继续穿。

内忧与外患并存，优先解决哪个为上？崇祯皇帝举棋不定，整个朝堂也议而不决。

崇祯皇帝一度采纳了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杨嗣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略，集中优势资源对付国内农民起义军，而且快要成功了。但最终这一方略还是被女真人入侵所打断。军队被调到边关防守，起义军趁机复活。

最初的农民起义主要集中在陕西、山西一带，到了崇祯六年（1633年），起义扩大到河南、湖广、南直隶、四川、陕西等省，成为全国性的大起义。起义军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闯王高迎祥，崇祯八年（1635年），他率领农民军攻克明中都凤阳，打出“古元真龙皇帝”大旗，焚毁皇陵享殿，挖掘皇帝祖坟，并且破坏了朱元璋当年出家的皇觉寺，给明皇朝以沉重打击。

崇祯九年（1636年），高迎祥被俘牺牲，李自成被推举为新的闯王。他率领农民军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进入河南。进入河南之前，在杨嗣昌部署的围剿之下，李自成的兵力已经不足1000人，到河南后，当地饥民争相归附，人数很快增至几十万。

1644年，正是明崇祯十七年。这一年的大年初一，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发生了地震。年初，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建国号大顺，正式表明要取明朝而代之。

二月初八，李自成军攻陷太原，京城为之震动。三月初六，崇祯皇帝下令辽

东总兵吴三桂放弃山海关外土地，回京勤王。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明朝驻扎在城外的三大营不战而溃。三月十八日，吴三桂军还没有赶到河北唐山，而北京城已被攻破。十八日深夜、十九日凌晨，崇祯帝朱由检只身与太监王承恩缓缓地登上了宫殿后面的煤山，在小山之巅，他回头再次遥望着此时已经是连天烽火和血染的宫闱，泣声长叹，掩面久久无语。在命人分送太子、永王、定王到勋戚周奎、田弘遇家，与皇后等诀别之后。朱由检——这位大明的苦命天子，留下了“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的遗言。伴随着骨肉分离，国破家亡的辛酸凄楚；伴随着对李自成等“千古逆贼”的谩骂痛斥；伴随着对祖宗基业一朝灰飞烟灭的深深无奈；伴随着对奸臣误国的切齿憎恨；伴随着对江山社稷的无数次回眸的眷恋；风吹圣袂飘摇举，大明徐徐地落下了帷幕。

明朝最终亡于内忧，而不是外患。后来的清朝只是明智地抓住了历史时机，利用内部矛盾摧毁大顺、攫取了胜利果实。

16、17 世纪，本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是游牧民族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代。如果说蒙古人对全世界的征服，是游牧民族武力的巅峰，那么此时他们正走向衰败。因为火器的出现和发展，使得游牧部队处于明显劣势。明军的火器很发达，不仅有手持点放的火铳和鸟铳，还有安装在架座上发射的火炮，威力很大，袁崇焕就曾经多次用火炮击退清军，连努尔哈赤都是死在明军的红衣大炮之下。而且永乐时还开始设神机营，专门掌管火器，开启了世界上火器部队的先河。

不幸的是，大明此时正在走霉运，王朝的衰朽周期正在到来。天灾人祸，尤其是政治腐败，已经掏空了王朝的地基。明朝的内部矛盾，被满族人巧妙利用，并最终征服了中国。

反思明朝的灭亡，学者们认为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明朝的财政危机。明朝的军队战斗力一直比较强，农民军刚开始根本不是明军的对手，面对战斗力很强的后金军队，明军还与之对峙了几十年。军队后期经常战败，则是因为国家财政亏空，军人领不到兵饷，自然是难以维持生计。

明朝的财政政策被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称作“洪武型财政”。这种财政政策核心是“节俭”，以维持国家经济活动的最低水平为基础，而从来不考虑开源。它把国家的税收主要限制为农业税，对商业税、海关税从不重视，是一种极端保守的税收政策。到了后来国家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国家的税收逐渐减少，而这时又遇上外患，它在经济政策上没有更好的调控办法，只好加重对农民的剥削，竭泽而渔，人民当然造反，农民大起义将国家推向灭亡。

第十五章 第三次生存危机：清建政始末

争夺大明遗产

满族族名 1636 年才正式出现，当年灭亡北宋的“女真”就是满族的先人，他们曾经灭亡北宋，建立起金朝。在明朝末期，趁着明廷衰落，内忧不断的机会，领袖努尔哈赤引兵大举征明。努尔哈赤之后，其子皇太极即位，并于崇祯九年（1636 年）自称皇帝，改国号为清，和明朝对抗，企图取而代之。

1644 年，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攻破北京，立足未稳。

鹿死谁手，还未可知。清在等待时机。

手握重兵的吴三桂是双方都想拉拢的对象。吴三桂负责山海关的防守，此关一旦洞开，中原就处于无险可守的境地。在仔细权衡之后，吴三桂又怀着父亲被大顺部将掳掠、爱妾陈圆圆被霸占的满腔愤恨，倒向了清领袖多尔衮，上演“泣血求助”的一幕。

清迅速反应，立即发兵。情势急转直下，曾经倾覆了大明的大顺军，在山海关之战中虽然苦战力竭，但是最终没有挽回颓势。仅 42 天的繁华梦一朝陨落，北京城由大顺易手到大清。此后李自成一败涂地，1645 年 5 月 17 日败死于湖北九宫山。

进入北京后，顺治称帝，满人便开始进一步征服中原。清军入关后，以洪承畴经略江南五省，孔有德徇广西，尚可喜、耿



清代八旗服饰图

仲明徇广东，吴三桂徇四川、云南。此五人，都是明将投降清朝，尤其吴三桂率精兵转战南北，影响最大。

此时的大明天下，早已糜烂不堪，抵抗力量虚弱。此时，南方各个流亡的南明政权争事拥立。主要的有南京福王、福州唐王、浙江鲁王、肇庆桂王。这些小朝廷内部仍然是一片钩心斗角、乌烟瘴气。二十年间，包括南明小朝廷、李自成残部、张献忠残部等抵抗力量被各个击破。

明朝社会的领导集团是官僚士大夫阶层，普通百姓并无参与政治的机会。儒家的士大夫们，大部分主张文化至上，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很淡薄，每到国家危难的时候，这一思想弱点便暴露得十分明显。对君父的忠诚，对于乱臣贼子的痛恨，是他们核心的价值尺度，因此普遍痛恨李自成，但组织反清的却是少数。这一心理被清牢牢抓住，彻底加以利用：只要认同华夏文化，就“华夏之”，这一学说，此时成了清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拜一拜孔子，就收获了天下士大夫的拥护之心。

大清的征服和统治

自1644年清军入关，到1681年占领中国全境，满洲人在中国转战烧杀了37年，方才初步征服中国。这个征服过程靠不断残酷屠杀开路。

清初入关后，实施了一系列欺骗性宣传策略，例如宣布减免税赋。对于前明的“练饷”“剿饷”“辽饷”等“三饷”加派给予减免，并号称永不占地。

但很快，清于顺治元年（1644年）下令圈地。北京附近的农民有些逃往河南，有些逃往口外，还有一部分人沦为清朝贵族或八旗旗丁的庄客，备受蹂躏和剥削。等到当年受到清宣传迷惑的普通百姓在清统治稳定后清醒过来，为时晚矣。

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清军围攻扬州，史可法困守孤城，誓死不降。二十五日，清兵攻破扬州，大肆屠杀居民，史可法被俘，不屈牺牲。清军连克江南苏松所属的各城镇。同年六月，清廷下令江南人民剃发。蓄发是汉族传统，强迫剃发为汉族所不能接受的。大家方才明白，这不仅仅是改朝换代的“亡国”，更是“亡天下”了。顾炎武曾说：“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至此，江南各地纷纷反抗，其中以江阴、嘉定两地斗争为最激烈。

1645年夏，江阴人民为抵制剃发令，在江阴典史阎应元、陈明遇、冯厚敦等人领导下进行斗争，前后长达81天之久。此役，10万江阴百姓面对24万清军铁骑，两百多门红衣大炮，血战孤城，抗清81日，击毙清军75000余人，亲王3名，大将军18名。城破之日，清军下令“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全城“咸

以先死为幸，无一顺从者”。嘉定也组织乡兵，据城不降，陷落后惨遭清军屠杀。

在南方，海上武装头领郑芝龙降清，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表示“父教子忠，不闻以贰”，毅然打起“背父救国”旗帜，以厦门、金门为根据地抗清。此时的台湾，被海上强国荷兰悄然侵占已有数十年。郑成功围困、击败荷兰人，在台湾立住脚，并把台湾作为光复大明江山的根据地。

为了隔离沿海人民与郑成功和其他反清力量的联系，清统治者颁布了“迁海”的命令，强迫山东、江浙、福建、广东等省的沿海居民离开海岸向内陆迁徙。在“迁海”的过程中，堕城郭，烧庐舍，“老弱转死沟壑，少壮流离四方”，给东南沿海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清朝统治的两百多年期间，一直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很大的原因是怕沿海人民与海上外部力量联合起来颠覆政权。

清朝建立统治权，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有三大策略：一是改革中央政府的组织制度，进一步把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二是控制汉族思想，消灭抵抗心理。主要通过尊孔崇儒、大兴礼乐教化和厉行文字狱，软硬兼施来实现。三是严格满汉防线，防止满族变质或被汉族所同化，例如不同民族分区居住、禁止杂居，严禁满汉通婚（该规定到1905年清朝灭亡前夕才废除），禁止满族女性效仿汉族女性穿衣等。清自称金朝女真族嫡系，却非常害怕重蹈金朝汉化覆辙。它在全国统治越稳定，专制越强化，皇帝对丧失统治权力的恐惧越强烈。

清朝政权权力结构的核心特点是设置“满汉双轨制”，中央部门及各行政机构均设置满汉两个首长，满人掌握核心权力，汉人实施具体行政工作。

所谓满汉双轨制，并非清朝首创。类似的政权结构，在中世纪中国北方边疆诸族建立的政权史上都曾出现，如鲜卑的北朝，契丹的辽朝，女真的金朝，蒙古的元朝，都曾出现。其共同特色便是征服族群的血统贵族高居权力核心。不过，贯穿于清代全部权力史的满汉双轨制，也非清朝列帝所追步的金元机制的简单重复。它的结构准则是“以满驭汉”^a，策略上则广泛运用“以汉制汉”。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清朝这样



军机处内景

^a 朱维铮：《重读近代史》。

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得以统治如此长久？学术界有不少探讨。

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派是美国最近几十年新兴起的“新清史”研究。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洲因素，是“新清史”的主要特征。换言之，他们认为清朝能够成功地将满蒙回藏汉等众多的民族、文化统一在一个政权之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非汉因素”——清朝文献现在已经大量地公开，那些清朝统治高层内部用满语讲的悄悄话，是一些十足精明的统治术，瞒过了无数人，至今仍有人以为当年的满族真的被汉文化所同化了。

汉族知识分子原是各地反抗的领导力量。为了笼络他们，清军入关后，迅速做出姿态，采取尊孔崇儒策略，并实行科举取士。

顺治元年，沿袭宋代以来成例，封孔子65代孙为“衍圣公”，后又尊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康熙、乾隆曾多次去山东曲阜祭孔，康熙还依据儒家学说亲自制定《圣谕》16条，雍正又为之做注，御制《圣谕广训》，颁发全国，广为宣传。清廷尤其推崇朱熹，科举取士，考四书五经须以朱熹所做注疏为准。通过倡导儒学、尊孔读经，防范“以小加大、以少凌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稳定社会秩序，巩固专制统治。

清朝统治者尤其注重发挥礼乐教化控制思想、维护尊卑等级制度、安定社会的特殊功效。为此，清廷进一步完善表彰忠孝节烈的旌表制度和维系教化人心的种种禁令及奖惩规定；充分利用《宗约》《族规》《乡约》《家训》管束人心；并且神道设教，发挥释、道二教“辅翼王化”的功能。一些地方官员甚至把《邪教阴报录》之类果报轮回读物视作“唤醒愚民”之“救世良方”，不惜工本，“急为刻印，广为施舍，并雇唱词人到处歌唱，愚夫愚妇闻而流涕”，以此为“治本”之大计。

文字狱是清朝统治的又一关键。清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来看，这是“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千百年来形成的华夏正统思想，强烈的民族反清意识，大量地反映在明末清初时期的各种著述里，影响深远。康熙朝政局渐趋稳定，进而加紧对文化思想领域进行严密控制，屡兴文字狱，用以打击异端，钳制思想。所谓文字狱，系指因文字著述得祸而立案入狱。从案情上看大致分反清复明、触犯皇帝尊严、妄议朝政、文字附会四类。

文字狱之严密荒唐，匪夷所思。雍正时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以《诗经·商颂·玄鸟》中“维民所止”一句出为考题，被解释为要去掉雍正之头，病死狱中，又遭戮尸。乾隆时著名文人全祖望作《皇雅篇》歌颂顺治得天下，其中“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被解为“竟敢冠贼字于清字之上，尤为悖逆”，差点因此丧命。清代统治者对于这些一般的思想问题、无关紧要的小事，动辄杀头戮尸，

株连子孙，虽然杀的人比一场战争死人要少得多，却在社会上造成极大震动。地方官若疏漏失察，也要遭受严厉惩罚。江西巡抚海成查禁王锡侯《字贯》案最力，但只奏请革去举人，未上纲到大逆不道的高度，被乾隆指斥“双眼无珠，茫然不见，漫不经心，天良尽昧”，处斩刑，缓期。于是人人自危，挟嫌诬告成风。

在清朝，几代皇帝发起的一百几十次文字狱，使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关怀，对人权、对人性的思考都灭绝了，金石学、鱼虫学应运而生，传统文化不再是有生命的形体，而被博物馆化，汉人的学问已成故纸。

文字狱对思想的禁锢不言而喻。历史上的相关资料显示，文字狱期间中国的发明急剧减少，使得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晚明尽管政治腐败黑暗，但民间很有活力，科技、经济、思想一派欣欣向荣。清朝确立统治之后，“我花开后百花杀”，思想领域被彻底禁锢了。

清征服过程中的大规模屠杀的史料，也被精心掩盖起来。

满人在学习中原文化的同时，也按照他们的意愿来阉割中原文化。像《四库全书》这类宣扬清朝文治武功的丛书，也同时实施着思想审查。《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晓岚等 360 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 多人抄写，费时 13 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 3500 多种书，7.9 万卷，3.6 万册，约 8 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虽然其整理了大量古籍，但是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大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 1.36 万卷，焚书总数 15 万册，销毁版片总数 170 余种、8 万余块。此外，清廷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明代档案仅 3 千余件，估计不少于 1000 万份明代档案被销毁。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清廷还系统地对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或是进行篡改。著名学者章太炎指出，乾隆年间被销毁的古代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十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历史学家吴晗则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这是以国家政权的力量对华夏文明进行的一次摧毁。衣冠尚且是表面的，更深层次的是扼杀创造力、摧毁士族阶层的精神根基。

古代中国民间崇尚士的精神，居庙堂之上的士大夫以据理力争为荣，知识阶层更是以天下为己任。清军入关后，血腥屠杀，文字狱的钳制，有血性、有才华的汉民族精英大多在那个天崩地裂的亡天下时代消亡了。

在这种环境之下，民族性也发生了变异。鲁迅说：“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民国年间，军事家蒋百里曾说：“我所认识的那些举人秀才，化成灰了也都是当奴才的料。”（大意）

版图扩张：领土和民族的整合

清统治者在压服了南方汉人的抗清力量之后，便开始向边疆发展，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连续向西北等地用兵，并成功地大幅扩张了版图。

康乾时期讨平了蒙古势力。蒙古在明朝初期称为北元，是元朝蒙古统治者败退蒙古高原之后的政权。明朝建立并派遣徐达大军攻陷元朝国都大都后，退居蒙古高原的原蒙古宗室的政权国号仍叫大元，以地处塞北，故称“北元”。1402年元臣鬼力赤篡位建国鞑靼，元亡分裂成鞑靼和瓦剌两部，与明朝时战时和，摩擦不断。至清时，蒙古问题基本解决。

清巧妙的统治措施不只针对汉族，对较为亲近的蒙古人，他们一方面以贵族之间的通婚来笼络，另一方面也精心设计了专门的策略，以羁縻统治。

清朝对蒙古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征收大量的赋税与徭役，既有“每年常数之勒派”，又有“无常数之勒派”，以及繁重的役站与兵役负担，使得蒙古牧民苦不堪言。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之时，蒙古的景象是：“蒙民困穷，日甚一日；种族凋零，庐帐萧条；台吉而上才足自存，兵丁之属衣食多缺。”有战事，蒙八旗必首当其冲，就连征战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清军主力也是蒙兵，用蒙人杀蒙人。

最隐秘却有效的是清朝有意识地在蒙古人中推广喇嘛教，以“驯化”这些彪悍善战的族群。清廷在蒙区大建喇嘛庙，让蒙古男子大量地去当喇嘛，最终，蒙古男子，居然有一半当了喇嘛，这些喇嘛不事生产，也不事生育，从而蒙古百业凋零，人口严重下降。康熙曾得意地说：“建一庙而胜十万兵。”

在西藏事务方面，清廷又在西藏设置了两个驻藏大臣，并设立了“金瓶掣签”的制度。喇嘛教也是清笼络藏族的重要手段之一。

但清刻意不使蒙、藏两族的文化水平得以提高。蒙、藏附属于清近300年，语言文字犹然不能相通，儒教号称中国国教，却与蒙、藏两族几乎不发生任何关系——实际上，这是清文化上“分而治之”的巧妙策略。对汉族，它吸取辽金列朝先辈的教训，决不重蹈征服者被征服的覆辙，因而它实现政治大一统，却对被征服族群宗教文化传统又打又拉，而实际上决不放弃自身的萨满教信仰。

在西南地区，雍正初年，朝廷采纳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废撤地方土司，改设朝廷任命的流官，谓之“改土归流”。革除土司后，分别设置了府、厅、州、县，实行和内地统一的政权体制。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派施琅率兵攻打台湾。此时郑成功已经病故

多年，台湾内部为争夺权力相互砍杀，政局混乱动荡。郑克塽即位后已不再坚持抗清复明立场，希图自安为一个小国。清廷与荷兰侵略者联系，攻取台湾，后设立台湾府。由此，清朝完成了巨大版图的统一。

隔绝与落伍：世界潮流中的大清国

在清朝初年，欧洲已经爆发工业革命并开始崛起。

欧洲国家中，首先与清朝接触的是俄国。俄国原是一个落后的国家，长期在蒙古人（钦察汗国）统治之下。明代中期始驱逐蒙古人而独立，并开始逐渐崛起，向外扩张。

沙俄政府颁发特许状的小股土匪武装部队，在明末清初开始向东方扩展，并逐步到达黑龙江流域。俄国东向扩张中，遇到的都是抵抗力极差的土著，其扩张步伐在遇到较强大的清兵后才被遏止。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朝政府派都统彭春与驻守瑗珲的将军萨布素合水陆军1.5万人击败俄军，毁其私自建的雅克萨城，但俄军在清军撤退后，又重新侵入，筑城固守。1686年，清又出兵围雅克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双方在尼布楚对峙，签订了约定领土范围的《尼布楚条约》。条约签订后，双方鸣炮誓天。

清朝初年，俄国彼得大帝进行了改革，他模仿欧洲国家建立起一套体系，俄国由此更加强大。

彼得大帝所效仿的欧洲，16世纪以来已经开始日益强大，由一个中世纪社会逐渐转变成现代社会。清朝初年，欧洲已经爆发了蓬勃的工业革命，美国正在脱离英国的控制而独立，人类社会由此开辟一个新纪元。

欧洲机械化是惊人的：到19世纪20年代，操纵动力织机的人，其产量20倍于一个手工工人，而一台动力驱动的“骡”（即纺纱机）具有200台手纺车的能力。一个火车头运输能力相当于数百匹马，而且速度要快得多。英国在1870年的蒸汽机的能力约为400万马力，这相当于4000万个男人所能产生的力。1800年（清嘉庆五年），欧洲人占领和控制了世界土地面积的35%，而且这一数字也在快速上升：到1878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7%；到1914年，达到84%以上^a。

工业革命本是制度的产物。欧洲在这两百多年间，政治体系、教育体系、科技体系、工业体系、交通体系等日渐完备，各种新的思想成果、技术和工业成果

^a 保罗·肯尼斯：《大国的兴衰》。

层出不穷。在这掀天揭地的改革进步大潮中，大清转身向内，浑然不知。

在这种背景下反观清灭明，不只是改朝换代这么简单，它对历史走势产生了长期影响。回望晚明社会，中国虽然政治极度腐败，但民间社会却一片生机。换言之，在明朝中后期，中国就已经开始了近代化，士大夫们热情拥抱来自西方的新知识。那时的中国，本来还有一线机会跟上世界潮流。

明朝的知识分子不再仅仅是皇权的依附物，而把书院作为抗争的阵地，并敢于在朝堂上与皇帝据理力争，而且像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李贽、唐甄这样的著名学者则开始关注人权等问题。在政治思想上，许多思想家都把思想锋芒都达到了“民权”高度。王夫之提出了虚君立宪思想，他说：“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法相裁，以义相制……有王者起，莫能易此”。宪法至上，即使天下再易手，新的“王者”也不能轻易改变宪法。黄宗羲则怒批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明朝时期，以中原华夏贵胄自居的明朝知识分子是自信的，也是开放的，从皇帝到各级官僚，再到一般知识分子，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抱着热忱的欢迎态度。以往被看得很低的“奇技淫巧”，在明代也获得了广阔生存空间。

明朝时期，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各种技术和原始机器的发明和创新尝试在各个领域不断涌现。

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徐光启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这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并在崇祯二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

1634年，即明朝灭亡前十年，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崇祯历书》修编完成。而就在一年前的1633年，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因推广“日心说”被罗马教廷判处监禁，这是东西方对现代天文学态度的鲜明对比。《崇祯历书》书中采用第谷创立的天体系统和几何学的计算方法，也对哥白尼的学说做了介绍并大量引用其在《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可谓集欧洲天文学新说之大成。而徐光启当时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得到崇祯皇帝的宠信，可见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新说的开放态度远超过欧洲。

1634年，明朝还建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天文望远镜，名为简，其意思为筒（因外形如筒）。

大学者、政治活动家方以智非常重视，经常追踪西方天文学最新进展，方以智研究光学，提出光波动学说（为了与近代光的电磁波动说相区别，可以称之为



利玛 与汤若望、南怀仁（从左至右）

气光波动说)。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他还做了小孔成像实验，并且努力用自己的理论去解释常见光学现象。他还把整个科学技术按其对象，区分为“质测”（自然科学）、“宰理”（社会科学）和“道几”（哲学）三大类。他还立志邀集专家编译综合百科全书，但这个宏愿未得实现。值得一提的是，方以智晚年以南明王朝宰相身份被清捕获后，途经江西万安惶恐滩，念及文天祥“惶恐滩头说惶恐”诗句，慨然自尽^a。

事实上，明朝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现在我们把林则徐、魏源看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列强。徐光启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也就是说，虽然那时关外的建州满人是明朝的大敌，但像徐光启、崇祯皇帝那样的人已经知道西方将是中国更凶恶的敌人，因此在内忧外患之中还不忘加紧引进西方科技。

明朝时不仅没有关上国门，而且还走了出去，这样使我们的航海与军事技术都始终与西方世界接轨，不至落后。

明朝末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曾经发展了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无法和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荷兰是西班牙之后、英国之前的海上霸主，但数次与郑芝龙海战，均遭败绩。

^a 史书只简略记载方以智“道卒”，历史学家余英时考证其当为自尽。

清统治的严冬来临之后，中国跟外部彻底隔绝，注定了以后被甩在世界潮流之外，以及终被列强宰割的命运。明朝的两条线，第一条是专制政治之恶，这一点被清朝完整地继承，第二条线是民间社会的生机，这在清朝却被彻底扼杀了。

乾隆皇帝跟华盛顿是同一时代的人，且在同一年（1799年）去世，他们两个人的区别，正是东西方巨大差异的写照。

有清一代两百多年，再也没出现过哪怕一个世界领先的思想家或者科学家。

也有人极力夸赞康熙皇帝学习西方科技，但这种学习局限在宫中，引进西学也很有限。他的动机和目的又是什么呢？康熙自己说：“朕幼时，钦天监汉官和西洋人不睦……朕思，己不思，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而愤而学焉。”他是为了强化皇权。学习西方科技不是国策，也没有形成社会风气，其次是为了炫耀自己。南怀仁说：“他通过这件事……便在其周围的贵人面前，能夸示自己的学问而得意！”康熙喜欢向具有较高文化水准的江南士大夫挑战，以凌驾汉人之上为快。就像他懂了一点理学之后，就嘲笑汉人讲的多是“假理学”一样，他掌握了一些西洋数学，就嘲笑汉人“一字不知”。他以天文知识拷问作弄汉臣为乐。据李光地记录：康熙说：“你们汉人全然不晓得算法，惟江南有个姓梅的他知道些。他俱梦梦。”^a这实质反映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的独特心理。而他对于采矿、冶金、机械很少涉猎。在战争结束后，出于防备汉人心理，很快下令限制火器的发展。康熙下旨说：“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此事不准行。”以至于清末平定太平天国起义时，用的还是明朝遗留下来的火炮，左宗棠偶然得到一批明朝炮弹，十分惊喜。

康熙和彼得大帝无法相提并论，他没有建立科研机构，没有派人出国考察，不鼓励臣民科学探索。所以到了雍正、乾隆，对西方科技再无任何兴趣，追求的只是西洋玩物而已。

马戛尔尼访华：近代史的开端

此间，欧洲多个国家与中国有外交往来，但总的目的无非通商求利而已，并不影响中国在东亚的独大地位。只有英国使者来访，才代表了东西方两个世界体系的接触和碰撞。

此时的东方，是一个“万国来朝”的世界体系，此时的欧洲，是一个以条约

^a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理气》，中华书局1995年版。

约定各国关系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1792年9月26日，英国皇家战舰“狮子号”“印度斯坦号”等正准备出发。这是乔治三世国王派遣的访华使团船队。为首的是乔治·马戛尔尼勋爵，副使是乔治·斯当东男爵，使团共有八百多人，堪称隆重。他们将前往遥远古老的中国，参加乾隆皇帝83岁寿辰典礼。

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帝国，已成长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王国。它的舰队，每船都装备了几十门到一百多门大炮。皇家海军是世界秩序的仲裁者。而当时的中国，表面上是强大的东亚陆上帝国，但从武器装备到政治治理，其实都十分落后，中国自己并不知道。

英国对其他国家的领土没有多大兴趣，他最大的需求在于全世界的自由贸易体系（这一点不同于后起的法国、德国等列强）。此时，英国希望与中国商谈互设外交代表机构，互派常驻使节，以及开展商务贸易。英国政府特别对马戛尔尼强调，要对中国表示平等、友好交往的态度，决不要像对一般小国那样轻慢，并同时要对中国说清楚，英国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很不幸，这些都起到了反效果，蛮夷之邦居然敢跟天朝上国谈平等，让乾隆皇帝冷笑，说没有领土野心，那就是暗示有领土野心的实力，这令皇帝很不高兴（马戛尔尼援引葡萄牙在澳门的先例，希望使用一处小岛作为贸易中转站，这项要求具有领土意味，乾隆帝严词予以驳斥）。

为了进一步帮助自己取得目标，马戛尔尼带去了英国科学和工业实力不胜枚举的样品。他给皇帝的礼物包括一些工业制造品，至少有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显示中国与英国贸易可能会获得神奇的利益：火炮、战车、镶满钻石的手表、英国瓷器、国王和王后的肖像画。

而让马戛尔尼意外的是，仅仅关于磕头问题的讨论就持续了几个星期。清廷说，马戛尔尼要么向皇帝磕头，要么空手回家。马戛尔尼拒绝这种不平等的仪式。这是第一个坚持己见的国家，清廷很吃惊。经过英国人坚韧不屈的争取，双方最后商定，马戛



马 尔尼 见乾隆

尔尼可以遵循欧洲的习俗，跪下一个膝盖。这在大清的统治者看来，马戛尔尼是被皇帝的崇高威严镇服了。

这次耗费了英国纳税人 78522 英镑的使命，最终结果是一场外交失败。这是东西方两个不同的世界体系的接触与撞击。

但英国人没有白来，他们成功地收集到了关于中国的第一手珍贵情报。值得注意的是，使团离开北京，经京杭大运河往杭州等地参观。在游历了东部中国，遍观了风土人情之后，敏锐的马戛尔尼察觉到，当时中国的科学和医学知识程度很低、知识阶层对物质进步漠不关心、其军队落后到仍然使用弓箭而缺少近代火器、普通民众生活贫穷、官场中贪污腐败非常普遍。关于清王朝的前景，他作了相当犀利的评价：“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飘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骸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

23 年后，即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国王第二次派遣了访华使团，目的仍然是与中国通商。这次因为使团拒绝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而直接被驱逐出境。

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而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产能严重过剩，更加坚定需要建立并维护自由国际贸易体系，对华武力开路的声言渐渐强大起来。只是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英国忙于对拿破仑作战、应付北美殖民地独立等全球重大事务，对最遥远的东方大帝国一时腾不出手来。

欧洲大炮改变中国：进入世界局势

18 世纪的广州，是大清国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外国人经由政府指定的“十三行”跟中国做生意。因为中国人对西方的工业产品无需求，贸易顺差严重地偏向于中国一边。外国商人前来购买茶叶、生丝等货物，是需要用金银来支付的。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船舶经常装载 90%——有时高达 98%——的黄金，只有 10% 的货物是商品。1781—1790 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 1640 万两，1800—1810 年则达 2600 万两。这种贸易顺差持续到 19 世纪 20 年代中期才趋于平衡。1826 年之后，贸易平衡开始向相反一端倾斜：1831—1833 年间将近有 1000 万银两从中国流出。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逆差进一步扩大。

是什么东西引起了这一贸易平衡的急剧逆转呢？只有一样东西：鸦片。

鸦片危害国人的健康，自不待言。鸦片贸易导致了白银大量外流。白银的大量流出，引起银价剧烈上涨。银价高涨，大大加重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负担，因为他们出售产品所得的是制钱，而交纳捐税要按银价折合。银荒又引起了商业的停滞和物价的上涨。鸦片引起的一系列的恶性循环使得社会各阶层逐渐认识到了其巨大的破坏性。

其实道光皇帝早就下令禁烟，但是大清国吏治腐败，官员们早已结成了鸦片产业链利益集团，因此道光年间反倒是鸦片输入最多的时候。

满朝大臣当中，林则徐对禁烟的态度最为坚定，于是道光皇帝任命他负责。林则徐坚决宣称“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于是扣押英使、英商，在虎门海滩挖了两口巨大水池，从1839年6月3日到21日，把两万多箱英国鸦片倾倒入海，用石灰煮沸，予以公开销毁。这个举措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

英使、商人被扣押、财产受损失，让这个新崛起的第一强国感到十分受辱，主战声音四起。但鸦片是肮脏的走私生意，即使在英国国内也不受舆论支持。故在是否对华开战问题上，英国议会发生了激烈辩论。反战者批判鸦片生意，主战者所谈的重点不在鸦片，而在政治荣誉和自由贸易诉求。

最终，英国议会以9票之差通过决议，决定采取炮舰政策，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那次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

这场战争，即便没有鸦片，也很难避免。民族间的生存竞争是以赤裸裸的武力为终极手段的。当时在华的传教士们，大都批判鸦片，而支持对华战争，这可以代表西方人的主流心理。

英国政府遂派全权代表懿律率领海陆军队来华。懿律在广东并不进攻，仅宣布封锁海口。封锁以后，北上派兵占领定海。以后主力舰队直到天津大沽口。英方目的明确：远道征伐，不宜久战。直捣心脏，迅速逼降才是上策。坚船利炮，腐朽落后的大清国哪能抵挡？

当英军逼近京城的时候，道光帝慌了神。他急忙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应付。琦善看到了英军的先进，回想中国的设备落后，以及现在的战况——大海及长江的天险已为外人所据，决计“抚夷”。可是他依旧停留在天朝上国和蛮夷野邦的国际观念上，觉得自己要帮助英国人“伸冤”，不仅打击政敌林则徐，同时也屈辱地答应满足英国人的苛刻条件。但是，当犹豫不决的道光帝听说英国人要割让香港岛时，出于对祖宗之地不可丢的义愤，又变成了坚决的主战派。英国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自然也恼羞成怒。

从这时起中英双方皆一意主战，彼此绝不交涉。

到了1842年夏，英军步步胜利，并逼近南京（道光帝得到的消息是胜利、胜利、胜利，最后忽然全部失败了）。清廷被迫屈服了。

鸦片战争开始的时候，英国远征军总人数7000人，以后逐渐增至2万人，这样一支小股部队，击败了总人口超过4亿、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军队的帝国。清廷遂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约定了一些交往的原则框架，第二年又签订了细则条款（鸦片问题在条约中没有提及，等于默认合法）。

战争失败了，原因并不复杂：中国以古代农业社会的军力，不可能对抗得过近代工业化国家。然而这个道理，当时只有少数一些人明白。

跟英国人打过交道的林则徐和琦善，都清楚地看到了中英间的巨大差距。

林则徐是主战派，主张“剿夷”。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在当时的清朝士大夫看来，只是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林则徐充满信心，可惜他没有与英国人一战高下的机会。国人因此并不服输。

但是林则徐的抗争不仅仅拘泥于古法，他是一位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的人物，他对于西方的很多看法和做法也是明智和具有预见性的。他到广东以后，发现中国军器不如西洋，就竭力买外国炮、外国船，同时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把所搜集的材料给了魏源。魏源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这本书流传到日本，促进了日本的维新。

可惜的是，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并没有带动时代变革，他虽有这种洞见，但是怕引起舆论反对，所以藏着不说，仅仅写在私人信件里，还嘱咐对方不要外传。他太爱惜羽毛，宁可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听任国家走向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形象和名誉去与流俗奋斗。林则徐尚且如此，别人更不必说了。

而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等人，虽然也看清了中外的强弱差异，但是在应对的方式上又是华夷之辨的老一套，束手无策，提不出也不想提出解决方案。

总体来看，鸦片战争之后，士大夫群体的世界观仍然没有任何变化。于是举国在自以为是中又浪费了20年的宝贵光阴。

在此期间，也有优秀的士人发展出了比林则徐更有远见的理论，例如徐继畲著述《瀛环志略》。他推崇美国民主制度，大清国浙江省宁波府1853年赠送美国的花岗岩石碑，援引他的话“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至今仍被嵌于美国华盛顿纪念塔第10层内壁。但是之后，举国上下士大夫围攻他为洋人张目，徐在千夫所指中处境十分艰难（连林则徐都带头攻击他）。徐继畲的处境很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态，几十年后曾国藩

的幕僚郭嵩焘出使欧洲，回来后著书赞美欧洲的治理，竟引发谩骂如潮，湖南士绅全都耻于与之伍，郭嵩焘虽然看清了，但是却不能有任何作为，郁郁终老。所以，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国民，其实无法建设现代化的国家。

鸦片战争虽然缔结了条约，但国人的世界观并没有发生变化，对待英国依然是老一套。实际上，签订《南京条约》之后，顽固守旧分子反倒更加得势了，主政广东的徐缙云、叶名琛反感洋人都是有名的，因此中英双方一直存在大量细节性矛盾摩擦。例如《南京条约》约定，英国商人可以入住广州城，但实际上英国人一直进不去。英国使者要找广东巡抚叶名琛谈判，叶不愿见面，英国使者四处寻找中国官方谈判，发现没有一个人回应——在他们看来外交渠道等于断绝。英国人后来逐渐认定，对大清无理可讲，他们只认识大炮。

条约不能获得履行，英国人起初还愿意隐忍，1856年，叶名琛派兵登上悬挂英国国旗的“亚罗号”商船上搜查，英国积累已久的怒火终于趁机爆发。此时，法国有两名传教士在广西被杀，于是，英法两国组成联军，诉诸武力。联军北上，大清的铁骑在天津、北京一带被打成肉泥，咸丰皇帝逃出北京。英方自感多次受到天朝侮辱，怒火积累已久，下令烧毁、洗劫圆明园。

咸丰帝逃跑，28岁的恭亲王奕訢留守北京城，独自面对英法大军。奕訢原来坚定反对洋人，接触之后却惊讶地发现，这些夷人竟然颇为讲究规则信义，只要求一定的赔偿，而且谈定了就愿意主动退兵——按照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他们本可以称帝、占有整个中国，但是他们却言而有信地退兵了，不仅如此，他们竟然还愿意帮助中国现代化，连最不可思议的出售先进武器、帮助训练新军都不成问题。恭亲王意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失为一个办法。

此次战争后，沙俄使者出面调停，并成功使得清政府割让150多万平方公里



鸦片战争后签约场景

的领土作为回报，而不费一枪一弹，从而成为最大的赢家。回顾历史，俄国外交十分狡诈：总是以帮助的美好名义，实行最根本的侵略。甲午战争后，俄国故技重演，成功诱使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打着帮助中国对抗日本的名义，将势力延伸到中国的东北。

年仅31岁的咸丰帝还没来得及回京，就病死了。幼童载淳继位为同治皇帝，而慈禧太后联手恭亲王奕訢发动政变，处死了咸丰帝指定的辅政大臣，夺得实际权力。慈禧太后由此掌控中国达半个世纪。

恭亲王奕訢政变有功，成了政府首脑（首席军机大臣兼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真切地认识到了欧洲的先进与强大，代表大清中央政府的世界观已经大变。此后几十年间，中国与欧洲（顺及美国）开始了一段蜜月期，欧美各国对中国的来访者热烈欢迎，留下了许多美谈；西方也有许多卓越之士来华效力，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如哈佛大学毕业生马士（Hosea Ballou Morse），来华工作后写了一本《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这些西方人士中，有些（如赫德）甚至越来越迷恋中国文化，自认为成了大半个中国人。

在这种友好互助的气氛中，恭亲王奕訢以及后来的地方大臣们，例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开始了一波向西方学习的努力，后世称为“自强运动”或“洋务运动”。这波运动从发展军工业开始，逐步扩展到采矿、铁路、电信、航运、翻译出版等领域，算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开端。

中国就这样一步步被动地进入了世界局势。国际体系的力量决定着中国的命运：英国强盛时，英国主导，英国相对衰老后，日俄主导。

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为何都不能救中国

在中国内部，传统历史上的王朝衰朽周期正在降临。此次外患爆发之前，中国国内情况近乎糜烂，吏治腐败不堪，民生凋敝困苦，革命之火已经星星点点。据近代学者统计，道光年间，仅道光二十一年到二十九年，各地暴动起义竟达110次之多。

太平天国运动所处的历史背景已经不同。自古以来许多民间运动都带点宗教性质。至清朝时期，因清王朝“神道设教”，各种五花八门的鬼神信仰在中国更加大肆流行。随着西方传教势力的渗透，土宗教掺入了洋宗教，势力角逐中又加入了西方国际体系的因素。

洪秀全本是一个落第秀才，落第之后病重发疯，梦中通灵。中外民间，本来

常有一些有特异功能的通灵之人，西方称之为巫师或先知，中国民间称之为神婆、神汉。洪秀全可以说就是一个有点文化、粗通历史的神汉。

洪秀全称耶和華為天父，耶穌为天兄，自为天弟（在他的教义之中，本是三位一体的天父耶和華，一下有了两个儿子）。洪秀全自称奉天父、天兄之命来救世。崇拜耶和華上帝者“无灾无难”；不崇拜者“蛇虎伤人”。战士如果死在战场，就是登仙。孔教、佛教、道教都是妖术，孔庙及寺观都必须破坏。

洪秀全在广东传道，应者寥寥。后来跟冯云山一起去了广西，才在底层劳苦大众中打开局面，发展了一些信徒。按一些资料描述，洪秀全给人治病、救死扶伤，早期十分灵验。他们也并非一开始就想起义，只是想作为一个宗教团体自由隐居，但逐渐被官府注意并发生摩擦，发展起来后，演化成金田起义。

道光三十年（1851年）夏天，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兵。九月，攻占永安县城，定国号为太平天国，洪秀全自称天王，正式挑战清政权，永安建制，分封了东、西、南、北、翼五王。一路进兵，各地腐败官员但求自保，只追不堵，太平军并无劲敌，加上各地纷纷响应，人数便陡然壮大。短短两年后的1853年春，便打下南京，定都于此，改名天京。在繁华富贵的秦淮河畔称王称尊，是他们两年之前所不敢梦想的。

而清朝方面重用曾国藩，先是组织地方民兵办“团练”，继而任他为两江总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事，涵盖全部长江中下游，他于是得以通盘筹划，对洪秀全采取大包围的战略。同时英、美、法三国也给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不少帮助。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领导集团迅速奢侈腐化，并产生惨烈的夺权内讧。曾国藩方面却艰苦朴素、稳扎稳打。优势、劣势逐渐发生转换。

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在曾国荃领导之下打进南京，洪秀全病死，太平天国就此灭亡。

太平天国运动前后14年，波及16个省，曾占据半壁江山。

曾国藩灭太平天国后，位高权重（由于满汉之防，仍进不了军机处这一权力核心，但相比之前的汉人，掌握的实权大增），他于是可以部分地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图谋国家振兴。曾国藩及其友人、门生、同僚们，开始推动中国走向工业化，建立起一批军工厂、采矿冶金机械等企业，设立学校培养新式人才，翻译西方书籍，铺设铁路等，引领了洋务运动（自强运动）的潮流。

洪秀全和曾国藩所代表的力量，谁能为中国开辟出路？

洪秀全不能。且不说太平天国已遭失败的结果注定了他不能，单分析天国的

领导集团：革命初有成果，他们就已经迅速腐化变质，说一套，做一套。革命者宣扬废除私有制，但其领导人自己却积众了庞大的财富。他们倡导夫妻分营而居、男女平等和一夫一妻制，洪秀全本人却有 88 个嫔妃，东王有 50 多个，北王 14 个，翼王 7 个。当女馆解散时，女馆成员被分配给太平军官佐，官阶越高，得到的就越多。洪秀全为了独断后宫，学习清廷糟粕，想制造太监。于是从民间捉来许多幼童，实施阉割。殊不知，施阉割之术需有复杂的护理医学技术，岂是他们理解的割掉就行那么容易。由于没有掌握阉割技术，造成了大量男童死亡。^a更根本的是，除了狂热的宗教信仰，洪秀全没有为中国指出方向、提供改革方案（《资政新篇》基本是洪仁玕个人的想法，不能代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

然而曾国藩所领导的洋务运动又能为国家开辟出路吗？洋务运动在当时看上去是一个务实可行的选择，但从内、外两方面来分析，注定成不了太大气候。

从内部看，国家机器已经彻底锈烂腐败，清王朝为维护统治权力，压抑民间力量生长，不肯放开民营企业自由经营，一切都要以政府和国有企业来主导。这样，洋务运动学步欧洲、照猫画虎，只停留在浅表层次，自始至终与腐败和低效形影不离。归根到底，政治不改革，洋务运动只能是一棵长不大的幼苗。

从外部看，时间窗口期非常有限，生存竞争加剧、亡国迫在眉睫。甲午战争炮声响起，中国从事发展建设所需要的安定的外部环境就不复存在了。

曾国藩所领导的洋务运动建立了一批近代军工业及附属产业，但这些只能一时救大清，不能真正救中国。曾国藩个人堪称一代圣贤，却忠于清这个腐朽的政权，其原因很复杂。首先，是忠君卫道的礼教思想立场。其次，是劣法优于无法，维持一个腐败但相对统一的朝廷，优于天下大乱的现实选择。

以退而求其次的方式去维系清王朝的生命，在曾国藩自己看来也许是尽忠，但从大历史角度来看，维护腐烂的政权，实在是耽误了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批评他为“汉奸刽子手”（范文澜语），不是没有理由的。

晚年的曾国藩，曾经翻阅《红楼梦》，暗自感慨大清国犹如贾府，已趋衰朽不可救药，但不敢明言。曾国藩死后，清朝和中国，都将面临更大的暴风骤雨。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曾国藩去世之后，清王朝又残喘了 40 年，便告寿终。

a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第十六章 晚清：走向近代

自欧洲地理大发现以来，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展，国家间的生存竞争已经由原来的一地扩展到全球。西方来华派驻使节和开展贸易，不过是全球化之前的一个前奏，东西方几大文明体的正面生存竞争即将开始。

秦汉以来的古代中国，跟近现代中国，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在于中央权力的角色转换。秦汉以后的两千年，中国的中央政权是一个几乎没有外部竞争和外部制约的绝对权力，维系稳定是它最根本的目标，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社会的运行方式和社会文化；近代中国的中央权力，再次进入到类似于春秋时期的那种多个政治实体相互竞争的状态，为了适应这种竞争形式而进行的内部改造，即努力实现现代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最大的驱动力。总之，中国已经无法再处于自古以来独成一世界的状态，而变成万国中的一国。鸦片战争之后，现代国际体系塑造出“中国”这一现代概念，她需要以一国的身份参与世界各国事务，而不再是以天下共主的身份领导无边无际的“天下”（这对清统治者以及士大夫们的世界观几乎是一个摧毁，表征着逻辑转换的巨大力量）。由此，中国在外来军事挑战下，开始向近现代社会艰难转型。

鸦片战争和天平天国运动之后，大清帝国元气大伤，已经进入苟延残喘状态。其后的每一次对外战争，都是屡战屡败，都在加速帝国的淘汰进程。这一系列较量——尤其是甲午海战，清楚地证明，传统的帝国体制已经不适应全球化时代的竞争环境，必须改革。实际上，运行了两千年的帝国体制，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了。

“列强”各不相同的对华心理

环顾晚清国内和国际环境，日法英俄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向中国外围藩属国或者中国本土渗透，大清危机四伏。

“列强”这个词很有误导性，听上去好像天下乌鸦一般黑，其实他们并非同

质化，而是各有不同的文化传统，进而对中国的战略取向也迥然有别。当时李鸿章就观察到，西方国家不过是“肌肤之患”，日俄却是“肘腋之患”，而英美在后来康有为等士大夫们的笔下，已经成了“礼仪之邦”。

欧洲国家有双重心理：一是帝国主义的、生存竞争的心理，意在榨取中国的资源和财富，必要时不惜动用暴力，典型的如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德国强租胶州湾；二是他们又有一种欢迎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教师心理（英美为最），清政府如果表现出愿意融入条约国际体系、愿意改革进步，他们愿意热情支持，甚至愿意出售先进的军火、战舰，甚至帮助训练军队。当然，这种双重心理都跟他们的国家利益有关（中国变为现代国家，将是欧美企业的投资地和市场，有双赢之结果）。英国首相帕默斯顿（Palmerston）曾有名言：“大英帝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不变的国家利益。”

总体来说，欧洲国家对中国不构成根本性威胁，他们的核心目的仍在于建交通商，不在于灭亡中国（我们现在最在意的治外法权、租界等“主权”问题，当时是中国主动拱手相让的，在传统的世界观中，这不是重点）。

日、俄两国却不同，这两国好比食腐动物，如果中国亡国，他们收获最大。两国居心相似，手段不同：日本思维简单粗暴，惯于暴力强夺，俄国老谋深算，每每利用乱局居中调解，大获渔翁之利。

列强之中，美国最为特殊。美国本是受迫害的清教徒所组建的年轻移民国家，保持着清教徒的诚挚信念，“天赋使命”是美国的国家神话。因此美国虽然武力强大，却一直保有一些少年般的理想情怀和道德感，甚至在国际政治中，也不完全按照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规则行动，而是经常“感情用事”，按照价值观、同情心、理想等因素决策（这一点倒像古代中国），即便时至今日，理想主义也是跟现实主义分庭抗礼的国际政治学派。因此，美国相对于欧洲和日、俄，显得比较特立独行。比如，英国人对待中国只有产出没有需求的市场，无可奈何，最后靠的是鸦片才打开局面，并用最卑鄙的暴力来保障这一罪恶的“贸易”，同期的美国不但坚决反对鸦片贸易，而且别具巧思地发现，中国其实也有需求——海獭皮，海獭皮是堪与貂皮相论美的御寒佳品，美国用海獭皮、人参（西洋参），换得了中国的茶、丝，太平洋上货畅其流。

随着日、俄崛起，欧洲各国在中国的相对竞争地位发生变化，英、美越来越倾向于强调维护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遏制日本或俄国单方面打破现状侵占中国，简直成了中国的看家之犬，典型的如义和团动乱期间，日本想浑水摸鱼进军厦门，第一个挺身保卫的竟是美国驻华使节蒲安臣，并联合英国水军把日军赶下

大海^a。其他涉及中国国运尤其是领土完整的如“门户开放”政策、八国联军及日俄战争后维护中国主权、退还庚子赔款建设大学，乃至巴黎和会以后从日本虎口中夺回山东省归还中国，都是美国所力主。

日本则对中国垂涎已久。明朝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就打算以朝鲜为跳板征服整个中国，甚至再进一步征服印度。日本被中朝联军击败后退缩回本国，但征服中国、移民大陆的思想却越来越成为主流。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力转强，于是打算再度出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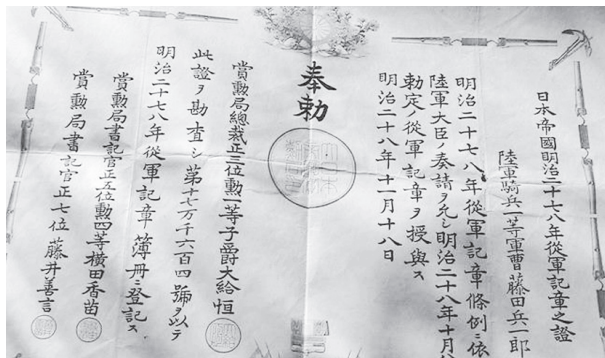
决定国运的甲午海战

太平天国之后，大清元气大伤，与此同时，日本却通过明治维新一举崛起，变为工业化的东亚强国，对中国虎视眈眈。

了解日本的野心，只要看一看《征讨清国策》，就可见一斑了。1887年2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在两次秘密侦察中国大陆和听取谍报人员汇报后，完成《征讨清国策》案，从而拉开侵华的序幕。该策在第一部分说：“若维护我帝国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屹于万国，保持安宁，则不可不分割清国，使之成为数个小邦国。”《征讨清国策》对清政府的方方面面进行了事无巨细的阐述：“清国岁入总计一亿二千五百万元有余……军备金额大约七千五百万元，但用于八旗、绿营者恰好救助贫民，于军备之上，不见利益，只是养活海陆军之防勇、练军四十万之兵力而已。”

日方还对中国旅顺口炮台、山海关、大沽及吴淞等百多所港口炮台的方位、地形等情况作了详尽描述。在日方无孔不入的情报收集中，清政府的守备力量一览无遗。

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吞并了五百年来自中国纳贡从不间断的琉球国，命名为冲绳县。琉球使者曾经向中国外交官黄



侵华罪证——甲午海战从军章、证书等

a 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第四章第五节。

遵宪哭诉，祈求中国出兵搭救，可是中国自身难保，只能眼睁睁看着琉球被吞并。至今琉球仍未能独立——但历史记忆还在，仍有琉球人在争取。

1894年，是农历的甲午年。这一年，朝鲜发生了农民起义，中日同时派军入朝。7月25日，日本海军在牙山口外的丰岛附近偷袭击沉中国运输船高升号。同日，驻牙山地区的叶志超、聂士成等部在敌人进攻后溃退平壤。于是8月1日，中国和日本同时宣战。平壤之战局势还是很可有为的，虽然朝鲜政府已经为日军所控制，但是朝鲜人民仍以极高的热情支持中国军队，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军。

9月17日，北洋海军与日本舰队在大东沟一带黄海海域遭遇，随即开战。大清北洋海军方面船舰吨数虽然较多（海军舰艇吨位在全世界列第8位，日本是第11位，但李鸿章不能协调全国的政策和军事行动，故只有北洋海军一支海军参战），且军舰不如日本军舰新，速度也不及日本。5个多小时的残酷海战后，大清北洋海军遭受重创，损失4艘战舰和1000多名士兵，日军方面只损失1艘战舰。此时天色已暗，北洋海军逃出战场的回港维修。此后，李鸿章下令海军只能守口，“不得出大洋浪战”，于是陆路战事形势也就更加不利了。日军从陆路登陆辽东、威海，甚至用威海卫炮台居高临下轰击停泊在海港内的中国舰队。

日本乘机加紧进攻，从10月下旬开始，一路日军渡鸭绿江攻陷九连城和安东，另一路日军在花园港登陆，占领凤凰城和金州，从后路包抄攻陷防务号称巩固的大连和旅顺。辽东半岛全部陷落，敌军在旅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1895年2月中，北洋海军在威海卫内被全部摧毁。到3月中，清军在关外溃败，多地沦陷。中国全面战败。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条约，其中主要款项为：①朝鲜完全“自主”，实际上即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并禁止中国协助朝鲜抵抗日本的侵略。②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后来经列强协调，还给中国）。③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④允许日本资本家在通商口岸设立各种工厂。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商船驶到上述各地。日本军国主义从中国侵占土地，勒索巨款，并进一步掠夺物资财富来发展自身势力。

以清廷之愚昧和腐败，从战争还没开始就命数注定。战前英国顾问曾建议中国购买两艘新式快船，但资金已被慈禧太后挪用建筑颐和园、庆祝六十大寿。相反，日方购买了这两艘船，其中一艘正是大海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吉野号！慈禧太后统治中国长达47年，她贪婪、愚昧、阴毒，几乎就是清政权的化身。慈禧太后全称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这么冗长的称号，并不全是拍马屁的虚文，原来她的尊号每加两个字，国库便要每年增拨20万两

白银，作为皇太后的个人津贴^a。据说八国联军侵占清宫时，清查她的私蓄，发现已达白银 1800 万两之多，她才是帝国第一巨富。慈禧太后是甲午战争的主要责任人，但不是唯一责任人。中国举国上下，被一群腐败分子集团领导着。就算是为国呕心沥血的李鸿章，本人也贪腐，他手下那些将领亲戚，贪污的军费更不知有多少了。相比之下，日本连天皇都省吃俭用，锐意进取，击败大清，实乃天理！

甲午之战关乎国运。如果中国战胜，则朝鲜可保，后来的日本、俄国侵吞东北不致发生，进而，日本全面侵华也会长期推迟甚至可能不会发生。然而，没有侥幸，大清顺理成章地战败了。

甲午战败引发了严重后果：瓜分狂潮。各国一看日本吞下半个中国，竞相争夺权力，纷纷要求划定势力范围，形成瓜分之势。幸而有列强之间相互角力：本来英国在中国占据最大的贸易额，此时一看已经落后，便暗中支持美国提出“机会均等，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各国在划定的势力范围内一律向其他国家开放，禁止独占，该政策削弱了各国的权力垄断性，缓解了对中国的瓜分。

甲午战败后的救国之路：改良与革命赛跑

甲午战争戳破了洋务运动的泡沫。

甲午战争真正地打醒了国人。洋务运动不奏效，怎样才能救国？两条不同的变革——救国思路逐渐成为主流声音：改良与革命。两派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康有为和孙文（孙中山），两人都是广东人。

马关“议和”条款传出后，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签名上书中央，主张迁都抗战，这就是“公车上书”。

孙中山早年也曾上书李鸿章建议实行改革，李鸿章置之不理，孙中山由此得出结论，建言改革无非与虎谋皮，于是决意举行武装革命，这使他走上和改良派不同的道路。此后不久，孙中山及其同志们第一次进行了武装起义的活动。孙中山于 1894 年冬在檀香山华侨中间秘密组织“兴中会”，到 1895 年 2 月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

康有为自幼便沉稳爱读书，童年时便被戏称“圣人”，他 18 岁时拜大儒朱次琦为师，受到了严格的古典学术训练。但是他又不至于局限于传统中学，同时也接触西方文化。游历香港的经历，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

a 朱维铮：《重读近代史》。



斯麦与李鸿章

志略》等书，从中学转为西学，进而举一反三，自成一体。

康有为认为，随着时代形势的变化，旧的帝国体制已彻底过时了，政府必须考虑对外关系和工业化的新问题，并相应地使其结构现代化。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是最值得学习的。

康有为通过著述论述自己的思想。他的作品大多以儒家经学的面貌出现，拉圣人孔子作陪衬，以减小阻力，结论则是融合中学习方法，倡导尊重儒学和君主立宪。其作品主要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秘不示人”的《大同书》初稿等。《新学伪经考》刊于1891年，宣告东汉以来所谓古文经学都是“新莽”（王莽）一朝之学，出于刘歆伪造^a。这部书在学术上破除盲目信古思想，在政治上打击了顽固派“恪守祖训”反对变革的思想，成为今文经学之高峰。“大同”思想提出历史不断发展的见解，算是一种进步史观，并为人类历史发展勾勒了一个模式，认为最高发展阶段将是“大同极乐世界”。

康有为中进士之前，已经名满天下，同时也充满争议——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认为康有为的经学是“野狐”，同时代的学者叶德辉讽刺康有为像“香蕉人”那样，“其表则儒，其心则夷”，根子上宗奉西学。康有为数次长途跋涉进京，试图向光绪皇帝直接上书，陈述自己的变法主张，以求匡时救世、得君行道。

不过数次受挫后，康有为最终打动了翁同龢，后者把他引荐给光绪帝。光绪帝年方青春，正思奋发有为，与康有为一拍即合，成了康有为的热心读者和粉丝，戊戌变法由此开始。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0日的103天中，教育、行政管理、工业和国际文化交流领域的40到55项变法令很快陆续颁发。

激进的改革计划受到了大多数中央和省级高级官员的抵制。废除八股文遭到了负责科举考试的礼部的强烈反对，即使是较开明的总理衙门对十二个新局的提

^a 康有为的论点，引发晚清今古文经学两派的长期辩论，但他的说法后来已经被钱穆推翻，即，古文经并非伪造。

案也感到不快。至于省级机构，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大都阳奉阴违。

这些中央和地方的官员敢于阳奉阴违，是由于他们完全清楚，真正的国家权力不在皇帝手中，而在不赞成改革的皇太后的手里。9月21日，慈禧太后派兵突袭帝宫，夺回权力。持续了短短103天的变法戛然而止，光绪帝被囚禁，直到十几年后在慈禧病重之际突然死去。

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志士以身殉国。此时奕訢已死，李鸿章、张之洞等重臣，因为同情改革，得靠边站；以慈禧太后、刚毅为代表的顽固派重新掌权，这意味着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世界观又回到了鸦片战争之前。刚毅有一番名言：变法对汉人有利，对满人有害；对于中华这块财产，宁赠友邦（外国），不予家奴（汉人）。从清朝的立场来看，刚毅这番话是很有说服力的，实际上，这就是清朝政府最后十几年生命中的指导思想。

慈禧太后本人的思想境界不高，玩弄权谋、牢牢把控权力是她的特长和本能，对现代世界谈不上任何知识性认知。所以，后来她唆使义和团暴民围攻各国驻华使馆，又同时对11个国家宣战，从而引发了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一度受到西方热情欢迎的“改革的中国”，再度成了他们眼中的野蛮国家、半开化民族。从慈禧太后再度执政开始，清王朝终于一条道走到黑，再也未能自我更化，直到彻底灭亡。

表面上，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了，但这一时期，社会却在发生静悄悄的巨变。“平等说”“民权说”“自由说”“新民说”“排满说”“革命说”“共和说”……一波波新兴思潮，不断冲刷千年皇权的固有根基，掏空千年皇权的内在精神，剥夺其正当性，看似坚不可摧的参天大树，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虚弱的空壳。

戊戌变法失败，许多社会精英得出结论：清廷不会改革，要救中国，必须武力推翻清腐朽统治。革命压力迫使清廷不得不考虑改革。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7月，清政府为了挽救危局，接受了“立宪”的口号，挂起“预备立宪”的招牌，特派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但是得出的结论正是揭露了此行的真正目的——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但主张慢慢搞，妄图借“立宪”之名缓和国内矛盾，消化革命，使清皇位永固。缓兵之计只能使政府的公信力更加丧失殆尽。清王朝到处都是气数已尽的气象。

辛亥革命与南方独立

对清廷假改革彻底绝望的社会精英，决意革命。

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一面行医，一面结纳反清秘密会社，准备创立革命团体。孙寻求海外华侨、秘密会社、基督徒、传教士等人的帮助。

首先对他伸出援助之手的是海外华人秘密会社洪门。洪门的成立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明灭于清、神州陆沉之后，士大夫星流云散，其中有人逃亡到台湾地区或者日本（例如朱舜水）。留在大陆的，秘密组建洪门，代代相传不忘反清。洪来源于繁体字“漢”字，去掉右侧中、土，含义为“汉失中土”。两百多年之后，洪门后人反清的宗旨已经接近淡忘，基本是一个江湖义气之合了。此时，洪门的历史记忆被孙中山再度点燃，因而力挺孙中山的革命。

1894年秋，孙中山前往檀香山，在兄长帮助下，于1894年11月24日组织了兴中会，最初会员为112人。孙计划将活动扩展至美国，因此他匆匆返回中国，以便利用中日战争的有利局势。他返回香港，并于1895年2月21日在此建立兴中会总部，并在各地设立支部。会员均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样，第一个革命团体便诞生了。

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极大地转变了革命的特征与方式。孙中山从此以后能从留学生、不满现状的文人与进步军官中找到支持，这些人无疑是中国的领导群体。

当时南洋大臣张之洞主政湖北，锐意培育新军。湖北新军的装备、作战能力与北洋军队不在一个档次，但声威满东南，主要靠军心旺盛、军中学风浓厚。湖北新军吸收了许多留日归国学生，他们在日本期间，多受同盟会影响，思想上早已反清。军中有共进会、文学会，都是革命思想充沛的组织。

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新军中的一些基层军官密谋起事，并打算邀请在沪的革命家黄兴与宋教仁（孙此时在海外）前来指导革命。革命之火随时可能被点燃。

四川的保路运动此时爆发，清廷拆东墙补西墙，将部分湖北新军调往四川镇压，武昌要枢防守顿时空虚，而这一时机也很快为革命党人所利用。

1911年10月10日，起义爆发，工程营率先夺取了武昌的官方军火库，继而联合炮兵营向总督衙门进攻，总督与提督闻讯逃跑。新军起义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至中午时分，他们便完全控制了武昌。由于没有真正的革命领袖在场（孙此时在海外，黄兴仍在上海），他们于是强迫清军协统黎元洪担任军政府大都督。同时，长期以来对革命表示支持的湖北前任谘议局局长汤化龙获推举为军政府的民政部长，负责组建初步的行政机构。汤一面电告各省，敦促他们宣布脱离清廷，一面成功地使在汉口的外国领事认识到，他们在混乱之际应保持中立。因而当逃



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

去的清朝总督要求外国领事调来炮舰轰击革命军时，法俄领事只简单地说，此时的形势与义和团事件之际是迥然不同的。而其他领事们则严守中立。10月12日，汉口与汉阳亦落入革命军之手。

孙中山后来追忆，胜利来得很侥幸。如果清总督没有被吓跑，如果提督仍坚守职位，便可能击溃那估计仅二千余人的单薄的革命力量。当然，各国的中立也帮助了革命事业，此后，最令人鼓舞的形势发展是南方其他省份与重要城市相继宣告独立。

当时，清政府在各省都设有“督军”，军队数量多则数万，少则几千。武昌首义之后，南方各省督军（北洋系控制北方，思想守旧，南方与北洋系不属同一阵营）先后通电宣告独立，帝国政治秩序开始土崩瓦解，大清帝国由此解体。

回望清朝灭亡，它亡于谁之手？亡于自己一手训练的新军之手。新军代表各地方宣告独立，大清帝国在绝望中挣扎了几个月之后，就咽气了。

帝国的终结：大清朝的最后一天

辛亥年的寒冬是清廷的统治者最难熬的一个冬天。紫禁城虽然表面上还保持着帝国的威严，但它的主人已经感到了末日的临近。隆裕太后还不死心，她临朝训政，一方面下诏罪己，并下令释放所有政治犯，作出变革的姿态，另一方面急召袁世凯回京，派袁世凯带兵去武汉镇压起义。

袁世凯出兵武汉，炮轰起义军，但并不赶尽杀绝，而是同时在双方渔利，讨

价还价。他在向南方军事施压的同时，又派代表与武昌革命政府秘密接触。谈判在上海进行，清廷的和谈特使是袁世凯亲信唐绍仪，南方独立各省的首席代表是老资格外交官伍廷芳。双方共议和五次，障碍重重。南方政府为尽快结束南北战争，迅速推翻清政府，向袁世凯作出公开承诺：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逼迫清室退位，大总统之位非他莫属。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再次致电袁世凯重申这个承诺。袁世凯于是打定主意：出卖清王室，换取大总统宝座。

紫禁城里，可怕的一天到来了。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来到养心殿，奏请隆裕太后召开皇族会议讨论帝位去留问题。袁世凯带有逼宫性质的强硬行为给当时只有6岁的皇帝溥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辞别隆裕太后，袁世凯经东华门出宫，遭到革命党人的袭击。这一次暗杀行为使袁世凯找到了要挟清政府的借口，从此他称病不再上朝。皇宫里关于退位的争执更加激烈，近卫军将领良弼坚决反对退位。隆裕太后多次召集御前会议也没有结果，良弼成了革命党人刺杀的另一个目标。1912年1月26日晚，良弼在家门口遭到炸弹袭击，刺客是青年的革命党人彭家珍，他自己也被当场炸死。同一天，在前线作战的段祺瑞等50名将领通电逼宫，性质等于造反，隆裕太后彻底崩溃了，她代表清廷，最终决定认输，下诏辞位。

1912年2月12日，农历腊月二十五日，再有五天，辛亥年就要过去。但对于清帝国来说，它已经熬不过这个年关了。

这天上午，隆裕太后携6岁的皇帝在养心殿举行了最后一次朝见仪式，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等14人，亲历了帝国最后一刻的政务交接。整个交接过程平静、快捷。代表袁世凯出席朝见的外务大臣胡惟德，带领着大臣们向皇太后和皇上行三鞠躬新礼，隆裕太后将三道辞位诏书交给胡惟德，颁行天下。

至此，清朝268年的历史画上了句号。不唯如此，在中国实行了2132年的帝制，也就此终结。

推翻了清王朝是辛亥革命的唯一成果。旧的秩序已经崩溃，新的秩序还没有生成。对于中国的四亿民众来说，一个痛苦而宏伟的转型历程，才刚刚开始。



第四卷
大国问路

第十七章 民国：寻找制度的苦难历程

248

至简中国史

大转型：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大清帝国在肉体上元气大伤，在精神上认同感彻底崩溃，已经进入苟延残喘状态。其后的每一次对外战争，都在加速帝国的淘汰进程。一系列战争较量——尤其是甲午海战，清楚地证明传统的帝国体制已经不适应全球化时代的竞争环境，必须改革。

国人针对时弊，提出了若干救国改革方案：有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方案（魏源）、中体西用方案（张之洞），有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方案（明确主张变更国家体制），有孙中山的革命共和方案，还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基尔特主义等其他各种流行一时的思潮主张。

这是帝国体制在竞争失败后面临的变局，也是其必然演化过程的开始。中国历史由此进入第二次大转型时代：从帝国体制向现代社会转型。

现代化运动反映在我国的内容与特性，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六大项目：

一、独立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国家形式。此种国家形式显然是和我国固有的“民无二王”的世界性国家形式（universal state）迥然有别。

二、工业化和社会化的国民经济。我国固有的是农业的国民经济和不平均的财富分配制度。

三、合乎人类理性，合乎科学，并能适应工业化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社会制度。我国的旧道德和旧社会制度，凡不能与此三点配合的（例如：“三纲”、盲婚、守节、宗族制度等）均在现代化运动过程中逐渐被扬弃。

四、专精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研究。

五、教育及其工具之普及。

六、民主政治。亦即是一种足以保障基本人权，采用多数决定和法治的原则，

用选举方式产生的政治制度。

这一发展的原动力则是由西方文化的“挑战”所产生。举此六点，我们不是说我国古代学术思想中没有这方面的学说。相反的，这六项概念都可在我国的文化遗产中找到根据，但是那些根据只是少数学者的理想，它没有成为我们的立国基础，没有形成被群众接受、蔚成一时风气，而为“举国和之”的运动。^a

其现代化转型是一个全面的、一转百转的过程，每个地区、每个行业，凡是能在现代化运动当中走在前面、起到领导作用的人，都是两百年来的豪杰人物，这些人何止千千万！他们构成了我们民族的领导群体，他们是民族的中流砥柱。

对于如何实现现代化，国人也有各种不同主张，各种思想流派蔚为大观。但这在非西方国家应对西方国家挑战所进行的转型中，是一种普遍现象。世界上所有非西方国家面对西方的挑战，应对思路归结起来可分为：A. 基马尔主义（又译凯末尔主义，指全面拥抱现代化和西方化）；B. 改良主义（拥抱现代化，拒绝西方化）；C. 拒绝主义（拒绝现代化，也拒绝西方化）。^b

穆斯塔法·基马尔（又译凯末尔）通过武装政变，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创建了一个新的土耳其。在从事这项事业和抛弃伊斯兰的历史时，基马尔使土耳其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一个在其宗教、遗产、习俗等方面是伊斯兰的社会，其统治精英却决心使它成为现代的、与西方一致的国家。在整个 20 世纪，许多国家在学步基马尔主义，试图用西方的认同来代替本土的认同。

基马尔主义在中国的反响，主要是五四时期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例如胡适、钱玄同等，这一流派之中，不少人不但视中国传统文化为实现现代化的障碍，甚至主张废除汉字。这一流派思想虽浅薄轻浮，余波却颇为长远，在台湾地区有后继者如《丑陋的中国人》的作者柏杨、作家李敖等名流，在大陆也仍有以“河殤”派为代表的大量追随者。这一流派多是文学出身，胆敢对天地万事放言高论，却又每每说些外行话而不自知（胡兰成在《山河岁月》中谈高利贷以及中国古代经济问题，让人捏着鼻子才能继续看下去，民国文人谈经世，水平大抵如此）。说外行话不但不丢丑，竟还能在中国社会得大名，更可惊的是在 21 世纪仍有市场，一般国民思想水平和判断力实在令人悲叹。

回首民国，这是一个全面向现代社会大转型的时期，又是一个在旧制度解体之后，不断寻找和尝试新制度的时期。新制度并不是从中国传统中自然生长出来，主要靠移植，因此充满了水土不服和排异反应。这一历程伴随着战争与天灾，构

a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b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成了民国的苦难画卷，这画卷之中，又因为现代基因的注入而在若干局部生机勃勃、五彩缤纷，深刻苦难的背景中，万千新气象已经在孕育。

民国建立：风雨飘摇中袁世凯掌权

民国是南北妥协的产物，不管是思想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它都像一座裂开的房子。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段风雨飘摇的过渡期——现代化的临产阵痛，其实是所有国家必经的。

辛亥革命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孙中山为革命所做出的努力和他在革命中享有的崇高威望是有目共睹的。1911年12月底，各省都督府代表在南京选举刚从国外归来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

南京政府虽然成立了，但是，清帝并没有正式退位；北方也还掌握在拥兵自重的北洋军阀袁世凯手中。这种情形决定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政府，力量极其微弱。孙中山回国之初曾宣称：“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可言。”此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充分表现了孙中山坚定的决心。并且一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就自任北伐军总指挥，宣布立即北伐，希望统一全国。但现实却是残酷的，无法支撑起孙中山的宏大理想。

南京政府的现实困难，迫使孙中山逐步妥协。首先，新政府没有作战能力。



袁世凯

南京政府本身不掌握一兵一卒，军队都在各省当权者手中。南京政府曾经提出过一个六路进军北伐的计划，尽管有详尽的作战计划，但这不过是画饼充饥。其次，就是财政拮据。临时政府初创，中央政府几乎没有直接的财政来源。当时海关由英国人管理，海关税收用以偿还外债以后的剩余，被依然在北京苟延残喘的清廷悉数囊括。安徽都督孙毓筠曾派人来要求接济，孙中山批给他20万，但胡汉民奉命到财政部提款，却发现金库中只剩10块大洋，窘迫之甚。黄兴担任陆军部长、参谋总长兼大本营兵站总督，可是发军饷、买军火都要钱，他经常奔走于南京、上海间，累得吐了血。再

次，还有同盟会内部的分裂倾向。许多同盟会成员认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从此可以安享胜利成果。章太炎曾经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两句话用来形容当时的情况，倒是贴合事实。他甚至嘲笑临时政府道：“政府号令，不出百里。”

这个刚刚成立的新政府表面上获得了半个国家的拥戴，内部却难以为继。而与此同时，它的对手袁世凯已经剑拔弩张，等待时机下手了。

袁世凯巧妙地利用两边对立的力量，为自己牟取最大利益。革命党人同意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凯表示赞同共和的条件下，把政权让给袁世凯。清帝退位，孙中山也被迫下野，并由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清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都把政权移交给了袁世凯——袁氏是洋务改革的能臣，一直思想进步、功劳巨大，连洋人都敬佩他，此刻接手政权，众望所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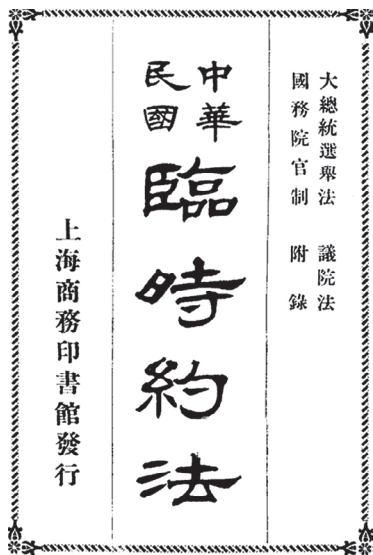
效仿欧洲：移植代议制

民国建立之后，各派政治人物试图将欧美的政治制度模式移植到中国来。可是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皇权社会，政治的土壤十分贫瘠，全国上下，能够领会国家运转要义的人，恐怕也就只有梁启超、宋教仁那么几个。自然界没有飞跃，人的观念和行为的改变，需要很长的时间。观察中美洲、亚洲各国历史，全都是经历了百年以上，才从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因此，民国初期的政治制度设计，没有传统作为根基，自然容易水土不服。

民国初年，精英阶层效仿欧洲代议制民主政府进行制度设计——制度移植，这在一开始获得了全社会的支持和殷切期待。同盟会的一些领导人物，如黄兴、宋教仁等认为民国真的是人民之国了，尤其突出的是宋教仁。宋教仁，中国“宪政之父”，与黄兴、孙中山并称，主持第一次国民党改组。他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民国的主要缔造者，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他希望通过国会和政党政治来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企图以一纸《临时约法》和责任内阁制来约束袁世凯的野心和权力。但袁世凯毕竟是个旧官僚，他老于世故、精于权术，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停留在旧时代。

袁世凯并不是一开始就冲着当皇帝去的。从民国初年他的各种妥协求全、处心积虑维持全国协调的举措来看，他也致力于让民国政府有效运转起来。

但袁世凯显然不能适应四处碰壁的状态——一定程度上，最高领导人四处碰壁可以说是代议制国家的常态，但中国没有哪个政治领导人过过这样的日子。作为大总统，袁世凯感觉国会的唯一作用就是给他捣乱。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当然，责任也不全在袁世凯方面，国会同样不合格。在每个政府部门都饥肠辘辘的时候，只有国会议员自己给自己加工资（他们掌握财政权），而且工资从不拖欠，有的甚至公然在红灯区（北京八大胡同）炫耀。

尽管各方面都有失水准，但新生事物趑趄趑趄原也正常。如果各方都能保持克制，大体维持在宪法框架之内活动，假以时日，政治走上正轨也是有可能的。放在世界历史中来看，民国初年的乱象并不荒唐。即便是英国，历史上也数次发生军人武力驱赶议员或者王权复辟的事件，其他国家效法英国，更是乱象丛生。

实际上，民国初年的政治实践，尽管局面纷乱，但是不少方面也做得有声有色。

议会、宪法、政党可谓西方宪政体制的三块基石。民初的制度移植中，建立国会、组织政党、制定宪法等相继推进。清末预备立宪中建立起来的资政院、咨议局带有西方议会的雏形。民初议会起源于各省都督府联合会及稍后的临时参议院。1913年4月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开幕，这是民国史上正式试行议会政治之始。宪法处于权力制度化的核心地位，它提供制度化的逻辑与规范。因此，制宪问题成为民初权力制度化的关键所在。根据《临时约法》，宪法起草委员会由两院议员中选出同等数目之宪法起草委员组成。1913年3月，由两院议员中选出的起草委员在天坛祈年殿开始起草宪法。

民初一度有300多个政党，但人们很快开始认识到多党林立不是稳定的政治结构，于是各党派之间不断合并，局面很快为两大政党的结构所取代。同盟会改组并与其他党合并后的国民党在首届国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则成为第二大党。

移植代议制失败与袁氏复辟

但此后，一系列历史进程使得制度移植失败。^a

^a 以下的论述框架见邓丽兰：《权力制度化的追求与挫折——民国政制史论纲》，载于《社会科学辑刊》。

移植受挫的第一层是政党政治的破产。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却不为袁世凯所容。袁世凯收买宋教仁不成，竟然指使刺客刺死宋教仁。宋教仁被暗杀使部分国民党人再次掀起“二次革命”，走上武力解决的道路。而袁世凯则借机宣布国民党为乱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使国会人数不足而直接瘫痪。孙中山遂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在组织方式上回归同盟会时代。双方都在严重践踏宪法。

而进步党人也认为，袁世凯复辟是党争的结果，转而主张“不党主义”，主张有国家而无党派，有公理而无党派。1916年国会重开后，各政派不再以政党名目相号召，“除了什么韬园、潜园，什么胡同、大街，什么系、会等名号以外，党员心目中便只有金钱同官位”。“不党主义”、政派政团的私利化瓦解了宪政民主试验的第一环。

移植受挫的第二层是国会运作的失灵。技术层面，因倾慕英国式的议会主权而加大了国会的权重，使袁世凯感觉国会总是“捣乱”。人为方面，国人并无民主政治之下生活的经验，国会一旦运作不畅便出现举国上下的失望与诋毁。国会常被指摘为“议院专制”，多次被解散，且因政局关系而分裂。一些维护制度运作的方法也以损害合法性作为代价，如通过立法延长议会任期、发给出席费、修改通过程序所规定的多数比例等。频频揭露出的贿选黑幕，也使国会与议员蒙上恶名。

移植受挫的第三层是宪法久孕不产，社会舆论由“法统迷信”转向“法统破产”。制宪之初，各派政治势力围绕国会草宪、专家草宪、政府草宪等不同起草方式展开激烈争论，当国民党人的意见占了上风后，袁世凯就煽动各地方军阀反对天坛宪法草案，中断制宪进程。国会恢复后，制宪活动却多次被政争所打断。在后来曹锟贿选触发的宪政危机中，不但国会本身的制宪权受到质疑，民国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宪法也被称为“贿选宪法”而被抛弃。



宋教仁像

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因为实力弱小，被各个击破，孙中山再次逃亡海外。袁世凯在武力镇压反对派的同时，也一步步地破坏了议会和约法。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设立政治会议。以《中华民国约法》

取代《临时约法》。民国的招牌此时已经荡然无存了。

面对转型困难，容易走回老路。袁世凯一步步走向了他一生熟悉的政治模式：称帝。经过了一系列的准备之后，袁世凯于1916年改元“洪宪”，准备举行“登基”大典。中华民国出生仅仅3年之后，便夭折了。

此时急切想做皇帝的袁世凯，已经利令智昏了。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做事方法也变得越来越奇怪，尤其对相命、风水、堪舆之类的东西更加迷信。当选大总统后，袁世凯特意请了一位“青鸟大师”，对即将入住的中南海一卜吉凶。这位风水大师装模作样地做了一番测试之后，认为中南海居震、离两方，而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乃帝王之所，有百利而无一害。袁世凯听后大喜过望，于是在大师指点下，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搬进了中南海。之外，袁世凯还找了一位郭姓堪舆家，专程去观察袁氏祖坟的风水。郭某看了十处墓地后，认为第七冢袁世凯母亲的墓最不同凡响，他说：“此坟外形，来脉雄长，经九迭而结穴，每迭上加冕，应九五之象，左右边送护卫，罗列诸侯，直帝王肇陵之形势。”袁家人听后，皆兴奋不已。郭某回到京城后，袁世凯问“东兴之运”有多少年，郭某心里没底，不知如何回答，忽然想起了“八卦”与“阴阳二气”，于是应声说：“八二之数。”袁世凯问：“是八百二十年，还是八十二年？”郭某故弄玄虚，只强调：“八二之数，天机不可泄露。”袁世凯于是自言自语说：“就算是八十二年，已历三代，我也满足了。”可让袁世凯万万没想到的是，郭某的预言虽然验证了，但不是八百二十年，也不是八十二年，而只是八十三天！

袁世凯的复辟行为终于掀起众怒。梁启超、蔡锷师生联手策动，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组织护国军，在云南首先起兵反袁，即“护国运动”。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军民的反对浪潮中病死，称帝也彻底失败。

袁世凯一生最大的秘诀，便是私有武力。他曾说：“大丈夫不可一日无兵，只须兵权在我，何畏之有？”摧毁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后，更加相信武力。上行下效，他的部属也认定武力万能，各自为谋。帝制之前，已经渐渐不听号令，这也是袁覆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后来各山头变本加厉，大者盘踞中央，小者把持一方，招兵买马，相互火并。

代议制再次失败与南北分裂

1916年6月7日，即袁世凯死后第二天，（原）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恢复《临时约法》以及旧国会，也就意味着民国法统已经恢

复。起先，1915年12月12日袁接受帝位后，曾经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固辞不受，将册封匣退回。

北洋系之乌合，靠的是利益而不是理想信仰，所以袁世凯一死，北洋系失去核心，内部很快四分五裂，相互较量实力。黎元洪并没有军事实力作为支撑，北京民国政府也由此陷入了军阀轮流把持的局面。

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被北洋军阀控制，北洋内部此时分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段祺瑞、冯国璋为北洋军阀的巨魁，早已各立门户。段虽不是省里的督军，但一直任陆军部，还有内阁总理，山东、安徽、浙江、福建、陕西、甘肃是他的势力范围。冯任江苏督军，直隶、江西、湖北督军奉他为首领，地盘不及段广阔，而富庶过之，彼此势均力敌。段为安徽人，冯为直隶人，所以他们领导的集团，分被称为皖系、直系。而张作霖统领东北三省，是为奉系。

民国法统光复后，“府院之争”导致它再次崩溃。段祺瑞以北洋正统派首领自居，掌握军政大权，与黎元洪分庭抗礼，矛盾重重。因一方为总统府，一方为国务院，所以他们间的争斗被称为“府院之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参与对德国宣战问题上，双方斗争达到白热化。

按照《临时约法》，国务院重大决定要经过总统盖印方可发布。1917年3月4日段祺瑞偕同全体阁员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国务院向国会提出对德绝交案的咨文上盖印，黎元洪沉吟不办，段愤而提出辞职，离京赴天津。后在冯国璋调解下，段祺瑞返京。

1917年4月25日，为了实行对德“宣战”，段祺瑞联络各省督军，在京召开督军团会议，对国会施加压力（军人有秩序地影响政治，并非公然武力干政）。5月10日，众议院召开会议审议对德宣战案，段祺瑞竟指使组织“公民团”在国会示威骚扰，近乎流氓手段，结果造成僵局。

5月19日，众议院以多位内阁阁员辞职，而催议咨文乃用国务院名义于法律不合，议决缓议对德宣战案，须先进行内阁改组。同一天英文《京报》揭露段祺瑞私自向日本借款一事。同日，督军团联名通电要求解散国会，改制宪法。就在此时，黎元洪瞅准时机下令撤销了他的总理职务，段祺瑞愤然离京去津，并指出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总统无权撤销总理职务，不承认黎的免职令。

之后，在段祺瑞的策动下，安徽、奉天等八省先后宣布独立。

此时，有一个要人出面调解“府院之争”——北洋军队老资格、江苏督军张勋。张勋是清统治的既得利益者，到了民国，也公然表示继续效忠清王室，为此，下令属下军人一律不准剪辫子。表面上，张勋是要调解“府院之争”，实际上，

他有自己的算盘——借机复辟清朝。

段祺瑞早已看穿，便有意放任张勋带兵入京，借张勋力量推翻黎元洪。

给段祺瑞出主意的，是下属将军徐树铮。徐树铮人号小诸葛，他的总思路，是一方面筹谋以武力统一中国，另一方面与列强周旋，尽量在大乱局之中维护中国完整。1919年，他挥师受俄国煽惑而独立的外蒙古，武力制服蒙古王公贵族，迫使他们声明放弃独立，重新回归中国（徐树铮后被刺杀）。

张勋昂然带兵来到北京城下，为政局再添一场闹剧。

张勋对黎元洪提出条件：必须解散国会。黎被迫答应，并于1917年6月12日发布命令解散国会。6月14日，张勋率5000名“辫子兵”进入京城，入京后，他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襄赞复辟大业”。

7月1日，张勋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并召开“御前会议”，改称1917年为“宣统九年”，通电全国改挂龙旗，自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复辟的首席理论家康有为被封为“弼德院”副院长，而黎元洪，当然被赶走了。

张勋复辟，帝制恢复，民国法统再次断绝。张勋复辟集团的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国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在南方组织护法政府，要恢复民国法统。

段祺瑞瞅准时机，在天津发表讨张的通电和檄文，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任参谋。4日在马厂誓师出发，5日正式开战，12日拂晓攻进北京城内。“辫子兵”一触即溃，在讨逆军的夹攻下，有的举起白旗投降，有的剪掉辫子，扔掉枪支逃命，当时北京街道上丢弃的发辫俯拾即是。

“辫帅”张勋满怀被段祺瑞利用、出卖的怨恨，仓皇逃到荷兰使馆躲藏起来。只做了12天“北京皇帝”的溥仪再次宣布退位。民国国体得以恢复。

黎元洪于事后辞去总统职，总统改由冯国璋担任，总理仍由段祺瑞担任，“府院之争”这才告一段落。民国国体又一次死而复生，此时有一个问题：恢复旧国会，还是重新组织国会？实际上两种选择皆有其合理、合法性。经梁启超提议，段祺瑞决定废止旧国会，重新组织临时参议院。

孙中山坚定主张：恢复《临时约法》，恢复被袁世凯非法解散的旧国会。显然，这是民国的法统之魂。虽然张勋复辟已经失败，孙中山失去了最主要的反对对象，但他依然决意在南方另立国家机构。1917年8月25日，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因为法定人数不足，所以称之为非常会议）。9月10日，“中华民国军政府”宣告正式成立；孙中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南北对峙局面正式形成，南北战争（护法运动）随即爆发。

由于旧国会议员分成南北两支，故南北两政府当时都有一定的法统正当性，

但也都存在合法性缺陷。

运动虽名为“护法”，但实际上以法律程序看，广州“非常国会”每次开会皆少于法定人数。因此，实际上，军政府自成立始，并不符合法定程序。广州军政府成立之后，亦一直未为外国所承认。

孙中山初期想利用南方军阀进行北伐，但他很快发现军阀自有算盘，不为他所用。孙中山在气沮之余，终于走向与苏俄结盟，借苏俄之力重组党组织、自建军队的道路（起先想联日，不成）。

北方的政局也并未走上正轨。在民国初年，宪法（约法）框架尚且能受到各方敬重，司法系统也相对独立，故纵有违反宪法的行为，大致也能在框架内纠正（例如宋教仁遇刺案，杀手被判死刑；财政部长陈锦涛贪污案，诉之于法律；段祺瑞所指使的“民团”骚扰国会，都被绳之以法，段祺瑞虽身居高位，却无可奈何）。但此后，宪法框架越来越不能约束各方，或者说，各方在内心已经放弃了共和的精神，而越来越转向赤裸裸的暴力相争，各方势力犹如饿虎争食，退化到近乎丛林法则，显然，这样的局面，最后只能等待一支更强大的力量来统一全国，美国开国初年那种各州协调组建联邦的模式，在中国走到一半便失败了。从国内看，主要是因为“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清朝遗存不能理解也不能尊重宪治，从国际看，最大的外因是苏联崛起，直接改变了中国国内的力量对比。

否定代议制思潮与新思想的诞生

民国政局混乱，各地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又适逢天灾，人民生活极其困苦，许多人甚至感到还不如前清时代。而外部世界也正在天崩地裂，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文明、撕碎了国际体系，并导致了俄国苏维埃的诞生。

内外环境反射到中国人的心里，便形成了摧毁代议制移植的最后一层：激进主义思潮的兴起。这一思潮的兴起，可以陈独秀的话作为预言：“立宪政治在19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为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思想震动。许多人认为，俄国模式是中国实现飞跃的捷径。从思想上来说，共产主义属于最新潮的思想创新，从政治上来说，苏维埃俄国频繁向中国示好，这在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好感。一时间，媒体上纷纷发表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各地涌现出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研究会、共产主义青年团之类的青年组织，他们怀着

极高的热情拥抱这一新的学说，并试图用它改造中国社会。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英、美等国为了反对日本独霸中国的企图，希望中国保持统一和领土完整。在他们的建议之下，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主张南北休战，举行议和。经过与广州军政府协商，双方同意停战并进行谈判。

这和1945年二战结束后的国共谈判有点类似，而且南北双方的分歧还小于国共之间。遗憾的是，谈判最终破裂，没有达成和平统一。从此以后，南北双方走向武力解决的轨道。

南方崛起的契机，在于搭上了苏俄。苏俄在中国的触角很广，工作极为细致深入。此前分别试图跟张作霖、吴佩孚等多个势力合作，均遭拒绝。此时处境艰难的孙中山，跟苏俄接触后，一拍即合。苏维埃俄国跟孙中山握手，背后自有他的远东战略。

孙中山的一生事业，有两个最足以影响历史：一是推翻清王朝，二是通过联合苏俄，培植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的世界相对平静，不过也有几件大事值得一记：蒙古再度脱离中国；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党成立；华盛顿会议召开（大部分内容是巴黎和会未尽事宜的延续），中国在此会议中大获全胜，所提要求，包括巴黎和会未能解决的继承德国在山东的“遗产”问题，几乎全都获得了满足。而1921年对中国历史来说，最大的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的画面，并不宏大，然而它悄然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南方革命政府初步统一中国

对孙中山来说，跟苏联合作至少有两个作用：一是用严格的纪律重组国民党，前面加上“中国”二字，称为“中国国民党”，以示跟以前有别；二是建立一支党掌握的军队。

得到苏联支持的结果，就是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苏联对广州国民政府是牢牢把控的：在国民党开中央委员会的时候，必须有俄国代表出席，俄国代表季山嘉则直接主持广州军队。广州政府的主要武器，通过斯大林安排从海参崴运到广州，广州政府的主要津贴，通过上海和香港由鲍罗廷筹集，以国际赤色劳工组织捐助名义提供给广州政府。

从此，珠江上轮船往来，运送着机枪、大炮、子弹、煤炭等重要物资。

国民党宣布联俄、联共。尚在襁褓中的中共由此实现了第一次飞跃，在几年

之内变为一个全国性大党。

苏联、中共、国民党合作于1924年5月在广州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培养军事干部，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因军校校址在广州市郊珠江中的黄埔岛上，所以简称为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学习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设立政治部，实行党代表制度，一些共产党人先后在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及教官。至北伐战争前，军校招收学生五期，成为进行北伐战争的重要力量。

1926年6月，国民党中央正式通过国民革命军迅速出师北伐案。7月1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颁布了北伐动员令。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北伐战争旨在武力统一中国。当时北方经过分化重组，主要有三支力量：一是直系吴佩孚；二是奉系张作霖；三是直系分化出来的孙传芳，另外还有中立的冯玉祥、阎锡山部。苏联军事顾问提出了集中兵力、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两湖，打垮对国民政府威胁最大而又是北洋军阀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吴佩孚，然后移主力于东南，消灭孙传芳，最后再消灭张作霖。

真正的作战也是基本按照计划实施，消灭了吴佩孚和孙传芳，完成了北伐的一期作战。

蒋介石在北伐中声名鹊起。蒋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9岁丧父，由母抚育督教，初在私塾读经史，17岁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因受日俄战争影响，1906年春，东渡日本，拟习陆军，因陈其美的介绍，加入同盟会。1920年，粤军回师广东，参与指挥作战，孙中山盛称其勇敢诚笃而知兵事。1922年，陈炯明叛变，蒋与孙在广东省河军舰共患难四十天，事后越来越得到孙中山的倚重。

蒋介石对于苏俄的看法本身与孙中山有很大不同。早在1923年8月，蒋奉孙之命，率领代表团访问苏俄。他访问的重要观感和结论是苏俄对国共施行分化。共产国际对于国民党的非议，更令他愤慨，认为苏俄的方针在造成中共为正统，决不信与国民党可始终合作。一旦苏俄政权强固，势必复活帝俄时代的野心，不仅仅要使满洲、蒙古、新疆、西藏成为苏维埃，更是要染指中国本部。他对于联俄、容共政策也缺乏信心。这是他与中共分道扬镳的历史渊源。

而北伐节节胜利时，争夺上海的控制权，成为蒋与鲍罗廷、中共决裂的近因。蒋于1927年3月26日抵上海，以白崇禧为卫戍司令。盛传工人纠察队准备强行进入租界。蒋向新闻记者声明，保证不以任何武力或群众暴动改变租界地位。国民政府将以和平协商方法，获致国际上的平等地位。

4月12日，蒋介石指示上海驻军强制收缴工人纠察队武器，工人死伤300余人，其中帮会出力不少。其他各地亦采取相同行动，而以广州最为严厉。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胡汉民任主席，通缉鲍罗廷及中共首要190余人。南京国民政府与共产党正式决裂。

1928年4月，蒋介石派兵继续北伐。当北伐军围攻直鲁军张宗昌部时，日本政府于5月出兵山东，阻止北伐，制造了血腥屠杀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蒋介石下令北伐军撤出济南，绕道北上，逼进京津。张作霖见大势已去，被迫退出北京，在沈阳附近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国民政府占领津京后，致力于用和平方式使东北归顺南京。1928年底，张学良毅然宣布“改旗易帜”，国民党政权遂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

1930年5月至11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势力角力，开始“中原大战”，蒋介石击败各方而胜出，进一步巩固了优势地位。不过中央政府的统一只是表面的，广东、广西、四川、新疆、山西、云南、贵州等省只是名义上听从南京国民政府号令，实际上是各行其是。

民国建设的黄金十年

从1927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是民国的“黄金十年”。在此期间，中华民国在经济、施政等方面皆取得了一定成就，整体环境为1840年以来中国较高水平。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央银行出台新的货币政策，这对稳定中国货币非常成功，可以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币制改革。中国第一种全面流通的不兑现钞票法币的问世，完成了货币统一并使币值脱离银价，迈入了现代化管理通货。随之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开始加深，相对地，各地地方势力，甚至租界洋行的利益有所削弱，使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出新气象。在交通建设方面，1928年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特设铁道部，积极发展铁路交通。到1936年底，国民政府制定国防交通建设计划，使交通建设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单从1936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的一年半中，就建成铁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达1353公里，这是1927年至1935年8年间年建设速度的6.5倍。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公路干线，例如平汉、粤汉、浙赣等铁路，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南京国民政府也同各列强展开了革命外交。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起了以收回关税自主权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为主要内容的改订新约运动。这场运动恢复了一些长期丧失的主权，增加了关税收入，否认了领事裁判权。

南京国民政府还推行“绝俄”政策，1929年，东北发生抢夺中东路事件，此事件导致中苏外交完全断绝。

一战之后，欧洲元气大伤，这催生了中国霉运最浓的时代。从欧洲生长出来的条约国际体系已经支离破碎，这个体系以及新成立的国际联盟，已经不能像从前几十年那样，从日、俄两恶邻爪下保护中国这个弱国的领土完整。欧洲衰落，日、俄两国的相对力量突然加重，对中国都有毫不掩饰的野心。中国等于要独自面对日、俄两强，与他们进行三国演义式的周旋。

日本军方判断：中日力量对比最悬殊的机会窗口，就在这几年，如果不果断行动，以后随着中国的长大以及国际体系的恢复，日本将永远失去侵吞中国土地的机会。如果能以武力迫使中国政府承认日本所侵占的领土，继而诱导国际体系承认“生米煮成的熟饭”，日本的战略利益便达成了。

于是，这十年间建设国家的新气象，很快被日本的侵略打断，中国的国运也从此夭折。

苏俄向中国输出了一整套思想，并将它培植为一股势力；而日本，则替这股势力打残了他的敌人。到八年抗战结束后，虽然共产党看上去比国民党弱小，但其实健康得多。再有四年，国民党败退至台湾，民国就要告一段落了。

重建代议制及其失败

孙中山晚年时提出，国家建设应该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军政时期一切制度都隶属于军政之下，训政时期则由国民党独揽大权，等训练人民实现多数省份地方自治之后，再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进入宪政时期。

1928年至1946年，是孙中山新方案的试验期。1928年10月，国民党宣布“训政纲领”，明确训政期间为6年，由国民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

训政时期没有宪法，取而代之的是国民党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但这一设计在实际运行当中弊端极大，国民党越来越成为一个腐败的执政党，而国民党之外的社会力量严重不满，许多自由知识分子要求放弃训政，恢复西方议会政治的框架，由此引发了要求结束党治、开放政权的宪政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层在内外交困中，终于认识到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有关制度改革的讨论终于列入了国民党中央会议的议程。

首先启动的是制定宪法程序。1936年5月5日，宪法草案公布。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内战结束。此后经过多次谈判，在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

终于承认中共合法地位。1938年3月，国民党又决议设立国民参政会，这成为共产党人和民主党派表达政见的公开论坛。

在宪法结构层面，从“五五宪法草案”到1947年宪法的颁布，事实上恢复了西方代议制政府中的分权制衡体系，是重新回归代议制。

但国共两方面以武力为后盾的深刻矛盾，足以撕裂这个宪政框架。

二战结束后，国民党表面看上去更强大。国民党高层普遍认为共产党只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事实上，多年连续战争，早已使得国民政府财政经济崩溃，货币几乎成了废纸。国民党内部贪污腐败成风，派系林立，在战场上见死不救。短短几年之内，共产党就以摧枯拉朽的方式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从华夏族到中华民族

民国期间，中国历史另外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国家的主体民族，由华夏族（汉族）转变为中华民族。

中华一词古已有之，近代以来，梁启超首先提议以中华民族来指代当今之中国人，这个概念后经孙中山加以推广，成为民国政府国策的一部分，遂逐渐获得全国各族人民的认同。

孙中山始终坚信单一民族的纯粹国家才能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即使在民国刚成立，迫于形势不得不在倾覆清朝政权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保守势力表示妥协的情况下，他本人也只在表面上用了“民族统一”的模糊提法，而没有附和当时流行的“五族共和”的提法。

从1919年开始，孙中山大力宣扬中国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融合为一个统一民族（像美国那样成为民族熔炉），用曾是汉族专称的“中华民族”来称谓这一统一民族，并提出了“国族”和“国族主义”的概念。

事实上，正是由于孙中山的大力宣传和倡导，“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包含中国境内全体民族的特定称谓的词汇才固定并开始流行起来。

第十八章 日本侵华：第四次生存危机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打断了中华民国建设的“黄金十年”，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华却没有被征服，反倒取得最后的胜利，这表明，现代化之后的中华民族所能凝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日本侵略扩张的千年大梦

其实日本心底深处一直有一个“大陆梦”，这个梦想代代传承了几百年，几乎沉淀成了一种文化心理。

日本“大陆梦”的模式一成不变：先染指朝鲜半岛，然后窥视中国大陆。从公元4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1500年时间里，日本向亚洲大陆的大规模暴力扩张共发生6次：

一、4世纪60年代（当中国南北朝时期），日本大和朝廷跨海入侵朝鲜半岛的新罗，征服了弁韩之地，在任那建“日本府”与高句丽对抗。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被迫朝贡日本。

二、公元600年（推古天皇八年，隋朝开皇二十年），日本为恢复任那的势力，派兵1万远征新罗。

三、公元663年8月，日本乘朝鲜战乱出兵，日本水师与唐朝、新罗水师在白村江决战，日军大败回国，后遣使向大唐系统学习。

四、千年后的明代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企图以朝鲜为跳板侵吞中国，遭到中朝联军抵抗，公元1597年11月，日本海军在露梁海战中大败。

五、又300年后的晚清时期，实现了初步工业化的日本再度染指朝鲜局势，后与中国在大东沟开战（甲午海战），日本获胜。

六、甲午海战之后，日本继续对中国大陆鲸吞蚕食，1937年全面侵华。

纵观日本历史的发展，始终以对外侵略，特别是企图征服中国，控制东亚为

基本战略。正面有官方军队，侧面则是民间的武士和浪人，后者犹如元、明时期中国沿海地区烧杀抢夺的倭寇。

亚洲大陆方面向日本主动进攻只有一次，即忽必烈时期元征伐日本。其实忽必烈很有洞察力，从日本与唐朝争夺朝鲜的主导权和不愿回到臣属关系就判断出日本不是省油的灯，迟早会给亚洲大陆带来祸害。与其让其做大，不如先发制人，及早解决。忽必烈两度征伐日本，都因遭遇海上大风暴而折戟沉沙。但此次进攻仍有震慑效果，日本两百多年不敢主动出战。

近代以来，日本的历史观念、价值观和社会运转体系，一直稳定不变。从1592年到1945年，日本在东亚地区先后发动的“壬辰倭乱”“甲午战争”和侵华战争等兵燹背后的思想观念，定调于丰臣秀吉，承绍于明治天皇，膨胀于昭和时代，已形成隐秘于事实背后一以贯之的思考模式和行为惯性。“二战”后主张切断战争间关联的意见，并不符合历史上日本人的自身说法和做法。

在丰臣秀吉的宏大计划中，除朝鲜、明朝和南蛮等地外，连遥远的印度也被纳入他的征伐对象中。具体计划第一步就是“直以其军进冲朝鲜，席卷明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打下中国之后呢，他打算把中国分赏给下属们。

为什么会是上述国度并且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这与他当时的“世界观”有关。原来中世时期的日本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即所谓“本朝、震旦、天竺”（即日本、中国、印度）。虽然日本在他国政治文化影响下建立起自身的国家权力，但不久打出的逆转式思考——“神国观”，却试图使人承认日本也是一个可以自律的世界，而且还是其他世界所无法比拟的。

丰臣秀吉虽被明朝击败，但在日本许多政治家和学者的思想深处，丰臣秀吉式的扩张幻想却代代流传从未停息^a。

1823年，左藤信渊内阁制定《宇内混同秘策》，提出要使“世界悉为皇国之郡县。万国君主皆为天皇之臣民……凡此先以吞中国始”。

甲午海战后，日本进一步壮大，同时为征服中国积蓄力量。数十年间，琉球、朝鲜的民众皆被日本所奴役。生存危机的沉重阴影继而向我国直压过来。

1927年7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了“满蒙积极政策”，世称《田中奏折》，这个秘密文件的主要内容是阐述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田中奏折》提出日本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

a 关于这一思想的流传演化详情，可参考韩东育《日本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1592—1945）》，载于《中国社会科学》。

征服中国。”之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大和民族在亚洲大陆显露身手，掌握满蒙的权利则为首要关键。”

战略大棋局

田中奏折提出的是“雄伟”的总目标，但实现这个总目标的战略路径，在日本决策层头脑当中其实并不清晰。仔细梳理，日本方面侵华战略，经历了如下的变化过程：

1. 1928 年前：

a. 日本官方“正统”思想是“满洲特殊利益”，即不直接侵华，而利用在华的代理人（如张作霖等）来保证日本的利益；

b. 民间和右翼的主流思想，即北一辉的“大东亚概念”，应该将满洲作为移民基地，建立“王道乐土”。

2. 1928 年—1937 年底：

a. 官方“正统”思想是由石原莞尔等人主持陆军参谋本部的主导，以“不扩大，不进行全面战争，将战事控制在局部冲突范围”为基础，通过“小战取胜”——“签约保障胜利成果”，以此逐步蚕食中国利益，以达到日本的最大收益。这一策略一直延续到“八一三淞沪战役”结束，军部的“吴福锡澄停止线”指令被前线军队破坏，军部事后予以默认。“南京攻略”开始，“蚕食政策”遂告破产；

b. 民间和右翼军人的观点，即“惩膺暴支”，要好好教训中国人，穷追猛打，以牙还牙。此观点的理由是基于当时日本国内宣传的“暴支恶行”，如中村事件、成都事件、三友实业社事件、柳条湖事件等等，直到二战结束后策划一系列事件的日本参谋人员说出事情真相，日本人民才知道这一列“暴支恶行”的事件，多半是右翼参谋人员一手炮制。

3. 1938 年以后，日本军部和民间，以及右翼的侵华策略基本统一，即“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以彻底征服中国为目的，而不再考虑局部的和谈以确保胜利果实，是为“全面战争”。

实际上，这个变化过程的另外一面，正是日本人因为民间思潮狂热以及战略水平低下而一步步陷入泥潭的过程。

国民政府应对日本侵略的思路，一是坚决不妥协（日本短期和局部的成果无法在法律层面得到巩固，蚕食政策失败，才会导致气急败坏的全面征服政策）；二是以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最后拖垮日本（此前蒋百里、毛泽东分别提出过

持久战可最终战胜日本)——实际上,八年战争正是按此思路进行的。

此外,美国、苏联两大国的想法也很关键:苏联希望中国能够拖住日本,成为自己的肉盾,所以后来在1937年到1939年之间,给中国大量物资援助;美国坚决不承认日本的侵略所得,要求保障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战争进程:日军大举进犯,中国苦战周旋

1931年,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先后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仅4个多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九一八事变”本是关东军几个基层军官擅自策划实施的,后来才得到日本天皇的追认和嘉奖。胜利来得如此容易,日本举国上下都有点惊喜。

“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在东北地区已经建立了以旅顺、大连为中心的关东州强大殖民机构,主要有:一是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与陆军部。1919年改民政部为关东厅;1920年改陆军部为关东军,司令官由现役陆军上将或中将充任,直属天皇。二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它主要以从事经济侵略活动为主。三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它以外交为掩护,从事各种秘密的特务活动。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军,在黄河以北其实没有一兵一卒,其主力部队一部分因为参与中原大战仍驻扎在河南(刘峙部),另一部分正在江西“围剿”红军。东北此时是张学良的地盘。蒋介石固然打算通过外交方式处理中日关系,不过“不抵抗”的命令似乎并非他发出,而只是张学良本人的意思,真相究竟如何,目前仍是历史研究的疑点。

从1935年开始,日本加紧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中华民国从前清继承了巨大的疆域,此时大部分不能守住,新疆一带、外蒙、东北北部为苏联控制,东北南部、华北为日本控制。

在当时的中国境内,共产党是唯一能够对国民党构成挑战的力量。日本侵华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三国演义”的局面。此时爆发的“西安事变”成为国共合作的关键。经过与中共秘密协商,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突然实行“兵谏”,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制造的“卢沟桥事变”,则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目的是要占领平、津,控制华北,进而灭亡中国。7月29日,北平陷落。30日,天津失守。整个华北陷入危机。

第一阶段日军主要的动向是南下和东进合并,两路并进,以最快的速度攻占

首都南京，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日军大举进攻华北的同时，加紧部署对上海的进攻。企图迅速占领上海，进逼中国的首都南京，压迫国民政府屈服，以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8月13日，日军以上海租界为据点，突向闸北进攻，并以海军舰艇猛烈攻击上海市区，制造了“八一三事变”。中国军队奋起还击，淞沪抗战由此爆发。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对日本的侵略实行自卫。

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先后出动最精锐的73个师进行淞沪大会战，坚守了3个月，给日军以重大打击（国军自己也元气大伤）。11月12日，日军占领了上海，但代价十分沉重，“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自然破产。

此后，军事战线变成了沿长江自东向西，而不是蒋介石此前曾担心的从北向南——那是蒙古人灭亡南宋的路线。

攻下上海后，日军向南京方向进迫。在敌猛烈攻势下，苏南、皖东南各地相继失守。12月5日，日军迫近南京市郊。尽管中国军队共约10万人进行了南京保卫战，但因日军攻击猛烈，未能持久。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接着，日军在南京进行了一个多月灭绝人性的烧杀抢掠，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有30万以上的中国军民惨遭杀害。在日军向南京推进时，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日军占领南京后，为沟通南北战场，打通津浦线，部队分南北两路沿津浦线夹击徐州。为粉碎日军的战略企图，国民政府在1938年春组织了徐州会战。期间，台儿庄之战歼灭日军2万余人，是正面战场抗战以来取得的首次胜利。

徐州会战后期，为保存有生力量，摆脱不利态势，中国军队从敌包围空隙中撤出转至新阵地。5月19日，徐州失陷。

南京被占领后，蒋介石仍然不屈服，日本也就仍然无法实现其速战速决的计划。于是日军继续西进，急切希望解决中国战事。

武汉会战由此成为战略防御阶段最大的一次作战。从1938年6月至10月，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大小战斗数百次，历时4个半月，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城市，在粤汉铁路建成后，它是中国内陆的重要交通中心，同时也是将南方港口运来的对外援助运往内陆的枢纽。日军侵占南京后，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当时中国的军事力量集中保卫



日军侵华暴行

武汉。由于南京的陷落没有达到令中国政府投降的目的，日本政府的战略目标是希望武汉陷落将会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增强指挥机构与作战能力，决定调整作战序列，于1938年6月中旬新编第9战区。同时决定以第5、第9两个战区所属

部队保卫武汉。参加武汉会战的部队以及空军、海军，总计14个集团军、总兵力近110万人。

武汉会战，从日军攻占安庆开始到武汉失守为止，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人的代价，毙伤日军25.7余万。此战意义重大，它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本妄想迫使中国屈服、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

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但就战略而言，则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反而更加泥足深陷。用日军自己的话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武汉之后，由于消耗巨大，日军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

1939—1940年间，中国军队先后对日军发起过四月、七月、秋季与冬季四次攻势，尤以“冬季攻势”规模最大，投入总兵力达192个师，故有人称之为“百师大战”。这些攻势给予日军相当程度的打击（日军伤亡数量或称数千，或称数万），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提到，冬季攻势“引起圣上虑念，并使中央不安”。

到了1940年7月，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已发展至近40余万人，并拥有约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近200万的民兵组织。共产党游击队神出鬼没，日军被迫分散驻守，兵力被摊薄，越陷越深。

在正面战场方面，日本仍然抱有绝望的幻想，希望国民政府能尽速投降。于是后来又决定发动对重庆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

1941年之前，中国作为一个弱国几乎是独自支撑着与日本苦战。中国军队的落后程度，今天的人们很难体会。中国军队的武器从世界各个角落进口而来，杂七杂八，口径从11.43到6.5不等，枪支规格有数十种之多，零件不能互换，子弹也极其缺乏，也就是说，很多枪支可能用几次就只能扔了。有些手榴弹、土

制地雷爆炸后，敌人竟然毫发无伤。更惨的是，中国军队实际上连肚子都吃不饱，美国人对国共两军的共同评价是：普遍营养不良，士兵在剧烈运动后会倒毙。而日本武器精良、成制式，士兵经过系统化训练，人人都会枪械拆装。

但这样堪称世界一流的敌人，没能压垮我们。新加坡之战可以作为对比。此战中，日军以三万军队攻击十万英军。英军人数虽多，但不得展开，日军速度快、作战决心坚定，单兵战斗力也超过英国，于是一举击败英军，取得辉煌胜利。英国当时仍是世界霸主，以占据绝对优势的兵力，居然守不住他们必守的新加坡，这彻底改变了西方人的看法。

日本终被拖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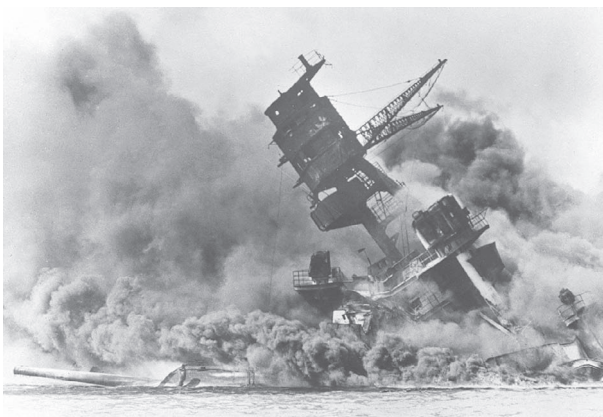
事实上，到了1940年，日本人已经发现中国战场的投入产出比太差了。欧洲战争进入白热化，他们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守备薄弱，席卷可得。1940年，日本人轻松进入印度支那（越南），法国殖民军不堪一击，很快投降，欧美震惊。

此时陷在中国的日本大军主力，可谓进退维谷：如果撤退，前功尽弃，这是日本人绝不能接受的。故日本只能两线作战，在东南亚再开一盘更大的赌局。

在此期间，日本与美国的摩擦逐渐增多。1941年，为了协调两国的关系，双方开始进行一些谈判。但双方条件差距巨大：美国要求日本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华盛顿九国公约，甚至连日本在满洲的特权都含糊其辞不予明确承认，等于是要求日本退兵到1937年7月以前的状态。日本朝野正沉浸在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中，绝不可能向美国妥协。

日军横扫东南亚，美国宣布对其石油禁运。

石油，是工业体系的命脉。日本联合舰队母港当时设在南婆罗洲的特鲁克（接近澳洲），如此远离本土，只有一个理由：石油。婆罗洲的石油可以直接使用，无须精炼（尽管用起来容易爆炸）。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炼油能力的低下和无奈。那时候没有战



珍珠港事件

略石油储备，禁运意味着日本联合舰队只能工作两年。于是日本只能变成赌徒跟美国搏命，寄希望于短期击败美国而迫使其屈服。

1941年底，美、日两国摊牌。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开战，意味着日本挑战现有国际秩序遭遇到了武力反击。

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出，重庆鞭炮齐鸣，人人相互道贺，因为他们知道，美国参战，日本必败。日本的战略劣势，不是战术胜利所能掩盖的。

日本和美国国力不可同日而语。当时只有美国拥有如此强大的国力，能在同时打两场大规模常规战争的同时，还投入大量科学家、原料和资金（约20亿美元）去发展一种效果未知的新武器（原子弹）。雷达、钢材、石化产能、飞机产能，这都是美国压倒性工业优势的自然体现，日本军人士气虽高，奈何难为无米之炊。

战争后期的日本，为了省油，培训飞行员的方式是看电影——事先摆好各种模型，用电影摄像机模拟飞行的各种动作，让飞行员看。这种训练方式基本是上天送死，但日本资源已经近乎枯竭，只能做困兽之斗。

日本终于在一个接一个的战术胜利中，走入一个战略大败局。

结局：日本投降与中国重建

国际的援助加快了中国的抗日战争由相持转入全面反攻的进程。苏联在索要了极高的价格后，也同意出兵东北，参加对日作战。这样，日本已被包围。

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两市市中心分别投下一颗原子弹，城市在瞬间变为废墟，数十万日本人在瞬间化为蒸气。

8月14日，日本裕仁天皇发布“停战诏书”。15日，日本政府正式向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向盟国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停泊的美舰“密苏里”号上举行。至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9日，在中国南京陆军总部礼堂举行了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10月25日，日本驻台湾总督签字，向中国归还台湾。

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明治天皇就通令全国，优待中国留学生，培养亲日情绪，支持一切可以祸乱中国的因素，挑动中国内战，消耗中国实力。侵华战争中，日本投入了全部陆军精华和数十年全力经营之果实，甚至日军对中国地理的熟悉，都在中国将领之上，他们还是失败了。中国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15年内军队就站在了世界第一阵营。中华民族的潜质，实在超乎所有人想象。

回顾这段历史，日本所迷恋、奉行的“大陆战略”成了它本土被摧毁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投入的作战部队很少，仅仅11个师。相比之下，它在“满洲”有13个师，在中国内地省份驻有22个师。日本1943—1944年在中国实施大规模进



日本向中华民国政府递交投降书

攻时投入了最大量资源。1945年初，就在尼米兹挥师逼近日本，日本本土遭到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时，仍有100万日军滞留在中国内地，还有约78万日军驻在中国东北。

日本是个很特殊的国家，以此之心度彼之腹很容易出现判断失误。回顾人类历史，大多数时期国家进行领土扩张的战争目的是获得生存空间，获得生存空间的最终目的是获取生存资源，古代社会里，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几乎是不可分割的。当代工商业社会体系高度发展后，随着国际金融体制和贸易体制逐步完善，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形成之中，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变得可以剥离，通过有保障的公平贸易，无须进行战争扩张，同样可以获得生存资源。另外，由于节制人口生育的科学技术已经出现，人口的无限增长不再不可控制。所以，应该说困扰日本的千年难题和导致日本千年扩张的根源已经基本消除。但根源的消除不等于从根源中派生而来的千年精神状态、价值取向、文化习性和行为方式很快会消除，不等于作为一种历史的惯性不会影响当代日本同邻国的交往。

二战结束以后，中国境内两个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展开谈判，全社会对此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在和平基础上建设国家。谈判也达成了相关协定，但之后国民党撕毁协定，于是爆发内战，几年之后，共产党击败了国民党。

第十九章 世界体系变迁与中国国运

272

至简中国史

近代以前，中国决定了所在世界的世界体系；近代以来，世界体系决定了中国。

中国所创造的世界体系，是一个万国来朝的东亚社会体系，中国犹如星系中的太阳；而影响、定义和决定中国命运的近代世界体系，是发源于欧洲的世界体系，这一体系以国际法和各国之间的条约作为基本框架。世界体系的蔓延，塑造了中国这一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世界体系内部的强权博弈，从外围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路径和国家命运。

公元 1500 年被中外学者公认为近代、现代的分界线，尽管此时欧洲的居民们还看不出他们即将统治大部分的地球，但内在的力量已经开始萌芽。

鸟瞰近代世界体系的演化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西方—非西方阶段；共产主义—非共产主义阶段；文明集团分化竞争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是西方以不同形式向外扩张以及内部争霸的阶段，最后一个阶段是人类各种文明体系分别实现现代化之后，所呈现出的权力分化局面。而中国在这其中，分别处于非西方、共产主义阵营、中华文明圈核心国家的位置。

西方的崛起

中世纪晚期（1000—1500 年）的欧洲，商业活动向更大的地理区域扩展，并开始出现跨国商业团体。随着技术的进步，海洋探险变得更安全。1492 年（明朝弘治五年），最早的探险者西班牙的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新大陆，当代国际关系相关的历史也被认为由此开始。这个“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把欧洲带入了一个扩张大周期。

在此之前，中世纪时欧洲的最高机构是教会，政府组织十分薄弱。而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教皇和皇帝的权力被剥夺，主权国家的概念得

以确立和发展，“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构成了欧洲内部的协调框架。资本主义开始在欧洲西部的一些国家（英国、荷兰等）出现，并帮助其实现经济起飞。

英国最先确立宪政体系，综合国力超过西班牙、荷兰，成长为世界头号强国，欧洲的追随者们在其身后排成了长队。英国在欧洲之外的广袤领土上实现扩张，在欧洲大陆内则充当仲裁者的角色。18 世纪的末尾属于英国，那是它稳扎稳打、蒸蒸日上的时代。

两次革命后迎来了 19 世纪：一次是反对英国统治的美国独立革命（1776 年），一次是反对君主专制统治的法国大革命（1789 年）。法国大革命初期目标只是要求立宪，并不打算颠覆君主统治，但局面失控，迅速演变为一场旨在建立共和国体的全国性大革命。大革命开启了法国向现代化转型的大幕，随后的一百年，法国三起三落，饱尝大转型之痛苦。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又卷入了新的战争中，其间拿破仑崛起，经过一系列著名的战役，拿破仑几乎征服整个欧洲。然而在 1815 年即清嘉庆十九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败给英国和普鲁士军队，之后五个欧洲强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和俄国在维也纳召开国际协调大会，以“均势”为核心确立新的国际关系，史称“维也纳体系”，它是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第二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体系，不仅给欧洲带来了一段百年（相对）和平，也在全世界形成了深远影响。

而在这段时期里，经济、技术、政治发生了剧烈的变革。18 世纪，蒸汽机被当做动力机普遍使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开始，人类的生存方式出现了革命性的颠覆。进入 19 世纪，新技术新发明不断出现——到 19 世纪 20 年代，操纵动力织机的人，其产量 20 倍于一个手工工人，而一台动力驱动的“骡”（即纺纱机）具有 200 台手纺车的能力。一个火车头能运输需要数百匹马才能运输的货物，而且速度要快得多。欧洲掌握了其他世界不可想象的巨大力量。

欧洲的崛起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其他帝国。此时的欧洲，拥有稳定的法治体系、可积累的科学技术体系、规则清晰的国际关系体系。他外在的强大和内在的健康，都是世界上其他力量所根本不能比拟的。它自身几乎不可能衰落，除非对手将它压倒。欧洲的力量伴随着航海能力溢出，海啸般地压向全世界。世界由此划分成西方、非西方两大阵营。

在这之前，欧洲对世界的侵略就已经上演。先是在明朝晚期，伴随着宗教的狂热和贪婪的梦想，一批批欧洲殖民者踏上了美洲的土地。其中，最富戏剧性的是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率领 169 名士兵征服庞大的印加帝国，南美由此逐渐沦为西班牙等国的殖民地。



维也纳会议

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对全世界的侵略速度大大提升。

在北美，印第安人在数百年被逐渐驱赶到大陆边缘，沦落到几乎灭绝的境地——白人刚到美洲时，印第安人以为他们是天神下凡，始终未能从民族生存竞争角度去理解与白人的

关系（最后濒临灭绝了才意识到，但为时已晚）。

在非洲，白人从事黑奴贸易，将非洲人像牲口一样贩运到美洲从事苦力。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自从英国的民族英雄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光顾之后，在那里生活了上万年之久的土著族群惨遭种族灭绝。

在中东，奥斯曼突厥帝国被欧洲列强围攻，横贯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属地或附属国逐渐丧失，帝国挣扎着向现代化方向转型以求自保。

在南亚次大陆，印度的蒙古王朝四分五裂，被英国各个击破，最终印度被纳入了英国版图。

在东亚，中国在明朝末年已经接触到葡萄牙和荷兰的海上武装。到清朝中期以后，欧洲的力量对中国形成压倒性优势，到清朝晚期，列强开始对中国瓜分蚕食，中国鉴于波兰、土耳其、印度的前车之鉴，在列强间艰难应付。

实力对比悬殊，征服世界看上去很容易：在大清，僧格林沁亲王的蒙古铁骑挥长矛向英法联军勇猛冲锋，结果在北京城外八里桥被打成烂泥。在1898年的中东恩图曼战役中，英军用马克沁机枪和来复枪，在几小时内消灭了1.1万名伊斯兰教托钵僧，而自己的部队只损失了48人。

工业革命为西方国家提供了领土扩张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工业强国开始只需要很少的军官和管理者就能轻易统治大规模遥远的土地。数据显示，1800年，欧洲人占领和控制了世界土地面积的35%；到1878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7%；到1914年，达到84%以上^a。

^a 数据来源：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

欧洲列强内部，相互厮杀也没有停止。英国在崛起过程中，先后以武力击败西班牙、荷兰，此后法国壮大，英国与法国在北美、非洲、印度分别开战。维也纳体系之后，虽然欧洲内部相对和平了一些，但在世界各地的角逐从未停止，欧洲内部权力变动引发的矛盾也从未停止。



西班牙殖民者屠杀印第安人

在这个“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大变局中，东方的感受，正如作家老舍的一篇小说所描述的：

“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热着。他们的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盾，都有什么用呢；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灵了啊！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穗的缠旗，绿鲨皮鞘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成昨夜的。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听说，有人还要杀下皇帝的头呢！”

中国在清朝的腐朽统治下，在全球殖民化版图中，成为砧板上的鱼肉。其中日、俄两大恶邻，给中国的撞击和国运的潜在影响，尤其巨大。然而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新阶段，此时的中国虽处境不利，却没有再次遭遇南宋、明朝的亡国命运，一方面由于中国尚有自强的能力，另一方面世界体系的存在也支撑住了中国大厦，比如，日本想扮演忽必烈、努尔哈赤的角色，从北向南征服中国，就因世界体系的存在而终不能得逞，辽东、东北土地已经衔到嘴里，却硬是无法下咽。

很显然，此时的中国要想获得生存，法门只有一个：实现现代化。

但实现现代化十分不易，它需要蹚过两百年凶险无比的“历史三峡”。正当中国全心全意向英、美学习时，西方世界的另一股浪潮——共产主义思潮，悄然

向中国蔓延过来。以后的历史表明，这股当时不起眼的潮流，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也因此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

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

1848年，时值清朝道光年间，《共产党宣言》在欧洲出炉。卡尔·马克思是这一具有感染力的“幽灵”的创始人。其理论核心在于认为：财产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个理论体系以阶级斗争为武器，以建立共产主义天堂为蓝图，以暴力革命为直接方法，并且激烈反对欧洲最主流的文化存在——基督教信仰。它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变种、作为人类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众运动，从欧洲诞生并向全世界蔓延。

共产主义最初的魅力有它的土壤：资本主义早期的工业发展，给社会带来许多痛苦和不公正现象，当时的国家体制，甚至民主国家体制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上一切不公正现象，寻求建设一个完美的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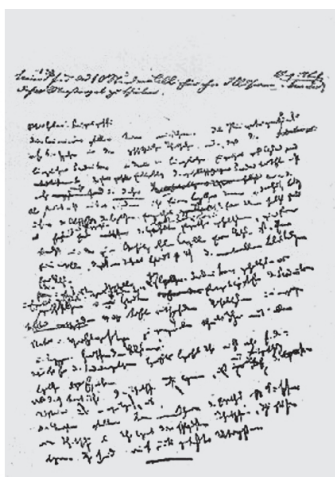
马克思本人是一个学者兼半个政治活动家，一生并无世俗社会的大功业。他的学说真正变成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是在列宁对它进行了改造之后。

一战是欧洲文明巅峰后的浩劫，战争将维也纳体系彻底撕碎。一战之后的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沙皇被推翻，共产主义理论产生了现实世界中的政权国家——苏维埃俄国。

跟俄国的专制传统相结合以后，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运行，发生了一些变化。

苏联是世界体系的挑战者，在全世界点燃革命的烈火。

在整个20世纪的世界体系运动中，后起的日、俄两强在东亚的博弈，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和历史路径。而中国的历史走向，也是共产主义运动潮流在这块土地上所泛起的一朵浪花。



图为《共产党宣言》第一版封面（左）和马克思所写《共产党宣言》草稿仅存的一页

从 1920 年开始，共产主义传入中国，并得到苏联的培育。当时的新兴知识分子，都认为这是国家可以迅速富强的捷径。共产党迅速壮大，并加入国运竞争。之后通过国共内战，共产党于 1949 年建立新中国。

二战之后，欧洲衰落，美国和苏联崛起为两个超级大国。两国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上都水火不相容，两者各自形成了世界体系：共产主义阵营和非共产主义阵营。

二战结束之后的那段时间，苏联的声望达到鼎盛，苏联模式被普遍认为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捷径。当时许多脱离宗主国的控制，新获得独立的殖民地国家，即便没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也会把苏联模式当做重要的借鉴。

这一时期，在贫穷落后的中国，领导集团模仿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希望乘坐上历史的快车。

但是短短 20 年之后，苏联模式就陷入了困境。20 世纪后半段，西方非共产主义阵营活力四射、蒸蒸日上，而共产主义阵营却日益走向僵化。这种明显的对比，首先体现在经济方面。有统计显示，到 1985 年，共产主义国家的人口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当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仅为 10%，在技术发明创造方面仅仅占到全世界的 3%。在苏联，二战结束 40 多年后，仍然要对肉类实行定量供应，家庭主妇们还要为买食品而排队。

事实上，现代经济竞争主要依靠经济资源分配的效率以及经济创造力（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创新是其中一种），而苏联式计划经济体系所到之处，不但经济资源的分配效率十分低下，创造力也都逐渐枯萎了。

到 1980 年代末，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失去了往日的革命活力：它与发达国家的生活格格不入，它协助第三世界国家摆脱社会经济发展困境的努力陷入败局。中国由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并没有被完全格式化。中国对何为马克思主义不断在继承中发展，因此不像苏联那样受灾严重、深远，而所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改革开放后）要远大于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

文明集团竞争：华夏中国涅槃重生

苏联解体，世界形势剧变。

如何看待冷战之后的世界结构？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模型和分析框架。其中，一个很有力的范式是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教授提出的“文明竞争”理论。他认为，在当今世界，人们越来越根据文化认同来重新界定自己的阵营。世界体

系由此划分为不同的集团，分布在不同的层次。

实际上，国家已经不再是国际政治唯一的主角。文明（集团）的竞争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等来界定自己。人们不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

当代的主要文明可以列举如下^a：

西方文明；中华文明；穆斯林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或有）。

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是核心国家——美国、欧联、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以及某些伊斯兰国家，将是世界舞台的主要角色。

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已经不复往昔的巅峰盛况；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非西方文明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特别是东亚社会，正在发展自己的经济财富，创造提高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基础。随着权力和自信心的增长，非西方社会越来越伸张自己的文化价值，并拒绝那些由西方强加给它们的文化价值。

上述文明集团处于不同的海拔层次。20世纪后期，西方作为一个文明步出了其发展的“战国”阶段，走向其“普适国家”的阶段。它目前的形态既像古罗马帝国的再现（世界体系的创造者和维系者），又有古代中华远无弗届的“天下”概念的影子。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以北约体系为核心组织的欧美文明集团，是目前的世界体系的建立者，也是凌驾于各大权力之上的仲裁者。

斯宾格勒所说的“西方的没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趋势，不是短期可以看到的。文明集团的竞争正在继续，在长期历史竞争中胜出，目前只有英国——英语族群曾经做到。如果说将来还可能出现一个的话，那么最有资格的参赛选手无疑是中国。自古以来，华夏世界的天赋使命是创造文明泽被万邦，随着中国社会完成凤凰涅槃的过程并再度崛起，这一古老的天赋使命完全可能重生。

a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第二十章 复卦：历史大转型进行时

国家机构像一切有机生命体一样，必须适应生存环境而不断演化。中国从封建制发展到帝国制，从帝国制被淘汰而到今天仍在进行的大转型，无不是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国被卷入工业化进程，国家组织方式随之进行运动和演化，直到其适应工业社会的组织方式、思维方式和文明模式，才会最终稳定。

新中国也经历着变化，大致梳理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到1956年是第一个阶段，1956年至1978年是第二个阶段，1978年至今是第三个阶段。

邓小平主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总体发展战略，从此，制度改革释放了社会活力。在后发优势的驱动下，中国经济开始起飞，社会面貌也正在发生全面、巨大的变化。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正处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大转型时期，现在转型的速度日益加快。

改革开放以来，最显著的事件是财富增长。对一个国家而言，财富的增长有两个源泉：一是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国际贸易的开展，这早已为经济学原理所证明。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在迅猛提高，这其中既有资源重新配置所带来的效率改善的作用，也有技术进步、管理进步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贸易也在迅猛增长，1978年时，中国只是一个出口初级农产品、矿产品的小角色，到201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到2014年时，中国每6个小时的出口额就等于1978年时全年的出口额。

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持续时间之长，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这是中国融入现行国际体系、参加国际分工所收获的丰硕果实。当然，这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中国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驱动力和长期繁荣。

两三百年来，落后农业国家转型成现代工业化国家的成功案例，在全世界有不少，例如日本、俄国、土耳其、韩国、新加坡等，中国的转型仍在继续，但对世界的影响无疑将会是更为深远的。

大转型覆盖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方面：经济方面，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企业和新的企业家不断产生，经济思想不断变化；社会治理方面，正在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观念意识方面，由农业社会的观念意识转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观念意识。

当前，中国已经实现工业化，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中国有 220 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或者第二。2010 年，中国生产了全球 83% 的空调、66% 的化纤、58% 的水泥、47% 的彩电、47% 的粗钢、46% 的煤炭、42% 的冰箱、35% 的洗衣机。^a

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每年有全世界最大的 IPO 融资额，全世界最大的期货交易规模，全世界最大的汽车产销量，全世界最多的工程师，修建着全球最多的超高层摩天大楼。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媒体、公共交通体系、教育体系、现代金融体系，等等，中国都已经初步具备。

蒋廷黻曾经在《中国近代史》中写道：“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曾保持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的世界纪录，现为继美国的庞恰特雷恩湖桥和青岛胶州湾大桥之后世界第三长的桥梁。

a 这一系列数据依据《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行业的统计数据综合计算而来。

今天，全世界对这个问题，恐怕都不会再有任何疑问。

华人具有极高的民族基因禀赋，所以能支持高速、持久的经济增长。在本书写作时，中国人长期被压抑的创造力正在发挥威力，在移动互联网、互联网金融等与国外起跑线相差不大的领域，中国已经领先于全世界。

但中国的经济奇迹并非没有代价，我们的代价也是巨大而且长久的。

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且有些污染是不可修复的。我们生存的这片土地，已遍体鳞伤：中国国土面积近 1/3 荒漠化；^a3.6 万公顷土地重金属超标；^b1/3 的水域、近半沿海海域遭受严重污染，^c这些污染都会侵蚀人体健康。随着对环境的透支和破坏，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从公元 300 年到 1950 年期间，我国西部每 31 年才爆发一次沙尘暴，1950 年到 1990 年间，每 20 个月就会出现一次沙尘暴，1990 年以来，沙尘暴几乎每年都会光顾。^d

中国目前经济运行的总体效率和质量不高，表现在创造财富所消耗的资源 and 能源非常严重。2009 年，中国的 GDP 占世界 8.6%，日本占 8.7%，但同时我们消耗了全球 46% 的煤，日本只消耗了 3.3%。生产每单位财富所消耗的能源，中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5 倍，是美国的 3.3 倍、日本的 7 倍，同时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生产每单位财富所消耗的水量，则是发达国家的 5~10 倍。

维持庞大的中国社会运转所消耗的物资数量极为惊人。中国目前每年消费 5 亿多吨粮食、6 亿头猪、47 亿只鸡、5 亿吨石油、2 万亿支香烟、5000 多万吨啤酒。同时，每年产生近 10 亿吨垃圾，每年仅浪费损失的粮食便高达 700 亿斤以上。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自有人类文明以来，从没像今天这样有这么沉重的负荷。

为什么经济发展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无疑，这跟中国的运行模式和治理水平有关。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以及更远的目标，中华民族能否再一次领导世界，都将取决于这些治理问题能否解决。

在历史大转型的洪流之中，我们脚踩着激流中的石头，已经可以眺望到彼岸。但是到达彼岸不会那么顺利，更何况还有不少从发达国家重新沦落为发展中国家的案例，例如拉丁美洲诸国。大转型时代的中国，面临着自身独有的难题：这块千万年以来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正在被透支和损毁；道统和法统沙漠化、价值

a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中国土地沙漠化概况》http://www.mlr.gov.cn/tdzt/zdxc/tdr/21tdr/tdbk/201106/t20110613_878377.htm.

b 《第一财经日报》，2010 年 11 月 17 日报道。

c 《中国经济时报》，2008 年 7 月 2 日。

d [美] 贾雷德·戴蒙德：《崩溃》，上海译文出版社。

系统虚无化的文化阴霾，可能将国人推向某种危险的生存边缘。印度圣哲甘地曾经评说，有七种罪恶足以毁灭人类：没有原则的政治，没有牺牲的崇拜，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道德的商业，没有是非的知识，没有良知的快乐，没有劳动的富裕。在今日之中国，这是尤其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现代社会，任何国家的终极发展水平，均由两个核心要素决定：一是制度环境，二是民族基因禀赋。德国、美国等国兼备两者，印度、朝鲜则分别居一个极端。所谓“劣质民主国家”的种种问题，则往往是制度和民族基因禀赋的问题同时难解、相互缠绕。中国的情况最为独特。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创造力正在释放。从炎黄时代到秦汉时代，可以视为华夏的一个上升周期，自秦汉到清朝，可以视为一个平台震荡周期，现在，第二个上升周期正在展开。

一个周期的展开好比一棵大树的生长，需要有支撑它的力量。对一个社会来说，最终极的支撑力量来自制度和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制度和思想的定型是转型完成的标志；今天这个中国第二次社会大转型，也将在制度和思想层面画上句号。思想建设的方向在于融汇中西、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它绝不会是简单的继承和复古，而是转换性创造，所谓“读经热”和“拜孔子”只不过是浅表层次的表演，根本无法触及实质内容。

我们思想创造的源头活水，在于生生不息的先秦时期（不在汉朝以后）。

中国文化原是一种集大成的文化，中国学者历来又多是一个长于集大成的群体。外来文化的输入，将会为思想创造提供新的营养。南北朝隋唐时期佛学的传入曾催生了新文化（禅宗和宋明理学），与之类似，西学东渐从明清持续至今，在未来的几十年或一两百年，将会产生新的文明交融成果。

自古以来，华夏的精神世界一直有一种“天赋使命”。这一“天赋使命”在当代并没有消失，中国的使命绝不仅仅在于自身到达现代化的彼岸，还在于为人类探索新的生存模式和哲学意义。中国古典文化以凤凰涅槃的方式完成现代化的复生和转换性创造之后，或将为人类文明创造出新的价值。

回望历史，华夏自炎黄至秦汉两千多年，仿佛《易》的《乾》卦，属阳，外向，进取，运动，壮烈如火。自汉至近世两千多年，仿佛《易》的《坤》卦，属阴，内向，保守，静止，渊默如水。今天，则仿佛《易》的《复》卦。复，古人认为这表示迷途知返，回归本源。在万千艰难之中，一线阳爻从最底部冉冉升起，势不可挡，它将融合阴阳，化育乾坤，这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生命的自我更新。

致谢名单

首先要感谢苏州同源学前教育机构董事长、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沈新鲁先生，并感谢花山仆人陈慧中先生，在我最为艰难的时刻，如果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本书就无法面世。同时要感谢大成律师事务所南通分所洪加健律师，正是由于他的提议，我才决定着手写作本书。

要特别感谢这些朋友：徐战前、魏嘉瓚两位国学大家，我的老师王桂莲、张美荣、王学艺、王继昌、王东烈、赵桂森、王梅、崔凤林、高珺泉、刘翔凌、张国栋、王志斌，以及我的好友高创中国董事长栾星、玄音琴行廖璇、赵孟春、郭涛涛和蒋芊翦贤伉俪、杨宇东、牛智敬、应民吾、杨小刚、马俊、宋冰、杨志、黄宾、任绍敏、罗敏、顾乡、徐以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炜、姑苏台酒业总裁金东生、江苏鑫信担保集团董事长付树兵、三胞集团副总裁邹衍、浦发银行行长詹定国、太湖旅游集团董事长周菊坤、兰陵美酒陈学荣、上久楷丝绸（宋锦）吴振飞、孙业庆、孙业功、王旭光、王新东、吴丽琴、拜小东、《法务在线》创始人及资深企业法律顾问牟志全、中新社王津、新京报社于平、界面网杨真福、大方广告方骥宏、肖妍茹、朱荣跃、张文虎、袁秋伟、萧歌、宋学国、李耀东、任爱民、北京书问公司董事长汤勇平、北京上德装饰总经理王华强、苏州伟基集团董事长王玉涛、苏州海诺制品公司总经理梅旭明、江苏九鼎律师事务所主任董思荣、卓一叉车总裁潘小军、亚夏股份副总裁张志文、包卫军、郭卫军、司二元、王斌、王林君、樊中江、德尔德机械总裁龚德强、顾贵水、山东广电网络邢强、大江网张涛、大众网李兆辉、新华社缪俊逸、亚朵酒店集团创始人耶律胤及市场总监吴甜甜、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罗金远、胡利强、王平、葛俊伟、沈静、苏州康提诺建材总经理周智勇。

最后，要感谢的是我的几位专项课题研究助理，他们是：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隋树坤、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殷亚伟、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周代林、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张辉、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单磊、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孙瑀岑。

鸣谢

感谢苏州姑苏台酒业对本书专项研究课题的赞助



姑苏台始建于前 492 年，相传春秋时期，吴王大胜归来，以吴地古法酿酒，犒赏功臣。该酒以糯米、麦曲、太湖水为原料，经过浸米、发酵、开耙、灌罐后酵、澄清、煎酒等 116 道工序精酿而成，醇美甘甜。诗仙李白曾云游至姑苏台，留下了“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的千古名句！